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二期
2010.10

中华书局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ISBN 978-7-101-07763-6



定价：68.00元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二期
2010.10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第2期/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1.1
ISBN 978-7-101-07763-6

Ⅰ.国… Ⅱ.北… Ⅲ.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Ⅳ.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773号

书　名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
编　者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3¾　插页2　字数35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763-6
定　价	68.00元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目录

汉学人物

研究综览



论著评介

基地纪事

汉学论坛

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

杉山正明

主持人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一次重要讲座,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到了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杉山先生大概已经出了20本书,可是遗憾的是还没有一本译成中文,是因为里面片假名太多了吗,还是因为我们没看懂,可能这些原因都存在。杉山先生在日本是蒙古史研究第一人,而且在世界学界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位大家,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对于我们的研究同行来说,应该非常关注杉山先生的研究成果,他是站在蒙古帝国,放眼全世界,做的非常之宽,我们从今天的题目和星期五的题目(马可波罗的谜团与真相)都会感觉到他的很深的学术底蕴,这个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忽视杉山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特别把他从日本请来,用非常集中的两讲来把他近年的、其实许多都是多年的思考讲出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是去年12月7号成立的,由国家汉办和北京大学合作办的一个机构,英文叫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Chin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IACS),来推动中国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汉学研究,也包括蒙古学、西藏学、中亚学等等,我们虽然前面有几讲,但真正从外国直接请来的杉山先生是第一讲。现在请杉山先生开始。

作者单位: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 根据杉山正明先生2010年5月26日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讲演录音整理。

杉山先生：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来听我的讲座，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在这个房间我做演讲是第二次，从现在开始我大概讲一个半小时。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这个题目对我来说非常难，因为很显然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在座的各位都比我知道的多。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成为一种世界史，当然我知道的世界史也是很小的一部分。我懂十几国语言，所以能从许多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史，今天我就谈一谈我的感想，演讲完毕后请大家不吝指正。

我先讲一讲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京都大学文学部签有学术交流协议，北大和京都大学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北大是1898年，我所在的京都大学是1897年，早一年。京都大学和北大的老师有很多交流，交流的结果是签订了那个协议。日本有许多学会，其中的东方学会聚集了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会和中国的学会不太一样，是没有钱的，只有东方学会特别有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背后是日本的外务省。正如大家所知的，中日发生过战争，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个时侯我还没有出生。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中国将来会怎么样还看不太清，外务省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日本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与中国搞好关系。当时京都大学的校长是羽田亨，他是个东方学家，主要研究敦煌文献和中亚文献，北大的荣新江先生从学术系统来讲可以看做是羽田亨业绩的后继者之一。当时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日本的两个中心大学，东京大学的校长不是学文科的，于是外务大臣就委托羽田先生，为了改善中日关系，先从学术交流开始。那时，日本刚刚战败，没什么钱，外务省却给东方学会拨了10亿日元，当时的10亿日元不同于今天，是一笔很可观的投入。当时给羽田先生很大支持的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先生。吉川先生通读过中国历代的文学文献，羽田先生要作演讲的话，执笔的都是吉川。东方学会建立不久羽田先生就去世了，后来由吉川先生掌管。50年代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吉川以研究中国文学为理由，经常来中国，和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会面谈话，特别是与郭沫若。这一半是为了学术交流，一半也是为了中日友好。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和美国、日本没什么联系，很长一段时间欧美的学者没办法来中国留学，就都去了日本，特别是京都大学。我今年58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欧美学者都是在京都

大学留学的，因此我跟他们都是朋友。“文革”后，中国开放了，欧美的年轻学者都到北大来留学了。

中国很长时间都是日本文明的老师，日本古代的许多都城都是模仿中国的。日本最古老的都城是京都，从794年到1867年都是日本的首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随便在哪里挖都能挖出文物来。日本文明是模仿汉字文化、汉字文明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13、14、15世纪日中的交流非常的频繁，那时的日本佛教实际上就是中国佛教，日本从中国买了很多宋版、元版的书。在中国宋版、元版流传的并不多，日本却有很多。日本有许多专门收集中国古籍的机构，但比它们拥有更多宋版、元版的是以京都为中心的寺庙。日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争，这些寺庙里保存了相当多的古籍，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我想去看他们不让，也许是因为古时候他们买这些书花费了很多钱。我认为这些寺庙里的宋元版书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这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希望北大的诸位，最好是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建议来调查这些古籍。

我今天讲演的主题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往认为四大文明中黄河文明是最晚的，但我认为黄河文明很古老。实际上关于四大文明有两个谎言。世界上的文明不只有四个，应该有许多，八个、九个、十个，都有可能，在南美也有。最早提出四大文明说法的是日本著名的学者江上波夫，他是东京大学的考古学家，战前在中国做过考古工作。我认为四大文明的说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比如说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基本在一个地方，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当然，各位也许不同意我的看法。

关于“文明”这个词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说到文明我们就想到英语的civilization和法语的civilisation，这个词实际上是18—19世纪法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发明的，它来源于罗马时代的拉丁语civis，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英国和法国认为自己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英语的civilization和法语的civilisation只是发音不同。在亚洲国家里日本是最早西化的，日本把英语和法语的这个词翻译成了“文明”，“文明”实际上是个日语的翻译词。这个词来源于《易经》，近代日本用中国的汉字来翻译西方的事物，中国、韩国、越南都是用的日本的翻译词。civilization和civilisation这两

个词本身并不坏，但难以接受的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亚洲的各国是野蛮的。日本为了成为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在拼命地努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文明”这个词特别流行。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是很畅销的书。英、法、德等国要将亚洲文明化，并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文明”是他们创造的一个具有歧视性的词，大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替换它的词当然更好。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国家很重要，那就是古代的亚述。它位于今伊拉克北部，巴格达附近，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帝国。伊拉克19世纪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是一个很恐怖的国家，它把自己统治区的文物都运回了英国。今天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全是亚述的壁画，我30年前头一次看到，当时非常震惊。亚述帝国分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相当于中国的夏，后半期相当于殷商，两方都出土了青铜器、碑文和战车。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比较晚，但我认为和其他文明应该是同时期的。亚述语中把东方叫Asu，西方叫Ereb～Irib，这个说法原样地传到了希腊，Asu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来就成了“亚细亚”，西方叫Ereb～Irib，意思是夕阳西下的地方，后来就成了“欧罗巴”，近代欧洲国家认为自己的原点在希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黑板上画图）下边是埃及，这边是亚述，这是伊朗，这是希腊，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圈。我们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欧洲人的说法，其实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下面再说说亚历山大大帝。古时候有一个阿契美尼斯王朝，比较大，也比较先进，而希腊比较小。但近代欧洲认为首先有希腊，再有罗马，再有欧洲，如果希腊不先进的话他们会很麻烦。古代伊朗语我不是非常好，但是稍微懂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欧洲所说的那些事，基本都是幻想。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看来他是英雄，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比起阿契美尼斯王朝来有点野蛮的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他跟这个比较大的比较先进的阿契美尼斯王朝打仗的时候，偶然地赢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亚历山大帝国就只有三年，只有三年的帝国怎么可能会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对我们亚洲人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佛像的问题。那么，希腊的文明传到了东方，东方的文明发生了变化，这叫古希腊化。有那么一个说法就是，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他和印度发生了接触，接触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佛像。按

以往的说法,印度的社会里是没有做佛像的习惯,而希腊人就有把神变成人的形象,就是用个石像来表现出来的习惯。那么,欧洲的说法是古希腊的神话传到了印度的西北部,和印度的文化发生了接触。恐怕大家到现在为止都是那么学的,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是公元前 4 世纪的人,但是在印度找到的最早的佛像,是公元后 1 世纪,这至少有 400 年的时间差,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400 年的差你怎么解释?400 年的空白你怎么解释?印度的佛像实际上是诞生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最近才明白的事,德里的南边有个城市,实际上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出土的佛像脸是圆的,是东方人的样子,那个地方的石头比较像沙子一样,这个公元前就已经有了。按以前的说法就是古希腊文化传到了印度,然后产生了佛像,那完全就是一个"小说"。

近代欧洲的确做了很多很不错的事情,但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19 世纪的时候,它以它海军的力量来侵略亚洲,实际上是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民主制的,认为自己接受了希腊和罗马文化而侵略别的国家是很正当的。要谈这个话题恐怕要谈一天,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谈了,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人类史、世界史的这么个时代了,作为历史学家来说,首先是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必须要弄清楚。我经常去欧洲,和欧洲的主要学者也都认识。实际上,欧洲那些主要学者,他们心里也明白,但是一般的民众、一般的国民他们还是原来那个想法,就是欧洲它有意识地犯了这个错误和无意识地犯这个错误,我们亚洲学者有必要给他们纠正。

关于雅利安人这么个说法,其实是英国人为了统治印度而编造出来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叫威廉琼斯的人,以前他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他原来是研究梵文的,我以前学过一些梵文,大家要是学一些梵文的话,就会发现梵文和英文、法文、德文多少有点像,我是 19 岁开始学习波斯语的,那时觉得波斯语和英语很像,恐怕那个时候,威廉琼斯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人种和语言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如果是印欧语系,这个说法也许可以成立的,雅利安人这个说法就不大对了。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说英国人、法国人进入殖民化之前,欧洲人已经到那儿了,所以他们到那里是很自然的结果。他的说法

其实是有这么个政治目的在那儿的。人种主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比方说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支撑纳粹的理论学说就是这个雅利安人的说法，在日本的学者当中也有同意雅利安人这个学说的，我是完全反对的。

中国文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有什么东西，要更清楚的向世界发出信号。当然研究中国历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世界史的这个角度来把中国文明很好地正确地定位，它是怎么在整体的世界史范围内发展的。应该怎么来做？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讲最后的部分。日本的都城摹仿了中国的长安和洛阳，正如大家所知，关于中国的都城规划什么的，在《周礼·考工记》里边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个对中国古代的建筑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在公元前1世纪。几乎是完全同一时期，在印度同样的一本书就是《实利论》，那里边几乎完全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不会用电脑，所以不能用 ppt 演示给大家看，上面《考工记》，下面就是印度的，正如佛教进入到中国一样，实际上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非常的近。

现在谈一谈纸，中国对世界有很多的贡献，给世界贡献了非常多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是纸。在中国纸的出现有各种说法，但是目前比较倾向于公元前250年。纸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这大概是在600年到610年。往西边传就是在750年，无疑是传到撒马尔罕，就是唐和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传到巴格达是795年，传到开罗是900年，他们用来写阿拉伯语，950年传到了利比亚，1100年传到摩洛哥的非斯(Fez)。传到意大利是1268年，实际上那是蒙古皇帝给罗马教皇 Innocentius 四世一封信的时候，那封信用的是纸，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有纸，在意大利造纸的工厂产生于1268年，第二个是1273年，第三个是1283年。纸在欧洲是非常贵重的东西，那之前用的都是羊皮，我觉得那个时候产生文艺复兴是很难想象的。

从明年开始我打算去意大利调查二、三年，在意大利有非常多关于东方贸易的材料。为什么会这样呢？1868年之前，意大利分成好多小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威尼斯是威尼斯，米兰是米兰，都是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文书馆，那里的东西应当整体上去做调查，但现在还没有人做。大概是20年前，我和日本国家电视台 NHK 制作了五个电视节目，这对 NHK 是一个重

大的事件，是日本向世界发出的信号。那个时候我虽然自己不能去，我就拜托 NHK 的人帮我查了一下威尼斯的资料，那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但是宋元时期意大利与各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明白了。历史的文献是这样的，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因为不知道所以不重要，其实不一定。

我认为 13、14 世纪以后的世界史恐怕还有很多要改进的余地，为此，需要懂多种语言，那个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意大利刚刚有纸，之前都是羊皮，而那时中国已经印刷了很多的宋版元版书。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农桑辑要》。在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两种《农桑辑要》，一种是大字本，非常大的体积，还有一种是小字本。实际上那个时候同时做了大字版和小字版，都是同时做的。原版的《农桑辑要》一次要印 1000－1500 部，1500 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中国所有的县加在一块大约是 1500 个，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县给一部《农桑辑要》。一般来说，木板印刷一次印二百部的话，基本上这个版就坏了，但是这也要看情况，国家制作的话，它会用好的木材，也有很好的技术，如果不好，也不会一次印二百部了，实际上把所有《农桑辑要》拿来计算，总共印了 15000 部。东和西到底哪个先进呢？仅从这一点来说，东方远远超过了西方。我顺便说一下，《农桑辑要》传到了伊朗，然后用波斯语写下了，这有记录。在座的有一位王一丹女士，她是波斯文专家，希望她来研究这件事情。研究波斯文的《农桑辑要》，中国文献她能读，波斯文献她也能读，两个条件都具备了。

作为研究者其实有两个做法，钻某一门钻的很深，这个当然也非常不错，还有一种就像我几个专业领域都做，这两种方法都需要，钻研的很深和钻研的很广泛。超越人种和国界这么去做的话，真正的世界史和人类史我们就能看得到。我再说一个王一丹女士非常了解的事情，我和她都读同样的史料，即拉施特的《史集》，虽然是波斯文的，但是里边包含了很多中国的史料，拉施特恐怕是犹太裔的伊朗人，在书中详细地列举了汉字的优点，他是怎样赞扬的，大家可以请教王一丹女士。

其实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再说两点。东方一直是超过西方的，中国一直比西方先进的，怎么会发生逆转的呢？转折点是在明朝。就像大家所知的，在宋元时代，中国有很多船到了印度洋，那个时候东西方贸易是中国的船和

阿拉伯的船互相合作完成的。到了永乐帝的时候，这个状态一直是持续的，比方说郑和的船。有一个说法是郑和的船超过8000吨，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谎言，从技术上来讲大概是不会超过300吨。我看了东西的史料，在永乐帝之前印度洋其实是中国的海，永乐帝之后的宣德帝整个地抛弃了以前的方针，锁国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了海上的主导权，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东方的研究和西方的研究都分开了，各做各的。我研究过西方的史料，那个时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其实非常小，根本没有技术上了不起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哥伦布，哥伦布实际上是受了马可·波罗的影响而出去航海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从结果来讲中国禁止出海了，造成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海上的局面。我不是批判明朝，自从蒙古帝国以后，世界变得非常紧密了，如果你退出某一部分，人家就会很快跟进。哥伦布航海以后100年，欧洲叫这个时代是大发现时代，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无聊，很没意思，最近我们一直在给欧洲的学者施加压力，不断对他们抱怨，他们也慢慢开始反省，于是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大探险时代，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说法，自己没有去抢夺东西，只是去探险，没有做坏事，前提是他们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坏事，不愿这么说，换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日本研究西洋史的学者做了一个愚蠢的事情，就是西方把这个时期说成是大发现的时代，日本的西洋史学者说如果自己也这么认为的话，就会非常痛苦，于是在20年前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大航海时代。这20年间，"大航海时代"这个说法很流行，而我却拼命地想要击溃这个说法。在日本的西洋史学者里边有两个人非常有名，年龄比较大，实际上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自己承认20年前说了这个话，创造了这个词。今天我批判欧洲比较多，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欧洲和美国特别跋扈，欧洲和美国他们施行武力的工具叫动力船。正如大家所知的蒸汽机是英国发明的，过了30年他们把蒸汽机装在船上。因为蒸汽船的出现，世界史改变了。在这之前是帆船，有风的话，它就会动，如果逆风的话，它也可以走三角，但是没有风它就不能走。变成动力船的话，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形成一个舰队，像在陆地上打仗一样，可以运用战术。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舰队。日本为了应对欧美也组织了舰队，并和中国发生了甲

午战争,我认为明治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没有中日的战争就没有俄罗斯的南下,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文明拥有十几亿的民众,华人分布于世界各地,将把整个世界引入到一个新的秩序中。

我已经超时了,实在对不起,谢谢大家!

(现场翻译:王铿;录音整理:李政富)

Laurence Picken and the Tang musical modes

Glen Dudbridge

One of my earliest memories of beginn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in 1959 is a concert of Chinese music given at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I had then just joined. The concert was performed by a group from China. My memory tells me that they cam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though at the distance of 50 years I cannot be sure. It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of Chinese music and also, in the speeches at the end, my first chance to hear 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outside the classroom. Yet the deepest impression that remains from that far-off occasion was left by the mild-mannered middle-aged English scholar who stood with the musicians on the stage and presented each instrument in turn, then gave an introduction to each piece of music they played, pointing out the different styles and scales deployed in them. How could an Englishman know so much about it?

This remarkable man was Laurence Picken(1909—2007). When I first saw him that day he was at the height of his career as a research scientist in the department of Zoology and was soon to publish his book *The organization of cells and other organisms*(1960),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biologists for years afterwards.

Author affiliation: Oxford University

Yet he was also well advanced in a second research career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Asian music. His appointment at Cambridge switched from Zoology to Oriental Music in 1966. In 1975 he would publish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urkey*. But long before then he had embarked on what would become the most significant research project of his long life in scholarship: reconstructing the court music of Tang China.

I learned about this when I saw him for the second time on a stage with musicians. The year was 1973, and the place was now Yale University, where I had a visiting appointment and he was offering a series of guest lectures followed by a performance. He had reconstructed the piece 'Birthday Music' 千秋乐 and had arranged it for performance by the Yale University Brass Band. It was, he pointed out in a rousing introduction, the first hearing of this piece since 729, when it was performed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Tang Xuanzong 唐玄宗. The audience was thrilled, and demanded a repeat of the whole work. Many years later, when I found myself sitting next to Picken at a dinner in Cambridge, I told him that I had been a member of that audience and remembered the occasion perfectly. Now a very old man, he was pleased to hear this, but told me of his great regret that no recording was made of the historic performance.

To understand what he had achieved we need to look at some background. Major studies of Tang musical culture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China and Japan. Ren Erbei 任二北 had published his huge study *Tang xinong* 唐戏弄 in 1958, along with other works based o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Kishibe Shigeo 岸边成雄 had published the equally huge *Tōdai ongaku no rekishiteki kenkyū* 唐代音乐の历史的研究 in 1960—1961, setting out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at musical culture. Yet neither scholar had confronted the science and texture of the music itself. They naturally knew that there was an early connection with Japan, and Ren Erbei had written:"以言日本乐舞,其声之究竟如何,非至彼邦不得闻."

Picken did go to Japan, where he made an important discovery. The court music inherited from Tang China and transmitted in the Japanese imperial court until today was quite unrecognizable as Chinese music, yet buried inside it were the melodic lines, some of Central Asian origin, which the medieval Japanese musicians had learned from China. They were concealed inside the series of chords played by the *sheng(shō)* 笙 instrument, and ove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of steady development the music had slowed down many times over and gained rich embellishment. In Japan Picken was able to study early manuscripts of the instrumental parts in the court orchestra and compare these with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over that time. Identifying the buried melodies and playing them many times faster, he was able to restore a large number of fresh, lively tunes such as greeted the ears of the Tang emperors. But how reliable was that reconstruction? I heard the question put to Picken when he once lectured on it at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 London. He answered with the mild, clear voice of a scientist: "There is no element of hypothesis in this reconstruction." Everything was there in the evidence.

The major fruit of this long endeavour has been a series of seven volumes under the title *Music from the Tang court* (1981—2000) in which Picken,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younger scholars mostly trained by himself, published performance scores of many numbers from the Tang court repertoire. These are supported by detailed research essays, many from Picken's own pen.

Back in 1966 a German scholar, Martin Gimm, had published a study of the Tang work *Yuefu za lu* 乐府杂录 by Duan Anjie 段安节, in which he gave an interpretation of Duan's statement of the modal system. Picken wrote a long review of Gimm's book (1969) offering certain corrections, but also developing a table in which the system could be clearly seen as based on four 7-note modes, each with a distinctive sequence of tones and semitones.

These four bore the names of the ancient notes *gong* 宫, *shang* 商, *jue* 角, and *yu* 羽. (The note *zhi* 徵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system.) What is more, they had direct equivalents in the church modes of medieval Europe. Picken matched *gong* with the Lydian mode, *shang* with Mixolydian, *jue* with Aeolian, and *yu* with Dorian. His ideas on the modal system later received a further, more refined statement in volume 7 of *Music from the Tang court*.

It is both surprising and impressive to learn that the underlying modal system of Tang court music shared common properties with that of medieval Europe, though Picken was quick to stress that the tunes themselves were profoundly different. But one cannot help wanting to ask the same question that was put to him above: how reliable is that reconstruction? In making it, Picken developed an elaborate technical argument to identify tones and semitones in the musical terminology used by Duan Anjie, and these alone make it possible to list out the different note-sequences of the four basic modes. Was that correctly done? Can it be verified?

I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se questions some months ago when studying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tenth-century statesman Wang Renyu 王仁裕(880—956). Born under the Tang, he spent his adult career under the changing regim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His biography in *Xin Wudai shi* 新五代史 points out that he was expert in musical theory and gives a story to illustrate how sensitively he could discern the flaws in a musical performance. That story is taken from an original document of the Later Jin 后晋 court in which we can read Wang's own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ystem of musical notes inherited from the Tang. This is what I found there: "子寅卯巳未酉戌谓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谓之宫,子丑卯巳未申戌谓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谓之商". In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musical terms found in *Yuefu za lu*, Wang Renyu used a numer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地支) to define the notes of the four basic modes. We can easily translate them into western notation: 1—3—4—6—8—10—11(羽), 1—3—5—7—8—10—12

(宫:),1—2—4—6—8—9—11(角),1—4—5—6—8—10—11(商).(There is a puzzle with the second note of 商.)These in turn can be translated into sequences of tones (T) and semitones (S), as follows: TSTTTST (Dorian) (羽), TTTSTTS (Lydian)(宫), STTTSTT (Phrygian)(角), TTSTTST (Mixolydian)(商).(I have modified the second note of 商 to make better sense.)

When we compare these results with Picken's reconstruction it is clear that three modes (羽宫商)are the same, but one (角)is different in the first two notes of the set. Here is the verification we are looking for, and it shows that Picken was nearly, though not quite completely, correct in his reconstruction. I am not a specialist in musicology and am not well qualified to analyse this further. But it has surprised me to find that Wang Renyu's clear and detailed statement, transmitted in both *Wudai hui yao* 五代会要 and *Ce fu yuan gui* 册府元龟 (twice), is not mentioned anywhere in the writings of Gimm or Picken. Nor have I yet found it analysed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hip.

Alas, Laurence Picken died a few years ago at a great age, and regrettably this material has come to my notice too late for me to seek his response to it. It would have been a fitting way to complete my long years of learning from that charming man and incomparable scholar.

Works cited:

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の历史的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1961.

Gimm, Martin: *Das Yueh-fu tsa-lu des Tuan An-chieh: Studien zur Geschichte von Musik, Schauspiel und Tanz in der T'ang-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6.

Picken, L. E. R.: "T'ang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T'oung Pao* 55, 1969, 74—122.

Picken, Laurenc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ur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icken, Laurence (ed.): *Music from the Tang cour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2000 (vols. 2—7).

京都高山寺明惠上人高辩与宋代佛教说话

矶部彰

序言:故事的往日效用

过去诞生的文学作品能被人们反复阅读,其中自有各种原因。

例如,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16 世纪以后在东亚各国广为流传,并与各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相结合,为各国人们所接受。因为该书的主题是佛教,其被接受的原因有的是出于佛教信仰的流传,有的是因为其劝善惩恶的故事情节受到了欢迎,或者有的是因为把猴子或猪作为了异形神来加以信仰,总之,《西游记》被东亚诸国所接受的动机各不相同。

本文通过日本镰仓时期作为宗教家活动的僧侣明惠上人,介绍一下东亚佛教故事带着特别的意味被明惠上人所接受,在他的一生活动中产生了各种影响的情况,以此来思考小说和故事的社会作用。然后,对过去的故事是一种超越国境和民族的共有精神文化的问题进行论述,谈谈古典小说对今日社会将会发生的作用,以致包括现代小说在内的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本文的时代背景是南宋后期,这时的日本镰仓时期正相当于北方金王朝

作者单位:日本东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已经命数将尽，高丽王国独立危在旦夕的年代，日本京都郊外的高山寺是其人物活动的舞台。

一、高山寺的历史与明惠上人

在京都西北的梅尾地区，有一座以红叶和明惠上人（见图 1），以及《鸟兽人物戏画》而知名的古刹高山寺。高山寺曾经藏有很多佛教类书籍和一些外典类书籍。高山寺自镰仓时期以来就藏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典籍，东国作为保存宋代出版文化的设施与武藏国的金泽文库齐名。在高山寺从宋朝输入宋版典籍和有关玄奘三藏方面资料的是明惠房高辩（成辩，1173—1232），被人尊称为明惠上人。近年来进行了经藏的综合调查，并公布了其整体情况。据调查结果，外典类书籍大多已经散佚，某些书籍成了其他组织的宝物[①]。

高山寺始于奈良时期，建永元年（1206），从后鸟羽院引用了《华严经》中“日出光照高山之寺”一句为寺名，并把高山寺这块地方给了明惠起，高山寺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明惠上人承安三年（1173）生于纪州（和歌山县）有田郡，8 岁成为孤儿。养和元年（1181）9 岁时，随着祖父汤浅宗重的好友僧文觉上人，以及相当于自己叔父的僧上觉（行慈房净觉）来到了高雄山神护寺。文治四年（1188），随上觉出家并在东大寺戒坛院接受了具足戒。也就是从那时起，明惠上人被称为成辩，号明惠房。从此，明惠上人一边致力于密教的修行，一边在佛教教学研究上重点攻读《华严经》。建久六年（1195）23 岁时，明惠上人走出神护寺来到纪州汤浅庵居。虽有时返回京都，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纪州修行，致力于讲解《华严经注疏》的同时，还两次立志欲前往印度。建永元年，受上皇诏书之命居住于高山寺，从此一直将梅尾作为自己主要活动的地方。承元四年（1210）起自称为高辩，建历二年（1212）对专修念佛进行了批判，并著有《摧邪轮》。后来，在李通玄“华严合论”的影响下，根据佛光观力主密教与华严相一致之说。承久之变以后，明惠上人曾救济成为败军的朝廷遗族，在设立善妙寺尼庵的同时，还与镰仓武士

①以筑岛裕先生为代表的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对高山寺的情况进行了长期的认真调查，其巨大成果作为高山寺资料丛书出版。

北条泰时相识并保持了往来。贞永元年(1232)圆寂于禅堂院,享年60岁[①]。

《高山寺圣教目录》是了解与明惠上人有很深关系的圣教类书籍的线索。据研究,编纂《高山寺圣教目录》的建长二年(1250),即明惠上人死后的第18年,其前后出现了很多关于明惠和高山寺的著述[②]。目录本身的编撰大概也是这一时期进行的。《高山寺圣教目录》鲜明地表现出镰仓中期以华严教学为中心的高山寺典籍的性质,从后鸟羽院本来就是为了华严宗的兴隆,而赐给明惠上人高山寺匾额的情况考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明惠圆寂后的高山寺,虽然多少卷入了南北朝的争乱,但寺院似乎基本保持了以往的格局。但是,在应仁之乱发生之际,遭到了山名军和细川军的先后侵占,高山寺成了厮杀的战场。特别是天文十六年(1547)闰七月,细川晴元攻打高雄之际,高山寺深受破坏几为灰烬。《华严宗祖师绘传》衬纸上的元龟元年(1570)的记录,就描述了高山寺典籍类惨遭天文战火之灾的情况:

> 华严宗祖师义湘大师绘四□、……兽物绘上中下同类□二□开田殿□□本、都合十一卷、本是高山寺东经藏之具也。先年兵乱之时、足轻共狱散、为彼兵火所々烧失了、□然坊人共拾集之间、此坊取置之、寺家有再兴之时节、可令奉纳彼藏也。……时元龟庚午七月廿一日□僧□性(花押)

东经藏的藏品被拿出,后来僧侣们把部分被烧掉的藏书捡回来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现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两种,卷头均有缺欠的情况,估计就与此有关。

高山寺从日本战国时期到织丰时期虽然逐渐走向了衰落,但后来又从江

---

①高山寺及明惠上人的研究或介绍著述很多。笔者引用的书籍有以下几种:田中久夫的《明惠》(吉川弘文馆,1961),白州正子的《梅尾高山寺·明惠上人》(讲谈社,1967),奥田勋的《明惠·遍历与梦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河合隼雄的《活在梦中的明惠》(京都松柏社,1978,据岩波版著作集第9卷),颖原退藏的《明惠上人》(生活社,1946),吉原シケコ的《明惠上人歌集的研究》(樱枫社,1976),山田岩、木村晟先生两编的《极乐愿往生歌·明惠上人歌集·本文と索引》(笠间书院,1977),镰田茂雄、田中久夫两先生编的《镰仓旧佛教》(岩波书店,1971),三山进编的《图说日本佛教第四卷·镰仓佛教》(新潮社,1988),《神护寺·高山寺》(淡交新社,1965),《古寺巡礼京都15·高山寺》(淡交社,1977),及《艺术新潮》1996年11月号"洗心大特集·白洲正子·爱的明惠上人"。

②奥田勋的《关于高山寺经藏古目录》(《宇都宫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6号第1部,1975),和《明惠·遍历与梦想》,229页。

户初期的宽永十一年(1634)左右走向了复兴。但后来由于受到明治废佛毁释风暴的袭击,很多圣教类书籍都被拿到了寺外。

二、善财童子、义湘元晓故事与明惠上人

高山寺曾藏有《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①的宋刊本,其中描述了《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善知识参问的事情(见图 2、图 3)。高山寺现存的相传是明惠在世时绘制的"春和夜神像"画②,就是其中善财参问的一部分,在《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假名行状〉》卷下的宽喜二年项中③,明惠梦中仰慕善财童子之事,建仁元年(1201)让佛师俊贺等人描绘《华严五十五善知识》④(《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上山本〉》卷中"建仁元年十一月初,奉图写善财善知识唐本之日,佛师俊贺之家缘边此鸟飞来……"⑤)之事,或明惠自身抄写《善财善知识》、《善财善知识念诵次第》等⑥,从他对华严教学十分精通的情况来看,《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可以看作是出于明惠所需而带来的东西。《高山寺缘起》中记述了南面学问所一事之后,还有以下文字:

同左角奉安置,

善财童子木像一躯,

帐四扉图绘梵天・帝尺・毗沙门天・韦陀天等像、成忍笔、上人灭后信庆施入之。⑦

---

①盖有"高山之寺十无尽院"方印的神田旧藏本,现归大谷大学所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赠图书善本书影》,大谷大学图书馆,1988,No. 17 图版"解说",39—40 页。

②《古寺巡礼京都 15・高山寺》,图版 No. 21"解说"(宫岛新一先生)137—138 页"春和夜神"(バサバエンティ主夜神),在宋本中相当于"善财童子第三十二诣"婆珊婆演底主夜神的场面。

③据高山寺资料丛书本《明惠上人资料・第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④高山寺藏《华严海会诸圣众曼荼罗图》、东大寺藏《华严海会善知识曼荼罗图》,收在《图说日本的佛教四・镰仓佛教》308、309 页中。前者为明惠的提案,后者有根据高山寺本底本描绘的说明。另外,东大寺藏《华严五十五所绘卷》,收于《续日本的绘卷 7》(中央公论社,1990)之中。亀田孜以宋本(似为《文殊指南图赞》——笔者注)为粉本,高山寺本、东大寺本是据此产生的(《佛教说话绘的研究》"东大寺华严五十五个所绘小考")。若把宋本图与《华严五十五所绘卷》相比较,应该说亀田先生的见解是很中肯的。因此,明惠曾拥有过《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一事基本可以定论。

⑤据高山寺资料丛书本《明惠上人资料・第一》。

⑥高山寺资料丛书《高山寺经藏典籍文书目录》"高山寺圣教类"第一部、第二部著录。

⑦据高山寺资料丛书本《明惠上人资料・第一》。

记载的虽是明惠上人圆寂之后的事情，但其中暗示了信庆深知明惠心中深怀善财童子情况而献上木像一尊这一点。

高山寺旧藏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描绘了善财童子参问诸善知识的情形，并采用了用赞语来结束的诗话形式。例如，在华严五十五善知识内容的第一中，善财童子在娑罗林回到了文殊师利菩萨身边，并在狮子象王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了指引。

接下来在第二里面有：

第七天在第二妙峰山参见德云比丘。

在第三海门国参见海门比丘，得以闻知十年余观海而佛祖显现，经千余年而听经的事情。

在第四楞伽道傍，参见了善住比丘，得见比丘两手持日月，身边瑞烟齐放天花四散的景象。之后，从在第五达里荼国又来到了弥加长者身边，得妙音陀罗尼法门，悟出生贵住之事起，到第二十八诣中拜访观音菩萨的场面，其描述如下：

> 善财童子第二十八诣普陀落迦山，参观自在菩萨。诸菩萨众，各坐宝石。犹如满月，共演慈音，说离恐畏，随宜摄化，得大悲行法门，证隋顺众生回向。赞曰：
>
> 迤逦山西岩下求　金刚宝石月轮秋
> 善财童子叮咛语　却问观音那路修
> 一切含生离恐畏　百千异类等调柔
> 闻思修入三摩也　犬吠鸡啼卒未休

善财童子从参拜娑罗林文殊师利菩萨始，又参拜了妙峰山的德云比丘，然后游历诸国城落、山场会处，在第四十毘岚园中领悟善慧地，又在第四十二拜谒此世界中，在佛母摩耶圣后身边得到了大愿智幻生法门。这样从善知识那里得到法门和妙境，又来到普贤菩萨身边修到了功德。最后佛国禅师看到善财童子刻苦钻研的情况，予以赞叹的词句，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最后猴行者被封为铁骨铜筋大圣的赞文很相似。《华严五十五所绘卷》(图 4)是采用以绘画为主体、伴有画赞的表现形式，《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故事是采用以文章为主体、伴

有图赞的表现形式。我们正可以从这两个画卷看到变相图与变文的关系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华严宗祖师绘传》。《华严宗祖师绘传》是描绘新罗僧元晓和义湘求法的画卷故事,是一个被称为元晓绘和义湘绘的新罗华严宗的祖师绘。

元晓绘据说是与明惠上人的信仰相关联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以元晓和义湘前往唐朝求法途中遇到大雨而借宿于坟墓,在那里元晓梦见鬼神而醒悟(图 5),于是没有入唐而是留在了新罗国内,然后撰写经论注疏而出名成为一代祖师。本画卷以此为根据,其中描写了后来元晓虽然成为仁王会导师一事受到了妨碍,但要为王后治病(图 6),他撰写大安圣者带来的金刚三昧经略传(图 7),最后到治愈王后的疾病,元晓参列朝廷而受到道俗两方赞叹(图 8)。

义湘绘是以入唐后的义湘和他心中爱慕的名为善妙的女子的故事为中心的。与元晓一同踏上前往唐朝之路的义湘,与梦见鬼神(图 5)而留在故国的元晓分手后只身入唐,并遇到了美女善妙(图 9)。但义湘压抑对善妙的恋慕之情,在长安与至相大师相识,学会了《华严经》后准备回国。昔日就对义湘一往情深的善妙,她面对生离死别不胜感伤(图 10),在岸边遥望义湘前往新罗的船只离去后,抱着赠给义湘的箱子跳入大海(图 11)。后来善妙化为一条大龙守护着义湘乘坐之船早日回到了故乡(图 12)。而且善妙还化为巨石将从旁门寺院来的异宗赶走后,把寺院交给了义湘居住,协助义湘使本教派兴盛繁荣(图 13)。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义湘的祖师传,倒很像是一部以唐代传奇小说才子佳人故事结构构思的作品,将它称之为新罗版李娃传也未尝不可。从被高山寺邀请来的女性神的善妙神,承久之乱败将的寡妇们与善妙寺建立的关系上,还有梦中当作义湘的明惠与善妙神的关系上来看,可以说义湘绘是一个与明惠上人之心密不可分的故事画卷①。

元晓绘(图 8、图 9、图 10)和义湘绘(图 11、图 12、图 13、图 14、图 15)既可以说是与《玄奘三藏图》相比的祖师传记图绘故事,又是与明惠上人密切相关

①梅津次郎的"义湘・元晓绘的成立"(《绘卷物丛考》,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8),梅津次郎的《华严缘起～二人的新罗僧之恋与修行故事～》(日本的名画,平凡社,1957),金泽弘"《华严宗祖师绘传》成立的背景与画风"(日本绘卷大成 17《华严宗祖师绘传》,中央公论社,1978)。

的图绘故事[①]。它们都是根据《宋高僧传》创作的两部图卷,内容属于佛教故事,而且还具有新罗国佛教故事的色彩。华严五十三之中,从东大寺本的祖本很有可能是通过高丽的僧义天传到日本的说法来看,华严五十三参中的善财童子故事也像义天的续藏传到日本那样,很有可能是通过宋朝与日本、高丽、辽朝与日本这两大佛教文化途径传到高山寺的。有必要注意到,善财童子绘和元晓绘、义湘绘是华严教学的一端的同时,也是与新罗、高丽这样的半岛佛教有着相互关系的。

三、明州灵鳗传与明惠上人

高山寺过去还曾藏有带《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作者佛国禅师惟白之序的《明州阿育王山如来舍利宝塔传并护塔灵鳗菩萨传》[②]。这是一部在《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五十五甲中亦有记载的宋刊本(崇宁二年序刊),这本宋刊《灵鳗传》与赞宁的撰写有关,是住在阿育王寺附近四明圣井的灵鳗的显灵传。从与明惠的关系考虑应该予以注意的是,在《明惠上人梦记》承久二年五月上旬此条中关于梦中"灵鳗"菩萨显现的记录:

> 议灵鳗口□飞腾之形事之间,日中假眠,此时不心悬此事。
>
> 忽然梦云,有一清澄池,从其中如鳗鱼跳举,长一尺余也,其形头尾具垂,其形ᔕ如此也,是即灵鳗之应验也。[③]

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明惠得到了《明州阿育王山如来舍利宝塔传并护塔灵鳗菩萨传》的结果。《文殊指南图赞》和《灵鳗传》都具有很强的佛教色彩,在中国大概是一种面向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佛教商品"。

---

①金泽弘"《华严宗祖师绘传》成立的背景与画风",83 页。

②《宋本书影》(长泽规矩也编刊,1933 年)No. 21 中作为内野氏皎亭文库所藏刊登。现为天理图书馆所藏(天理图书馆善本写真集 XIX《宋版》No. 10,1962 年)。卷末有"天保九年戊戌二月奉修补了,沙门慧友护六十有四岁"的跋和朱印。改为轴装。宋刊《灵鳗菩萨传》,在上述两本的解说中"玄敬殷贞征"各字缺笔。

③高山寺资料丛书《明惠上人资料・第二》。

《护塔灵鳗菩萨传》是北宋开宝五年(972)开刻的版本,崇宁二年(1103)重刊的北宋版本现藏于天理图书馆。该书本来是高山寺的藏本,是明治以后流出寺外的圣教类书籍之一。

在研究高山寺典籍文书类方面,现存于栂尾的《高山寺圣教目录》等书籍具有重要作用。现在的"高山寺圣教类第一部 244 号"1 帖和整理好的《高山寺圣教目录》,是宽永十年转写的写本的祖本。《圣教目录》中虽然没有版本记录,但在包着的书皮上记载着该目录是由奉上皇后嵯峨院之命的义渊房灵典编辑献上的,时间为建长二年(1250)①。在这个建长二年(1250)的《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五十五甲中记载着:

付法藏传四卷……

玄奘取经记二部　玄奘碑文一卷

……明州育王山灵鳗传一卷……

关于灵鳗传,除了北宋刊本以外,在《阿育王山志略》卷上(图 14、图 15)中也有收录。

撰写者赞宁是五代到北宋初期人,吴越王时代曾是杭州灵隐寺的僧侣,后入天台山钻研南山律。赞宁还曾奉太宗之诏来到东京,得慧大师赐号,咸平四年(1001)83 岁时圆寂。这个赞宁还编纂过《宋高僧传》等,其传记可见于《释氏稽古略》卷四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等。

名为《护塔灵鳗菩萨之传记》的灵鳗菩萨传的大致内容如下:

成为灵鳗的实为难以预测的一个神物。据《咸通传》的记载,道宣律师向陆元畅询问,听说四明圣井中会出现灵鳗,但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陆元畅回答说灵鳗是护佛塔的菩萨,是宝塔从东方被拿来的时候一起过来的。至今为止,四方信徒如手持名香异花前来参拜时,仍可见到在清泉中游动的灵鳗。灵鳗所在的井泉,在距阿育王寺东一里,从两山相夹的山路下行

①奥田勋的《关于高山寺经藏古目录》及高山寺资料丛书第 14 册《高山寺经藏古目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解说。以下引《高山寺圣教目录》均指此本。该圣教目录被转写,为引起寺外众人的注目,许多高山寺传来的外典类书籍都流出了寺庙。

百步的微暗之处。在灵鳗将要现身之时，先会出来两只红螃蟹。其状是身长一尺五寸，头如龟但竖有双耳，脑袋上有金色斑点，有时还会出现银色斑点。尾如鲶鱼之状，呈黑黄色并带有锐利的背鳍。在水中游动时十分勇猛，但穿过佛寺时会变得十分恭顺。游动时宛如龙蛇。捞在手里嗅之无腥臭味，放回水中则会像龙一般潜入深水，捕之并非易事。

因为饮此泉水可除去疾病和罪孽，所以被人传为“圣井”，其鱼被称为“鳗菩萨”。

咸通十年(869)，刺史柳韬等携家眷访此灵地时，不相信鳗鱼的灵验而把它捕获带回州府，不到三天柳韬等便欲把鳗鱼做成菜肴来享用，但此时鳗鱼却不翼而飞。柳韬赶紧派人到井泉去看，只见鳗鱼还在水里生气勃勃地游动。

那年有个僧人来到寺院发誓要供养宝塔三年，这时来了一个说愿意无偿在身边照顾他的人。该人自称道:“我就是井鳗，是来帮助师傅供养宝塔的。”

自贞明二年(916)，钱武肃王来到钱塘迎请舍利宝塔，建造九级浮图后，灵鳗消失了身影。不管寺僧们如何献上名花请鳗鱼再次出现，但始终不见踪影，大家都说那灵鳗去守护宝塔了。

同光丁亥(天成丁亥，927)岁十一月，武肃王梦见头戴结鳗花冠，两肋夹着螃蟹的菩萨。便向大师法崇询问其缘故，法崇回答说是住在阿育王寺的灵鳗菩萨来守护宝塔来了。于是，武肃王派人到井泉查询，果然见到了一条鳗鱼。接下来武肃王马上又派近卫前往，迎来了带有银色斑点的小鳗鱼。尽管时值大雪纷飞的严冬季节，但总算在宝塔西侧挖了三井把鳗鱼放了进去。到了灌佛会时人们聚集而来，拿着鲜花到井边邀请鳗鱼，鳗鱼便跳跃而出，前来观看的人们都深深地被吸引住了。

癸巳年重修阿育王寺时，在圣井中见到本应在钱塘的鳗鱼在里面游，人们才知道鳗鱼是一直守护着宝塔的。由此可见，鳗鱼的来来往往有不为人知的情况。

丁酉岁时因不见了鳗鱼的踪影，大家到山里寻找时，发现了仰面朝天死在路边的鳗鱼，于是便立了个坟墓把它掩埋起来。就在这时，突然又在井中见到了来回游动的鳗鱼，文穆王听说此事后，便向鳗鱼供上了香火。

辛丑岁，明州阿育王寺一带遭遇连天风雨，父老乡亲们都说是灵鳗又回

来了。寺庙僧侣到井泉一看,鳗鱼果然如往昔一样在那里游动。

戊午岁,钱塘井亭被烧,武肃王让人重建但没有发现井口在哪。大家都说这是因为灵鳗早已回到了四明山上的圣井。于是武肃王根据僧人皓卿的上奏,让钱仁晃等人由高德僧侣陪伴,乘坐鲜花装饰的法船到阿育王寺井口参拜,并开设了道场。于是马上又得到了灵鳗,并且还得到了小鳗,便把它们放入水罐中郑重其事地在细雪纷飞中带了回来。夜晚住宿州西之时,忽然不见了小鳗。行船黎明前出发,在申时就到了余姚。

戊辰八月,在外井和中井见到了十五条鳗鱼在游动。明州太守返回衙门做法会进行祈祷,因冒出青烟鳗鱼死掉了,便悄悄地把它拿回放到圣井中,鳗鱼又跳跃而起钻进了泉穴之中。

与灵鳗相似的东西在南方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尽管没有守护浮图和圣迹等事,但都含有离奇的变化。给水族加上灵鳗菩萨尊号的,是因为华严会中所有的人都是佛教徒,而且在经典中也有其旨趣,所以并无不可思议之处。

《灵鳗菩萨传》是自古以来在宁波和杭州一带流传的佛教说话故事,相似的灵鳗故事在《警世通言》第二十卷的"计押番金鳗产祸"中也有流传。时代设为北宋末期的《警世通言》的故事,据说旧名为《金鳗记》,是一部写计安一家把在金明池钓上来的"金明池掌"吃了以后,惹来杀身之祸的作品。作品中金鳗并不是主人公,只是一部谈到"只借金鳗,作个引头,连这金鳗说话,金明池执掌未知虚实,……"程度的作品。金明池在同书第三十卷的"金明池吴青逢爱爱"中也曾出现。金明池中提到了开封,但金鳗记的故事的实际舞台是在临安(杭州)。明州的灵鳗虽被烹食但没有降灾之事,写的是鳗鱼为了护法而复活的内容,与《警世通言》的故事虽然有很大差异,两者关系虽然较远,但作为故事或许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明惠上人对灵鳗传感兴趣,当初是想得知作为律学者撰写人律僧赞宁的思想,后来又接触到灵鳗与文中道宣律师的关联,是从见到"华严会中,……"关于华严经世界的记述开始的。但是,后来如梦记所述,一定是被关于住在被尊称为灵鳗菩萨的四明圣井中鳗鱼的传说,也就是被唐朝五代时期的佛教灵验之谈所深深吸引了。

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明惠上人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两部书，都是从高山寺经藏中流出的，其中保留了宋代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的重要资料。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以下除了对两部书加以区别以外，均采用在《高山寺圣教目录》所见“玄奘取经记”的略称)，因是宽保三年(1743)初秋晒书之际，由贤首院住持照谷发现的[①]，所以可推断至江户中期这两部书应是藏在高山寺的。其后的流传经过虽不甚明了，到直至明治时期作为寺外流出品再次出现，大概一直是保留在高山寺内的。

很早得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是德富苏峰谈到的鸟尾小弥太[②]。鸟尾小弥太去世后，此书又落到了三浦梧楼之手。鸟尾小弥太和三浦梧楼都是长州出身的军人政治家，并且是旧知好友[③]。

另外，《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明治时期前期就已经从高山寺被拿了出来，德富苏峰于明治三十八年发现该书，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它买了回来。这是一段显示出德富苏峰热衷于藏书和他十分努力的佳话，似乎也是德富苏峰自身很引为自豪的事情[④]。这样，从镰仓时期传下来，并一直藏于高山寺的玄奘取经记两种书籍变成了个人所有物。

镰仓时期，出现了密教系列的旧佛教等面对新兴宗教，整顿纲纪严守教义以确保其正当性的倾向。在此背景之下，完成西天取经为大乘派佛教留下伟绩的玄奘三藏之事再次受到了注目。《释迦十六善神图》和《玄奘三藏行脚

---

①小川贯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形成》(《龙谷大学论集》第 362 号，1959)一文，介绍了前田慧云抄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记载照谷跋文(延享元年，1744)及原本的发现经过。

②德富苏峰的《〈唐三藏取经记〉发掘记》(《读书九十年》，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2)里，只提到“鸟尾将军”，从与三浦梧楼的关系来看，指的应是鸟尾小弥太。

③参见浅见雅男的《华族诞生》(リブロポート，1994)137 页，吉川弘文馆《国史大辞典》“とりおこやた”条目。在现存收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桐箱盖子上，有“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浔莽秘藏”三行墨迹，其里侧还有观树居士的受赠记录。从此墨迹可以判明此书是从鸟尾小弥太转为三浦梧楼所藏的。

④参见德富苏峰《苏峰随笔爱书五十年》(ブックドム社，1937)“关于玄奘三藏的上表记”、“三藏取经记与取经诗话”、“罗振玉与成簣堂本的特色”及德富“谈谈发掘物——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记”(《书祭》，书物展望社，1939)。早川喜代治《德富苏峰》(大空社，1991)575 页。

图》的制作，金泽文库本(称名寺藏)《西域记传抄》(断简中有"又尝牵母衣，被推于河中，大鱼吞之，会父买鱼剖腹了□？所损水不能死，后取佛书(以下阙)"这样一段让人觉得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十七内容的记载)，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抄写，还有《玄奘三藏绘》的成书等，都能看出当时与《玄奘取经记》被带到日本而出现的"玄奘三藏"热。

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都盖有"高山寺"的朱红印章，这证明两部书就是建长二年《高山寺圣教目录》所记载的"《玄奘取经记》二部"。建长二年(1250)相当于南宋淳祐十年，时为理宗皇帝的太平之世。虽然不能明确德富苏峰看的是哪个时代的抄本，但他的确很有鉴别能力，《玄奘取经记》最晚也是南宋刊本。应该予以注意的是，在目录中同时记载了玄奘取经记两部书。说明这两部书在被带到日本之前，很有可能是在大陆书店里摆在一块儿出售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两本书的版本先后问题[1]，至今尚未定论。但从玄奘取经记故事传至西北西夏的榆林窟，南方传至福建省的永福县和泉州等地，其故事的成立的下限可以推测为北宋末到南宋初等情况来看，可以很顺理成章地认为：两种版本在中国都应有更早的祖本，由于继承它的书肆或地域不同，虽然是同一内容，但出现了书名各异和误记的情况[2]。

---

①长泽规矩也"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书志学》13－6，1939)，太田辰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考》(《神户外大论丛》第17卷123合并号，1966)、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全集14《西游记》下(1960)《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译"解说"。在1970年以后的研究中，国内外包括笔者在内有很多研究成果。小川贯弌先生似认为取经诗话与取经记都是临安刊本。

②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南宋临安刊本的看法是主流。与此相对，由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中没有刊记，故其出版地和出版年月不明。但如德富苏峰所言，从有缺笔的情况或从《高山寺圣教目录》来看，说是宋代刊本应该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出版地在什么地方。在相同时代(金)出土的黑水城遗址《刘知远诸宫调》的各卷题目中，如"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弟三"等处，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弟三终"相似。另外，同属黑水城出土的《新雕文酒清话》残页中的"新雕"这样的文字，在现存的宋刊本中很少这一点也令人有所思。真福寺藏的北宋刊《新雕中字双金》，在称为"新雕"的卷末刊记中有"乃是张家真本矣"的字样(尾崎康，"宋版鉴定法"，《古籍鉴定与维持研习会专集》，1985)。《新雕入篆说文正字》(《成篑堂善本书目》)，虽称"新雕"但有云是北宋刊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南宋刊《新雕名公纪述老苏先生事实》(《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No. 50，汲古书院刊，1992)。虽然是难以成为旁证的例子，但说不定《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新雕"，是沿袭以前北宋本已有的名称，或具有相对于旧北宋本而称"新雕"的意味。我怀疑它是一种临安以外的刊本，拟在今后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没有"玄"(宋始祖)和"敬""祖"两字缺笔，而是对"惊"(祖)字做了缺笔处理。当然，在《刘知远诸宫调》中对"敬"也没做缺笔处理，黑水城出土的似为西夏本的《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的"敬"字也是本来的样子。

那么，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把《玄奘取经记》两部书带到日本高山寺的呢？

把玄奘取经记作为佛教说话来看时，可以认为它们传入高山寺的背景，是与上述两种宋刊本的《文殊指南图赞》及《灵鳗菩萨传》相同的。

《玄奘取经记》虽是把玄奘三藏西天取经虚构化的作品，但它是以唐代密教文化为基础，与地域传说相结合而形成小说并流传了下来。因此，对于从事华严教学并继承密教法灯的真正始祖明惠上人来说，《玄奘取经记》可能是一部极具重要意义的作品。在明惠的信仰方面，唐三藏的西天取经似乎有着很大意义。建仁二年(1202)冬天，明惠上人第一次谈到自己的渡天之志。在《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汉文行状〉(上山本)》卷中有这样的记载：

> 建仁二年冬比，殊恋慕西天遗迹，……对数辈同法，谈话西天云游。……

但是，春日大明神来到汤浅宗光的妻子橘氏处转告了应该中止的神谕。尽管如此，明惠还是仰慕西天之志未泯，于元久二年(1205)又重新萌生。同书元久二年春条中有如下记述：

> 然间西天修行又思企之，五六人同行同以出立，或图绘本尊，或书写持经，又从大唐长安城，至中天王舍城，路次里数勘注之彼里数记文入经袋，犹被持之云云数日之间经营评定，……纵虽舍身命，此心不可退转，其次种种述怀云，我从幼稚之昔，学显密圣教本意者于尺尊御事，凝殷勤恋慕，望西天遗迹，为遂云游之志也，誓愿之趣三宝诸天定垂照览，有何本意可留此所乎云云，……仍为决实否欲取孔子赋，本尊尺迦，善逝、善财五十五善知识、春日大明神御形像，于三所御前，书二笮(一者可渡西天哉一者不可渡哉)可取之，此三所中虽一所若得渡笮者，虽舍身身命，可遂其志，若三所皆为不可渡之笮，可思止云云，即致精诚祈请之，善知识大明神两笮令他人取之，于本尊御前上人自取之，写二笮于壇上之处，一笮运转堕坛下，求之不得，遂不知所去，取所□残笮见之不可渡笮也，余二所笮皆同前也，仍彼修行思止了，其后所劳气即时平

复，可谓不议，……

结果，明惠上人最后相信了在释迦、善财、春日三个地方否定天竺之行的抽签而放弃了这个念头。如汉文行状所示，明惠上人当时的西天之行计划，是预定入唐之后由长安前往印度的，并对其里程做了计算。他本人在《大唐天竺里程书》中曾亲自记述道[①]：

从大唐长安京到 □ 诃陁国王舍城二、五万里……长安京至第三年十月十日可到着王舍城也。印度ハ佛生国也。依恋慕之思难抑，为游意计之，哀々マイラハヤ。……

从现存的亲笔书写的书籍来看，因为其旅程内容只是一个简单的笔记，所以身边有入宋僧人的明惠不会只依据里程书来筹措渡天之行的，这个记述应视为是当时明惠上人内心愿望的直接表露[②]。对于明惠上人来说，西天之行是他始自年轻修行僧时代的最大憧憬。在《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假名行状）》卷上建久六年(1195)秋之条中，记载了出高雄后在纪州汤浅的白上峰修行的事情之后，还记载着明惠平生通过玄奘三藏写的《大唐西域记》，或者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西天的向往，这在其用假名撰写的《金文玉轴记》中有所存留[③]。实际上，在《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五十四甲的开头记载的：

西域传二部各十二卷，慈恩传二部各十卷一部　佐法印御房进，……法显传一卷……

---

①《古寺巡礼・京都15・高山寺》彩色 No. 33，《艺术新潮》明惠特集号，46页，及田中久夫《明惠》，76—77页，白洲正子《梅尾高山寺・明惠上人》，232—233页，有原文或翻刻。

②在上觉宛消息（元久二年九月十九日）中充分表达了此时明惠的心情。前面提到的白洲先生著作77—78页、233—234页，奥田先生所著58—61页。消息中，"玄照法师の事ヲ申候に、恨生不遇圣、幸睹遗迹又、又云、挂想只园、背令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又……"（基本上根据白洲先生刊登的照片与翻刻）将西天巡礼愿望寄托在了玄奘法师的西域行脚这一点应格外注目。

③前面提到的田中久夫的著作41页，《明惠上人歌集》的第八十三首中引用《法显传》的同时，还将西天的竹林园的竹子与中国和日本的相同看待，从而表达了对那里的憧憬（参见上面提到的吉原シケコ先生的著作82—83页）。

应是明惠自身喜爱阅读的书籍。从使用频率来考虑，所说的两部书籍应是正本和副本配套。这件事说明《玄奘取经记》也是记载了玄奘三藏西天取经经过的小册子，对于满怀对先哲完成西天取经敬仰之情的明惠来说，记载了《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没有收录的关于玄奘各种故事的《玄奘取经记》，是一部价值别具一格而且十分重要的书籍。《明惠上人传拾遗记》中[①]，补记了在明惠亲笔写的里程书中没有的一段，即玄奘三藏到前世七度时被深沙神所害的传说：

> 海路者十万余里ノ烟波卜，ツネニハヲホクミエタリ，上古ノ三藏达，多分苍波万里ノ逆浪ヲ，シノキ给ケリトミヘタリ，凡海路ハ，远近不定ニシテ风波ノ难ナヲヽソロシキカ，陆地モ山岩崄曲ニシテ，恶鬼毒兽サリカタシ，イハンヤ玄奘三藏ハ，七生マテ，深邪(ママ)神ニ生ヲウハヽルト申タレトモ，行程ハ一定五万里ノ陆地ハカタヤスナルニ付テ，カクノコトクアラレマシイテ，印土ノ佛生国(ノ)恋慕ノ思ニシノヒカタキ心ヲ，ユカサンカタメニ，内ニハ，三密加持ノ方便ヲモテ，云游修行之愿望ヲイノリ，外ニハ，远近山川之行路ヲ勘注云云。……

玄奘七生谈不仅是唐代唐三藏的传说，还被密教的密传所摄取，密教僧侣也都知道它是来源于深沙神王和大般若经的。承和六年(839)的《常晓和尚请来目录》的"深沙神王像一躯"中虽然见不到关于玄奘七生之类的事情，但在《觉禅抄》卷一二一的"深沙大将"中作为"或云"进行了补记。真言僧觉禅比明惠年长，由此可知《觉禅抄》所收教义在惠明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对于继承了密教法灯的明惠来说，深沙神王与玄奘三藏的关系，从密教图像方面也是很熟悉的事情[②]。看到《玄奘取经记》中收有可称为是深沙神感应说的故事的情况，明惠作为其读者是没有任何奇怪之处的。

---

①高山寺资料丛书《明惠上人资料　第一》"解说，十八，明惠上人传拾遗记，一册，高山寺藏"，735页中，提出了因前半部分是日语读法的印度行程记，可看作本来就是明惠的著作的看法。

②关于从中国唐末到宋初的唐三藏传说与密教的关系，参见以前研究诸说以及矶部彰《〈西游记〉形成史的研究》(创文社，1993年)第3章〈唐代密教文化所见唐三藏西天取经传说〉等。《高山寺经藏圣教内真言书目录》中为"96深沙对王法二々"，《法鼓台圣教目录》中为"117深沙大将菩萨仪轨要一首"。

建久末期，来到下边纪州的明惠上人，望着浮于汤浅海面之上的两座岛屿，对遥远的西天心驰神往。

《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汉文行状〉(上山本)》卷中有：

> 建久末比下向纪州，汤浅海中有二岛名曰苅磨，……正望西方海畔与大虚相连，西天境无隔，有便于通恋慕之思，……(119页)

从这段行状可以明确地看出明惠对西天的憧憬。这种对西天的憧憬，似乎还影响了来到此地的其他行脚僧。前面提到，在明惠的事迹里可以看出有将自己投影于玄奘三藏的情况。例如，明惠在这棵松树上的坐禅的事(《栂尾明惠上人传》卷上，383页)，根据成忍绘的“明惠树上坐禅像”(图1)(《高山寺缘起》，645页)都是广为人知的。明惠之所以对松树感兴趣，或许是出于他对唐代以来著名的玄奘传说之一的摩顶松传说有所钟情的缘故吧。

据说明惠曾经谈到，幼年曾有过与玄奘之母梦见三藏穿着白衣服前往西天之事相重合的经历[①]：

> 一生年七岁ノ时，其姨母梦ニ此儿白服ヲ著セリ，白布ヲモテ缚リテ柱ニ结ヒ付ルニ，ヒキチキリテ，西ヲサシテ去ト见ル云丶，上人自云ク，彼玄奘三藏ノ母，梦ニ三藏幼年ノ时白服ヲ著シテ西ヲサシテ去ト见ル，此ハ天竺ヘワタルヘキ先兆ナリト云丶，然レハ此梦モ正ク渡ルコトコソナケレトモ，心ヲ遗迹ニカケテ天竺ヘ渡ラムト云カ见ル欤，藏ハ法师ニ成テ永ク欲缚ヲタツヘキカ見ケル欤云丶(《高山寺惠明上人行状〈仮名行状〉》卷上，13页)

如上所述，联想到明惠仔细读过《大唐西域記》和《慈恩传》之事，在中国的高僧中，明惠在心里对玄奘三藏一定是无限憧憬的。明惠圆寂时怀着能上

①明惠所说的玄奘出生时的“梦谈”在《慈恩传》卷一有记载。《玄奘三藏绘》(中央公论社《续日本的绘卷4—6》，小松茂美编，1990)卷一第三段中的词书中也曾收入。

升为弥勒兜率天的愿望，在禅堂院度过了他最后一刻[1]。《慈恩传》里详细地记述了玄奘三藏平时和他圆寂时，也始终抱着能上升为弥勒兜率天的愿望，在这方面两人是相同的。

在建长五年的《高山寺缘起》中，详细记载了明惠刚圆寂之后的高山寺内的建筑群和佛画佛像之类的情况。其中也有可以了解明惠与三藏，或者与唐三藏的被传说化了的关联性的记载。据此，罗汉堂里面不仅有从大殿移来的宾头卢尊者像，还有唐本系绘像十六罗汉画[2]。十六罗汉与玄奘翻译的《法住记》有很深关系这一点毋庸待言，高山寺里还藏有：

>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一卷，法住记一卷（《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七十四乙）

在十六罗汉信仰上值得注意的，是与在唐末和宋代的唐三藏故事里就存在的玄奘前生是宾头卢，取经后为宝胜如来这样的成佛内容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日本人也已知道十六罗汉和关于玄奘西天取经传说的存在。圣众来迎寺十六罗汉画中的第五尊者，描绘着唐三藏骑着白马伴随深沙神的形象[3]。至少十六罗汉与《法住记》、玄奘的关系，是学问僧的话都会知道的。顺便提一下，妙善寺把唐本十六罗汉像等来开光供养，是在明惠在世时的贞应三年(1224)。

由此可见，明惠与玄奘三藏故事有着很深的关系，尤其明惠本人有主动与其相联系的倾向。收藏价格昂贵的舶载宋刊本的理由尚无定论，或许是因为当初书名不一样而将两种版本作为“唐三藏传承”一起收藏的。但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高山寺圣教目录》是把它们用“玄奘取经记二部”同一略称记载并保存的。或者很有可能当时虽然知道是同一内容，但如《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的情况那样，出于对玄奘三藏事迹的重视，考虑到

---

①参见前文提及的田中久夫先生著作180页、194—195页。

②明惠于建保三年著有《十六罗汉讲式》。《明惠上人梦记》承久二年七月(149页)中，有与“圣僧”问答并梦见了十六罗汉二三个人的记载。参见《图说日本的佛教四·镰仓佛教》295页。

③《国宝药师寺展》(2008年，读卖新闻社东京本社等刊)“十六罗汉诸矩罗尊者”(12世纪)。

这些记录很重要而以正副两个版本的形式来收藏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玄奘三藏的事迹在高山寺受到了特别重视，其证明之一是在经藏内把玄奘方面的典籍重复保管并记载在经藏目录上。在建长二年以前，若要找一位对《玄奘取经记》特别重视的人物，那就只能是对玄奘三藏及其印度之行充满憧憬的明惠上人了。

那么，又是何人将《玄奘取经记》等书籍拿到高山寺的呢？关于这一点因相关资料荡然无存，所以很难进行推测，但有可能是通过很早就跟随明惠的入宋僧行辩得到的①。另外也有明惠通过宋代商人直接购入的可能性。虽说后者的可能性最高，但前者的可能性也难以排除。从《玄奘取经记》等传到日本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明惠的需求和其被接受的情况。

五、明惠上人与佛教故事的接点

以上对明惠上人得到《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护塔灵鳗菩萨传》及《玄奘取经记》二部的情况，并以传记为中心从几个方面对明惠喜爱这些书籍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本章中，再从有关明惠遗物等角度，并以此为旁证来推测明惠与《玄奘取经记》等佛教说话的接点，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现在的高山寺虽然遭受了日本战国时期的灾害，但可以说其所有的一切都是明惠的遗迹。据说栂尾山上留下的小黑犬木雕，是明惠生前喜爱的雕像，曾天天伴随在他的身边②。这座雕像虽然是中世日本普通的小狗，但却能明显地给人一种佛像中所没有的新鲜感。大概它与出现在明惠梦中的小狗有一定的关系。与此相同，传说为明惠生前喜爱的一对雌雄神鹿木雕，其栩栩如生的神态与其他佛像雕刻杰作相比也是别具一格，可以想见明惠把它们置于身边一定是心旷神怡的。从春日明神与明惠的关系来考虑，把木雕神鹿

---

①前面提到的奥田勋先生的著作，176 页。建长六年书写的明惠上人的置文案中，有关于行辩法师入宋带回六千余卷经卷的赞辞。中野玄三先生指出，该入宋僧也有带回了宋代佛画等的可能性。（中野先生“洛西·洛北的绘画——以神护寺·高山寺为中心”，113 页，《日本古寺美术全集第九卷·神护寺与洛西、洛北的古寺》，集英社，1981）。

②淡交新社《神护寺·高山寺》图版 74 页，本文 66 页，前面提到的白洲正子先生的照片 30 以及照片说明，《艺术新潮》明惠特集号 18 页。

放在身边虽无不可思议之处，但若加上小狗雕像，可以说明惠对人类以外的生物和无生命的东西也都是有悟于心的。《玄奘取经记》中对西方景色、人物、妖精和菩萨诸尊等有较为简要的描述，而且猴子变的孙行者作为唐三藏随从也出现在了故事里。唐三藏是借助于这个猴行者的神力来完成取经大业的，喜欢动物的明惠读到这里，也一定会被其情节所打动吧。中国很早以前，就有灵隐寺高僧慧理由猴子伴随进行修行为代表的类似故事，正是把动物和僧侣相结合的土壤成为了后来《玄奘取经记》诞生的一个动力。伴随明惠的小狗和神鹿，或许在接受这类作品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明惠修行时最为重视的事情之一的梦境中，也有暗示可能读了《玄奘取经记》的记述。

在《梦记》中[①]，除了有明惠本身来到兜率天在弥勒宝殿前洗浴（承久二年六月）等让人深感兴趣的记述以外，还出现了暗示与玄奘取经记有联系的修禅的猴子。

梦中的猴子与现实中书籍记载的猴行者这样一个护法神之间，到底有无关联性虽还不是十分明确，但在同一《梦记》中的有关灵鳗之梦的记载，大概与高山寺所藏的《明州阿育王山如来舍利宝塔传并护塔灵鳗菩萨传》有着直接关系。

或许它把明惠拿到此书时的印象作为一个梦进行了再现。假如两者是一致的，则可以认为这本书传到日本是在承久二年稍前的时候。考察宋刊《灵鳗传》与明惠之梦的关系时，将猴行者与梦中猴子联系起来看，并不能说是一种勉勉强强的对接[②]。当然，在佛教里猴子会以各种形态出现，正如在《明惠上人歌集》第九十四首中，将洛北山中猴子形态进行歌咏那样，与自然界猴子的关系也是可以考虑的。

①根据高山寺资料丛书《明惠上人资料　第二》本，《明惠上人要集》本。奥田勋先生撰有“关于明惠上人的梦记与梦”（附高山寺资料丛书本）。

②在前面提到的河合隼雄先生的《絲野的御前之梦》158－163页中出现的“奇怪的桃子”，或许与玄奘取经记中王母池蟠桃的记述有关。

六、小说的现代效用

明惠上人不仅从宋朝输入了大藏经，还从宋代导入了善财童子的善知识求法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守护明州阿育王寺宝塔的灵鳗说话故事《护法灵鳗菩萨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书籍。另外，让人创作以新罗僧义湘、元晓入唐和开宗为题的《华严缘起绘卷》的也是这个明惠上人。这些作品虽然是宋代或高丽国的佛教说话和故事，但明惠上人是从佛教教义的角度去理解，从宗教的观点来导入的，这与宋朝的人们接受的故事观的情况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明惠来说，无论是唐三藏故事，还是善财童子的佛教说话，还是灵鳗的传说，都是处于佛教教义之中的东西，是超越虚实和国境的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善妙即是善妙神，既是一个理想的女性，也是一个可亲的慈母。这些不但不会成为明惠修行的妨碍，反而会成为让明惠一心向佛的力量，是始终存在于明惠上人的心中的。明惠对宋代的佛教故事就是这样理解的。

明惠上人虽然没有离开过日本，他的宗教活动可以说是在日本与南北中国（宋辽）、高丽的佛教文化之中展开的。明惠身上不存在国境与民族的区别，而是以同生于佛教世界的心情，来看待世界万物和共同拥有生命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过去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今日以科学技术展开竞争的经济世界里，对于文学、思想和艺术等的形成，超越国境和民族等人为障碍，认识人类的共同尊严，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图 1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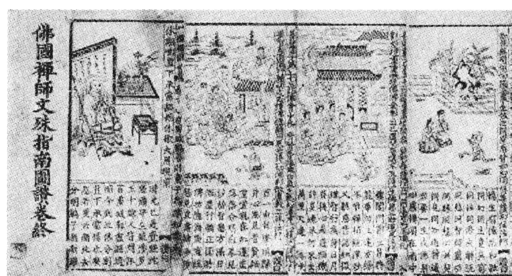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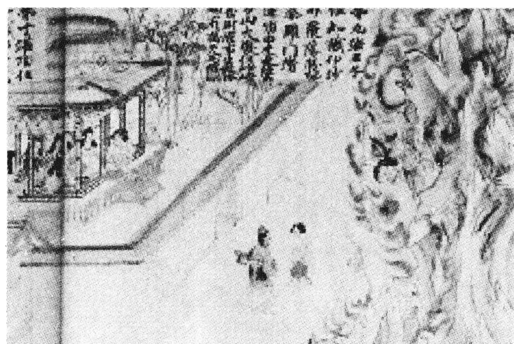


图 4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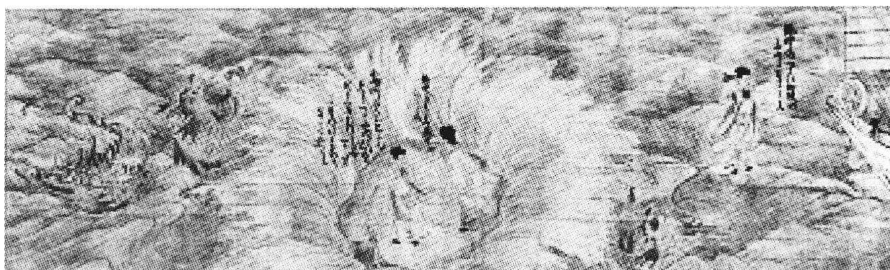




图 6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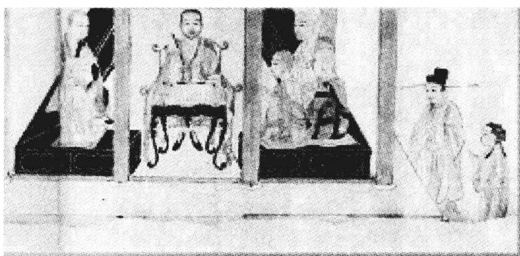


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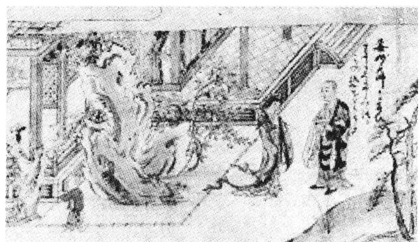


图 9



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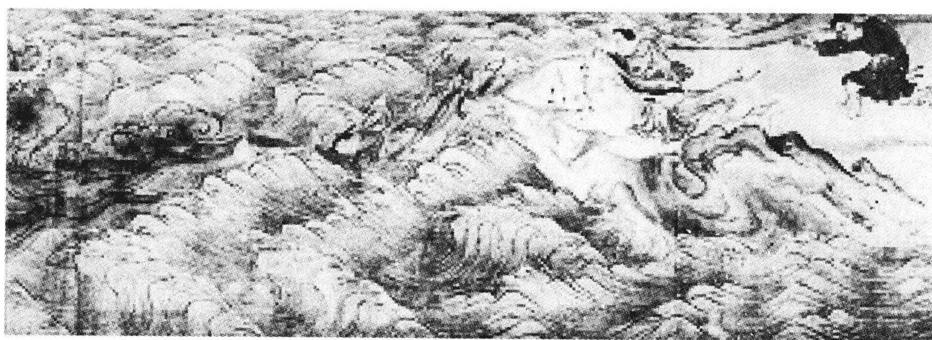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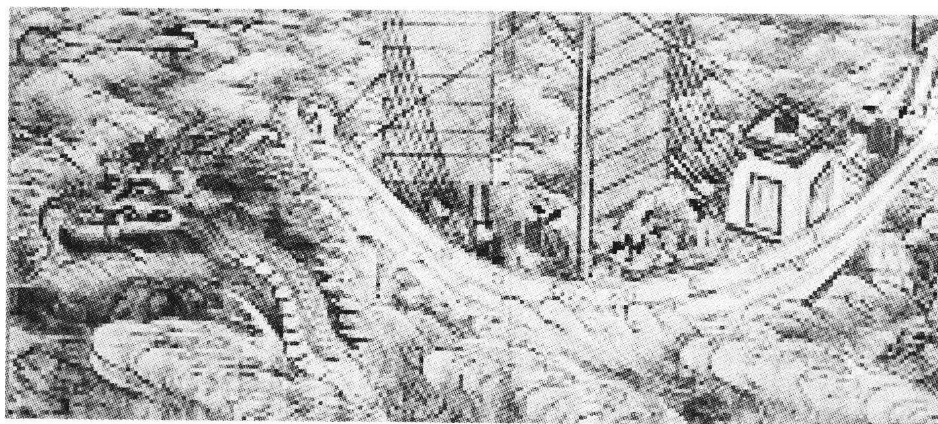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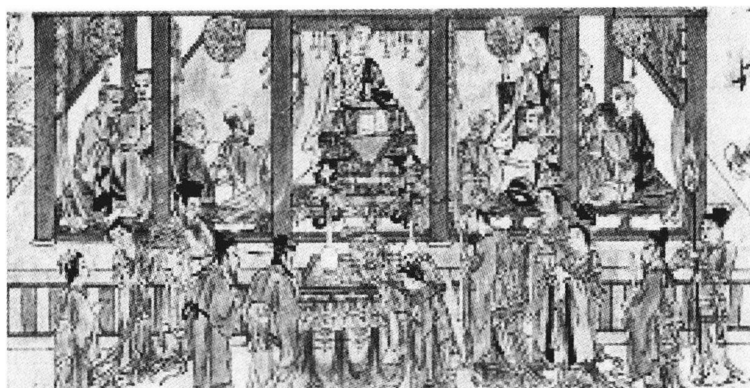


图 13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泰和楊嘉祚邦隆父校
△神明效靈
人貴於物物靈於人非謂側置一念之真照破塵
利自稱大權亦有蘇漢授是因緣金沙之井靈鰻
天矯魚中有龍妙變非小人亦有龍自不知聖春
貢已靈鰻說佛性志神明効靈
護塔靈鰻菩薩傳
靈鰻者不測之神物也按感通傳南山道宣律師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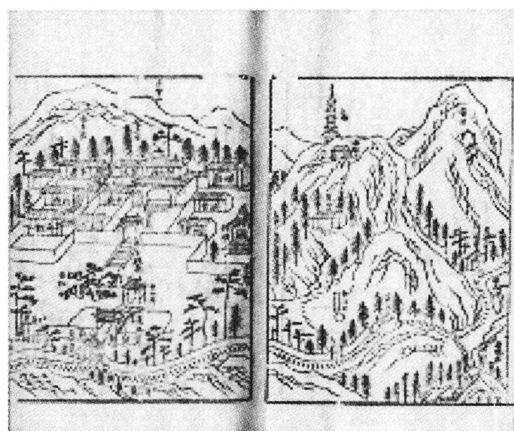


图 15

关于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
华峯文库《中华正音》

朴在渊

一、序　言

非司译院正式编撰，由个人所作之抄本贸易汉语会话书有《你呢贵姓》、《学清》[1]、《骑着一匹》[2]、《中华正音》等，均出版于朝鲜后期。本文将着重研究的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亦是如此。此书现藏于华峯文库，此前从未对外公开。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以及顺天大学藏本《中华正音》、藏书阁藏本《骑着一匹》、日本濯足文库藏本《中华正音》为同一书的四个不同抄本书。其中，濯足文库《中华正音》及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中标有韩译与注音。此外，有两种《中华正音》，即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3]、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但这两种与本文所要研究之华峯文库《中华正音》除标题相同外，内容完全不同。即上述资料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标题

作者单位：韩国鲜文大学校中文系

①朴在渊、周发祥校注，《你呢贵姓·学清》，鲜文大学校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2002。

②朴在渊、金雅瑛编，《骑着一匹》，鲜文大学校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2008。

③朴在渊、金雅瑛编，《中华正音》，鲜文大学校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2009。

均为《中华正音》，由此可见意为汉语官话的“中华正音”在当时相当于汉语会话书之代名词。实际上华峯文库《中华正音》的封面标题为“官话”。

本文将着重介绍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之文献形态和内容，同时对其词汇特征进行分析以探明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与其他汉语会话书之异同。

二、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之文献形态、用字及音韵

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为抄本贸易汉语会话书，现藏于华峯文库。华峯为吕丞九先生之雅号。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不分卷，全书共 1 册，44 张。大小为 21.4cm×22.6cm。每半叶有 16 行字，每一行 16 个字左右。封面左边题有“官话”两个大字，其下方有两行小字，“中华正音”及“译话韩语”。封面的里页标有“大韩隆熙三年己酉八月二十九日汉语抄”，证明此书抄写于 1909 年。此书的汉语原文的右边标有韩语注音，原文左边或原文下边标有韩译。

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之内容与藏书阁及阿川文库藏本《中华正音》完全不同。此书的开头如下。

骑着一匹飞快大马[치져이피븨쾌다마]，一上道立刻就到门上去[이상다니커쥬다문상취]，先找星德号[션잔싱더한]，在那里恼半天的口[딕나리난반텬디쿠]。”한필나는듯헌큰말을타고쳑길의올나닙긔의문상의이르러가서만져셩덕호를ᄎᆞ져가서거긔서반일이ᄂᆞ슈작ᄒᆞ니라(1a)

全书结构大体同上，将原文按句分段，加注了韩语注音及译文。

就用字而言，书中有很多字假借读音相似的字来标写，即用了很多借音字。如：“恼(闹)”、“挑掳(张罗)”、“啊哥(阿哥)”、“小(少)不得”、“皮(脾)气’”、“肚(赌)气”、“攮(弄)”、“增(挣)钱”、“正尽(净尽)”、“莫(摸)不着”、“庄家(稼)”、“高粮(粱)”、“勾(跟)”、“合实(适)”、“苏长家(素常家)”、“这吗(这么)”、“怎吗(怎么)”、“大庄(大装)”、“藏船(装船)”、“致登(踢蹬)”、“托批(托庇)”、“恒(行)家”、“恒事(行市)”、“开板(盘)子”、“后邦(帮)车”、“明个(箇)”、“满闲(限)”、“讲就(究)”、“扶恃(服侍)”、“句(勾)当”、“当

(耽)误”、“收(受)用”、“到(倒)”、“一塘(趟)”、“枉宴(玩意儿)”、“该(还)”、“遭搨(遭塌)”、“芝吗(芝麻)”、“劳到(劳叨)”等。书中亦可见“淂(得)”、“戋(钱)”、“筭(算)”、“寔(实)”、“老寀(老实)”等俗体字。我们将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与其他三种用字上有所差异的汉语会话书的用字情况进行了比较,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华峯文库《中华正音》	顺天大学《中华正音》	藏书阁《骑着一匹》	濯足文库《中华正音》
星德号(华1a)	盛德号(顺1a)	盛德号(骑1a)	盛德号(濯1a)
挑攞(华1a)	挑挪(顺1a)	挑挪(骑1a)	讲挪(濯1a)
啊哥(华1b)	阿哥(顺1a)	阿哥(骑1a)	啊哥(濯2a)
鄙处(华1b)	卑处(顺1a)	卑处(骑1a)	卑处(濯2a)
当淂岂呢(华1b)	当得起呢(顺1a)	当得起呢(骑1a)	当得起吗(濯2a)
宴闹(华2a)	宴恼(顺1a)	熱闹(骑1b)	熱闹(濯2b)
赶甚吗(华2b)	干甚吗(顺1b)	赶甚吗(骑1b)	干甚吗(濯3b)
恒市(华2b)	事(顺1b)	市(骑1b)	事(濯4a)
归期(华3a)	归起(顺1b)	皈起(骑2a)	皈起(濯4b)
箇个(华3b)	箇箇(顺1b)	箇箇儿(骑2a)	箇箇(濯5b)
如候(华3b)	如候(顺1b)	如才(骑2a)	于今(濯5b)
不用说(华3b)	了得(顺1b)	不用说(骑2a)	了得(濯5b)
若一(华4a)	若一(顺1b)	若一(骑2a)	万一(濯5b)
恼臭(华4a)	恼腐(顺1b)	恼臭[腐](骑2a)	恼腐(濯6a)
大恒大事(华4a)	大大事(顺1b)	大恒大事(骑2a)	大大市(濯6b)
古淂[的](华4b)	古淂(顺1b)	古得(骑2b)	古来(濯6b)
过不是(华5b)	过不是(顺2a)	过不是(骑3a)	不过是(濯8b)
藏船(华5b)	藏船(顺2a)	庄舡(骑3a)	装舡(濯8b)
讲就(华6b)	讲主(顺2b)	讲究(骑3b)	提(濯10a)
遭搨(华6b)	遭他(顺2b)	遭塌(骑3b)	遭搨(濯10a)
托批[庇](华7a)	托(顺2b)	托(骑3b)	保護(濯10b)
啊嘸咤佛(华7a)	啊彌咤佛(顺2b)	啊嘸咤佛(骑3b)	阿彌陀佛(濯10b)
硼(华7a)	硼(顺2b)	硼(骑3b)	不一定(濯10b)
擔(华7a)	但(顺2b)	担(骑3b)	担(濯11a)

续表

华峯文库《中华正音》	顺天大学《中华正音》	藏书阁《骑着一匹》	濯足文库《中华正音》
膽(华 7b)	胆(顺 2b)	膽(骑 3b)	胆(濯 11a)
大庄(华 7b)	大庄(顺 2b)	大裝(骑 3b)	大裝(濯 11b)
万般(华 8a)	万般(顺 2b)	万般(骑 3b)	万般事情(濯 12b)
如何啊(华 8b)	如何啊(顺 2b)	如何啊(骑 3b)	何如呀(濯 12b)
各处(华 8b)	各城(顺 3a)	各城(骑 4a)	各处(濯 13a)
芝吗(华 9a)	芝麻(顺 3a)	芝蔴(骑 4b)	紫麻(濯 13b)
各种(华 9a)	各种(顺 3a)	各种(骑 4b)	各处(濯 13b)
庄家(华 9a)	庄稼(顺 3a)	藏家(骑 4b)	庄稼(濯 13b)
哺哩(华 9a)	哺哩(顺 3a)	哺里(骑 4b)	哺哩(濯 13b)
该(华 9a)	咳(顺 3a)	咳(骑 4b)	还(濯 13b)
咳(华 9b/11a)	咳(顺 3a/3b)	咳(骑 4b/5b)	还(濯 14b/16b)
那种(华 9b)	那种(顺 3a)	那宗(骑 5a)	那稣(濯 15a)
海参(华 10a)	海菜(顺 3a)	海参(骑 5a)	海参(濯 15a)
恒事(华 10a)	項事(顺 3a)	市(骑 5a)	市(濯 15b)
不小(华 10b)	不少(顺 3b)	不小(骑 5a)	不少(濯 16a)
银子(华 11a)	银子(顺 3b)	艮子(骑 5a)	银子(濯 17a)
沈阳城里(华 11b)	盛城里(顺 3b)	沈城里(骑 5b)	沈阳城里(濯 17a)
恒家(华 11b)	項家(顺 3b)	家(骑 6a)	恒家(濯 17b)
往(华 11b)	往(顺 3b)	望(骑 6a)	往(濯 17b)
催(华 11b)	推(顺 3b)	促(骑 6a)	催(濯 17b)
怎吗(华 12a)	怎吗(顺 3b)	怎吗(骑 6a)	怎沒(濯 18a)
糟起冒(华 12a)	糟起胃(顺 3b)	糟起否咧(骑 6a)	糟起帽(濯 18a)
囉嗦(华 12b)	囉唣(顺 4a)	囉唣(骑 6a)	囉嗦(濯 18b)
寡(华 12b)	寡(顺 4a)	寡(骑 6a)	寬(濯 18b)
体面(华 12b)	軆面(顺 4a)	軆面(骑 6a)	替面(濯 18b)
恼淂(华 12b)	恼淂(顺 4a)	恼得(骑 6b)	得(濯 18b)
打发(华 13a)	打派(顺 4a)	打发(骑 6b)	打发(濯 19a)
臭肉(华 13b)	腐肉(顺 4a)	腐肉(骑 6b)	肉贱(濯 19b)
焦急(华 13b)	燥急(顺 4a)	燋急(骑 6b)	焦急(濯 20a)
本情(华 14a)	本成(顺 4a)	本成(骑 7a)	本情(濯 20b)
并一(华 14a)	并一(顺 4ab)	便宜,併一(骑 7a)	併意(濯 20b)

续表

华峯文库《中华正音》	顺天大学《中华正音》	藏书阁《骑着一匹》	濯足文库《中华正音》
平(华 14b)	便宜(顺 4b)	便宜(骑 7a)	便意(濯 21a)
又易浔易(华 16b)	又易浔易(顺 5a)	由易得易(骑 8a)	又易得易(濯 24b)
码子(华 17b)	縻子(顺 5a)	瑪子(骑 8b)	縻子(濯 26a)
戔(华 17b)	钱(顺 5a)	戔(骑 8b)	钱(濯 26a)
貁子皮(华 17b)	狜子皮(顺 5a)	貉子皮(骑 9a)	狜子皮(濯 26b)
謊价(华 18a)	謊价(顺 5b)	謊价(骑 9a)	啽价(濯 27a)
寀(华 18a)	寀(顺 5b)	寔(骑 9a)	实(濯 27a)
替另(华 18b)	替另(顺 5b)	管是(骑 9a)	替另(濯 27b)
囉唕(华 19b)	劳道(顺 6a)	劳叨(骑 10a)	劳叨(濯 29b)
齐打胡哩(华 20a)	齐打胡哩(顺 6a)	齐打胡哩(骑 10a)	起打嘲哩(濯 30a)
唾灛哏毒(华 22a)	吐昧狠肚(顺 6b)	唾穃狠肚(骑 11a)	唾穃狠肚(濯 32b)
东袒号(华 22b)	东长号(顺 6b)	东袒号(骑 11a)	东袒号(濯 33a)
银数(华 23a)	艮数儿(顺 6b)	艮数儿(骑 11b)	银数儿(濯 34a)
皮铺里(华 24a)	皮铺里(顺 6b)	皮哺里(骑 11b)	皮鋪里(濯 34b)
绽他们锅(华 24a)	斫他们锅(顺 7a)	砍他们的锅(骑 12a)	斫他们锅(濯 35b)
胡哩胡涂(华 24a)	胡离胡涂(顺 7a)	胡里胡涂(骑 12a)	嘲哩嘲涂(濯 35b)
帽客(华 24b)	帽客(顺 7a)	毛客(骑 12a)	帽客(濯 36b)
正尽(华 25a)	正尽(顺 7a)	淨尽乙(骑 12b)	正真(濯 36b)
昨个往京(华 25b)	昨个往京(顺 7ab)	作个往京(骑 12b)	昨箇王京(濯 37b)
辨(华 26a)	贩(顺 7b)	辦(骑 13a)	辨(濯 38a)
伏侍(华 26b)	服侍(顺 7b)	服侍(骑 13a)	扶侍(濯 38b)
敢儿时(华 27a)	赶儿时(顺 7b)	赶儿是(骑 13b)	赶儿时(濯 40a)
明个(华 27b)	明个(顺 7b)	明儿个(骑 13b)	明箇(濯 40b)
后个(华 28a)	候个(顺 8a)	后儿个(骑 14a)	侯箇(濯 41b)
枉宴(华 29a)	枉宴(顺 8a)	枉藝(骑 14b)	狂宴(濯 42a)
舒服(华 29b)	舒福(顺 8b)	舒服(骑 15a)	受福(濯 43b)
吃岂(华 31b)	吃吃(顺 9a)	吃起(骑 16a)	
祼子(华 33a)	祼子(顺 9b)	袴子(骑 17a)	
苏禾(华 33b)	素西(顺 9b)	禾西(骑 17a)	
冠(华 37b)	管(顺 10b)	管(骑 19a)	
捎来(华 38b)	捎来(顺 11a)	擃来咧(骑 19b)	
鐘(华 40b)	种(顺 11b)	宗(骑 20b)	
劳到(华 44a)	劳倒(顺 12b)	劳叨(骑 22a)	
疲马(华 47b)	正疲马(顺 13b)	腴马(骑 23b)	

在音韵方面，有部分借音字的使用是受到了东北方言的影响，如“小(少)不得”、“增(挣)钱”、“讲主(究)”等。这些借音字体现出了东北官话混用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特点。但与目前为止发现的《骑着一匹》、《学清》、《你呢贵姓》、《中华正音》(藏书阁藏本)等其他抄本汉语会话书相比，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中受到东北方言影响的借音字较少。

三、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之主要人物及内容

1. 主要人物

□ 朝鲜商人阿哥

故事的开端为朝鲜商人遇到中国商人王氏。书中对朝鲜商人的姓名并未作明确的交代，只见其他人称呼朝鲜商人为“啊哥/阿哥”。

(甲一1)“托啊哥的福，虽然不能大发财，横竖是句照顾就是咧。”(1a)

(甲一2)“阿哥，你咳[还]不明白这一层理儿。你们朝鲜出的许多的东西里头，就是但一种海参是本来南京地方发行的，除咧这一种货，别的却是过不是我们这关东一生地方通用的。若把你们那里的大纸、海菜藏[装]船送得南京否咧，不但说是寡[光]省车脚钱，却是管包大见光。”(5ab)

(甲)“啊哥/阿哥”这两种写法中正确的当为“阿哥”，“啊”为“阿”之借音字。从(甲一2)中可知“阿哥”为朝鲜人。(甲一2)中提到“大哥，你还不明白具体情况。你们朝鲜出的许多东西中只有一种海参原本就发往南京，除了这一种货，别的都只是在我们关东这一个地方通用。如果把朝鲜的韩纸和海带用船送到南京，不但可以节省运费，而且一定可以赚大钱”，其中提及了朝鲜。从这一段中可以大致推测“阿哥”是一个朝鲜商人。

□ 中国商人王大哥

书中的对话主要在朝鲜商人和“王大哥”之间展开。从下列(乙一1)、(乙

一2)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王大哥"的一些情况。

(乙一1)骑着一匹飞快大马,一上道立刻就到门上去,先找星德号,在那里恼[闹]半天的口。(1a)

(乙一2)"王大哥,这几年撒拶的生意得意吗?"(1a)

(乙一1)为书中的第一句,意为"骑着一匹飞快的大马,马上就到了栅门,先去了星德号,在那里聊了半天"。接着就是与"王大哥"的对话,可见"星德号"为王氏的店铺。(乙一2)为书中的第一句对话,对话中朝鲜商人称王氏为"大哥"。另外,从(甲一2)中的"除了这一种货,别的都只是在我们关东这一个地方通用"这一段中可以知道王氏是一个在中国关东做生意的商人。

□ 商人永长家

(丙)"我在那里的时候,永长家这此次丢人不小。怎吗缘故呢?他们归人家的票银子,好数千儿来的银子。上塘[趟]贩去的杂货是,都发淂沈阳,咳在那里堆着。起根各人打着发卖好[存]货,倒等现银子归人家的票,所以他们入去的时候,亲手并没有带连一分银子去,白在那里住些个日子。赶到秋天,沈阳城里杂货恒市一违咧,连一张皮子卖不动,何时对付银子来呢?"(11ab)

(丙)中的"永长"为商户名,"永长家"意指店主人。书中并没有"永长家"与朝鲜商人或中国商人的对话,但朝鲜商人在对话中多次提到"永长家",且讲述得非常具体,因此从广义上讲,"永长家"也可算是主要人物。

□ 凤凰城大老爷

(丁一1)"啊哥,这凤凰城大老爷赶几时满闲[限]哪?"(25ab)

（丁一2）"嗳啊，人品却倒不离，天生明公，就是性品忒急，作比要办这一件是，立刻就办浔来才对浔他的边。若是误迟工夫咧，在底些办事的管包有难。终不图银钱，只讲清楚公道。所以伏侍的底些们、伺候的兵伴们，谁不害怕呢？若有错处否咧，管他谁也一点不讲究，只照罪过重轻立刻治罪，故此旗庄、民庄的百姓家，终不敢恼事连累。一当大罪就再不能活过来，还要先斩后报呢。"（26a～27a）

"凤凰城大老爷"为"凤凰城"城将。这里的"凤凰城"是现辽宁省凤城县。朝鲜商人和中国商人的对话中有几处提到了"凤凰城大老爷"。（丁一1）中问到了"凤凰城大老爷"的任期，这里也是书中第一次提到"凤凰城大老爷"。而（丁一2）中则提到"凤凰城大老爷"的人品，称他为人公正但性子急。

□　店房掌柜的、南京的四五个客商们、刘三爷、商人东昶家

这些人物均与"永长家"有关。书中有一个客栈主人被称呼为"掌柜的"（13b），是想促成"永长家"与南京商人们的生意。"南京的四五个客商们"（13b）与"永长家"住在同一个客栈。"刘三爷"（14b）这一人物努力说服南京商人们，想让他们购买"永长家"的皮子。而"东昶家"（23a）是位于西关的一家皮铺"东昶号"的店主，他最终购买了"永长家"的皮子。

2. 主要内容

此书主要由朝鲜商人阿哥和中国商人王大哥之间的对话构成。而第五段对话则是朝鲜商人阿哥和赶车人之间的对话。全书的内容可根据话题分为如下五个部分。

（1）有关生意情况和收成的对话（1a～9b）。朝鲜商人阿哥找到中国商人王大哥的店铺"星德号"，开始与中国商人对话。阿哥问王大哥生意好不好，王大哥回答还能凑合着过日子，但接着又慨叹道最近不景气，不像以前那样有货就能卖，现在的货都卖不出好价钱，所以有很多存货，让人担心。见王大哥这么一说，阿哥劝解道，做生意有盈也有亏，不要太在意价钱。接着建议王大哥卖到外地的货不要用陆路运，用水路运货，这样能节省运费，岂不更好。

王大哥解释说用水路运货不仅无法保证到货的时间，而且如果遇上暴风雨，船上的货不保白糟蹋银子不说，还有可能出人命，所以不能用水路运货。阿哥听罢，说南京的商人们经常走水路，那只能听天由命。接下来阿哥向王大哥问起了收成。王大哥回答说年初还算可以，但秋天一涝大水把庄稼都冲走了。王大哥住的地方是高地所以还算不错，但过了辽阳歉收更严重。阿哥说自己住的地方的收成也非常不好。

(2)有关永长家的对话(9b～25a)。阿哥说自己在沈阳的时候听说除了大纸和海参其他货物都卖不出好价钱，都做不了生意，接着提到了永长家的遭遇。说永长家把上次买下的杂货都发到了沈阳，本来打算到沈阳卖掉那些杂货变现后还人家货款，身上连一分银子也没带。但没想到沈阳城里市场不景气，连一张皮子也卖不动，要还的票据也到了期，被人催着还钱。永长家想通过中间人卖掉那些货，但别说是现金交易，连先给货后付钱也无人问津，这让永长家丢大了面子。客栈主人对永长家的境遇很是同情，想撮合南京商人们与永长家做生意。南京商人们一开始拒绝了客栈主人的提议，但经刘三爷劝说，他们决定和永长家谈谈价钱，让永长家先出价。永长家开出了一个价格单子，南京商人们看过后嫌贵，提出了较低的价钱，但永长家拒绝接受这一价格。客栈主人见双方都不愿意让步觉得非常恼火，说头一次见做生意的这么不懂让步，既然如此这买卖就算了。这时候西关东昶号向永长家表示肯以永长家提出的价格买下他的货，这样一来永长家比一开始多挣了四五百两银子，觉得非常高兴，永长家的这一桩生意就这样结束。王大哥问阿哥东昶号连自家的皮子还没卖完，为什么要买永长家的货。阿哥解释说皮子的价格本来是要到夏天各处皮铺定下合适的买卖价格，到了春天形成市场价，但是如果其他铺子把永长家都买光，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市场价的形成，所以东昶号决定买下永长家的货。接着王大哥又问帽客们带了多少货，阿哥回答那要等车子到达才能知道。

(3)谈论凤凰城城长的人品和各自处境的对话(25a～31a)。阿哥问凤凰城城将的任期和人品怎样，王大哥回答说任期是三年，人品也不错，就是性格太急，且根据罪过的轻重严格公正地治罪，所以手下们都很怕他。另外，阿哥说今年有国王的教旨，要早点到达北京，所以要提前动身。王大哥跟阿哥说

像你这样到北京做生意的人能赚很多钱，感到非常羡慕，并且慨叹自己的处境。阿哥则向王大哥诉苦说到那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非常辛苦，他更羡慕王大哥这样店里有店员帮忙的生意人。王大哥又说运营店铺一整年都很忙，不能休息，所以也有苦衷。

(4)王大哥托阿哥购买物品的对话(31a～43a)。王大哥拜托阿哥到北京替他购买一些货，阿哥欣然答应。王大哥想在阿哥前往北京之前请他吃一顿晚饭，阿哥虽然一开始拒绝，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在启程的前一夜，阿哥与王大哥互相道别，见了最后一面。

(5)阿哥与赶车人王氏的对话(43b～45a)。阿哥拜托赶车人提前把货搬上车。准备完毕后阿哥上了车，然后跟赶车人说晚上到金家何留宿，但赶车人说今晚到不了那里。

四、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之词汇特点

在本章中将把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中现代汉语里已不使用的词汇以及带有方言特点的词汇与《骑着一匹》、《学清》、《你呢贵姓》进行比较，以此来探明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的词汇特点。下举用例为抄本汉语会话书中共同出现的词汇，明确体现了朝鲜后期汉语会话书的特点。

1. *名词*

□ 清天家

(1—A)“不过是走着一年一塘京，一还本地就<u>清天家</u>全不管甚吗事。”(28b)

(1—B)“他们皮气是本来同不淂别人，若不给他们捎来，<u>清天家</u>心里挂怒。”(38b)

“清天家”被译作“미양”，词义与现代汉语中的“整天/成天”相同。这里的“清”为“成”之借音字，这体现了东北方言中混用舌面音和舌尖后音的特点。“清天家”中的“家”不代表其本义，即“屋内/住所”，而是一个无法独立

使用的语素。在近代汉语中这一类“家”可记作“价”，有时还可记为“加、假、介”。使用过程中可用其他字代替“家”，这表明此时的“家”无明显的词义或语法方面的功能。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中除“清天家”，还可见“清天”。

□ 老金们

(1)“连门口不出去，底些还有些个老金们伏侍着，苏长家在铺子里，打发伶俐妥当的伙计们往外贩货去，一头攮这个的，一头攮那个的。”(29b)

(2)中“老金们”被译为“ᄉᆞ환”，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受使唤的伙计”、“佣人”。

□ 底些/底些们

(3—A)“这一下子连体面也恼滑底些去，各人肚气，把那个存货那怕甚吗价钱也罢，卖到现银子，要还人家的账。”(12b)

(3—B)“永长家亲手开一个单子，每种〻底些画码子，给客商们瞧〻。”(17b)

(4)“若是误迟工夫咧，在底些办事的管包有难。”(26a)

(5)“连门口不出去，底些还有些个老劳金们伏侍着。”(29b)

(6)“所以伏侍的底些们、伺候的兵伴们，谁不害怕呢？”(26b)

(3)“底些”被译为“디셜”，这一韩译直接借用了“底些”的汉语发音。“디셜”中的“ㄹ”表现的是儿化韵，可知正确的词汇应为“底些儿”。濯足文库《中华正音》中译作“지셜”，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则将“底些[디셜]”译成了“아레”或“디셜”，“底些/底些儿”应是“底下”的发音出现弱化的结果。收录最多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中词汇的词汇集《汉谈官话》中将“底些儿”译作了“下也”，这正好证明了上述观点。(6)中“底些们”被释作“아ᄅᆞᆺ ᄉᆞᄅᆞᆷ”。濯足文库

《中华正音》中则译作了“아리사람”。“底些们”为“下人”之意，意指“在客栈受使唤的伙计”。“底些们”这一称谓在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译作“아리사람”。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中则使用了“底些们”的近义词“打使伙’/打使辈”（《汉谈官话》中将“底些们”解释为“下人”）。

□ 底头/起头里/开头里

(7)“我们这里今年成底头却倒不离，赶到秋天一涝大水，各处沿上的庄稼哺哩都冲去咧。”(8b)

(8—A)“今个我在头里特以给你们二位办事，也有下不来的吗?”(17a)

(8—B)“永长家比头里多卖四五百银子，倒见便宜咧。”(23a)

(8—C)“作却到作，却是有话该当说淂头里，才‘先断后不难’。”(15a)

(9)“这个时候不是行用的时候，原是赶到夏天下缸的时候才各处皮铺里起头里往皮恒家开板子。”(23b)

(10)“王大哥开头里特以[意]托我这一点东西，我不用心，记错咧。”(39a)

(7)“底头”，(8)“头里”及(9)“开头里”为近义词。(7)中“底头”被译为“처음”。濯足文库藏本也是如此。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则释作了“필경”，对比较为明显。(8—A,B)“头里”被译作“처음”，而在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译作“처음”。(8—C)中被译作“만처”，但在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释作了“만처”。(8)中的“起头里”被解释为“처음으로”。

(9)“开头里”在《你呢贵姓》和《学清》中也被释作了“처음으로”或“처음”。

□ 归期/敀起

(10)“等着恒事往下赶着卖。搁到归期，恒事若违咧。”(3a)

(11—A)"一层〻的往下[赶]着完，办到皈起，要有完不了的是说不淂咧。"(28a)

(11—B)"作比买下咧，动不动堆淂这里，知道赶皈起味道如何呢?"(15b)

(10—11)中"归期/皈起"被译为"필경의"，用作"结果、最后"之意。"皈"为"归"之俗字。(10)中用作了"……到归期/皈起"的形式，(11)中则用作了"……赶皈起"形式。同一时期不同抄本会话书中亦可见"归起"这一形式。阿川文库《中华正音》和《你呢贵姓》以及《学清》中则分别被解释为"필경"和"나종"，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中还可见其用作名词。

□ 皮气

(12—A)"也没有看过像你们二位不体面的皮气。"(21b)

(12—B)"他们皮气是本来同不淂别人，若不给他们捎来，清天家心里挂怒。"(38b)

(12)"皮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脾气"。朝鲜时代译学书籍中亦可见"皮气"。在这里被译作了"버릇"。"皮气"一词见于《译语类解补》(1775)及《方言类释》(1788)，亦见于《华语类抄》(1883)和《华音启蒙谚解》(1883)。在其他资料中被释为"버릇/픠치/셩질/셩미/셩품/긔괴"等。这一词汇在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中见两处，最后见于日本侵略时期旧活字本汉语会话书《华语精选》(1913)和朝鲜人鹭溪叟改编自清代侠义小说《三侠五义》前23回的《包阎罗演义》(1915)中，之后便不见其用例，取而代之的是"脾气"。

□ 吸唬

(13)"张三李四天〻在那里，勾他恼吸唬，这是该怎吗的呢?"(11b)

(13)中"吸唬"被译成了"빗"，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译成了"빗ㅅ"。在《华

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中也被译作了“빗/빗ㄷ”，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饥荒，负债”。

□ 枉宴

(14)“听着说，春夏秋冬，按着四节寻常白恼枉宴。”(28b)

(14)中“枉宴[왕 벼얀]”被译作“즐 ᄒᆞ一”，而在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译作了“노 릇”。“枉宴”为“玩意儿”之借音字，亦见于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另外，本书中还可见“宴闹”，其韩译为“즐 비ᄒᆞ一”，可见“宴闹”为“枉宴”之近义词。关于“宴闹”一词在后面的形容词部分将进行仔细分析。

□ 今个/明个/后个

(15)“今个通着他们爷们讲定生意，横竖价钱是只要合实些。”(15b)
(16)“明个走不上就后个就必走啊。”(27b)
(17)“故此后个就不溽不走，一定在走呀。”(28a)

(15)中“今个[귄 거]”译作“오 날”，(16)中“明个[멸 거]”译作“ᄂᆡ 일”，(16，17)中“后个[홀 거]”译作“모 릐/모 레”。从韩语注音中可看出“今个”、“明个”、“后个”分别为“今儿个”、“明儿个”、“后儿个”的缩略语。

2. 代词

□ 那候

(18)“那候南京的四五个客商们，也在一个店里和他们一同住下。”(13b)

“那候[나 홀]”在这里被释作了“급 ᄢᅴ”，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释作了“그

싀”。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那时候”。

3. 动词

□ 起旱

(19—A)“大哥,你们这里往外发货呢,都是雇车起旱拉,我也莫[摸]不着这一点意思。”(4b)

(19—B)“江南、江西、苏州、湖南、泗[四]川、福建、广东地方,离这里道路遥远,起旱走不到,都是上舡才到得呢。”(6a)

(19)中“起旱”分别被译为“뭇트로 싣니ㅡ”及“뭇트로 단니ㅡ”,在濯足文库藏本中也是如此。“起旱”一词亦见于阿川文库《中华正音》。19 世纪末的翻译小说《绿牡丹》中将“起旱”译成了“뉵노로 써니보니ㅡ/뉵노로 거러거ㅡ/뉵노로 거ㅡ”,可知“起旱”中的“起”源自“起程”。

□ 讲主/讲究/讲道

(20—A)“年底些才满咧,一替三年是一定的规矩,讲主是三年才为满。”(25b)

(20—B)“把那个酒壶送过来,咱们随手各人篩各人哈,讲主是顿壶是淂。”(41b)

(20—C)“讲主通化镜是一期十年,一个是五十岁的方盒子,一个是四十岁的团盒子。”(34b)

(20—E)“价钱是由着他们单,银子却是讲主是皈淂三票。”(22b)

(20—F)“京城里各处铺子里发买东西,却是讲主是冠带来回,所以再不敢欺人。”(37b)

(20—G)“初会的朋友们跟前才讲主这个礼来呵。”(42a)

(21)“若有错处否咧,管他谁也一点不讲究,只照罪过重轻立刻治罪。”(26a)

(22)"今日咱们哥儿既是都在一处讲道闲话,这个时候比不如先时宴闹。"(1b)

例(20,21)"讲主/讲究"与(22)"讲道"为近义词。

(20—A,B,C)中"讲主[장 쥬]"被释为"놀ᄂᆞᄒᆞ—/놀난ᄒᆞ—",(20—D,E)中被译为"결단 허—",(20—C)中其韩译为"용서 ᄒᆞ—"。"讲主"中的"主"为"究"之借音字。在现代汉语中"讲究"意为"注重",但在东北官话中,用作名词时,意为"规矩",用作动词时,意为"谈论、议论"。抄本汉语会话书中"讲主"一词为多义词,其词义既包括现代汉语中的词义,也包括方言词义。另外,也可见"讲主头"。

□ 恼

(23)"一来怕这一点意思,二来一遭大风就必恼大难子。"(6b)

(24)"恼几天以后,客商们招掌柜的说是:'刘三爷既是劝我们讲生意着,我们也不淂不作。'"(14b)

(25)"恼几个月的工夫,人家的票满日子咧。"(17b)

(26)"像这吗利害的山道,万一黑着走咧,人辛苦马受罪,恼一夜的工夫走,到才几十里地,刚到店里,人马都疲咧。"(46b)

(27—A)"恼几个月的工夫,人家的票满日子咧,各处恒家、铺家东南西北上的,齐打胡哩只是往他催银子,张三李四天〻在那里,勾他恼吸唬,这是该怎吗的呢?"(11b)

(27—B)"万一人家胡哩胡塗的混绽一路锅,他们也恼淂里头白费钱。"(24a)

(27—C)"故此旗庄、民庄的百姓家,终不敢恼事连累。"(27a)

(23—27)中的"恼"为"闹"之借音字。如例(23—24),在本文献中"恼"被释作"저즐—/이앗 치—",但如(25—27),大部分用例直接借用其汉语发音作了记录,记作了"나우 ᄒᆞ—/나 위허—/나오 ᄒᆞ—"。《学清》、藏书阁所藏《中华

正音》中也用作了相同的意思。

□　恼口/恼腐

(28)"骑着一匹飞快大马，一上道立刻就到门上去，先找星德号，在那里恼[闹]半天的口。"(1a)

(29)"若一个搁到归起，差不多点恼臭咧。"(4a)

例(28)中的"恼口[놔 쿠]"被释作"수 작 허一"，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则被译作了"수 작 하一"，而《华音启蒙谚解》中的韩译为"말 ᄒᆞ一"。

(29)"恼臭[놔 칙]"被释为"무 셰 ᄒᆞ一"，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记作了"恼腐[놔 칙]"，释作"쎡一"。《骑着一匹》中记作了"恼臭[腐]"，"臭"与"腐"并记，由此可推断"腐"与"臭"含义相同，可混用，但读音为"臭칙"。这种用例书中可见两处。

□　见//光

(30一A)"若把你们那里的大纸、海菜藏[装]船送得南京否咧，不但说是寡[光]省车脚钱，却是管包大见光。"(5b)

(30一B)"我从本地来，一到沈阳，听着说大纸、海参大家见一点光，都卖出去。"(15a)

"见光[잔광]"在(30一A)中释作"니를 보一"，(30一B)中则释作了"니를 죵 보一"，即"获益"。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也见一处。但在现代汉语中"见光"意为：①"擦得发亮"，"发光"；②"受光(晒)"，并无"获益"之义。



□　倒等

(31)"起根各人打着发卖好[存]货，倒等现银子归人家的票。"(11a)

例(31)中“倒等”被释作“믓잣긋一”,濯足文库中则被释作了“뒤걱긋ㅣ-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为“捣腾”,词义为“转卖”。还见“倒腾,捯腾,捣登,捣动,叨登,叨蹬,叨腾,倒登,倒动”等异体字。亦见于《华音撮要》。

□ 打着

(32—A)“起根各人打着,发卖存货倒等现银子皈人家的票……”(11a)

(32—B)“所以打着这一两天的工夫都要遮完咧。”(28a)

(32—C)“打着五天的工夫尽力儿走着,准到沈阳。为甚吗在路上白误迟日子呢?”(45b)

例(32)中“打着”被释为“헴치一”,词义为“想”。目前在胶辽官话中用作“想着”、“打算”之义。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亦见多处用例,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中见一处。

□ 含糊

(33—A)“讲价钱是又易淂易,只由着大恒大事,不过是含糊一点就罢咧。”(16b)

(33—B)“永长家又嫌小,更不肯作。我们齐打胡哩劝他们里外含糊些。”(18b)

(33—C)“各人心里发烦,请傍边闲人们齐打胡哩劝他们两头□□[含糊]着,上下更不言语。”(20a)

(33)中的“含糊”在现代汉语中用作形容词时意为“模糊,不明确”,用作动词时意为“疏忽,随便应付”。但在这里用作动词,含义为“降价”,这一种用法较为特别。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也用作了“降价”之意。

□ 缴登

(34)"倘若缴登几只舡,白丢银钱是搁淂[到]一边,先不用讲就[究],白遭掲多少姓[性]命?"(6b)

(34)中"缴登"被释作"파 선 ᄒᆞ一",濯足文库藏本中记作"蹄蹬",译为"파션허一"。

《你呢贵姓》中以附录形式收录的词汇释义中也释作"상 하 여ᄇᆞ리다"。可知这一词汇在这些资料中的词义相同。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折腾"。

□ 擃

(35一A)"他们后邦车都没有到齐,也有弄多的咳有擃小的。"(25a)

(35一B)"一头擃这个的,一头擃那个的,给掌柜的各干其事,那个倒舒服不舒服?"(30a)

(35)中的"擃"意为"변 통 허一/변 통 ᄒᆞ一",是"弄"之借音字。这一词亦见于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和阿川文库《中华正音》。

4. *形容词*

□ 便当

(36)"咱们这里干生意家,都没有你们爷ˎ们便当些。"(29a)

(36)中"便当"被释作"편 안 ᄒᆞ一","편 안 허一"。亦见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翻译老乞大》和《老乞大谚解》。

□ 儹儅

(37)"他们这一等杂货是,原是不像我们本地的大路货僘儻,作比买下咧,动不动堆淂[到]这里。"(15a)

(37)中的"僘儻[상 당]"为"爽当",被译作"시원 ㅎ—"。藏书阁藏本《中华正音》也见其用例。

□ 不离

(38)"嗳啊,人品却倒不离,天生明公,就是性品忒急。"(26b)

(38)中"不离"被译为"무던 ㅎ—"。"不离"为东北、北京、胶辽官话,意为"好"、"不坏"、"过得去"。这一词亦见于藏书阁藏本《中华正音》中。在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也用作相同的含义。

□ 离散凋远/离胡

(39)"若是他门离〻胡〻的,离散凋远,胡讨虚价咧,这如何成淂了呢?"(16a)

(40)"横竖是六站里的年成是还算不离不胡,一过辽阳就十分荒年,故此沿道草料越发贵的离胡。"(9ab)

(39)中的"离散凋远"和(40)中的"离胡"为近义词,被译为"엉숭이",可知其词义为"荒唐"、"不着边际"。《关话略抄》中记作"离散倒远"。

(40)中"离胡"被译为"엉 둥 이",书中亦记作"离离胡胡",被译为"이렁저렁",或用作"不离不胡"的否定形式,译为"무 던 허—"。

□ 便宜/并一

(41—A)"雇舡往外发,图省车脚钱,也不便宜也不省事吗?"(5a)

(41—B)“永长家比头里多卖四五百银子，倒见便宜咧。”(23a)

(42—A)“开头以来，正没有斡[干]过像这吗不并一的卖买。”(21b)

(42—B)“他们是本情大庄的生意家，自然是银钱都并一些。”(14a)

(41)“便宜”与(42)“并一”为近义词。(41)中“便宜[평이]”被译为“니롭—/니로오—”，

(42)中“并一[빙이]”则被译作了“가즉/가즌”。濯足文库藏本中记作“併意[빙이]”，译为“다 가지—”。《学清》中亦被释作了“니르보—”。

□ 稀松

(43)“万一恼出缘故来呢，像我们稀松的生意，如何搁淂住呢，必是担不住。”(7a)

(43)中“稀松시숭”的韩译为“좀처”，可知其词义为“渺小、无关紧要”。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译作“조고마—”。1884 年左右韩文翻译的《红楼梦》中可见一处“希松”的用例，被译为“관즁히 너기지 아니ᄒᆞ—”，可知其词义与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中的“稀松”相近。

□ 宴闹

(44)“今日咱们哥儿既是都在一处讲道闲话，这个时候比不如先时宴闹。”(2a)

例(44)中“宴闹[여놔]”被译为“즐비ᄒᆞ—”，这一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热闹”，这定是受到了东北方言的影响。

濯足文库《中华正音》中准确地写作“热闹”，但韩语注音同样为“여놔”，韩译为“즐비(櫛比)”或“즐비허—”。如本文 4.1. 名词部分所述，本书中亦记作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62

"枉宴[玩意儿]",释作"즐 비ᄒᆞᅳ"。其他抄本汉语会话书中则用作"宴恼"。藏书阁《中华正音》中见三处,顺天大学《中华正音》及藏书阁《骑着一匹》中见一处用例。值得注意的是藏书阁所藏《骑着一匹》中的韩语注音为"이 예 난",与"宴"字的汉语发音"yàn"相似(由此可知卷舌音"rè"在东北方言中的发音按"ᅀᅥ>여>이 예"的顺序变化)。

5. 副词

□ 铺哩

(45)"除咧这两种货,别的恒事铺哩都臭。"(10a)

例(45)中的"铺哩",词义为"가 지 가 지/갖 가 지"。濯足文库《中华正音》、《你呢贵姓》、阿川文库《中华正音》等资料中也写作"哺哩"或"哺理"。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各种各样"。

□ 攏具攏

(46)"他们帽客这塘往边门口带的毛包是攏具攏多少?"(24b)

例(46)中不见明确的韩译。而在濯足文库藏本中,其中的"攏古攏[눙 구 눙]"被译为"도 모 지"。《你呢贵姓》中则记作"攏具攏"。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拢共"、"共计"。

□ 本情/底根/起根

(47)"他们是本情大庄的生意家,自然是银钱都并一些。"(14a)

(48)"东昶家底根有的存货是,先不算银数,只有三四十大堆子。"(23a)

(49)"起根各人打着发卖好[存]货,倒等现银子归人家的票。"(11a)

(47)中的“本情[成]”,(48)中的“底根”以及(49)中的“起根”为近义词,被译为“근 본”或“원 간”,均用作“本来”之意。(47)“本成”一词虽无法从词典中查到其词义,但例句中的含义与东北官话“本情”相同,故可推测“本成”和“本情”的关系与“清天家”和“成天家”相同,为混用舌面音和舌尖后音的结果,即“情”为“成”的记音字。这一词也体现了东北方言的音韵特点。这一词在《你呢贵姓》、《学清》中释作“근 본”和“본 ᄂᆡ”,可见与本书中的用法一样,也用作“根本、本来、原来”之意。该词亦见于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以及阿川文库《中华正音》。(48)中的“底根”同样见于《你呢贵姓》、《骑着一匹》、阿川文库《中华正音》、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另外,还可见于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支那语集成》和《汉语指南》,可见这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使用。

□ 齐打胡哩

(50—A)“各处恒家、铺家东南西北上的,齐打胡哩只是往他催银子。”(11b)

(50—B)“各人心里发烦,请傍边闲人们,齐打嘲哩劝他们两头□□[含糊]着,上下更不言语。”(20a)

(50—C)“我们齐打胡哩劝他们里外含糊些。”(18b)

(50)中“齐打胡哩[치다 후 리]”被译为“뭇 다 락 기/뭇 다 라 기/뭇 다 라 기”。(50—B)中的“齐打嘲哩”以及(50—C)中的“齐打胡里”被译作“뭇 다 라 기/뭇 다 락 이”,可解释为“一齐”、“一起”。在《红楼梦》中记作“齐打伙(儿)”,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齐打忽/齐打伙儿”、“一齐”、“一起”之意。

□ 管包

(51—A)“不但说是寡[光]省车脚钱,却是管包大见光。”(5b)

(51—B)“我这个老实価钱,你们又嫌贵,咳想平意咧,管包今个的生意成不来。”(19a)

(51—C)"所以每年个赶到春天就恒事管包起来。"(23b)

"若是误迟工夫咧,在底些办事的管包有难。"(26a)

(51)中"管包[관 봐]"被译为"졍코",(52)中则译作了"뎡코",可解释为"必定"、"一定"。《你呢贵姓》和《学清》中也有其用例。现代汉语中的"管包"为动词,词义为"负责"、"承担",不用做副词。"管包"为"管保"的另一种写法,即该词的正确写法应为"管保",阿川文库《中华正音》中就写作"管保"。

□ 动不动/动不动儿的

(53—A)"作比买下咧,动不动堆淂[到]这里,知道赶皈起味道如何呢?"(15a)

(53—B)"我开的这一个请单是,动不动儿的再不能捞下去的。"(19b)

(53—A)中的"动不动"与(53—B)中的"动不动儿的"均译作了"동 부 동",其词义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动辄"。常见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水浒志语录解》中也见多处用例。另外还经常见于《女仙外史》、《红楼梦》等小说。

□ 该当

(54)"作却到作,却是有话,该当说淂头里,才'先断后不难'。"(15a)

(54)中"该当[당]"被译为"가이/맛당이",这里的"该"为能愿动词,可解释为"应……"。本文献中"该"一律释作"가이","该"的借音词。"该当"一词多见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被译为"맛당이"或"맛당타"。

□ 苏长家

(55)"苏长家在铺子里,打发伶俐妥当的伙计们往外贩货去,一头攥

这个的，一头攥那个的，给掌柜的各干其事，那个倒舒服不舒服？又是嫌甚吗呢？”(30a)

(55)中“苏长家”被译为“믜 양”，这与濯足文库《中华正音》相同。“苏长家”还可见“须常家”等写法，正确写法为“素常家”。

□ 替另

(56)“客商们一瞧请单，心里嫌贵，由着他们替另开一人单子，给永长家瞧.”(18b)

(56)中“替另”被译为“싀 로 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重新”、“再”。该词亦见于濯足文库《中华正音》和阿川文库《中华正音》，分别被译作“자 로 이”和“자 루 이”。《红楼梦》中亦见“替另”一词，但在此用作北京方言。另外还有“题另”或“替零”等写法，前者可见于藏书阁所藏《中华正音》，后者则可见于《象院题语》。

6. 其他

□ 过不是

(57—A)“除咧这一种货，别的却是过不是我们这关东一生地方通用的。”(5b)

(57—B)“万一人家胡哩胡涂的混綻一路锅，他们也恼淂里头白费钱。过不是这一点意思。”(24a)

(57—C)“一种海菜是原是有钱的不吃，到处庄田家吃不岂值钱的东西，过不是图贱买吃海菜呢。”(31b)

(57)中“过不是”被译作“불과”，词义与现代汉语中的“不过是”相同。顺天本《中华正音》中则以“不过是”的形式出现。

□ 对淂边

(58)"作比要办这一件是,立刻就办淂来才对淂他的边。"(26a)

(58)中"对淂边"被释作"뜻의 마자 ᄒᆞ—",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释为"뜻제 마져 허—",意为"对脾气"。

□ 比不如

(59)"今日咱们哥儿既是都在一处讲道闲话,这个时候比不如先时宴闹。"(1b)

(59)中"比不如"被译作"—갓 치……뭇 ᄒᆞ—",濯足文库藏本中被译为"—만 치……업—",用作"不如"之意。藏书阁藏本《中华正音》中也见其用例。

□ 治不得

(60)"黑着白日里跑的时候,连觉也治不得睡,何时顾淂吃饭不吃饭?"(29b)

(60)中"治不得"被译作"뭇 ᄒᆞ—"。该词亦见于阿川文库《中华正音》。

□ 赶明个

(61—A)"横竖赶明个到全,才明知道多小数儿来啊。"(25a)

(61—B)"赶明个不增不费,那怕白洗手呢,大家熱闹些,却就领掌柜的情。"(15b)

(61—C)"万一别人买下咧,赶明个开板的时候,只怕绽他们锅。"

(24a)

(62)“啊哥敢明个一走，就横竖各人必明白着，咳用问吗?”(9b)

(61,62)中“赶明个”用作“赶一”或“敢一”两种形式，被译为“일후 계”或“일후 에”。“一계”为表示期间、时日、时间之意的词缀，用于名词后，表示前面所接时期为中心的前后一段时间。《华语精选》中则被释为“来日즘”。

□ 赶几是/敢几时

(63—A)“啊哥，这凤凰城大老爷赶几时满闲[限]哪?”(25b)

(63—B)“阿哥，你在这里敢几时往京里走啊?”(27a)

(63)中“赶几时/敢几时”被译作“어느 ᄣᅵ/어나 ᄣᅵ쎄”，濯足文库藏本中则被译作了“어늬 ᄣᅵ”。

□ 往下赶着

(64—A)“横竖是有本事的人，该往下赶着作，像我们倴本人们如何作得着呢?”(2a)

(64—B)“等着恒事往下赶着卖，搁到归期，恒事若违咧，立刻就往别处拉。”(3a)

(64—C)“一层ㆍㆍ的往下[赶]着完，办到敀起，要有完不了的是说不淂咧。”(28a)

(64)中“往下赶着”被释为“아ᄅᆡ로/……는 듸로”。(64—A)中被译作“아ᄅᆡ로 ᄒᆞ는[作]듸로”，(64—B)中被译作“아ᄅᆡ로 파ᄂᆞᆫ[卖]듸로”，(64—C)中则被译作“아ᄅᆡ로 ᄒᆞᆫ 듸로”。

五、华峯文库《中华正音》之语法特点

1. 介词

□ 搁

(1)"不搁海路通行,又是搁那吗走呢?"(8a)

(1)中"搁[부]'"被译作"ㅡ로 부터/ㅡ로",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从"或"由"。

□ 勾

(2)"张三李四天天在那里,勾他恼吸啱,这是该怎吗的呢?"(11b)

(2)"勾"字,常见于朝鲜时代的文献中。本文献中仅有一处用例。就其他汉语会话书而言,《关话略抄》中以"勾"的形式出现,见一回。此外,阿川文库《中华正音》及《华音撮要》中则以"勾"的形式集中出现。

2. 助词

□ 咧

"咧"相当于语气词"呢",书中有多处用例,下面为部分用例。

(3)"搁到归期,恒事若违咧,立刻就往别处拉,爱发那里就发那里。"(3a)

(4—A)"若是他门离ㄔ胡ㄔ的,离散凋远,胡讨虚价咧,这如何成淂了呢?"(16a)

(4—B)"若是误迟工夫咧,在底些办事的管包有难。"(26a)

(5—A)"作比买下咧，动不动堆浔[到]这里。"(15a)

(5—B)"我一个对着你们胡说咧，却就必不依我作呢?"(19a)

(5—C)"万一别人买下咧，赶明个开板的时候，只怕绽他们锅。"(24a)

(3)(4)中"咧"在假设句中与"若"或"若是"一起使用，用于强调条件。(3)中的"若……咧"和(4—A)中的"若是……咧"均被译作了"—면"，(4—B)中被译为"—서는"，在(5)中被译作了"—여도"，可见其在句中起到了强调条件的作用。

□ 了

与用做助词的"咧"不同，"了"在书中为构成词汇的语素，只用作补语。由此可知书中对"咧"和"了"的语法功能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6—A)"罢了罢了。就像你们爷们明公才能的作着生意，又是讲甚吗呢?"(1b)

(6—B)"该怎吗着，各人想不出方法来，寡丢人罢了。"(12b)

(7)"只照时价收买赶了咧，一齐发浔沈阳，随恒发卖。"(3a)

(8—A)"一层〻的往下[赶]着完，办到敀起，要有完不了的是说不浔咧。"(28a)

(8—B)"那吗你们这里许多的句当，几天里头怎吗都完浔了呢?"(27b)

(9)"若是他门离〻胡〻的，离散凋远，胡讨虚价咧，这如何成浔了呢?"(16a)

(10)"打派人招来[永]长家去，把这一件卖买是用不了几句话，一下子打没停偿。"(22b)

上举用例中"了"为构成词汇的语素。(6)中用作"罢了"，(8—10)中的

"了"均用于表示可能和不可能的补语中,(8－A)中的"完不了",(8－B)中的"完得了",(9)中的"成得了",(10)中的"用不了"等,"了"在其中均用作"v+不了"、"v+得了"这两种形式。

□ 否咧/不咧

"否咧"为较为特殊的助词,在其他汉语会话书中主要用于表示条件、假设及正反疑问句。在本文献中"否咧"被译为"一이면/으면/이어니"等词尾,这些词尾相当于现代韩国语中的"一면"、"一니"。

(11)"若把你们那里的大纸、海菜藏[装]船送得南京否咧,不但说是寡[光]省车脚钱,却是管包大见光。"(5b)

(12)"若有错处否咧,管他谁也一点不讲究,只照罪过重轻立刻治罪。"(26b)

(13)"普天下不拘甚吗地方不咧,再沒有卖不出去的。"(3b)

上举例句中的"否咧"在(11)(12)中用作表示假设的连接词尾,等同于"一면",(13)中用作表示条件、前一句为后一句的原因的连接词尾,等同于"一니"。由此可见,"否咧"表示条件和假设这种用法与其他抄本汉语会话书中的用法相似。

经典诠释

他者视域下的儒家经典:《孟子》英译本比较研究

刘单平

我国儒家经典西译的历史早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开始。最早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是传教士,后来大批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也纷纷加入,使翻译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由于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译者在同一个文本中可能会发现不同的意义,译本也就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为了全面认识译本的多样化,本文选择了四个英译本《孟子》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译者对《孟子》文本的解读特点,总结不同译本的特色,并探求造成译本多样化的原因。这四个译本成书于不同时代,由不同身份的译者完成。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的《孟子》译本(简称理译本)首次出版于1861年,以"忠实"闻名,至今仍被奉为"标准译本"。译者理雅各具有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的《孟子》译本(简称赖译本)以简洁著称,出版于1932年。英国人赖发洛作为在华海关洋员在中国任职长达40年,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刘殿爵的英译本(简称刘译本)出版于1970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普遍好评,被誉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典范之作。译者刘殿爵是著名的汉学大家,曾在伦敦大学任教近30年,直到1978年回香港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赵

作者学习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甄陶、张文庭、周定之的英译本(简称赵译本)出版于1999年,是当代国内学者翻译出版的最著名的汉英对照版《孟子》,隶属大中华文库工程,深受国家重视和媒体关注。英译者赵甄陶、张文庭、周定之既具有较深的国学功底,又是享誉外语界的知名教授。可见,本文选取的四个译本能够较为全面地代表《孟子》英译本的状况和水平。

一、译本比较研究

翻译并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切换,还要力求体现原文的文化内涵。笔者将从语义选择、对传统习俗的敏感度和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三个方面对以上四个《孟子》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以窥不同译者对《孟子》的解读特点以及译文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原文的文化内涵。

1. 译者对语义的选择

纵观四个英译本,译者在选择语义时大体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根据词语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翻译原文,一是结合语境和上下文判断词语在译文中的具体含义。译者不同的语义选择使译文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例如: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孟子·梁惠王上》)

理译本将"为长者折枝"翻译为"breaking off a branch from a tree at the order of a superior(根据老者的要求,为他折树枝)"。赖译本和赵译本将之译为"break a twig for an elder(为年长者折取嫩枝)"。这三个译文都按字面意思把"折枝"理解为"择取树枝"。刘译本独辟蹊径,将之翻译为"massaging an elder's joints for him(为老人按摩关节)"。

要判断那种翻译更准确,首先要对"折枝"的词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东汉赵岐注曰:"折枝,案摩,折手节解罢枝也。"朱熹《集注》说:"为长者折枝,以长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难也。"[①]据焦循《孟子正义》,"《文献通考》载陆筠解为'罄折腰肢',盖犹今拜揖也"[②]。可见,"折枝"古来有三种解释:折取树

①任俊华、赵清文,《大学·中庸·孟子正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81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4,86页。

枝、弯腰行礼和按摩关节。笔者认为,“为长者”三字出现在“折枝”前,是为了表明尊老之意。而“折取树枝”不足以表达此意,故应排除在外。如果取“弯腰行礼”之意,用在此处不妥。孟子在这里是为齐宣王解释“不为者与不能者的区别”。“为长者折枝”是“不为者”的代表,指那些容易做但不愿意做的事。在中国古代,年轻人对老人弯腰行礼是当然之事,应循之礼,不存在是否愿意做的问题。因而“折枝”取“替老人按摩关节”之意更佳。

可见,刘译本更准确、深刻地体现了原文的意思。而其他三个译本仅停留在词语层面上,未能结合文化语境与上下文体会出“折枝”的深层含义。

又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刘殿爵将“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翻译为“When food meant for human being is so plentiful as to be thrown to dogs and pigs, you fail to realize that it is time for garnering.(当粮食非常充裕的时候,人们用它喂猪狗,而你却没想到此时应当储备粮食)”。理译本和赵译本的理解一致,将之分别翻译为“Your dogs and swine eat the food of men, and you do not make any restrictive arrangements”和“Now your dogs and swine eat the food of the people, but you do not take any restrictive measure”,即“猪狗在吃人的口粮,而你却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这两种翻译的分歧在于:刘殿爵认为“狗彘食人食”和下文的“涂有饿莩”分别指在丰年和灾年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而“检”和“发”是统治者采取的不同经济措施。理译本和赵译本则把“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放在同一时空之下,指责统治者实行虐政残害人民。

笔者认为,刘译本更符合孟子之意。在“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后,孟子指出,“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在这里,孟子将“岁”和“兵”作类比,说明二者有相似之处,即“兵器”不是使人丧命的决定因素,起关键作用的是使用它的人;“年岁”好坏也不是百姓存亡的决定因素,主要还是看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从文意的逻辑关系上看,将“检”和“发”理解成统治者在丰年和灾年采取的不同经济措施更符合原文之意。不仅如此,在《汉书·食货志赞》中,孟子的这句话和当时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排列举,这也从侧面表明“检”和“发”指的

是当时实行的经济政策。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对这种经济政策做过精确的解释,即"丰岁则敛之于官,凶岁则粜之于民"[①]。理译本和赵译本仅看到"检"的字面之意,没有从上下文语境中判断其确切含义,导致了译文与原文的背离。赖译本在翻译此句时采取模糊策略,将之译为"Dogs and sows eat man's food, and no one knows what to do(猪狗在吃人的口粮,而没有人知道应当怎么办)"。这就轻易地回避了译家们的分歧。但从忠于原文、传播传统文化的角度讲,这是不可取的。

2. 译者对传统习俗的敏感度

典籍是古代文化的负载者,涉及许多古代社会习俗和政策。如果译者对传统习俗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有可能将其漏译、甚至误译。

例如:《礼》曰:"父召,无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父召,无诺"虽然仅有四个字,却包含了古代对尊长应答之礼的规定。"古人的应答之词既有唯,又有诺。《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东汉郑玄的注说:'敬词唯恭于诺。'"[②]可见,应答之词"诺"有怠慢之意,"唯"比"诺"更显恭敬。因而,"父召无诺"指当父亲召唤的时候,应毫不怠慢,"唯"一声就起身,不说"诺"。

赖发洛对古代习俗缺乏必要的敏感度,将"无诺"按字面意思直译为"do not answer(不要答应)",这与《礼》的规定背道而驰,错误地译介了原文的意思。理译本将"无诺"翻译为"The answer must be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毫不迟疑地立即答应)",这基本符合《礼》的规定。刘译本翻译为"One should not answer, I am coming(不能回答'我就来'。)""我就来"含有怠慢地答应之意,与古代应答之词"诺"相似,故刘译本在翻译此句时做到了与原文"形神兼备"。赵译本翻译为"You should not even take time to say 'yes' but just go to him at once(你要立即到他身边去,甚至来不及回答'是')"。赵译本把《礼》中规定的子对父的应答之礼更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便于读者理解。

又如: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章句下》)

---

①富金壁、牟维珍,《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75页。
②张双棣等,《古代汉语知识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7页。

本句翻译的关键是对“迹”的理解。理译本将“迹”直译为“trace(痕迹，踪迹)”。他在注解中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周朝王权衰落始于公元前 769 年，周平王将国都从镐京迁往洛邑时。此后，周王的权力有名无实。”[①]显然，理雅各受朱熹影响，将“王者之迹熄”理解为“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②]。赖译本也按字面意思直译“迹”为“footmarks(足迹)”，将“王者之迹”翻译为“王者的足迹”。他只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形似，不关注文意的传达，令读者不知所云。虽然刘译本和赵译本都把“迹”理解为“远”，但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刘殿爵将“迹”翻译为“wooden clappers(木舌金铃)”。他在注释中指出，“木舌金铃是四处采集民谣的官员使用的东西”[③]。他这样翻译的目的是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使读者对中国古代采诗之人“以木铎记诗言”的特征有一个了解。赵译本更关注译文的通俗易懂性，因而把“迹”翻译为“collectors of songs(采集民谣之人)”。

从文意上看，孟子认为“王者之迹熄”和“《诗》亡”有密切联系，是导致“《诗》亡”的原因。“平王东迁”和“《诗》亡”并无密切关联，因而理译本的翻译有牵强附会之嫌。而“远”和“《诗》亡”联系紧密。许慎在《说文解字・丌部》曰：“远，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程树德在《说文稽古篇》认为：“考《左传》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④]两位华人译者对古代传统习俗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将“迹”中包含的古代圣王派使者去民间采集民谣，了解民情的传统介绍得较为清楚。外国译者赖发洛和理雅各漏译、误译了这一重要文化信息。

3. 译者对孟子思想的理解

孟子开创性地提出了性善论的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完备的道德修养论。准确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是准确译介孟子思想的关键。我们可以从译者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的翻译来窥探他们对孟子性善论的认识。

---

①James Legge, *The works of Mencius*, New York: Dover Pub. Inc, 1970, p. 327.

②朱熹，《孟子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3 页。

③D. C. Lau, *Menciu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p. 131.

④任俊华、赵清文，《大学・中庸・孟子正宗》，227 页。

赵译本将"性善"翻译为"Men are born good"。显然,译者对"性善"的理解是"人性本善"。虽然理译本将"性善"翻译为"The nature *of man* is good(人性是善良的)",但是准确地说,他认为人性向善。这在他对"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的翻译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理雅各将此句翻译为"The tendency of man's nature to good is like the tendency of water to flow downwards.(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赖译本和刘译本将"性善"翻译为"The goodness of our/ human nature(人性的善良)"。

孟子人性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性本善还是性向善更符合孟子之意?我们可以从孟子对性善的论证中得出结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相信"四心"是人性的基本内涵,人先天地具有善性。孟子同时强调,人需要将善性存养、扩充以实现自己的性。因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端"是开端、发端之意,故还需要"扩而充之"。

由此可见,理雅各对"性善"的理解与孟子人性善的内涵不符。理雅各对孟子"性善"的误解与他的传教士身份密切相关。岳峰指出,"理雅各的研究方法与耶稣会士的索隐派有相通之处。早期耶稣会士诠释中国经典时,常常力图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并行不悖,并尽力查询依据"[①]。基督教强调人必须弃恶向善,理雅各试图证明孟子思想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故将孟子的"人性善"翻译为"人性向善"。不仅如此,孟子对"性善"的论述也容易产生"性向善"的错觉。正如梁涛所说,"孟子的'四心'或'才'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容易使人产生'性向善'的错觉,但根据孟子对善的理解和定义,其学说显然应该是'性善论',而不是'性向善'论,尽管其对'性善'有独特的理解"[②]。

与理译本的"性向善"相比,赵译本的"人性本善"更符合孟子的人性观。但对"人性本善"也应全面理解。"人性本善"能够看到人天生具有善性的本质,但容易忽略孟子所谓"性善"的动态性,不重视善性需要存养扩充的一面。赖译本和刘译本将"性善"理解为"人性是善良的"。就翻译本身而言,译文译

①岳峰,《理雅各宗教思想中的中西融合倾向》,《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4期,94页。

②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4页。

出了"性善"的字面之意，但未体现出原文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使读者难以全面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实质。

二、译本特色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虽然译者都在翻译《孟子》，但他们的理解层次不尽相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具特色，使译本呈现出四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理译本的显著特色是注释包罗万象，篇幅甚至超过译文本身。理雅各在翻译《孟子》时多从浅处入手直译，试图用详尽的注释来保证译本的忠实。繁琐的注释虽使译本略显冗长，但为译文赢得了忠于原文的美誉，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孟子》研究资料。虽然理译本向来以忠实著称，但也不乏背离原文的现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理译本偏离原文的主要原因是过分依赖朱熹注释的权威，对经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家的新发现不甚关注。汉学家道森(Raymond Dawson)曾经批评理雅各"不了解晚近中国经学研究，接受了业已过时的正统阐释"[①]。这一评价用来解释理雅各在例句中出现的偏差尤为恰当。理雅各的传教士身份和宗教热忱是造成译本偏离原文的又一原因。尽管他的译文大都能在中国学者那里找到依据，但是传教士的价值取向根深蒂固，会在不自觉中影响他对原文的解读，给译本打上宗教的烙印。

赖译本的显著特色是用简单、通俗的词语逐字直译《孟子》。虽然理译本和赖译本都以直译为主，但前者以冗长闻名，后者则以简洁著称。赖发洛尽可能地逐字翻译原文的原则很好地再现了《孟子》原文简练的风格。与理译本擅用脚注不同，赖发洛仅用少许简要的注解训释译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他认为，"既然我的对象是英语读者，太长的无关注释只会显得格格不入"[②]。但是，由于中外语言和中西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译者如果仅按字面意思翻译而不加详细注释，就容易漏译原文中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赖发洛对"逐字翻译"的过分强调容易使"直译"走向极端，变成歪曲原意的"死译"、"硬译"。赖译本仅重视结构层面的忠实，对意义层面的忠实重视不够，在传播《孟子》

①王辉，《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4期，116页。

②Leonard A Lyall,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London: John Murray, 1907, p. 20.

思想和儒家文化上收效不大。

刘译本在许多地方都对先前的译文作了改进和创新。刘殿爵在翻译《孟子》时，不迷信前代译本的权威，善于通过严密的推论，多方面考证经典的原义。“他在经典研究方面，创获尤多。刘教授最有独特心得的方法是通过相关文献的排比对读，凸显问题之所在，结合语法、语义、语境、校勘、避讳字和假借字种种考虑，从而解决问题。”①扎实的汉学功底和科学、完备的考证方法使他能够准确理解《孟子》原文的内容，敢于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科学的翻译方法是确保译文兼备准确性与可读性的又一法宝。刘殿爵的翻译方法是，“第一次只求将原文的意思一无遗漏地译出来，不理会译出来的文字的好坏，过了几个星期，拿出来再看，不看原文，纯粹作文字上的修改，改完了又跟原文对一遍，每次改完再对，《论语》一书，我就修改了七八次，做到读起来是流畅的英文，而不失原文的意思”②。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翻译方法为刘译本赢得了普遍好评。古语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刘殿爵的译文尽管存在着少许误译现象，但总的来说不失为一篇翻译佳作。

由赵甄陶主译的大中华文库版《孟子》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今译、英译相互参照，译本通俗易懂。大中华文库版《孟子》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更关注译本如何吸引普通读者，译文能否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因而，译者不拘泥与原文的句式结构，采取解释性的翻译策略，对《孟子》中许多“中国味”特别浓厚的词语和文化现象进行通俗化的翻译。解释性翻译策略的采用很好地传播了《孟子》中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但在呈现原文的语言风格上稍显逊色。

三、影响译本特色的因素

翻译可以被定义为从原本（Original Text）转换为译本（Translation Text）的理解和书写过程③。根据这一定义，译者的典籍翻译活动可以划分为

①《采掇英华》编辑委员会，《采掇英华：刘殿爵教授论著中译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

②《编译参考》编辑部，《刘殿爵教授谈翻译问题》，《编译参考》1980年1期，72页。

③李河，《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60页。

理解与书写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有多种因素影响译者的活动，使译本呈现出不同特色。

在理解阶段，语言因素是影响译者理解原文的首要因素。《孟子》中字词的含义是丰富复杂的，"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①]。译者对字词意义的取舍不同，会直接影响他对原文句意、甚至是章节之意的理解程度。赖发洛在翻译《孟子》时，偏向于选择字词的表面意义，使译文肤浅僵硬，难以再现原文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刘殿爵善于结合语境与上下文寻求最佳词义，因而译文能准确体现原文的深层含义。

理解的历史性是造成译本多样化的深层次原因。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任何理解都具有历史的条件性，历史的实在性是历史与对历史理解的统一；另一方面它是指理解者清醒地知道他自己的意识状态是效果历史意识："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②]译者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自己的经验和思想体系之中来理解《孟子》的，这就给译本打上了译者及其时代的烙印。虽然理雅各的译本以忠实著称，但仍然鲜明地体现了译者作为传教士的身份特征。他不仅习惯用基督教教义来诠释、评价孟子思想，还通过对中国特有文化词语的神学化翻译，将基督——耶稣意象强加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理译本甚至也体现了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纷纷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时代特征。

在书写阶段，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使译本呈现出不同特色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译者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将直接影响译本的编排体例。刘殿爵虽未直接表明其书的目标读者，但从译本的编排体例看，本书面向的是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严肃读者。译本除了包含《孟子》一书的全文翻译外，还有近 40 页的序言和长达 59 页的附录以及精确的注释和完备的索引。赵译本以普通读者为目标读者，仅满足于完成一个汉英对照版了事，未将与译本相

①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22 页。

②曾振宇，《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文史哲》2009 年 4 期，39 页。

关的背景资料和研究成果收录其中。第二、译者的翻译动机从宏观上决定着译本的特点。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动机是，“我认为，如果将所有儒家经典都能够翻译出版并且还附有注释的话，将有助于未来的传教士们的工作”[①]。为了让传教士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雅各以忠实翻译《孟子》为己任，试图用详尽的注释来确保译本的准确性。第三、译者对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决定译本的特点。赖发洛选择直译的翻译方法，因而更关注译文与原文在句子结构上的对应，更容易再现原文的语言特点。而赵译本以意译为主，这就决定了译者更关注原文意义的表达，不强求字、词、句的对应，有时还会调整语序，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生动性。

四、小　结

译本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受语言因素、理解的历史性、预期目标读者、翻译动机以及翻译策略的影响，不同的译者即使带着同样严谨的态度翻译同一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译本特色也可能会大不相同。这使我们不得不同意赫尔曼的话：有的时候，“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译本的情况”[②]。通过阅读不同的《孟子》译本，读者可以体会到译者对《孟子》的不同认识轨迹，感受到译者眼中儒家思想的独特魅力。但是，承认译本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认可译者可以任意篡改原文之意。译本是原文本的化身，不管它如何多变，必须以原文本作为蓝本和依据，力求准确再现原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



①海伦·爱德司·理雅各，《詹姆斯·理雅各：传道师与学者》，转引自段怀清，《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3期，95页。

②西奥·赫尔曼，《翻译的再现》，转引自徐来，《英译〈庄子〉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31页。

《三国志》英文选译本评析

何凌霞

晋人陈寿所撰《三国志》是我国传统史学名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前四史”。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①]。《三国志》一书更因小说《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而备受大众瞩目。自中文世界第一本《三国志》今译本问世以来，至今已有十二种中译本(不含选注选译本)[②]。在经典全球化的今天，《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①吕思勉，《为学十六法》，北京：中华书局，2007，61页。

②这十二种《三国志》中译本按第一版出版的时间顺序分列如下：

王静芝等译，《白话三国志》，台北：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

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刘国辉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王根林等译，《白话三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分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栗平夫、武彰译，《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

杨达璋注译，《文白对照全注全译三国志》，北京：线装书局，2008。

国志》陆续推出了日译本[①]、韩译本[②]及英译本[③]，近年还有了俄译本[④]；而英语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强的语言，从这点上看，高德耀和孔为廉合译的《三国志》英文选译本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三国志》选译本的问世，为国际学界研究三国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基础。选译本旁征博引，将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融于一字一句的翻译中，译注详备，译文流畅，真正秉承了“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作为英文世界第一部《三国志》译本，它不仅仅有助于西方学界加深对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他者视域——译者笔下的这段三国妇女史以及美国学界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的。不难发现，由于语言、文化上的隔膜，译者对这段历史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读现象。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译者注的特色、译文可贵之处以及误译现象等三个方面对选译本加以评析，以期对典籍英译，特别是《三国志》的英译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由于英译本底本为中华书局校点本，故文中引用《三国志》原文处均括注 1982 年版标点本页码。

一、资料丰赡　注释精详

英文选译本的全名为《后妃：〈三国志〉选译》(*Empresses and Consorts: Selections from Chen Shou's* Records of the Three States *with Pei Songzhi's Commentary*)。译者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教授曾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研究领域为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孔为廉(William Gordon Crowell)教授曾是一名外交官，后执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研究领域为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译者在《前言》中表示：希望此番努力可以为中国妇女史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一本集资料、研究、翻译于一体的学术性译本。译本由导言和翻译两部分构成。导言部分包括五章内容：1. 绪论；2. 帝国早期宫廷妇女的地位；3. 妇女与帝国

①今鹰真、井波律子、小南一郎译，《正史三国志》，东京：筑摩书房，1977—1993。

②金元中译，《(正史)三国志》，首尔：申元文化社，1994。

③高德耀、孔为廉译，《后妃：〈三国志〉选译》，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

④见倪永明，《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6 页。

早期的历史及思想;4. 三国时代的后妃;5. 论《三国志》。在这五章中,译者主要探讨了妇女与先秦思想、后妃与宫廷政治、后妃与三国婚姻形态、后妃身世状况、后世对《三国志》的评论、陈寿关于甄后之死的记载等等问题。翻译部分为裴注《三国志》三卷内容,即《魏志·后妃传》、《蜀志·二主妃子传》和《吴志·妃嫔传》。

译本附有三国魏蜀吴地图、三曹后妃头衔表、曹魏后妃爵位等级图、卞后家族谱系图、刘备家族谱系图、孙权家族谱系图、孙/陆/诸葛婚配图、孙/朱婚配图、孙/全婚配图、曹操后妃子孙称谓图、曹丕后妃子孙称谓图、陈志与裴注字数统计表,以及注释、书目、索引。译本共 280 页,附录、注释、书目、索引等共计 148 页,约占全书一半篇幅。现仅以书目为例,译本共列书目 409 种,中、日、韩参考文献 187 种[①],西文参考文献 222 种[②],囊括了如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卢弼《三国志集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吴金华《三国志校诂》、毕汉斯(Hans H. A. Bielenstein)《汉代官僚》、贺凯(Charles O. Hucker)《中国古代官名辞典》等诸多学术成果,对一些发表在大陆学报上的论文也给予了关注,如《清华学报》1936 年 11 卷第 4 期刊出的杨联陞先生的《东汉的豪族》一文。

细致翔实的卷后注是译本的一大特色,内容涉及典章制度、名物故实等等,这无疑为读者理解文意扫除了很多障碍。全书共出注 675 条,其中《译者序》注释 12 条,导言部分共注释 385 条,翻译部分共注释 278 条。现举例如下:

1. 对典故的注释

例 1. 匹夫无罪,怀璧为罪。(《魏志·后妃传》,159 页)

注释:This is a proverb found in *Zuo zhuan*, Huan 10. (198 页)

按:译本指出这句话引自《左传·桓公十年》,并为这句译文添加了引号,可补中华书局本之阙失。

例 2. 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辄与恭等案谥法,宜曰昭烈皇

①中文参考文献 181 种,日文 5 种,韩文 1 种。

②英文参考文献 214 种,法文 7 种,德文 1 种。

后。（《蜀志·二主妃子传》，905 页）

注释："Cold springs"（*han quan* 寒泉）comes from the *Classic of Poetry* (*Mao shi* 32), a poem that is traditionally interpreted as having to do with the appreciation due a mother. See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4:42(prolegomena), 50—51.（209 页）

按：译本参考了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一书，指出"寒泉"这个词来自《诗经》中的一首诗《凯风》。这首诗在传统意义上被解读为子女对母亲孝思的表达。

2. 对专名的注释

例 3. **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魏志·后妃传》，158 页）

注释：Qian Daxin says that a *du xiang* was a district near the capital and that a du xiang hou, or the marquis of such a district, ranked above a regular xiang hou, or district marquis(*Sgz jijie*, 5. 7a).（197 页）

按：译本引用钱大昕观点"都乡者，近郭之乡，班在乡侯之上"，指出都乡侯的爵位高于乡侯。

例 4. **兄吴壹，少孤，壹父素与刘焉有旧，是以举家随焉入蜀。**（《蜀志·二主妃子传》，906 页）

注释：Yi's name was originally written 懿 but seems to have been changed by Chen Shou to avoid the taboo on Sima Yi's name(*Hygz*, 5. 489n; *Zztj*, 69. 2188; Fang,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67—68).（210 页）

按：译本参考了《华阳国志》、《资治通鉴》及方志彤译《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指出"吴壹"原名为"吴懿"。因避司马懿讳，陈寿将"懿"省文。

3. 对日期的注释

例 5. **后以汉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156 页）

注释：There seems to be a mistake in the date given here, for there was no yisi day in that month. Imataka, Inami, and Kominami, *Sangoku shi*, 1:149, also question this date. Note that Leban, "Ts'ao Ts'ao and the Rise of

Wei," 57, reads second month for twelfth month and thus gives the Western equivalent 4 April 160. Yanxi 3 ran from 27 December 159 to 13 January 161.（195 页）

按：译本认为此处的时间有误，因为延熹三年十二月并不存在己巳日，并指出今鹰真、井波律子、小南一郎等翻译的《正史三国志》也曾对此提出质疑。接着，引用 Leban《曹操和魏国的兴起》一文的观点，认为此处的"十二月"当为"二月"，"延熹三年二月己巳"即公元 160 年 4 月 4 日。须说明的是，译本虽然误将"己巳"看成了"巳巳"(yisi)，但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日期的文本校勘亦不能忽视。查万年历可知，"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确实有误。窃以为"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或作"延熹三年十一月己巳"，即公元 160 年 12 月 24 日；或作"延熹二年十二月己巳"，即公元 159 年 12 月 30 日。惜没有版本依据，暂时存疑。

例 6. 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167 页）

注释：The day *renshen* 壬申 was actually in the second month of Qing long 3, making the date 29 March 235(*Sgz pangzheng*, 7.6a; *Sgz jijie*, 5.21b). The interment of empress Guo took place on 16 April.（206 页）

按：译本参考了《三国志旁证》、《三国志集解》，指出此处时间有误。"青龙三年三月"并没有"壬申"日，这里的"三月"当作"二月"，即公元 235 年 3 月 29 日。郭后葬于青龙三年三月庚寅日，即公元 235 年 4 月 16 日。

4. *存疑*

例 7.《春秋说》云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魏志·后妃传》，155 页）

注释：That *San guo zhi* here *writes Chunqiu shuo* 春秋说 i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The only apocryphon with a similar title is *Chunqiu: Shuo ti ci* 春秋说题辞[①], and we have translated accordingly. However, the surviving fragments of that work do not contain a similar passage. Perhaps *Chen Shou*

① Apocrypho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Explaining the Themes and Words

is referring to a lost portion of the *Shuo ti ci* or to some now unknown work. An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Chunqiu shuo is not a title at all, but means instead "an explanatio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uals", as indicated by Dubs, who, however, was unsure. (192—193 页)

按：译本以为此处的《春秋说》颇为可疑，最接近原名的应该是《春秋说题辞》，因此，将书名翻译为[*Apocrypho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Explaining*[*the Themes and Words*]。但是，现存的《春秋说题辞》中并没有"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类似的句子，译者疑这句话很可能为佚文，亦或者书名另有所指。另一种可能性是，"春秋说"根本不是书名，而是指对《春秋》所作的阐释。

例 8. 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魏志·后妃传》，155 页）

注释：This sentence may mean something like"Only in the Taihe period, when he named a new lady, did he raise her position above that of pure consort," or "In the Taihe period when he first named a new lady, he raised her position above that of pure consort." These latter interpretations offer more specificity about the occasion, but we are not sure which of the three might be right. The one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reflects our impression that the punctuation in the Zhonghua shuju text may be misleading. (193 页)

按：译本认为此处的翻译颇费斟酌。从字面上看，此处有三种意思：(1)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2)惟太和中命一夫人，始登其位于淑妃之上；(3)太和中始命一夫人，并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译者暂取第一种，将这句话译成"Only in the Taihe 太和 reign period[227—233] did Emperor Ming restore lady to its position above pure consort"，但也不能肯定原文就是这个意思。译本以为中华书局本此处标点似误。

二、不拘一格　译文晓畅

德文中"翻译"一词"übersetzen"带有"摆渡"的意思。翻译所从事的活动

就是跨越文化的鸿沟，将此文化空间的语言文字运送到彼文化空间中，这不正是一场“摆渡”吗？如何从此岸顺利地摆渡到彼岸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译者对他所从事的对象是否已全部了然于心。《三国志》英文选译本的译者始终坚持“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这点可谓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译本众多参考书目让我们一睹译者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译者以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标点本为底本，参以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标点本，但并没有照搬中华书局本，而是参考了清代以来关于《三国志》史实考订、语词校诂方面的成果。之所以旁征博引、考证出处，这也是和译者既定的目标分不开的。译者希望给研究者提供一本学术性译本，而不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译本。鲁迅曾谈到：“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①]为了更好地实现译文的叙述价值和研究价值，译者在翻译策略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兼用异化与归化法[②]；在文化语词的翻译上，则以异化策略为主。现举数例如下：

例9. 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魏志·后妃传》，156页）

译本：And if calamity should happen to befall us, what misery is there in dying together?（90页）

按：“何苦”习用于魏晋时期口语，相当于现代汉语“何妨”的意思。卢弼《三国志集解》：“‘苦’疑作‘害’。”吴金华先生《三国志校诂》对此早有辨析：“苦”字不误，“何苦”犹言“何害”[③]。译者参考了吴先生的观点，将“共死何苦”按字面意义直译成“what misery is there in dying together”，保留了原文的时

---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4－365页。

②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进一步阐述了翻译策略。1995年，他在其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第23卷第1期，40页）翻译界普遍认为，异化和归化是译者针对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差异，面对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目的语读者等方面的不同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直译、意译、音译等等则属于翻译方法。异化追求保留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以期丰富目的语语言及文化；归化追求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及文化的规范，较好地满足目的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中国翻译》第23卷第6期，22页）。

③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39页。

代特色。这句话在当时是口语，而在今天看来却是古语了。为了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达原文的含义，译者选择了直译，以“what misery”来翻译“何苦”，用词极为熨帖。我们对比一下，如果将这句意译为“what does it matter that we will die together”，古韵全失，完全就是一句现在的大白话了。[①]

例 10. **逸薨，加号慕，内外益奇之。**（《魏志·后妃传》，159 页）

译本：When Yi died, she added[her little voice] to the keening and wailing, and those within and without the family increasingly regarded her as special.（96 页）

按：“号慕”同义连文，谓哀号恸哭，魏晋时期哀悼尊长之辞[②]。如果将“号慕”译成“号叫思慕”，很显然是犯了以今律古之病。译者汲取了吴金华先生的观点，将“加号慕”直译成“added[her little voice] to the keening and wailing”，非常传神地再现了三岁的甄后因哀悼父亲而啼哭不止的情景。此处的翻译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译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展示了译者高妙的翻译手法。

例 11. **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161 页）

译本：Your servant Songzhi understands the principl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be that great evils within the palace are concealed, while lesser evils are recorded.（100 页）

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实为“内大恶讳，小恶必书”，吴金华先生《三国志校诂》对此早有考辨[③]。译者此处没有蹈袭中华书局本之误，而是遵从吴先生的意见，将“小恶不书”译为“小恶必书”，体现了古籍英译有别于现代文英译的特色——文本的校勘不容忽视。

例 12. **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魏志·后妃传》，166 页）

译本：The river is meant to freely transport supplies. Besides, there is

①关于“共死何苦”的翻译，笔者曾请教苏杰副教授以及笔者的美国朋友，他们一致认为此处采用直译为佳。

②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40 页。

③吴金华，《三国志校诂》，41 页。

too little timber, and servants are not available. You would also need to take state-owned bamboo and wood for your personal use to make the dam. (109 页)

按:"奴客",当为"仆人"之义,译本正是译成"servants",于义为优。《三国志全译》译为"家产"[①],误。

例 13. **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魏志·后妃传》,166 页)

译本:In the spring of Qinglong 3 [235/236], the empress died in Xuchang. They built her tumulus in accordance with her last will. (109 页)

按:"终制",《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为"死者生前对丧葬礼制的嘱咐"。从原句上下文意来看,"终制"指称的是"郭后生前对丧葬的个人意愿",译本紧扣原文,译文明畅。而《三国志全译》将此句译为"朝廷按本朝丧葬制度为她营造陵墓"[②],似误。

例 14. **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骇,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魏志·后妃传》,167 页)

译本:Jia originally was a carriage maker(che gong 车工)under the chief commandant of waters and parks. When he suddenly became rich and noble, Emperor Ming ordered the court officers to assemble at Jia's home for symposia. Jia's demeanor and his behavior were very stupid and foolish, and when he spoke, he always referred to himself as "the Lordly Person". People of the time thought he was a joke. (112 页)

按:此处翻译不拘一格,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音译、汉字,并且添加了注释。译者以为"典虞"大概是"水衡典虞"的省称,因此,将"典虞"译为"the chief commandant of waters and parks"。在"车工"的处理上,直译、音译、汉字,三者并用。尤其可圈可点的是"饮宴"一词的翻译,译者以"symposia"对译,用词古雅,神韵犹存。汉晋时期,君臣宴饮,吟诗作赋,其风颇盛;而 symposium 一词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交际酒会,以此来翻译"饮宴",颇为传

①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109 页。
②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234 页。

神。此处的翻译让我们再次体悟到译者对文本的切实理解是文本获得其来世生命的关键。

例 15. **如有不遇，命也。**(《吴志·妃嫔传》,1195 页)

译本：If I am to be unlucky, that is my fate. (122 页)

按："不遇"，犹言"不幸"[①]。译者将"不遇"译为"unlucky"，深得文意。

例 16. **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吴志·妃嫔传》,1201 页)

译本：So they dispatched two shamans, one to each grave site, to remain in a particular spot to watch for her spirit. Inspectors were also sent to watch them so they could not come close to each other. (131 页)

按："使察鉴之"当为"使察战监之"，详见吴金华先生《三国志校诂》一书，在此不赘述[②]。译本不受中华书局本之惑，将"使察鉴之"译为"Inspectors were also sent to watch them"，正是"使察战监之"之意。

三、以今度古　瑜不掩瑕

古籍英译不同于一般的英译，它联结的是两个时空的语言、文化和受众，不仅要跨越空间上的距离，还得穿越时间隧道去沟通。这一路上的甘苦，只有译者深知其味，旁人是体会不到的。重重的陷阱、迢迢的弯路、密密的岔口，都是对译者理解能力最严峻的考验。关于这方面的困难，著名学者沈苏儒先生有过肺腑之论："就语言本身而言，理解其表层意义不难，理解其深层意义、联想意义、'言外之意'难。这里还有语境、语言的模糊性、方言行话等方面的问题。就文化内涵而言，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还有原作者及原文读者的民族、历史、地域、社会等文化背景的问题。如果是古代(即使是上一个世纪)的著作或资料，那末在语言及文化两方面的理解难度就更大。"[③]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开头所指出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阶段，也是决定翻译成败

①吴金华，《三国志校诂》，244 页。

②吴金华，《三国志校诂》，245 页。

③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07－208 页。

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在古籍英译的过程中，倘若“望文生义”、“以今度古”，翻译出来的句子虽然看上去通顺易畅，实际上却和原文毫不相干了。细读《三国志》英译本，我们发现译本也存在一些因译者误解原文而造成的误译现象。现举例如下：

例 17. **本娼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魏志·后妃传》，156 页）

译本：Originally, she was in a brothel, but when she was twenty, the Grand Progenitor took her as a concubine at Qiao.（90 页）

按：译者将“本娼家”翻译成“她原本出自青楼”，显然是误读了原文的意思。导言第 4 章介绍卞后的出身：“Cao Cao's Empress Bian had been an entertainer, perhaps even a courtesan”，这句话意思是“卞后曾是一名乐人，也可能是妓女”。其实，卢弼《三国志集解》广征博引，对此早有定论：“所谓倡乐，不似后世之淫业贱流，颜注训为乐人，于义得之。”“娼家”在当时指的是“从事歌舞表演者”，译成“entertainer”更为合适。

例 18. **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魏志·后妃传》，157 页）

译本：If any among you violates a law, I can even increase the offense one degree. Do not expect money, grain, kindness, or leniency.（93 页）

按：译本将“莫望钱米恩贷也”直译成“do not expect money, grain, kindness, or leniency”，意思是“不要期望钱、米、恩、恕”。此处直译望文生义，没有很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莫望钱米恩贷”，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要奢望用钱米来赎罪”。

例 19. **时武宣皇后体小不安，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160 页）

译本：The empress could not periodically check on her and was so anxious and frightened that she wept day and night.（98 页）

按：定省，子女早晚向父母问安，后泛指探望问候父母或亲长。语出《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郑玄注：“定，安其床衽也；省，问其安否何如。”译本将“定省”直译为“periodically check on”，意思是“定期看望”，似欠妥。

例 20. **妾无皇、英厘降之节，又非姜、任思齐之伦。**（《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165 页）

译本：I lack the integrity of Huang and Ying's marrying below their station, and I am not one to hope to emulate Jiang and Ren.（107 页）

按：英译本将"非姜、任思齐之伦"译成"I am not one to hope to emulate Jiang and Ren"，意思是"我不是那种希望效法姜、任的人"，误解了"思齐"的含义。此处的"思齐"并非"见贤思齐"之义，而是个典故词，典源为《诗·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任，指文王之母大任。姜，指太王之妃大姜。思，语气词。齐，庄敬。

例 21. **先主疑与瑁同族。**（《蜀志·二主妃子传》，906 页）

译本：The Former Sovereign suspected that he might be of the same lineage as Mao.（117 页）

按：此处"疑"当是"犹豫"之义，整句谓"先主因自己与刘瑁同族而犹豫不决"。译本将此句照直翻译："The Former Sovereign suspected that he might be of the same lineage as Mao"，意思是"先主怀疑自己与刘瑁同族"，与原文不符。

例 22. **亦必谓后降年有永，永与朕躬对扬天休。**（《吴志·妃嫔传》，1198 页）

译本：Furthermore, I was sure that her Heaven-granted years would be long and that with me she would respond to and spread Heaven's blessings.（127 页）

按：此处的"对扬"是个典故词，语出《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朱熹集传："言穆公既受赐，遂答称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庙器，而勒策王命之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万寿也。"据文意判断，"对扬"当为"答谢、报答"之义；而译者将"对扬"直译成"respond to and spread"，似欠妥。

四、小结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阐述"圆满

的翻译”时谈到：“译文中，语言的和谐如此深邃以至于语言接触意义就如同微风拨动风鸣琴。”[①]本雅明所阐述的这种翻译笔者以为只能是一种最美好的理想，现实中几乎没有一种译文可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的译文只是最切实的接近原作，而不可能是原文的再现。那么，如何使译文最大程度地贴近原作呢？国内翻译界讨论的最多的就是“异化”、“归化”等翻译策略的问题。但有些误译现象很显然并不是由于策略不当造成的，而是归根于译者对文本的误解，如上举“娼家”、“思齐”、“对扬”等例子。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到“理解”这个问题上来。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其实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一种诠释。诠释学大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而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②]之所以会出现多种解释，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语词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针对人类的各种理解，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解释学概念——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他认为，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文本处于两种不同的视域。理解者具有现今的视域，文本带有作者原初的视域，由于时空的变迁，两者必然存在着某种差距，这种时空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域”交融在一起，达到“视域融合”，这样才可能消除这种时空差距。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地将“现在视域和历史视域”融合在一起呢？关键在于理解者的“前见”，或称“前理解”。任何理解者必先有“前理解”，才能再去理解什么。“前理解”构成了理解者的当前视域，如何完满地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前理解”[③]。

因此，翻译首先解决的就是“视域融合”问题。译者受其自身修养、社会背景、文化环境的制约，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前见”，从而产生不同的解读以及质量不等的翻译作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如《三国志》的英语翻译，

①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页。

②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90页。

③章启群，《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94－95页。

译者能否与文本建立一种“亲密的语内阐释关系”，将文本历史视域内化于心，是较完满地实现“视域融合”的前提。笔者以为较好的办法就是译者与典籍研究权威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这样才可能避免由“前见”造成的误译现象。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吴金华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文献天地

扶桑留珎：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佚存初考

（附录两种）

童　岭

一、引言：汉唐学术与日藏旧钞本之关系

隋唐时代到来之前的东亚（Eastern Asia）文明圈[①]，处于核心位置之中国，首先经历了六朝的分裂时代。这一时代中，学术、文学都得到了自由的发展。即使在旧有的经学领域，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例如奉承郑玄注者有之，而反对者亦有之。广泛的采取佛教义理，并加以老庄玄味，这种经学方式迥然不同于两汉。虽然这一时代的著书比起两汉明显增多，但由于社会之不稳定，书籍散佚之数亦不少，譬如写在缣帛上的书物往往在战争中成为掠夺对象之一。故而即使是晋灼的《汉书集注》在南朝也属罕见之物，更不待侯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域外汉籍研究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域外汉籍与六朝隋唐文学综合研究”(10CZW037)成果之一。

①参见笔者《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耶？——关于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文载中国南京大学、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编，《“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又，关于隋唐时代“东亚文明圈”的定义与分期，请参笔者《隋唐时代东亚文明圈五期说刍议》，文载《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之乱与江陵之火矣。北朝的情况则更加惨淡，号称一代文治的北魏孝文帝，也不得不向南齐借书府库方才稍见充实。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云："元魏以降，屡经兵燹，当时载籍，零落殆尽"[①]。尔朱荣乱后，北朝分裂。只有东魏、北齐一支尚顾及汉籍整备，西魏、北周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制度改革和训练鲜卑族以及汉族战士上[②]。

隋承接南北两朝末期之弊，典籍状况亦不如人意。隋秘书监牛弘在开皇三年建议，用绢一匹换民间书一卷，以之充实府库。然而隋末大乱，对于典籍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③]。此外出于各种政治原因，六朝之前的古书也多有散逸。唐代一统天下之后，作为官吏选拔的工具，首先着手于典籍的底本整理与意义阐释。孔颖达以唐王朝为后盾，作出《五经正义》（入宋之后，《论语》、《孝经》、《尔雅》也陆续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有了"正义"）。六朝时代大量的义疏类注释典籍被人为地抛弃了。

我们今天往往是通过文献史籍记载来了解六朝隋唐之学术文化变迁，然而旧钞本，特别是日藏汉籍旧钞本也可以帮助我们部分地还原那段历史实态。比如日本的奈良、平安朝写经生留下的实物中，《汉书》和《晋书》残卷数量相当之多。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敕撰之史书[④]，作为当时最新、最流行的史书姿态出现；而《汉书》的注解则是由《五经正义》"定本"作者颜师古所作[⑤]，也

---

①朱祖延，《北魏佚书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1 页。有关南北朝之间的书籍文化交往，又可参吉川忠夫《岛夷と索奴のあいだ——典籍の流传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文载《东方学报・创立 70 周年纪念论集》第 72 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 年 3 月刊行。

②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外编第三章第四节《北齐北周政术概观》，京都：弘文堂书房，1932，680－697 页。

③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第四章"隋之聚书及其末年兵燹"，上海：上海书店，1983，178－181 页。

④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唐太宗重修〈晋书〉及敕撰〈氏族志〉之推论》认为："盖重修《晋书》所以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332 页。又，谢保成认为："修《晋书》以戒皇子和大臣，修《晋书》以诉自己的苦衷。"见所著《隋唐五代史学》第三章《新修两晋南北朝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2－73 页。

⑤清儒段玉裁《经韵楼集・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云："颜师古奉敕考定五经，凡《正义》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文载《段玉裁遗书》，台北：大化书局，1986，867 页。段氏之说代表了清儒的普遍观点，但也存在不同看法，如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对于《五经正义》定本为颜师古之说持反对意见，认为《五经正义》的定本并非颜师古的"考定本"，而是成于隋代之前。刘文淇的这一观点见其《左传旧疏考正・序》，载《清经解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8，881－882 页。亦可参铃木虎雄著、童岭疏证，《五经正义撰定答问疏证》，文载《艺衡》第 2 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是代表一种最新之史学注释学[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②]，说初唐学界崇尚的学问有"三礼"(经部)、"《汉书》"(史部)和"《文选》"(集部)。神田喜一郎《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认为，虽然日本学令规定要读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然而正仓院中却藏有不少《晋书》钞本[③]；公元648年，新罗王遣使入长安朝贡，唐太宗赐"新撰《晋书》"(《旧唐书·新罗传》)。这些都可以从实物角度佐证当时史部显学之《晋书》在东亚文明圈内得到广泛传播。现存的日藏《汉书》、《晋书》残卷在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的工作中起过巨大校勘作用，此后亦陆续有六朝隋唐时期的《汉书》、《晋书》等残卷出现，想必除了会对古籍整理等多方面有所裨益外，对于今人还原六朝隋唐学术思想史也有莫大之帮助。

又如，奈良时代的日本经学类汉籍旧钞本中，《白虎通》、《三礼义宗》、《经典释文》三者存在之意义十分值得关注。首先，《白虎通》是东汉章帝时代在白虎观汇集儒生讨论五经异同的文献，清儒陈立《白虎通疏证》云："汉儒说经师法，谓莫备于《白虎通》。"[④]然而六朝时代的经学风气和佛教徒的问答式讲经方式很接近，故而南朝时代重新被中国学者所推崇的汉籍《白虎通》，很快也流入了日本。其次，《三礼义宗》是南朝崔灵恩的著作，在中土业已亡佚，清儒马国瀚等辑得若干卷[⑤]。《三礼义宗》的部分逸文现今还保留在《职员令》中[⑥]，它应该和后来的《经典释文》一样，是代表六朝江南经学学风的著作，也分别在成书之后不久就被东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当时学界的重视。以上三种汉籍旧钞本，让我们知道了南朝经学界研析的文本实态。由此可见，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具有大量刻本所无法传达的信息，这些信

---

①吉川忠夫认为颜师古之《汉书》学虽然来自家传，但代表了六朝的新风气。参其著《六朝精神史研究》第十章《颜师古の汉书注》，京都：同朋舍，1984。

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440—442页。

③神田喜一郎，《扶桑学志·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载《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八卷，京都：同朋舍，1987，14页。

④陈立著、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3页。

⑤马国瀚辑得四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二册，扬州：广陵书社，2005影印，1142—1169页。黄奭亦有辑本(不分卷)，见其著《汉学堂经解》中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影印，650—671页。

⑥小岛宪之，《国风暗黑时代の文学——序论としての上代文学》，东京：塙书房，1968，305—306页。

息对了解处于钞本时代的汉唐学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汉籍旧钞本作一番详细之考查。

二、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的初步统计

1. 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说起

张伯伟先生在《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说道，域外汉籍包括：(1)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2)域外刊本或钞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①]。而钞本特别是现存的六朝隋唐的汉籍旧钞本，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尤其值得珍视。

汉籍的东传，千年不绝。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圈内的最先进国，其文化承载物"汉籍"也被文明圈内的各个国家视为瑰宝。日本的圣德太子时代是汉籍学习热潮的开始，从此之后经过白凤、奈良时代，伴随着佛教典籍的东渡，汉籍旧钞本也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汉籍在日本的规模初具，大约要在平安初期公元9世纪前后[②]。这一时期日本收藏汉籍的大致情况可以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据狩野直喜考证，这部目录的写作时间介于《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之间，是当时日本实存的中国书籍总目[③]。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曾经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各家部数及卷数(分注记卷数和实数两栏，下只列注记卷数)进行过如下之统计(虽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并未明言四部分类法，下列资料为方便起见，暂且按四部分类法统计)[④]：

经部：易家33部177卷；尚书家14部113卷；诗家15部166卷；礼家46部1109卷；乐家23部207卷；春秋家35部374卷；孝经



---

①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②参拙作《公元九世纪前汉籍东传丛考》，文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研究》第19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③狩野直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文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影印，285页。

④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东京：小宫山书店，1956。

家 20 部 45 卷；论语家 35 部 269 卷；异说家 17 部 85 卷；小学家 58 部 598 卷。

史部：正史家 35 部 137 卷；古史家 9 部 240 卷；杂史家 34 部 616 卷；霸史家 3 部 122 卷；起居注家 3 部 39 卷；旧事家 4 部 20 卷；职官家 4 部 70 卷；仪注家 11 部 154 卷；刑法家 41 部 580 卷；杂传家 40 部 437 卷；土地家 37 部 318 卷；谱系家 7 部 16 卷；簿录家 7 部 22 卷。

子部：儒家 15 部 134 卷；道家 62 部 458 卷；法家 4 部 38 卷；名家 2 部 4 卷；墨家 3 部 3 卷；纵横家 1 部 3 卷；杂家 95 部 2617 卷；农家 2 部 13 卷；小说家 10 部 49 卷；兵家 60 部 242 卷；天文家 85 部 461 卷；历数家 54 部 167 卷；五行家 156 部 919 卷；医方家 166 部 1309 卷。

集部：楚辞家 6 部 32 卷；别集家 149 部 1568 卷；总集家 85 部 1568 卷；

四部合计：1586 部 16734 卷。

通过小长谷惠吉的统计，可知日本奈良平安时代读书人的汉籍兴趣所在。其中经部礼家最多；史部杂史家、刑法家为多；子部医方家、五行家为多；集部别集家、总集家为多。今日日本实际所藏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在四部分类上虽然不完全符合上述之比例，但作为总体的学术兴趣倾向则大抵同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著录。比如日本从大宝律令至养老律令的变迁，应该和大量刑法类汉籍的输入有关联[①]。奈良时代律令制规定了日本大学寮模仿唐朝教育制度[②]，教科书也大多是唐朝之钞本。如大经（郑玄《礼记》、服虔杜预《春秋左氏传》）、中经（郑玄《毛诗》、《周礼》）、小经（郑玄王弼《周易》、孔安国郑玄

①中国律令的变迁从吏员令（晋令、梁令）发展为职员令（隋令、唐令），相应的日本律令从官员令（大宝令）发展为职员令（养老令），说参池田温《中国律令と官人机构》，文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前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会》，东京：劲草书房，1967，152—153 页。

②关于日本大学寮的研究，请参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第二章《平安时代初期の大学寮の盛容と大学别曹の设立》，东京：吉川弘文馆，1947。以及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の研究》第一部第一章《草创期の大学寮》，町田：玉川大学出版部，1990。

《尚书》)等的设置[①]。此外,对《尔雅》与《文选》的重视等等,都可以在日藏现存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中觅得一丝踪迹。

近年,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编纂了《日藏汉籍善本书录》[②],此书虽然钞本、刻本兼收,网罗甚丰,然其于钞本,特别是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方面的著录并不能完全满足学界的需要。下面,笔者将结合阿部隆一、长泽规矩也、中田勇次郎等人的统计研究[③],逐次罗列奈良、平安前期时代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

2. 奈良时代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

现存的奈良时代旧钞本除了写经生钞录的的佛典外,被钞录过的汉籍(外典)旧钞本如:

圣武天皇手书《杂书要略》
光明皇后手书《杜家立成》
同上《乐毅论》
同上《王勃集》(庆云四年,以上皆藏正仓院)
《古文孝经》断简(分藏天理图书馆、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神田家)
《经典释文》卷十四(藏兴福寺)
《史记集解》卷九十六、九十七
《汉书》卷一下、三十四(以上藏石山寺)
《汉书》卷二十四
《琱玉集》卷十二、十四(以上藏宝生院)[④]
《汉书·周勃传》残卷(藏高野山大明王院)
《翰林学士诗集》



①仓石武四郎,《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发达》第二章《平安期の中国学艺の受容》,东京:汲古书院,2007,9—10页。此书承京都大学平田昌司老师惠赐,特表谢忱之意。

②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③《阿部隆一遗稿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东京:汲古书院,1982;《中田勇次郎著作集》,东京:二玄社,1984。

④参见笔者《六朝时代古类书〈琱玉集〉残卷考》,文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

《毛诗正义》零卷(以上藏天理图书馆)

上述若干种汉籍旧钞本被认为是奈良时代之遗珍。有学者考证其全部为古代日本人所钞(如阿部隆一认为上述基本皆为奈良时代日本人之手笔)[①],因此基本都已经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除却上述几种由奈良时代日本人钞录的汉籍外,尚有为数不少的唐钞本汉籍保存在日本。然而正如同奈良汉籍旧钞本一样,唐钞本也是分藏各地,实物难得一见。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大阪市立美术馆曾经举办过一次"隋唐の美术"的主题展览,集中展示了相当部分唐钞古本。现据此,将奈良时代东传至日本的唐钞本罗列如下,以便比较:

《古文尚书》残卷(分藏九条家、皇室、东洋文库、文化厅)

《毛诗》卷六

《礼记正义》卷五(以上藏东洋文库)

《毛诗正义·秦风》残卷(藏京都市,原富冈铁斋藏)

《毛诗正义·大雅》残卷

《淮南鸿烈集解》(汉高诱注)卷二十

《王勃集》卷二十八至卷三十

《碣石调幽兰》第五(以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礼记子本疏义》卷五十九(藏早稻田大学)

《春秋经传集解》卷二残卷(藏藤井齐成会)

《说文解字·木部》残卷(藏武田科学振兴财团)

《真草千字文》(藏小川家)

《王子安集》残卷

《史记集解》卷二十九零卷(以上藏神田家)

《汉书》列传第五十七(藏上野家)

《周书》卷十一残卷(分藏猪熊家、大神神社)

①说见上揭本《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三卷,45页。

《卜筮书》卷二十三残卷(藏称名寺)

《世说新语》卷六(分藏小川家、京都国立博物馆、小西家、神田家)

《五臣注文选》卷二十残卷(藏天理图书馆,原藏三条家)

《翰林学士诗集》残卷(藏宝生院)

《唐诗残篇》(酒井家)

以上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唐钞本中,也大多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与奈良时代日本钞手所录的汉籍相比,有为同一书者,如《汉书》、《毛诗正义》、《翰林学士诗集》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从书法研究史上来看,日本的写经生等钞手模仿唐人笔迹的能力极强。日本书道学专家中田勇次郎认为,唐钞本的书风主要体现是初唐的楷书[①]。这些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传来的唐钞本被当时日本推为至宝。日本的写经生刻意摹写唐钞本之笔迹,其中高手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所以今日仅仅从书风上甄别奈良唐钞本还是奈良转钞本,是颇为困难的工作。上文的划分,是综合了中日两国的文献学家和书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后初步罗列的资料。其中,富于藏书的家族如神田家,一族之内竟有汉籍旧钞本数种。后神田香岩(汉学家神田喜一郎之祖父),在1919年把自己收藏的汉籍旧钞本印成《容安轩旧书四种》行世[②],但这种情况毕竟极少。寺院和收藏家虽然为汉籍旧钞本的保存制造了良好的环境,但也在很长的时间内使这些珍品深藏不示,即使是博物馆之类的收藏机构也将其藏之秘阁,无疑给今日研究汉籍旧钞本造成了重重的阻隔,毕竟像神田喜一郎祖父那样身兼读书人与收藏家,并愿意公示家藏秘籍的日本人属于少数。

3. 平安前期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

以上乃奈良时代之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下面继续考察平安前期之状况。在经部方面,日本学界的变化没有紧随中国本土(参日本经学家内野熊

①中田勇次郎监修并解说,《唐钞本》,京都:同朋舍,1981影印,144页。

②《容安轩旧书四种》收《隶定古文尚书》、《世说新语》、《史记·河渠书》、《王子安集》四种奈良、唐钞本,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地下书库。

一郎《日本古代(上代より平安初期)经学书の研究》)[①]。比如宋代的新学以及禅宗大约从镰仓时代进入日本,到室町时代为止,存在了四百多年[②]。然而日本学界并没有因为新学进入而废旧学,反而是一种新旧并存的状态。学界中墨守六朝隋唐注疏之学风的学者不在少数。这一状况直到江户时代亦未改变[③]。这正是汉籍旧钞本中的唐以前经部文献得以保存的原因之一。在文学方面,奈良时代的文人主要学习南朝文学(如《文选》)以及继承了六朝江南遗风的初唐宫廷诗人(如许敬宗、王勃等);而平安前期的文人则除了继续学习《文选》、初唐诗文(如李峤《百廿杂咏》),主要的兴趣已经被《白氏文集》代表的唐代新兴文学所吸引。这一点,通过罗列平安前期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就可以一目了然:

嵯峨天皇手书《李峤杂咏》残卷

宇多天皇手书《周易钞》残卷

《讲周易疏论家义记》残卷(藏兴福寺)

《毛诗郑笺》卷一(藏大念仏寺)

《周礼郑注》卷十一(藏お茶の水图书馆,原藏成篑堂文库)

《仪礼疏》卷十五、十六(藏宫内厅书陵部)

《春秋经传集解》卷二十六、二十九(藏石山寺)

《春秋经传集解》卷十(藏东洋文库)

《春秋经传集解》卷十三、六、十九、十六(藏武田科学振兴财团)

《急就章》存一卷(藏荻原寺)

《史记集解》卷九至十一(分藏防府毛利报公会、东北大学、大东急纪念文库)

---

①内野熊一郎,《日本古代(上代より平安初期)经学书の研究》,文载《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Ⅱ,1955年6月刊。

②这四百年间,日本五山僧人在儒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这方面的论著可参考芳贺幸四郎《中世禅林の学问及び文学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又,久须本文雄认为五山代表性僧人如虎关师链,他虽然不反驳宋学,然而更执着于汉唐之儒学,说见其著《日本中世禅林の儒学》,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92,275—276页。

③江戸的学风可参考日野龙夫《江戸の儒学》,载其著《日野龙夫著作集》第一卷,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

《史记集解·孝景本纪》第十一(藏山岸家)

《陈书》列传第十二(藏守屋家)

《陈书》列传第十四、第三十(藏宫内厅书陵部)

《天台山记》一卷(藏国会图书馆)

《黄帝内经·太素》残二十三卷(藏仁和寺)

《翰苑》卷三十(藏太宰府天满宫)

《蒙求》(原藏酒井家,后被杨守敬购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白氏文集》卷三、四(藏神田家)

《文选·出师表》(藏宫内厅书陵部)

《文选集注》残卷(分藏称名寺、东洋文库、天理图书馆、小川家等多处)

《文选》卷八、九(日本皇室御物,原藏九条家)

《新撰类林抄》卷四(藏文化厅,原藏中村家)

《赋谱》(附:《文笔要决》)(藏五岛美术馆)

上所举的汉籍旧钞本中,除少数外,基本已经很难辨别是平安时代日本人还是唐人所钞。这其中如《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和《文选集注》两种钞本,分别是经部和集部最具代表性的汉籍旧钞本,笔者有专文以及专题讲座论之[①]。值得注意的是,平安前期略相当于盛唐、中唐时期,然而此时中土李杜之诗、韩柳之文丝毫没有影响到日本的学人。李、杜、韩、柳四人文集的盛行,至少要到室町时代。

三、暗流:日藏汉籍旧钞本的非正常获取途径

目前堪称能和敦煌钞本东西映照的日藏汉籍旧钞本,其来源极其复杂。

①参见笔者《六朝后期江南义疏体〈易〉学谫论——以日藏汉籍旧钞本〈讲周易疏论家义记〉残卷为中心》,文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二分,2010年6月刊。又,笔者于2010年1月8日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作了题为"隋唐时代'中层学问世界'的可能性研究——以京都大学影印旧钞本《文选集注》为中心"的讲座,文章即刊。

首先，从古代来看，简帛时代之后的日藏汉籍钞本，其来源又可分为三种：一、中土人士在中国写成后传入日本者；二、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钞成后带回日本者；三、日本人在日本重新钞录者[①]。正常文化交流而输入日本的汉籍旧钞本无疑数量不小。

与中国相比，日本经历的钞本时代更长。虽说宋以后中国的刊本大量流入日本，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日本知识层的全部需求。日本从南北朝时代（公元1336年至1392年，之前为镰仓时代，之后为室町时代）开始，与五山有关系的寺庙开始陆续印刷汉籍，可是为数不多。社会上依旧是室町时代的钞本汉籍广为流传。此外，日本学界对于汉唐学风秉持时间很长，即使在“宋学输入时代”到来之后[②]，整个学界也并没有像中国本土那样大范围的接受新学而抛弃汉唐旧学[③]。故而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在整个日本学术史上皆受到士人重视，其保存数量反而超过了东亚文明圈核心国之中国。

岛田翰《旧钞本考》云：“盖王朝之盛，远通使隋唐，博征遗经，广采普搜，舶载以归，守而不失。真本永传，是以夏殷三代之鼎钟，六朝隋唐之遗卷，往往而有存则。”[④]的确不假，然而仅仅从正常文化交流得来的汉籍旧钞本，并非能代表整个日藏旧钞本的性质。日本近代以来的侵略战争，其掠夺的他国文化财产中，就有大量汉籍存在。这也是不得不提的重要来源。比如，江户初期庆长时代（公元1596），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不单单对于东亚古代史有巨大冲击，也是朝鲜半岛汉籍文物的一次大劫难。相对于至今仍然树立在京都市内的“耳冢”（丰臣秀吉在朝鲜割下战俘的耳鼻带回日本所建之冢），更让朝鲜人心痛的是大量汉籍的被掠夺。林泰辅《朝鲜通史》说：“朝鲜有形之文物，悉被破坏。”[⑤]此后藤木久治又说这次掠夺的范围“从朝鲜民众的私财，到经典、佛像、金属活字等寺庙文化财”[⑥]。但是，也有的日本学者对此讳莫如深，如神

---

①上揭拙作《公元九世纪前汉籍东传丛考》。

②久保天随，《日本儒学史》第二、三篇《宋学输入时代（上、下）》，东京：博文馆，1904。

③皮锡瑞云：“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中略）乃不久而风气遂变。”说见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156页。

④岛田翰《旧钞本考》，载其著《汉籍善本考》卷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37页。

⑤林泰辅，《朝鲜通史》第九章“壬辰丁酉の乱”，冈崎：进光社，1944，357页。

⑥藤木久治，《天下统一と朝鲜侵略》，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2005，431页。

田喜一郎《艺林谈丛·东洋の古活字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国的古活字本,是从朝鲜'学'來的。"[①]有失学者公允之心。这场战争掠夺的汉籍主要是朝鲜古刊本(即朝鲜出版之汉籍),同时也给日本带去了活字印刷技术。所以从某方面来说,江户时代日本迎来了汉学的再次全盛,和侵略朝鲜必有联系吧。20世纪初以来,日本谋划吞并朝鲜,在日据朝鲜期间,朝鲜不可胜数的汉籍、古物都被日本强夺而走。这几场浩劫中,朝鲜的旧钞本被日本洗劫一空。笔者推测,这也正是目前在韩国鲜有汉籍旧钞本发现的主要原因。

至于说,日本侵华战争(包括之前甲午战争等)中掠夺我国的汉籍国宝,更不可计数。这其中大谷探险队尾随欧美列强,在中国敦煌、吐鲁番掠夺走的汉籍旧钞本中,就有不少是属于六朝隋唐时代的珍品。笔者初步统计过目前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中的从华掠夺品[②],现罗列如下:

唐钞本《论语》残卷
晋钞本《春秋左氏传》残卷
唐钞本《三国志·吴志》卷二十残卷
唐钞本《搜神记》(句道兴著)
唐钞本《南华真经》天运篇第十四、知北游篇第二十二
六朝钞本《抱朴子·内篇》残卷(以上现藏书道博物馆)
晋钞本《三国志·吴志》卷十二残卷(现分藏上野家、书道博物馆)
唐钞本《刘子》残一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唐钞无注本《文选·弁命论》一卷(现藏上野家)
唐钞本阙名注《文选》一卷(现藏细川家)

当今学者在研究日藏汉籍旧钞本时,虽然常常惊叹于这些六朝隋唐旧钞本的古泽斑斓,但更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如果像清末那样国家孱弱、政

---

①神田喜一郎,《艺林谈丛·东洋の古活字本》,载《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八卷,京都:同朋舍,1987,384页。

②主要依据为: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东京:国华社,1915;台信祐尔编著,《大谷光瑞と西域美术》,东京:至文堂,2002等。

治昏暗，即使有满屋国宝，终是他人囊中之物。

四、结　语

日本汉学界在平安后期开始，执学界牛耳者逐渐被明经博士和文章博士所垄断，这样形成了博士家族以及博士家学①。其中菅原、大江、藤原(式家·日野)、清原、中原等博士家族又垄断了学问。此外，日本的僧人对于作为外典的汉籍投入了十分的关注，将其作为培养年轻僧人的一般教养来传习。因此，汉籍的钞录者常常也是僧人，寺院则成为汉籍旧钞本的最佳保存地。从平安后期开始，日本保存汉籍旧钞本的若干特征与前期相比，都发生了变化。

据上所举，目前可知的日藏汉籍旧钞本(包括被掠夺的敦煌六朝隋唐钞本)大致有六十余种。其中奈良朝(六朝末期至初唐)汉籍旧钞本约三十余种，平安朝前期(盛唐至中唐)汉籍旧钞本约二十余种，此外还有被掠夺去的敦煌六朝隋唐钞本十余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资料仅仅是目前公布的日藏汉籍旧钞本的数量。应该尚有存在私人收藏家、寺院中未公示者。笔者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时，指导教授平田昌司先生曾经带我游览左京区一带文化保护区私宅，皆存有江户古风。平田先生当时曾谓我，这些累世居住的私宅中，说不准就藏有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不过他们皆视之为传家秘宝，绝不轻易示人。长泽规矩也《日本书志学研究史》中也曾谓古代日本人喜欢把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切割装裱，作为“古笔切”艺术品收藏②，这一习惯恐怕同旧钞本一起也保存至今。此外，也正是在笔者留学京都期间，普林斯顿大学的某位著名汉学家为调查京都延历寺所藏《论语》旧钞本而专程来日，结果被寺院僧人拒绝。可见倘若全面研究汉籍旧钞本，尚有重重难关需要面对。

在日本陆续发现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者，如《文选集注》在影印公布多年后，庆应义塾大学佐藤道生教授和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弘教授又分别购得一

①这一时期日本博士家的学风及家族状况，参上揭本《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发达》第三章《博士家の学问と训法の发达》。

②长泽规矩也著，童岭译注，《日本书志学研究史》，文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

页《文选集注》“张平子《南都赋》断简”,《六朝学术学会报》第六集著录了这两页弥足珍贵的旧钞本写真件[①]。横山弘教授新收藏断简为“扲显乐都既丽且康”句开始,至“陪京之南”句止(25.2cm×9.7cm);佐藤道生教授新收藏断简为“体爽垲以闲敞纷郁く其难详”句及此句下的李善注、文选音决、五臣注(25.2cm×9.9cm)(校释详见本文“附录二”)。如斯种种例证,均可证明目前要给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下一个确切的总数,为时尚早,持续、深入的调查工作有待中国和国际的汉学界进一步展开。

此外,饶宗颐先生曾经研究中日书道关系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一是奈良时代;一是室町时代[②]。奈良以及平安前期崇尚的是六朝隋唐之艺术,而室町时代则崇尚宋人之艺术。饶宗颐先生所谓的第一次转折正好也对应于本文所讨论的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的兴盛时代,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史与学术史的重合现象。

附录一:佚存旧钞本十种解题

1933年,商承祚编纂《殷契佚存》一书。商承祚在书前引用其师罗振玉之语:“甲骨古脆,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收集材料,则尤重于考释也。”[③]与甲骨相比,日本所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虽然谈不上“发现之日即澌灭之期”,然而深藏私宅,久不付印。对于学者来说,其与散佚何异?下面从笔者留日期间所考察之经、史、子、集的汉籍旧钞本要集中[④],选取十种左右略做钩玄提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1.《古文尚书》卷第三、五、十二,纵26.7cm,长1138.2cm(藏东洋文库)

与伏生所传的隶书《今文尚书》相对,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先秦蝌

①六朝学术学会编,《六朝学术学会报·资料介绍》第六集,2005年3月刊行。

②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42页。

③商承祚,《殷契佚存》,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933。

④以下十种,或有见于日本影印本者,如《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等。

蚪文《尚书》称为《古文尚书》。此外，河间献王所得，刘向依据中古文校之。此后，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奏上孔安国《古文尚书》，现今大抵认为这是伪书。

现东洋文库本卷存第三、第五、第十二。卷三存《禹贡第一》（首尾缺，据文意断定）。其他所存篇目为《甘誓第二》、《五子之歌第三》、《胤征第四》。此外，卷第五存《盘庚上第九》（缺首部）、《盘庚中第十》、《盘庚下第十一》、《说命上第十二》、《说命中第十三》、《说命中第十四》、《高宗肜日第十五》、《西伯戡黎第十六》、《微子第十七》（缺尾部）。卷十二存《君牙第二十七》、《冏命第二十八》、《吕刑第二十九》。内藤湖南谓："此本之为传世《尚书》最古之袠犹信。"[①]

2.《毛诗正义》

《大雅》卷第十八，纵 29.4cm，长 240.5cm（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秦风》卷第六，纵 27.5cm，长 50.4cm；纵 27.4cm，长 25.8cm；

纵 27.4cm，长 25.4cm；纵 25.5cm，长 24.5cm（藏京都市）

东京国立博物馆本《毛诗正义》存卷第十八，即《大雅·荡之什》训传第二十五，《韩奕》的末二句及《江汉》全部。考经学史上有"经注疏"合刊本要迟至南宋，此前的经学界大多使用"单疏本"。但颇为遗憾的是，作为"单疏本"的经学书籍，目前中国只存一两种，而日本则有七八种。东京国立博物馆本《毛诗正义》就是单疏本之一种也。京都市本《毛诗正义》卷六残存四纸，款制都已描述如上。《秦风·车邻》诂训传第十一；《小戎》末尾"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的疏文开始到《蒹葭》开首的疏文；"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疏文的一部分以及同诗稍后一篇疏文残片。目前中国大陆学者对于京都本《毛诗正义》有深入研究的为王晓平教授[②]。

京都本《毛诗正义》"民"字阙笔，东京国立博物馆本《毛诗正义》"民"字改"人"字。均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避讳字。东京国立博物馆本《毛诗正义》之书风大抵为楷书，因此被认为是唐代中期的钞本[③]。

①内藤湖南，《岩崎男藏古钞尚书跋》，原载《内藤湖南全集》第 14 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标点本参见印晓峰点校，《内藤湖南汉诗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1－92 页。

②王晓平，《京都市藏唐钞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文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③上揭本《唐钞本》，160 页。

3.《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卷五十九　纵 28.5cm　长 642.4cm(藏早稻田大学)

新旧两《唐书》之《新罗传》记载，唐太宗赐给新罗晋祠碑和《晋书》，此后武后在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又赐给《唐礼》一部，还曾经赐给新罗《吉凶要礼》等三礼类图书。可知《礼记》作为儒教经典之一，不仅在汉唐的中土产生了巨大之影响，同时也是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使臣希求之物。高明士提出“东亚教育圈的形成”[①]，可参看。

汉人有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单称《礼记》，多指《小戴礼记》。东汉郑玄最初有注，梁代皇侃等江南儒学者有义疏，唐孔颖达又撰有《礼记正义》。《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一书也是六朝后期之义疏体经学书，每行约有三十小字。首部数行残缺，末尾有“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十二字。末题上方捺有“内家私印”朱印，度原为光明皇后所藏。罗振玉、杨守敬皆有跋文。日本方面，服部宇之吉《佚存书目》亦有考证[②]。

4.《说文木部》纵 25.6cm　长 242.4cm(藏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

许慎《说文解字》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凡木之属皆从木。”徐复先生《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云：“木为全体象形”[③]。今日我们所使用的《说文解字》文本，为北宋初徐铉校订之“大徐本”三十卷以及其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即“小徐本”)。两种文本互有异同，此外，《一切经音义》所征引的《说文解字》也有不同于上述徐氏两种校本者。那么，许慎《说文解字》的原始形态到底是怎样？唐钞本《说文木部》为此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文本(至于说此唐钞本《说文木部》在古音学上的价值，周祖谟有专论[④])。

①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亚世界形成史的一侧面》，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5。

②服部宇之吉，《佚存书目》，1933，4 页。此外，日本学者铃木由次郎《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证》可谓研究此钞本之力作，文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16 号，1970 年 3 月刊。

③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67 页。

④周祖谟，《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文载其著《问学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723—759 页。案，略摘钞周祖谟结论如次：“唐本木部之字次固优于二徐。”“训解大胜于二徐。”“唐以前人所引说文之音分为二系：一与顾氏《玉篇》相合，一与《字林》相近。”

清儒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最先介绍了这一珍贵汉籍旧钞本[①]。此后旧钞本流入内藤湖南之手，最后辗转归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此财团每年春秋季展出一次汉籍旧钞本，学者或普通民众都可以申请观摩。这份木部残卷共六纸，九十四行，百八十八字。约占《说文解字》全文的五十分之一。纸张缝合处有“绍兴”二字小印。卷尾有唐代润州（今镇江市）著名书法家米芾之子米友仁的“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值得注意的是，此旧钞本上的反切注音——当然不会是许慎原物——确为唐以前人之手笔，日本古文字学专家白川静《说文新义》云：“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多有鱼鸟名物之音，称为‘说文字林之音’，这一附音的《说文》钞本，恐怕就是近于《字林》的音系。”[②]

除武田科学财团藏《说文木部》残卷外，唐钞本中尚有《说文口部》残卷。仓田淳之助《说文展观余录》一文有介绍[③]。

5.《史记集解》卷第二十九　纵 26.0cm　长 165.3cm（藏神田家）

这一汉籍旧钞本是南朝刘宋时代裴骃《史记集解》的卷二十九，即《河渠书》第七的相关部分。此钞本卷首阙，从“漕从山东西”的“山”字开始，至卷二十九末尾。首页第一行下半部约八字左右已经蠹蚀不可读。这一钞本的存在时间极早，至奈良、平安时代就有学者阅读。卷尾接缝处“藤”字，即是右大臣藤原忠平的文印。藤原忠平在日本平安时代昌泰、延喜年间（约相当于中土唐昭宗至后梁末帝期间）担任朝政。功业、文采皆当时日本之首选。

近代以来，收藏此卷之名家，为神田喜一郎之祖父神田香岩。故而此旧钞本卷首尚有“容安轩主”阴文印，卷尾有“香嵒秘玩”阳文压缝印（见图 1 上）。至于说卷尾另一方“须静堂”阳文印（见图 1 下），则应是神田香岩之前一位收藏家贯名海屋（1778～1863）的斋号。

杨守敬曾经把此《史记集解》残卷首尾数行收入《留真谱》。而日本学界

---

①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案，莫友芝此书虽有笺异，但并无收录原件，在笺异部分前有“仿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重钞本影印。

②白川静，《说文新义・字林と说文・唐写本说文口部断简、木部断简》，神户：白鹤美术馆，1973。后收录《白川静著作集》，东京：平凡社，2002。

③仓田淳之助，《说文展观余录》，文载《东方学报》第 10 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1939 年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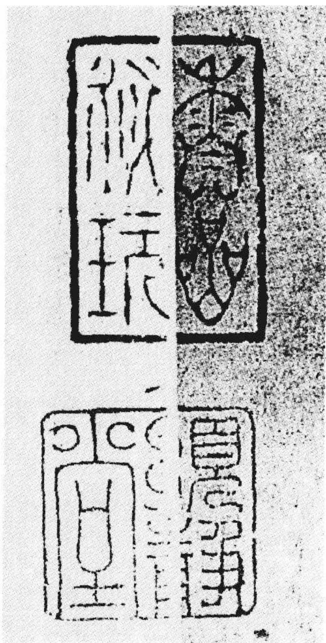


图 1 "香凿秘玩"等阳文压缝印

资料来源:《容安轩旧书四种》,京都:神田喜左卫门家印本,1919。

较为易见者则为 1919 年刊附神田喜一郎解题的《容安轩旧书四种》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就利用到了日藏的汉籍旧钞本《史记集解》,另一位《史记》研究专家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认为裴骃的《史记集解》单集解本(八十卷本)在宋代就已经很难于中国本土找到了①。

6.《周书》卷第十九

纵 26.4cm　长 84.8cm(藏猪熊家)

纵 24.3cm　长 267.3cm (藏大神神社)

《周书》撰者令狐德棻(传记见《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一百零三),宜州华原人。博涉经史,早岁知名。唐高祖时任秘书侍郎兼领国史。徐浩《廿五史论纲》云:"唐初各正史之修撰,其议自德棻发之,后专主修《周书》。"②唐贞观年间令狐德棻奉敕撰写的《周书》,又名《北周书》。此书在后代得到清儒的赞赏,赵翼《陔余丛考》云:"《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③

公元 6 世纪中叶,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篡西魏之国统,建立北周,是为北周孝闵帝。下逮北周静帝亡国,前后共二十五年。作为记载有周一代事迹的《周书》,共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缺志和表。《周书》最初的刊刻年代,大约是 11 世纪的北宋。此前以钞本形式存在的《周书》几乎全部亡佚。因此,吉川幸次郎"不无得意"地说:"南北朝史之古钞本,世间唯此与京都守屋氏所藏《陈书·沈众传》二种而已。不独为我邦所稀觏,实寰球之孤本也。"④考今日藏《周书》旧钞本为列传第十一的后半

---

①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特制本,1970,2 页。

②徐浩,《廿五史论纲》第二编"本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29 页。

③赵翼著、栾保群等校点,《陔余丛考》卷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137 页。

④吉川幸次郎,《大和大神神社に藏する周书の杨忠と王雄の传の旧钞本の考证》,文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七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

部分。案列传第十一原本为达奚武、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等六人合传，此六人皆为北周国业的奠基者宇文泰的“十二大将军”，府兵制中是仅仅次于“六柱国”的北周显贵①。目前日藏《周书》残卷存《达奚武传》至《宇文贵传》，以及《杨忠传》的后大半和《王雄传》的几乎全部。《王雄传》的末数行和“史臣赞”部分阙。此卷书风遒劲，实唐人手笔。持此以视百衲景宋本及武英殿本《周书》，自当格高一等。

7.《本草集注》一卷　纵28.0cm(藏龙谷大学图书馆)

这份汉籍旧钞本的卷末有“本草集注第一 序录　华阳陶隐居撰”十四字，因此被称为龙谷大学定为“《本草集注》残卷”之名，即《本草经集注》(正确称法当为《神农本草经集注》)之序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云“《本草集经》七卷　陶弘景撰”。案，陶弘景(456～536)，南齐末年隐居于句容(今镇江句容)，自号“华阳隐居”，是上清派道教团体确立期的著名人物②。《梁书·处士传》及《南史·隐逸传》有其生平记载。日本京都大学麦谷邦夫《陶弘景の医药学と道教》有谓：“陶弘景校订《神农本草经》、纂定《陶氏本草经》以及通过加注等一系列作业而成的《本草集注》，统一了当时混乱的本草学界，並且为此后隋唐时代本草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③

如上所云，《本草集注》成书后很快就在医学界作为标准书来使用，同时，奈良时代的日本也很快得到了这本代表着当时东亚文明圈内医学最高水平的《本草集注》。现日藏这份《本草集注》序录旧钞本从“之心故撰”开始，前缺约三十字左右。罗振玉曾经从小川琢治那里得到了此旧钞本的写真件，并将其印入《吉石盦丛书》中，后台湾编辑《罗雪堂先生全集》，亦将其收入④。可惜

---

①公元550年成立的府兵制中，其等级系谱为：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有专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目前学界的较新成果为气贺泽保规《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京都：同朋舍“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七”，1999。

②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云：“上清派是东晋中期，以杨羲、华侨这些灵媒和许谧、许翙父子间形成的新兴道流，以《上清经》为最高道典加以尊崇，是其特征，通过《上清经》的信奉者继承道流。这一派的人物，也是以吴的土著豪族出身者为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6页。

③麦谷邦夫，《陶弘景の医药学と道教》，文载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东京：春秋社，1998，313页。

④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7册，台北：大通书局，1968。

限于当时的写真技术，与原书的差别颇大。

8.《卜筮书》卷第二十三　纵 28.0cm　长 101.0cm(藏金泽文库)

日藏《卜筮书》为占卜书之残卷，撰者卷数皆不明。卷末题有云："卜筮书卷第二十三　式三"十字。现存二纸四十九行。从存"卷第二十三"推测，原书卷帙颇巨。罗振玉《唐写本卜筮书残卷跋》云："隋唐诸《志》洎宋以来官私诸家目录皆无之。此书之佚，殆已久矣。"[①]罗振玉后将此书残卷影印收录《吉石盦丛书》中，罗氏所见为"三百余行"，非今日金泽文库所藏本，罗氏本今在何处不得而知。

现日藏此旧钞本残卷尾题处有"龙"字朱文方印，原表纸右端捺有"太政官印"。此残卷纸背有元庆五年，日本比丘慧稠书写的唐荆溪湛然《授菩萨戒仪》。元庆五年即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 881 年)，故而此《卜筮书》卷东传日本，当在此前。文中别字、异体字颇与六朝碑版合。又如丙丁之"丙"作"景"乃避唐高祖祖昞讳，"白虎"作"白兽"乃避唐高祖祖虎讳。然而"隆"字不阙笔，度当为唐玄宗之前流入日本。

9.《碣石调幽兰第五》一卷　纵 27.2cm　长 426.4cm(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碣石调幽兰第五》旧钞本共十纸。标题处有"碣石调幽兰序　一名倚兰"十字，次行有云："丘公子明，会稽人也。梁末隐于九嶷山，妙绝楚调于幽兰"云云。此残卷体以"幽兰第五"，以下至卷末皆琴曲幽兰序。此中主要涉及古演奏法，为古琴学之宝笈。黎庶昌、杨守敬先将其收入于《古逸丛书》中[②]，琴学大师杨宗稷(号九嶷山人)又将其录于《琴学丛书・琴粹》中[③]，并分章为"幽兰古指法解"、"幽兰减字谱"、"幽兰双行谱"。在目录学方面，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云："原本京师某氏所藏，界长七寸八分，幅六分，每行二十一二字，书法遒劲，字字飞动，行间细楷亦绝妙，审是李唐人真迹。盖昔时乐家传藏秘卷，虽非完帙实为罕觏之书，岂可不贵重乎！"[④]可知此卷原藏京都。

案，东汉蔡邕《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诗五曲，又有十二操，其二曰"猗兰

①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366 页。

②黎庶昌辑，《古逸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③杨宗稷辑，《琴学丛书》卷三"琴粹三・幽兰卷子"，北京：中国书店，2005 年影印舞胎仙馆藏本。

④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解题丛书》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6，34 页。

操”。又称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引《藏春坞琴谱》云：“孔子益自慷慨，弦歌不衰。君子修德立道，不以穷困而改节，兰生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乃托辞于兰，因而作此曲也。”[①]六朝人鲍照曾著《幽兰五首》[②]。唐人吴竞《乐府古题要解》云“碣石”为“晋乐奏魏武帝词”[③]。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亦有琴曲“倚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一书中亦指出这一日藏钞本在琴学上之重要性[④]。

10.《赵志集》一卷　纵 27.3cm　长 212cm（藏天理图书馆）

《赵志集》为行书钞录之汉籍旧钞本。高度与长度已如上所云。每行约十七八字，共一百一十行。残卷首页书“赵志集一卷”五字，五字下有“山阶传法供　十七帐”八字与“兴福传法”四字印文，后八下字体似与前五字有异。此汉籍旧钞本内容为赵志之赠答诗。根据印记可知此卷当为奈良至平安初期的钞本。除了这一钞本外，带有“兴福传法”印记的另一著名汉籍旧钞本即为《王勃集》残卷。据内藤湖南《富冈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等文章考证[⑤]，《王勃集》为武则天时期钞本，故而此《赵志集》亦当为前后同时东传日本之物。

然而，所谓《赵志集》在隋唐诸《志》中并无著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有“赵公集 十〔卷〕”的记录[⑥]，不知此“赵公”是否为赵志。检《全唐诗》、《全唐文》中亦无“赵志”此人。此残卷中赠答诗的对象为张皓、刘长史、郑司马、裴草然、张结之、徐长史、徐司马、司户萨照等人。据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之考证[⑦]，在官职上，汉魏有“户曹掾”，主民户。东晋、南朝（宋齐梁）及

---

①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425 页。

②关于鲍照乐府与古辞之关系研究，参笔者《休鲍论初探》，文载《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99—2007）》，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1—236 页。

③吴竞，《乐府古题要解》，载《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35 页。

④R. H. van Gulik,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 Sophia University (Monumenta Nipponica monographs), 1940. 27.

⑤内藤湖南，《富冈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文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109—114 页。

⑥矢岛玄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220 页。

⑦严耕望，《中国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201—202 页。

北齐称“户曹参军”。唐制则府称“户曹参军”，州称“司户参军”[①]，县称“司户”。这里的司户萨照可能即是唐代地方上负责民户的一位低级官员。从诗体来看，此《赵志集》残卷近于初唐诗风，然而并无唐代标准近体诗之绝句或律诗。从文字上看，亦多六朝别字[②]。

附录二:新获《文选》残页校释

正文第四部分曾经提及庆应义塾大学佐藤道生教授和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弘教授购得之《文选集注》“张平子《南都赋》断简”，现附上图版，并略作校释如下(案:凡双行小注皆用“〔 〕”标出，字体不变)：

1. 横山弘教授藏本：

释文:张平子

於显乐都，既丽且康。〔李善曰，毛苌《诗传》曰，於，叹辞。《毛诗》曰，适彼乐园。《尒雅》曰，康，安也。《钞》曰，显赫，光明也。都者，人众所聚，故曰都。言，叹此南阳是显赫光明，欢乐都聚之处也。既丽且康者，言此南都既是丽美之所，复为安宁之地也。《音决》於音乌；乐音洛。吕向曰，於，叹美之辞，丽，美也。〕陪京之南。

岭案:通行本李善注，“《毛诗》曰”作“《诗》曰”，且无“《尔雅》曰，康，安也”六字。此旧钞本《文选》之《尔雅》作《尒雅》。《说文解字》云:“尒，词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段玉裁注云:“尒之言如此也。后世多以尔字为之。凡曰果尔、不尔、云尔、莞尔、铿尔、卓尔、鼎鼎尔、犹犹尔、聊复尔耳[③]，故人心尚尔皆训如此(中略)唐石经讹为焉耳。”关于“尒”等字之考订，参



①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即为蜀州的司户官，小尾郊一博士考证其家族从杨贵妃祖父一辈即开始衰落，其父亲只能勉强维持门第。说见小尾郊一著、刘建英译，《杨贵妃》第一章，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2—3页。

②中田勇次郎，《赵志集について》，文载《中國学報》第3号，大谷大学中国学研究室，1965年刊行。

③这里段玉裁举出的“果尔、不尔”等例子，后冯桂芬为之在典籍中一一寻源，参见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卷二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十六年稿本。

拙作《旧钞本〈文选集注〉诸注考》[1]。



图 2　张平子《南都赋》断简

资料来源:《六朝学术学会报》第六集,2005 年 3 月。

2. 佐藤道生教授藏本:

释文: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李善曰,《左氏传》叁,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请更请爽垲。杜预曰,垲,燥也。《洞箫赋》曰,又足乐乎其敞,高土可远望也。《说文》曰,敞,高土可远圣也。《楚辞》曰,纷郁郁其远蒸。扬雄《预州箴》曰,郁郁荆河,伊洛是经。《钞》曰,体谓土地形体宽闲,博敞广宽之貌。纷,盛也。已下九句言南都,土地宽闲,美盛最善也。《音决》垲,口改反。敞,昌养反。郁,於六反。张铣曰,爽,明;垲,高也。闲敞,清闲宽敞也。郁郁,众美貌。难详,难(下缺)。〕

岭案:通行本李善注云:"爽垲,已见《西京赋》。杨雄《豫州箴》曰,郁郁京(胡克家云:'袁本、茶陵本"京"作"荆",是也。')河,伊洛是经也。"与此旧钞本《文选》相比,出入颇大。又,今本《说文解字》云:"敞,平治高土,可以远望也。从攴尚声。"疑此旧钞本《文选》所引《说文解字》之"远圣"为"远望"之误写。

①《旧钞本〈文选集注〉诸注考》,文载《中国诗学》第十四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今本《九章》“纷郁郁其远蒸兮”之“兮”字，旧钞本略。

后记：

拙文的调查工作开始于2007年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期间，得到了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的指导；伦敦大学博士生陈汉文协助处理过相关英文文献；业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教授对于初稿多所诲正。谨此致谢！惟文成于仓促，涉猎未周，疏漏在所难免，一切错误均当由笔者负责也。

关于题名取为“留珎”，原委有二：一则因为日本在飞鸟时代末模仿唐“开元通宝”制作了“和同开珎”的货币；二则清乾隆帝有《金薤留珎》一书，多藏古来汉族与东北亚他族之关系印章。今取“留珎”二字，亦有四海碧波，永无兵戈之愿。

2010年夏，修订于南京河西寓所



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

陈　翀

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集注文选》残卷，现在学界一般通称其为《文选集注》（以下称之为"集注本"）。这部书虽然卷帙不全，但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唐代旧注，可以说是《文选》研究最重要的底本之一。然而，此书虽然被中日学界瞩目将近百年，但有关其成书时间以及编撰者却一直没有定论。

最近，笔者在一系列论文中通过对日本平安史料的钩沉，指出此书乃平安中期、也就是11世纪初期主掌大学寮的大学头大江匡衡（953—1012）受一条天皇之敕命，以之前大学寮所用菅家李善注六十卷《文选》证本为底本，汇合《文选钞》、《音决》（集注本所引《音决》还包括了部分大江匡衡所加按语）、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加上大江匡衡本人所校诸本文字异同之案语编撰而成的大学寮所用《文选》教科书[①]。而且还从历任冷泉天皇朝之式部少辅、文章博士、东宫学士、大学头的藤原明衡（989—1066）编纂的书信范文集《云州往来》中发现了如下之史料，进一步澄清了其卷次以及编成的问题：

作者单位：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院

本文为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补助金《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白居易受容の諸相及び日中独自文化の形成に関する研究》课题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中国文学论集》第38号，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2009，49—61页。

陵顿首二卷　长杨赋　同五卷　古诗十九首　同十卷　思玄赋　同十二卷　以上文选也　集注百二十二卷　梁昭明太子撰

右江家之说，证本得之。仍为见合菅家之说，先日所借申也[1]。

此乃还书时所添附信件中的一段文字，因此断无作假之嫌疑。文中称“集注百二十二卷”，又称其为“右江家之说，证本得之”，则完全可以证明《集注文选》为大江家所编，其全部卷轴为一百二十二卷。

另外，拙稿还提到大江编撰的《集注文选》虽然现在散佚繁多，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部分复原的可能性。如根据日藏旧钞本《文选钞》(九条家旧藏，现藏于东山御文库，下文按学界之惯例称之为“九条本”)卷一的行间、栏外、纸背所写入的音义、校注、转抄注语，至少可以将现在被认为已经散佚了的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予以大致复原。因此，本文以三十卷系统本之九条本为底本，先对集注本卷头所收李善《上文选注表》予以复原，同时也对为何现存日藏旧钞各系统本均将此《上文选注表》附于卷头这一长久未得以解决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拙见，以求海内外学者指正。

一、九条本所见集注本卷头之原貌

现存九条本卷一，依次抄录了李善《上文选注表》、萧统《文选序》、班孟坚《两都赋序》《西都赋》《东都赋》(按:《白稚诗》只存诗题)、张平子《西京赋》。其卷末还记有此卷历代转抄始末之大段识语，第一条云:“本云:弘安八年六月廿五日，以菅江两家证本校合书写了。散位藤原相房。”由此可知，这一卷的祖本乃是一位名叫藤原相房的文人于弘安八年(1258)以平安时期大学寮之菅原、大江两家的《文选》证本为底本合抄而成[2]。也就是说，其卷中行间、栏

---

①《云州往来二种》所收宽永十九年版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藏本影印本，东京:勉诚社，1981。

②有关九条本卷末识语的相关研究可参考以下专著或论文:ⅰ斯波六郎《九条本文选解说》,《文选索引附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ⅱ小林芳规《平安鎌仓时代に於ける汉籍训読の国语史的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ⅲ中村宗彦《九条本文选古训集》,东京:风间书房,1983。ⅳ山崎诚《式家文选学一斑——文选集注の利用》,《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纪要》第15号。ⅴ阿部隆一《东山御文库藏(九条家旧藏)旧钞本文选について》,《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东京:汲古书院,1993。

外以及纸背所写入的墨笔音义、校合注均源自菅江两博士家《文选》证本。由于现存中国诸系统《文选》之李善《上文选注表》均未有过唐人注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知，这些夹载在九条本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行间纸背注均是日本博士家菅江两博士家所作注释[①]。

据上文考证，笔者在复原集注原貌首先确定了如下三大方针：(1)集注本所收李善《上文选注表》，本是与昭明太子《文选序》合作一卷单行于本文之外。参照现存集注诸残卷以及九条本之体例，可推知原卷应为一纸有界十八行、乌丝栏、一行十三至十五字、双行小字注。因此，复原稿以 a 图与 b 图并为原本一纸。(2)纸背所记均为"集注"(大江家证本)。由此反推可知本文行间栏外所录注释均属菅原旧注。因此，复原稿将其全部并入"菅注"(菅原家证本)。(3)考虑到集注本是以菅原家本为底本这一事实，复原稿用先录本文，再在文下依次记入双行小注之"菅注"和"集注"[②]。

以下为笔者复原集注本《上文选注表》的凡例，图版为试稿。

凡例

(1) 本复原稿以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所藏《九条本文选钞》(八册照片本)为底本，同时还参考了池渊质实根据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所藏本的部分翻字。

(2) 在对注文复原之时，为了方便阅读，在注中加入其所注释的本文文字以及文章之原文。另外，复原稿中的标点亦为笔者所加。

ⅵ佐竹保子《九条本〈文选〉の误语の检讨》，《东北大学中国语文学论集》第 4 号。ⅶ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ⅷ池渊质实《九条本〈文选〉研究序说》，《中国学研究论集》第 6 号。

①有关九条本之行间、栏外、纸背所写入的注文，阿部隆一《东山御文库藏(九条家旧藏)旧钞本文选について》指出："栏外及で纸背长文所记书入注语，多转抄自李善、五臣注，此外，如钞、集注、陆、决云等所记，均引自集注或集注所载文选钞、文选音决、陆善经注、集注今案，其中还间抄有博士家独自所注的师说。也就是说，博士家在讲说《文选》之际，参考了李善、五臣注、文选集注来进行训読校合解义。李善注、五臣注应引自单行本，集注所载诸注是引自单行本，还是引自集注不详，但引自集注之可能性非常大。另外，卷眉之眉上还有标明李善本儿、五家注儿、集注儿等之注记。"

②九条本卷一所收李善《上文选注表》之栏外、行间小注均与菅原和长(一名东坊城和长)之《御注文选表解》(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本)所收注语一致，由此可确证这些注语为菅家所撰。详考可参照山崎诚《式家文选学一斑——文选集注の利用》一文。另外，菅原和长之所以尊称这些注文为"御注"，极有可能是因为与后来的《集注文选》一样，这些注本都是以天皇名义编撰而成的。

(3) 俗字略字均从九条本。无法解读文字用□表示。对于九条本所用书写略字符号作了以下之处理:“ィ”为异本之意,翻字为“一作”;“ナ”为日语“アリ”之略写,翻字为“有”;“斥”为日语“指すところ”之略写,翻字作“所指”。

上文選註表（菅注）上、猶登也。言於天子之書也、表也。

臣善言（菅注）善、李善。竊以道光九野、縟

景緯以照臨（菅注）道、天文之道也。九、天也。景、日月也。緯、星辰也。

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菅注）德、地理之德也。

八、八方、四方羅。埏、際也。錯、雜也。峙、立也。垂象之文斯著、

含章之義聿宣（菅注）象、形也。文、天文、日月星辰也。著、丁慮反、明

也。聿、則也。宣、舒也。叶人靈以取則、基化成

而自遠（菅注）叶、合也。人靈、猶人也。則、法也。基、本也。自、從也。故羲

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菅注）羲、伏羲氏、三皇號

也。葛天、葛天氏、伏羲之以前王者之號也。浩、大也。唱、歌也。（集注）上古之時、無是文字、唯結繩以爲事。事

大以大繩、事小以小繩。至於伏羲之時、始畫八卦以代結繩之政、然義彌者。結繩之政及伏羲之時、故云義繩也。葛天

之浩唱者、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媧簧之後、掞叢雲之

奧詞（菅注）媧、女媧、伏羲之後王者號也。簧、笙也、女媧之所作也。掞、布也、暢也。叢雲、舜樂

名。奧、深也。詞、歌辞也。步驟分途、星躔殊建

（菅注）途、道也。星、星辰也。躔、日月之行道也。（集注）步者、三皇之時也。言三皇之時、无□□事、故云步々

徐行也。驟者、五帝之時也。言五帝之時、稍急繁事、故爲驟。驟、疾於步也。言三皇五帝、各異時代、故云分途也。

正月建寅、二月建卯者、北斗所建也。球鍾愈暢、舞詠方滋

（菅注）球、磬也。愈、彌也。暢、敍也。方、今之方也。滋、繁也。楚國詞人、

御蘭芬於絶代（菅注）楚國詞人、屈原宋玉之徒也。御、治也。蘭芬、香草、比君子文章也。絶、絶遠之絶。代、世也。漢朝才子、綜鞶帨于遥年（菅注）漢朝才子、司馬相如・揚雄之徒也。綜、治也。鞶、帯端也、巾也、以比文章也。遥年、遥遠之年也。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菅注）玄流、老荘之法也。正始、魏康帝之年號也。其時好老荘之法以作文章也。氣、意也。質、略也。建安、漢獻帝之年號也、其時好意氣質略、以作文章也。長離北上、騰雅詠於圭陰（菅注）長離、魏文帝始爲太子時之名也。北上、詩名也。騰、一作登也。雅詠、所指北上詩也。（集注）魏文帝作北上詩也。圭陰者、言圭以木作長八尺、樹於地以量日影也。化龍東騖、煽風流於江左

（菅注）化龍、所指於晉元帝也。煽、盈也。風流、文章之風流也。江左、所指東晉也。（集注）西晉之末、童謡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也。以後、西晉既亂、於是瑯琊王・西陽王・汝南王・南頓王・彭城王倶行江南、瑯琊王自立爲元帝、東晉元帝是也。言依石勒之亂、天下文章泯亡、元帝自立、盛其文章也。爰逮有梁、宏材彌劭（菅注）爰、於是也。逮、及也。宏、大也。彌、益也。劭、明也。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菅注）昭明太子、梁武帝之子、撰文選之人也。業、太子之業也。膺、應也。守器者、天子巡狩之時者。太子必留以守天子之宮、故云守器也。貞、正也。（集注）太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々人曰撫軍、守曰監國。譽貞問寢、言周文王仕其父、一夜三起、以問其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菅注）居、坐也。肅成、門也。講、考也。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博望、苑

名。賢、賢者也。（集注）肅成者、魏文帝初爲太子之時、
集賢士之門也。博望者、漢武帝爲廢太子開博望苑、以招
集才子也。搴中葉之詞林、酌前脩之筆
海（菅注）搴、取也。葉、世也。中葉、所指於周以來也。脩、治也。前脩、先代才士之前治者也。筆海、言
劉向之子。劉子駿、其才不可盡、故時人號曰筆海也。周巡緜嶠、品盈
尺之珍（菅注）周巡、旋廻也。緜嶠、山名。（集注）周廻、旋廻也。亦云周國之名也。緜嶠、採
玉之山也。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菅注）楚、高
也。（集注）楚、高也、亦云楚國名也。長瀾、所指漢水也。漢水者、採珠之地也。故撰斯一
集、名曰文選（菅注）撰、撰其英也。後進英髦、
咸資準的（菅注）後、後代之後人也。英、俊也。髦、高也。咸、皆也。資、取也。準、量

也。準的、射之稱也。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
思垂風（菅注）惟、思也。陛下、當時之君也、不敢所指尊者、故云陛下也。經緯、天地謂之文
也。堯之四德、聰明文思是也。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
璧（菅注）大、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々乎、唯天爲、唯堯之則也。耀、照也。三辰、日月星也。
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菅注）希聲、聽之不聽
曰希聲。雲、雲門、黄帝之樂也。英、六英、帝告之樂也。孰可撮壤崇
山、導涓宗海（菅注）撮、取也。壤、地也。崇、高也。導、引導也。涓、小水
也。宗、大也。臣蓬衡蕞品、樗散陋姿
（菅注）臣、善自謂也。蓬、蒿屬也。衡、門衡也。品、等也。樗、似漆而惡木也。散、散木也。凡不當用之木通曰散

木。陋、賤也。姿、皃也。**汾河委函、夙非成誦**（晉注）汾河、水名。委、棄也。函、盛書之器、筥屬也。夙、早也。（集注）言漢武帝行於河東之時、失三篋之書。於是張安世皆誦之也、然則汾河者、河東是也。**嵩山墜簡、末議澄心**（晉注）嵩山、山名。墜、落也。簡、書札也。貫者曰策、不貫曰簡。（集注）言晉元年之時、有一人得經籍於嵩山之下、皆古文科斗也。時人無於是、東晳唯獨知之、曰、是者、漢明帝陵中之書也。**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晉注）握、取也。玩、弄也。斯文、文選也。載、則也。移、遷也。涼、寒也。燠、熱也。**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晉注）欣、喜也。永、長也。實、誠也。昧、暗也。通津、通智津也。**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晉注）勉、努也。寄、依也。三餘者、言年餘爲冬、日餘爲夜、月餘爲雨日也。（集注）十舍者、言以圭而量日影也。去地一寸者、去天十舍。卅里爲一舍、然則十舍者三百里也。**弋釣書部、顧言註緝、合成六十卷**（晉注）弋釣、尋思也。書部、百氏之書也。顧言、思也。註、釋前言也。緝、集也。卷、屈也、取也。六十卷、文選者卅卷也、然合注以爲六十卷也。**殺青甫就、輕用上聞**（晉注）青、青竹也。甫、則也。就、成也。用、以也。上聞、謂白也。（集注）殺青、上古之時無紙、唯以竹書之。生竹色不得書之、唯熱火令黃、則得書之、故曰殺青。**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晉注）享、留也。帚、治庭之器也。珍、宝也。緘、囊也。石、鸞石也。謬、過也。（集注）享帚自珍、魏文帝曰、夫家藏貴帚、而自以爲當千金。緘石知謬、是自見之患也。石狀似鸞、若欲雨雪之時、先飛行之也。言采有愚人、當得鸞石、於是不知鸞石、自爲以異、以藏於櫝中。時有一人教愚人

曰、是者鷰石、天欲雨雪、必先飛之。愚人益以爲貴、亦緘以牛皮五重藏之也。敢有塵於

廣内、庶無遺於小説（菅注）塵、不潔之名也。廣內、所指於宮中也。庶、庶幾也。里中有小説之書、千二百卷也。謹詣闕奉進（菅注）詣、往也。闕、天子之門、魏闕是也。奉進、謂獻也。伏願鴻慈、曲垂照

覽（菅注）曲、細因之籍也。謹言

顯慶三年九月十七日文林郎守

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

直學士臣李善上表（菅注）顯慶、當時年號也。

二、日藏旧抄本文选卷头均附李善表之缘由考

或许有学者要问，为何大江匡衡在编撰《集注文选》之际，不是将昭明太子《上文选表》，反而将李善《上文选注表》配于卷头呢？其实，斯波六郎先生在《九条本文选解说》一文中也曾提出过相似的疑问，并对此做过一些推测，兹将相关论述翻译于下：

如前所述，九条本先载李善《上文选注表》，次载昭明太子《文选序》，要知九条本乃无注三十卷本，本单载昭明《文选序》即可。为何还要故意将李善《上文选注表》冠于卷头，令人殊难理解。由此体例引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九条本之本文是否是从李善注本抄出的争论。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卷第六举与九条本一样前冠李善《上文选注表》旧钞卷子本无注文选卷第一（现上野氏所藏本）为例，认为上野本"盖即就李本单录出本文者"。然而，如果对上野本作一个精查的话，如后文还要谈到的一样，其文与李善本不一致的地方甚多，而在保存旧貌这一方面

显然更胜九条本一筹。然而，其也将李善《上文选注表》冠于卷头。由此考之，或许是我国的某个时期，在旧传的《文选》钞本上附加上了李善表，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传统，为后人所因袭。或许这就是现在的上野本以及九条本之祖本[①]。

斯波先生根据日本现存旧钞本之体例，推测日本在某一时期曾出现过将李善表附加于各个系统的《文选》卷头的现象，此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日本独有的传统。但是，至于此一现象出现在何时何地，又为何人所为，且为何能形成为一个传统等问题，斯波考证之中均没有予以言及。

其实，解决这一长年未解之难题的钥匙就隐藏在本文所复原的集注本李善表之中。要之，之所以会形成这一传统，乃是与平安大学寮之独特的《文选》学习方式分不开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平安大学寮的贵族文人们学习《文选》的方式。以下数条为规定平安大学寮之学制的法律条文。《令义解》卷三云："其音博士，无生者。学令云：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讲义。"[②]今依此文，"明经生必先就音博士读五经音，然后讲义，故别不置生"。这条律文乃是对"明经科"的学生所作的规定。其实，对于"进士科"的学生，同样有要求诵读汉音的规定，《令集解》卷二十二附有如下之释文："穴云：帖，隐三字令读过，谓之帖也。或云：帖所读者，读音耳。在穴记。朱云：《文选》并《尔雅》，音读耳。"[③]所谓"帖"，就是指"帖试"。据此条律文可知，大学寮"进士科"的考试并非笔试，而是口试。学生需要将遮住的文字正确地读出来。

其次，据冈田慎吾云其所见到的《令集解》还附有如下之释云：读文谓白读，与唐令之读文有异，唐令无音博士。古记云：学生先读经文，谓读经之音

---

①斯波六郎，《九条本文选解说》，《文选索引 附录》，5－6页。

②参照《令义解》卷一《职员令·大学寮》，《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二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38－39页。

③参照《令集解》卷二十二《考课令》"凡进士"之"二条，帖所読，《文选》上帙七帖"语释文，《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四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646－647页。

也；次读《文选》《尔雅》音，然后讲义其文也。”[1]由知平安中后期，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平安大学寮学生在进入大学寮时，都必须先跟随音博士谙熟五经以及《文选》、《尔雅》的汉语读音，合格之后才能跟随别的博士家研读本文。考平安大学寮开始设置教授《文选》、《尔雅》音的音博士为天平七年(735)。《续日本纪》卷三十五“宝龟九年十二月庚寅”条中有如下之记载：“(袁)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2]儒家经典之五经本文的汉语发音必须谙熟还可以理解，然而，要掌握背诵录有长篇难读的大赋以及各种拗口的碑志铭文奏状的《文选》对于外国人来说显然并非易事。从现存文献来看，当时平安的大学寮只需诵读《文选》之上帙(三十卷本之前十卷)，这是由《令集解・考课令》所规定的进士考试出题范围之“《文选》上帙”“七帖”所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学寮的学生学习《文选》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握其所收的赋篇的音读与解释。

再次，根据现存《正仓院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书》所收)中所保存的《文选》抄写记录来看，当时的大学寮还极有可能存在着跳过第一卷所录班孟坚《两都赋》以及张平子《西京赋》的习惯。这可以从以下所录的当时写经处所抄写《文选》记录中看出一些端倪。如其《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皇后宫职移・图书寮(天平三年〔731〕八月十日)》云：“写纸三百九十二(中略)《文选》上帙九卷・纸□□。”卷九《经师充本注文正仓院文书(天平十八年〔746〕五月)》云：“《文选》上帙　第二卷　第三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同卷《写经疏充用注文正仓院文书(天平十八年七月)》云：“《文选》上帙九卷　欠第一。”前一份文书指出《文选》只抄录上帙十卷中的九卷，后两份文书则明确指出不抄的是第一卷。为何均不读《文选》第一卷，现在还没能找到相关史料可对其予以详考。但是从别的史料可知，如能谙熟三十卷本《文选》前十卷之全部语音的话，至少在当时被认为是不世出之杰才。如《文德实录》卷八齐衡三年(856)四月条就有如此之

---

①冈田慎吾，《日本汉字学史》第一篇《八・音博士》，东京：明治书院，1939，46页。原文为：“釈に云ふ、読文は白読を謂ふなり，唐令の読文は此と異なり、唐令には音博士なし。古記に云ふ，学生まず経文を読むとは、読経の音を謂ふな存り、次に文選爾雅の音を読み、然る後に其の文を講義す”。

②参照《续日本记》卷三十五，《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445—446页。

记载："（藤原诸成）弘仁年中为文章生，聪悟超伦，暗诵《文选》上帙，学中号为三杰。"[①]由此可推知卷一所录两篇大赋之难解的程度。

综上所述，可知平安时期大学寮的《文选》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在音博士（主要由不太懂日语的归化唐人所担任）的指导之下谙熟《文选》上帙赋篇之汉语音（大多数学生跳过第一卷）。在通过了第一阶段的音读学习之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在其他日本本土博士门下开始听讲学习《文选》之本文以及相关注释。另外，在下文还要谈到，由于音博士只需传授汉语发音，其本文之语义句义以及相关出典均不需要其解释（如果考虑到大学寮中菅家以及江家的权威，或可将此现象理解为本土博士们不愿意将本文解释权交给归化人），因此其第一阶段的学习主要还是使用旧钞昭明太子三十卷系统本。这种独特的学习方式，或许就是唯独日本才保持传抄三十卷系统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日本各系统《文选》注本均统一将李善《上文选注表》冠于卷头的最根本的原因。

此外，在上文也谈到过，由于在唐代无为李善表作过注释的《文选》底本，因此九条本所抄录的旧注均可视为平安大学寮博士们所撰写之物。从上文所附复原的集注本李善表可以看出，博士们对于这篇李善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释字阐意。此处尚有一个疑问，就是结合平安的学令可知，李善表其实并不属于进士考试的出题范围，博士们为何要作如此麻烦之举呢？笔者认为，对于平安大学寮的博士和学生来说，李善的这篇表还不仅仅只是一篇序言，而是从第一阶段《文选》音读到第二阶段学习《文选》本文及注释的一篇重要的过渡教材。要之，平安的博士们正是通过对这篇表的注释讲解，为学生们解释今后究读《文选》本文及诸注的方法。再换句话说，这篇注有博士家之注语的表，就是平安大学寮之学生最初理解《文选》的一篇不可缺少的入门之文。而且考虑到一般学生不用学习第一卷，所以用六十卷李善注本为教材的菅原家，还特意把李善表以及此后的昭明太子《文选序》从原卷第一卷分离出来，再加上自己的注释将其独立为一个卷轴。从九条本卷一来看，此后大江家在编撰一百二十二卷本《集注文选》时也沿袭了这种体例，对于没有唐人注

①参照《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卷八，《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三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81 页。

释的李善表加以进一步的补注，对已有五臣注的昭明太子《文选序》则在保留菅家注的基础上加补了五臣注语。

然而，是否菅原家注就如笔者所分析的一样，是一份为完成了汉语读音学习的学生们所准备的究读《文选》本文以及李善注的一份入门教材呢？让我们来对本文所复原的菅家注之义例作一个简单的考证(引文均从原文)：

【证例 1】对《文选》及昭明太子、六十卷注本及李善等基础知识的解说。如：

*“臣善言”→“善、李善”

*“昭明太子”→“昭明太子、梁武帝之子、撰文选之人也”

*“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撰、撰其英也”

*“合成六十卷”→“六十卷、文选者卅卷也、然合注以为六十卷也”

【证例 2】菅家注基本上均属于对字义之简单的说明。如：

*“窃以道光九野、缛景纬以照临”→“道、天文之道也。九、天也。景、日月也。纬、星辰也”

【证例 3】对人名、地名、固有名词、年号的简要说明。如：

*“羲绳之前、飞葛天之浩唱”→“羲、伏羲氏、三皇号也。葛天、葛天氏、伏羲之以前王者之号也”

*“汾河委函”→“汾河、水名”

*“楚国词人”→“屈原宋玉之徒也”

*“显庆三年”→“显庆、当时年号也”

【证例 4】有关出典反切异同的注文，如下所示，均只用一例。如：

*“则大居尊”→“大、论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也”

*“垂象之文斯著”→“著、丁虑反”

*“腾雅咏于圭阴”→“腾、一作登也”

首先，从【证例 1】可以看出，这些讲义都是一些《文选》之最基本的书志常识，菅家博士将其撰入注语中予以讲解，正是因为大学寮的学生在第一阶段只是学习读音，对《文选》成书之经纬背景没有得到过任何说明。其次，诸如【证例 2】之对每个字义、语义作逐一说明的注语的大量存在，也同样显示了这

些学生还没有接触到过具体的汉文文章，需要老师对每个字义进行简单的说明。这种倾向也同样被反映在了【证例 3】中对人名、地名、固有名词、年号的说明。

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博士家注语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无论是菅家注还是大江家的集注，在解释语词之时并没有引经据典。即使是引用典故，也只是将注文限制在最简单的程度。这并非源于菅原家学问有限，而是其考虑到一开始就大量的引经据典会造成初学者之不必要的混乱，采用了一种避繁就简的教学方法，只释义，而不谈出处。此后的江家注也同样沿袭了这种注释法，只说明典故内容，而不出示原典根据。另外，笔者还认为【证例 4】特别具有代表意义，如证例中所举，在被复原的菅家注语之中有关反切出典文字异同的注释均只有一例，而且唯一标明的书名还是人皆所知的《论语》。或可将此理解为是菅家想利用这三条注例，为今后所要学习的李善注作一个初步的体例示范。

考证至此，我们可知菅原注确实具有为《文选》本文初读者而作之特征。再换句话说，这篇注有菅江两博士家注的李善《上文选注表》，正是平安大学寮的学生从第一阶段之音读过渡到第二阶段之本文阅读的重要教材。正因如此，博士们才需要将此李善表冠于卷头。这应该就是日藏各系统旧钞《文选》(三十卷萧统原编系统本、李善注六十卷系统本、大江匡衡编一百二十二卷集注系统本)均将李善之表附于卷头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过去斯波六郎所未指明的日本古代文人学习《文选》之“传统”。

要之，也只有执掌平安大学寮牛耳之菅家与江家，才有开启传统与风气的权威与资格。从九条本以及上野本可知，一直到镰仓室町时代，日本的文人们还是保持了从李善《上文选注表》之注释开始他们学习《文选》的传统。这种格式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古代日本文人的一个经典文本。

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

高田时雄

一、神田喜一郎的柏林访书

1936年的夏天，留在巴黎的神田喜一郎(1897－1984)①，访问了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Preuβische Staatsbibliothek)，并进行汉籍的调查。神田在祖父神田香岩的强烈影响下，从年少开始，便对汉籍的版本相当精通。在此约十年以前，宫内省图书寮委托他从事汉籍目录及其解题的工作②。而神田在柏林所藏的汉籍之中，所选取的第一个就是宋刊本《周易集解》十卷，共有六册。神田很快在《书志学》杂志发表了"宋槧の周易集解"一文③。当时和神田一起在巴黎居住的王重民(1903－1975)④，比神田要早一年，即利用1935

作者单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①当时担任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东洋文学讲座教授的神田，在1934年12月到1936年11月的两年之间，以在外研究员的身份由台湾总督府派遣到英法两国去进行研究。

②《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四卷附录一卷，1930；《图书寮典籍解题・汉籍篇》，东京：大藏省印刷局，1960。

③《书志学》第8卷第2号(1937年2月)《欧洲访书记の中から——宋槧の周易集解》。又《典籍剳记》(京都：高桐书院，1947)、《东洋学文献丛说》(东京：二玄社，1969)、《神田喜一郎全集》第3卷(京都：同朋舍，1984)皆有收录。

④身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的王重民，在与法国国家图书馆间有馆员交换的契约之下，于1934年到达巴黎，为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的敦煌遗书，从事编目等相关的工作，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离开了法国而转往美国。请参照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王重民《冷庐文薮》附录)。

年夏季休假间也前往柏林，曾对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图书进行调查，在其“柏林访书记”中提到[1]，在该图书馆可见到有太平天国文献、明钞本《华夷译语》及《正统道藏》，除了这些书籍之外，却从未接触到《周易本义》，对此深感些许的不可思议。因为从神田的报告中可以明白，在数年前《周易本义》已归该图书馆收藏。但王重民并未见到该书，到底是因为何种理由，至今仍无法了解。王重民从柏林回到巴黎时，便去向转往别处而稍晚回到巴黎的神田处，询问了内藤湖南旧藏《华夷译语》[2]，想必早前即有经常往来。此时，神田一定会向王重民询问在柏林访书的成果，神田从王重民那里听到该图书馆的汉籍所藏状况后，不难想象到也成为翌年到柏林访书的机缘[3]。

二、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的汉籍收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书籍疏散行动

神田喜一郎在柏林见到宋刊本《周易集解》以来，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该书并未回到柏林。这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预料首都柏林即将处在战火之中，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便进行了该馆藏书大规模的疏散行动。

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在中世纪以来，收藏着该国的重要写本、摇篮本及古地图，还有历代学者及作家的手稿等，以丰富的馆藏自夸，但据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藏书，约为七十万册在大战中损毁。毫无异议，关于汉籍的收藏，也堪称比肩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两大图书馆。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68－1740)成为勃兰登堡选侯以来，便断断续续地收集汉籍，被通称为 Libri Sinici，并且用旧搜集(Alte Sammlung)与 1913 年以

---

①《国闻周报》12 卷 42 期(1936 年 3 月)，后收录于《冷庐文薮》781－798 页，中华书局，1992。

②见于《冷庐文薮》，794 页。

③在神田之后，向达(1900－1966)也有可能在柏林见过《周易集解》。向达是和王重民一样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从 1935 年秋天到 1938 年秋天，都居留在欧洲。向达在大战结束后，发表了“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知识与生活》1947 年第 3 期(未见)。赔偿问题的牵连，还谈及从中国流出各国的文物之中，主张柏林的国立图书馆从清朝宫廷掠夺来的，号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的宋版《周易集解》，应该要归还给中国。见于散木《向达先生四十年祭》，《书屋》2005 年第 9 期，29 页。

后的新搜集(Neue Sammlung)来区分。后来,还收购著名汉学家弗里德里希·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的旧藏汉籍,和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旧藏的汉籍和满文书,此外,藏、汉大藏经及道藏也都非常齐全,形成了相当具有特色的一系列收藏。

1941 年 4 月 10 日晚上,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的建筑物由于开始遭受到盟军的轰炸,便开始认真地讨论书籍的疏散问题,并选定了疏散地点[①]。同年的 8 月,进行第一次疏散至仓库指定地点的实地调查,从 9 月到 10 月间进行了特藏部(Sonderabteilungen)藏书疏散到外地的工作。所谓的特藏部,并非是指善本的意思,而是指像乐谱等与音乐相关的书和地图之类,而设有独立目录的数据,中东(Orient)、远东(Ostasien)的图书也包括在内。1942 年 9 月到 12 月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书籍疏散的工作,以贵重书籍及少许古老的文献为主,将它们移送到黑森(Hessen)、萨克森(Sachsen)、西里西亚(Schlesien)等地去。接下来,1943 年夏天到秋天是第三次大规模的书籍疏散行动,这个行动到大战结束前仍在持续进行。由于汉籍是属于特藏部的缘故,在 1941 年时,应该大部分都已经从柏林移送到各疏散地去了。实际上具体被移送的顺序并不清楚,如果根据沃纳·硕候(Werner Schochow)的说法,大致上是往 Banz、Beuron、Fürstenstein 等地分散移送。战后,这些汉籍则在各地辗转流传之后,最终回到柏林,但疏散到 Fürstenstein 的书籍,在 1944 年到 1946 年,被移送到了西里西亚的格律骚(Grüssau)修道院的临时仓库,之后又被送到了克拉科夫(Kraków)[②]。《周易集解》则走后一路线,现今藏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雅盖隆图书馆(Biblioteca Jagiellońska)中。在 1944—1945 年之间,根据统计,中东及远东的图书共有 85,000 册,归还给柏林的则只有 50,000 册,遗失的有 35,000 册之多[③]。



①以下,关于疏散的记述,是根据沃纳·硕候(Werner Schochow)在《图书的命运: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迁移史》中的说法。《图书的命运: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迁移史》(*Bücherschicksale. Die Verlagerungsgeschichte der Preußischen Staatsbibliothek*),*Berlin /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3.

②硕侯,《图书的命运》,52 页。

③硕侯,《图书的命运》,306 页。

三、宋刊本《周易集解》的现况

在风波不断的慌忙移转中，原本完整存放在柏林的十卷六册的宋刊本《周易集解》，目前在雅盖隆大学图书馆只保存着卷八以下的两册。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孤本因为受到战争的波及而导致有所缺佚，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尽管如此，总算有一部分流传到今天，其原貌能够在眼前呈现，不得不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笔者在 2007 年的 2 月，偶然地有前往克拉科夫访问的机会，并且亲眼见到了这本书。在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所保存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旧藏汉籍中，连当时的编号也一起保存[①]，并继续使用着，本书的号，即是使用“Berol. Libri Sinici 1397”的编号。本书的版本学方面的概述，已在神田喜一郎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叙述，在此就不再重复介绍，不过在本文仍作最低限度的说明：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在版心有“易传〇”的形式来表示卷数，在叶数下刻有刻工名[②]。版框高 22.6 厘米，宽 14.7 厘米，整本书的大小是高 28.5 厘米，宽 19.5 厘米。

因为目前只保存有卷八以下，故卷首的状况只能依据神田的描述，根据神田的说法，首先书前有唐代李鼎祚的序，其次是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关于本书的解题，再次是宋代李焘和鲜于侃两人的序文，最后是鲜于侃之子申之在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所作的序文。申之的序文是模刻他的手迹[③]。卷末附有王弼的《略例》一卷，后有宋代计用章在庆历甲申(1044)七月甲子的后序，换言之，即附有初刻本的序。同样根据神田的描述，卷首的副叶有“易传。原二套十本。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畅春园发下，去衬纸改一套六

---

①由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所编辑的名为《东方刊本》(Druki orientalne)的目录中，关于夏德特藏 141 册、穆麟德特藏 39 册、Libri Sinici 57 册、及 Neue Sammlung 211 册等，共计 1,621 册，皆列举出残存的旧编号。

②神田没有提及具体的刻工名，但仅在残存 2 册中所见者有舜、成、丙、任、善、永、杲、羌等八人，都以单字来表示。

③很幸运地，鲜于申之的序的末尾之照片已在《书志学》第 8 卷第 2 号中发表，本文据此作为“书影 2”转载出来。神田的这一篇文章后来在《典籍剳记》等著作再度刊载时没有收录，是相当宝贵的资料。

本”的文字，由此可知，是由原先的十册在宫中改装为六册。原先的六册有可能是

第一册（序、卷一）　　佚

第二册（卷二、卷三）　　佚

第三册（卷四、卷五）　　佚

第四册（卷六、卷七）　　佚

第五册（卷八、卷九）　　存

第六册（卷十、略例）　　存

如同神田所揭示的，本书在乾隆时的《天禄琳琅书目》中并无著录，如果是早先从宫中流出的话，照理说应该要理解为康熙五十一年较为合理。在康熙乙未（五十四年）初夏，何焯（1661—1722）曾在宫中见过该书[①]，其流出的时间，最起码也应该在此之后。可是，之后经过谁的手，是经由怎么样的路径被带到遥远的德国去，则是无法得知了。长期担任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并主导购入本书的赫尔曼·许列（Hermann Hülle），在对神田说明时提到，“本书是数年前由民国的一个将领带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当时在柏林的市场中以两百马克的价格购入[②]。

不过，关于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得到本书的时期与途径，不无疑问。如上所提，该馆的汉籍收藏分为1913年为界限的新旧两大类。此年以后收藏的应划到新搜集类，但本书的编号为旧搜集类的 Libri Sinici 1397，因此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得到本书的年份不能说是1913年以后，与许列的上述说明发生矛盾。许列说的是神田访书的“数年前”，则最早也不会早于30年代。笔者推想此处因隐藏着某种背景而故意掩饰事实。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不少宫中文物被各国部队窃走，德国也不例外。柏林国家图书馆的馆史中亦言及此时的获得品，曾有1039套写本与刻本以及一些零散的本子[③]。当时图书馆中也确实有应该将其归还给中国的意见，但是后来怎么处理却不得而知。不

---

①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一《周易集解》校宋本条所引何焯跋，这是神田说法的依据。

②根据神田所引用的沧浪散人（田中丰藏）《欧米印象记》，《斯文》第十四编第六号（1932）。

③Guido Auster，“Die Orientalische Abteilung”（东方部），in《德国图书馆 1661—1961》（*Die Deutsche Staatsbibliothek*，1661—1961），Leipzig，1961，294页。获取这一资料得到汉堡大学王丁博士与柏林国家图书馆 C. Gumbrecht 主任伉俪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谢忱。

管如何，可以想象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对这些获得品需要慎重处理。因此许列对神田的说明无法令人轻易置信。另外在柏林的市场买到的这个说法大概也出于类似理由的借口话。当然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本书是庚子事变时的战利品，而不过是一种推想而已。总而言之，真正的详细情况还是不清楚。

再者，神田喜一郎把印在本书中共计九颗的藏书印，分作三类加以记录，（见附录：藏书印一览）[1]。换句话说，根据藏书印得知，本书从汲古阁的毛晋（1599－1659）开始传到第四子毛表（字奏叔），然后归到季振宜（1630－1674）的手中。

A. 汲古阁毛晋

1 "东吴/毛晋"（朱文）、2 "字/子晋"（白文）、3 "毛晋之印"（白文）、4 "汲古阁"（白文）、5 "毛"（朱文圆形）、6 "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白文）

B. 毛晋子毛表

1 "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朱文）、2 "毛表/奏叔"

C. 季振宜

1 "季振宜/藏书"（朱文）

这里的九种藏书印，除了A5以外，全部在现存的两册中皆可见到，现存的两册中，更可以见到其他的藏书印，如："☲(晋)"在卷八、卷九、卷十的卷首，"虞山毛/氏汲古/阁所藏"在卷八的末尾，"毛氏藏书/子孙永宝"在略例的末尾，"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印"在卷九的末尾。现在把它们分别以A7、A8、A9、B3的代号，附在文末的"藏书印一览"中。应该要注意的是，这些印记之外，只见到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印（D1），从所能见到的藏书印中，不仅无法得知是否为清朝宫廷之物，也无法了解从宫中流出之后的收藏者是谁。可以想象也许长时间是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沉睡着吧！

---

①A，B，C与1，2，3的编号是笔者为求方便附加上去的。

四、《周易集解》版本的流传

八千卷楼主人丁丙(1832—1899)在所藏的《秘册汇函》中《易传》的末尾,写有识语①,如下所示:

> 李氏《易解》初刻于宋庆历临邛计用章,再刻于乾道中资州郡守鲜于侃,嘉定五年侃子申之更刻大字于漕司。明毛子晋得影抄本,曾刻之汲古阁。此本为明胡震亨校刻本,惟毛刻十七卷,今止十卷。或为后人分割之欤。光绪甲午(1894)端节后三日丁丙自识。

宋代的《周易集解》的刊刻状况,最初由计用章在庆历四年(1044)开版刊刻,其次是乾道二年(1166)由李鼎祚的出身地资州的郡守鲜于侃刊刻,接着是嘉定五年(1212)鲜于侃之子申之使用大字并再度刊行,本书即是这个版本(见书影1—4)。是名符其实且豪华精美的蜀大字本,也是李氏《集解》现存最古老的版本。虽然《秘册汇函》所收本是十卷本,但毛晋的汲古阁所刻的《津逮秘书》中所收的是十七卷本,丁丙对此抱有怀疑,猜想后人将十卷分割为十七卷。此书分卷的不同,主要是来自于《唐书·艺文志》所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自古以來就常常被提及②。但是现在已很清楚,宋代所传的全是十卷本,到明代以后如嘉靖年间刊行的聚乐堂西亭氏(朱睦□)刊本及明末毛氏汲古阁的《津逮秘书》本等,则妄改为十七卷,以使之与《唐志》一致。虽然沈士龙和胡震亨(1569—1625)所校刊的《秘册汇函》本在卷末附有计用章的后序,但没有鲜于父子的序,也不附录王弼《略例》,因此可以知道,宋所用的是从计用章初刻本派生出来,与本书属于不同系统的版本。

---

①此《秘册汇函》后经由陶湘之手,由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收购,目前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

②关于这一讨论,参阅金生杨《论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巴蜀文化研究》第1辑(2004),153—165页。

易傳卷第一　李氏集解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案說卦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運行不息應化無窮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

书影 1：第一卷卷首

惟不敏憶以是正之茲四十有七年矣校復蒐考且字小不便於覽者不肖嗣申之　誤並將指敎大字刻之漕司尚賡其傳庶幾此學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子申之　謹書

书影 2：鲜于申之序（末尾）

易傳卷第八　李氏集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虞翻曰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

荀爽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

卑高已陳貴賤位矣

虞翻曰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也　侯果曰天地卑高義既陳矣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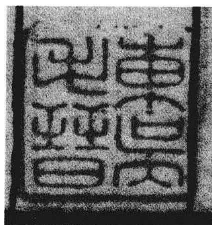
书影 3：第八卷卷首

慶歷甲申七月甲子臨卭計　用章

书影 4：卷末

毛晋还收藏有本书的影写本，已在《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里有所记载[①]。因此，当刊刻《津逮秘书》本时，为何没有直接采用本书，只能说是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在清代出版的丛书中，乾隆年间的德州卢见曾《雅雨堂丛书》、嘉庆年间的张海鹏《学津讨原》及同治年间的《古经解汇函》本等，全都是十七卷本，可见均已失去原来的样貌。这次，根据这一宋刊本的再发现，能够一窥李氏《周易集解》的眞面目，实在是件幸运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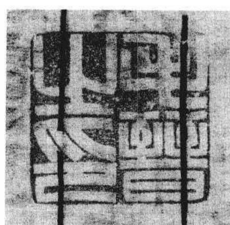
附录：藏书印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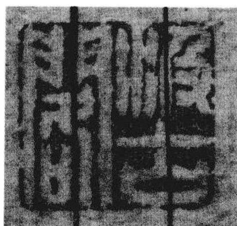
A1 东吴毛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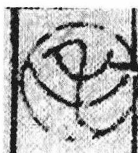
A2 字子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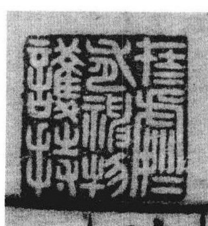
A3 毛晋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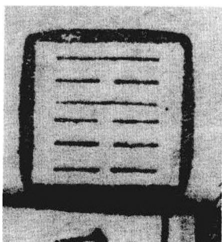
A4 汲古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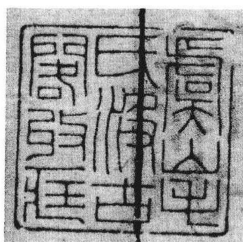
A5 毛



A6 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



A7 ䷢（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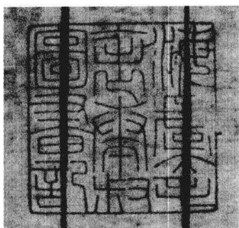


A8 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



A9 毛氏藏书子孙永宝

①这个影写本，可得知后来从黄丕烈手上传到陈鳣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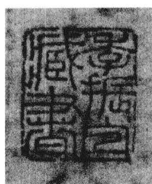
B1 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



B2 毛表奏叔



B3 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印



C1 季振宜藏书



D1 PR. ST. BIBLIOTHEK BERLIN

日本室町时代钞本《论语集解》的研究

高桥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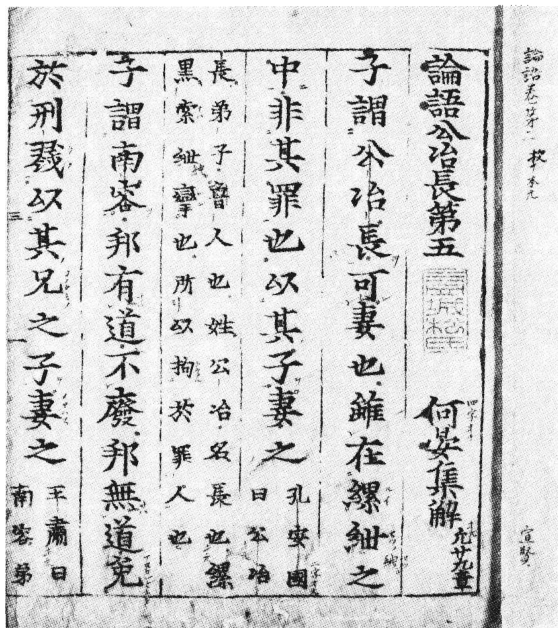
导　论

《论语》流行于汉代，魏何晏集诸家说编纂而成的《论语集解》，作为《论语》最完整的文本，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命力，无论对于寻求古老文本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用于简便诵读的读者来说，此书大概都是不可缺少的文本。《论语》于公元285年首次传入日本，此后它被接受的过程，其梗概已在拙文《关于安田文库收集的古钞本〈论语集解〉》(《安田文庫蒐集古鈔本〈論語集解〉について》，《藝文研究》八十七号，2004)中阐明，此处不再赘言。不过，江户时代林罗山登场后，南宋朱熹(1130—1200)的《论语集注》(《四书集注》之一)风靡一时，在此之前《集解》本就相当于《论语》，这是接受史的大前提。《集解》本在被《集注》本取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是在庆长年间(1596—1615)疯狂印刷的木活字印本，也就是以古活字版为中心的一系列庆长印本(参考拙文《庆长印论语集解的研究》〔《慶長刊論語集解の研究》，《斯道文庫論集》第三十、三十一辑，1996、1997〕)。本来，在以写本为中心的室町时代，制作写本、加上训

作者单位：庆应义塾大学附属斯道文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日藏〈论语〉古钞本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770006)成果。

点全部是因为讲读的需要，所以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中，对各种本子进行过校勘，这使文本呈现出如未完成的草图一般十分复杂的面貌，要看清其整体形态非常困难。这个草图经过修剪，以轮廓分明的形象出现，就是庆长印本的实态。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先对具有实态的东西进行确认，再进入深奥部分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室町时代写本形成的复杂情况，如拙文《五山版赵注孟子校记》（《五山版趙注孟子校記》，《斯道文庫論集》第二十九辑，1994）所述，宋版、五山版和各种写本互相联系，用常规方法确实无法解决。《集解》也不例外，有宋版、正平版《论语》、天文版《论语》、《论语义疏》，以及《论语注疏》等矗立在前，如见缝插针一般，在京都、足利、山口（周防）等有学问的地方出现了写本。但反过来说，在这些周边文本形成甚至输入的前后，写本具有不同的特点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把南北朝以前形成的写本《论语集解》与室町时代的写本区分开的理由所在。基于这样的理由，本文既着力于进行资料分析的调查研究，也企图阐明最为困难，但对日本中世期汉学来说又最为核心的，室町时代《论语集解》的学术动向中的一些问题。


論語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凡廿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也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於罪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肅曰南容弟

图 1　正平版《论语》图版

一、影响古钞本《论语集解》的正平版

这里必须先附带说明《集解》所牵涉的相关资料的概要。第一要列出的是正平版《论语》。正平版《论语》是正平十九年（1364）在堺出版的集解本，是日本最早的《论语》刻本。正平十九年相当于元至正二十四年，日本北朝贞治

三年。其初刻本(初刻双跋本)现存仅有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的一种,以及宫内厅书陵部藏的一部配本。此后,出现了原样覆刻初刻本的"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和"学古神德揩法日下逸人贯书"二条跋语的版本(覆刻双跋本)、省略了"学古……"的覆刻版本(覆刻单跋本)、削去覆刻单跋本跋语印刷的无跋本和明应年间(15世纪末)的覆刻本,总计四种版本。关于这些版本刊刻的顺序,各家说法不一。昭和六年(1931)九月川濑一马在《斯文》上发表的《正平版论语考》中,认为顺序是初刻本、单跋本、覆刻双跋本,而昭和八年(1933)大阪府立图书馆影印初刻本时所附长田富作的《正平版论语之研究梗概》中论述的,则是本文所述单跋本后出的观点。但是,要推定这些覆刻具体进行于何时,现在没有充分的资料保留下来。不过,东洋文库会聚了覆刻双跋本、单跋本和无跋本,要对其形成过程进行比较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覆刻的版本出现于何时,大致是可以推测的。

下面先看一下东洋文库所藏的三种版本。覆刻双跋本(二—c · a—2)五册,是屋代弘贤(1758—1841)、德岛藩蜂须贺齐昌侯阿波国文库的旧藏。有江户时代初期的朱红色外封,书中有墨笔写的返点、送假名,朱笔写的ヲコト点及合点等训点(注:返点、送假名、ヲコト点及合点都是用日语训读汉文时使用的符号。返点:表示阅读顺序的符号;送假名:表示动词活用词尾、助词、助动词等读法的符号;ヲコト点:在汉字的四角或上下的固定位置标上点或线,以表示动词活用词尾、助动词、助词等读法的符号,多见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至室町时代,根据博士家汉字读法图解中右上方的"ヲ",和右中部的"コト"而得名;合点:评点和歌等时,在好的作品上打点、圈、钩的方法)。除一部分薄墨的附训外,其他全部出自同一人,表明书写者的跋记录在卷一至卷六的末尾,如下:

卷一末　建武四年三月四日以家说授申饭尾三郎金吾了　清原赖元
　　　　予宽正五年庚申六月十九日于肥州厅而考正之但左方朱点清家点也

卷二末　前明经博士清原赖元饭如一之卷末

卷三末　前明经博士清赖元

卷四末　清家赖元点了

卷五末　清家赖元点了

卷六末　前明经博士赖元点

这些跋与训点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被认为是宽正五年(1464)过录、建武四年(1337)清原赖元的训点。建武四年点本的原本，现藏于大东急记念文库，由卷子改装为十二帖，因其为镰仓时代的钞本，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赖元是清原良枝(1253－1331)的次男，将家传的训点传授给了饭尾三郎。无论如何，以上跋语证明了该本是1464年以前刊刻的。

下面来看看单跋本。该本(二—c・a—3)为三册，据说是三条西实隆(1455－1537)的亲笔训点本。另外，此书于大正十一年(1922)由斯文会影印出版，有安井小太郎的解说。写入的训点有朱墨二种，出自同一人。朱笔是ヲコト点，墨笔是返点、送假名、附训，以及栏外补注等。卷三和卷十末有与本文训点注释出自同一人的墨笔写的跋。

长享第三历林锺十八日自/储皇竹园赐之可秘秘秘/亚相拾遗郎(花押)(卷十无“自”字)

此一部访大外记师富朝臣之训说/并见合清家之本写朱墨点加/随分之琢磨者也后昆可秘秘秘

也就是说，此书是长享三年(1489)皇太子(后柏原天皇)赐给亚相拾遗(三条西实隆)的，在继承了博士家中原氏的中原(押小路)师富(1434－1508)的训说基础上，加入了清原氏的点。另外，卷三末、卷六末有与ヲコト点出自同一人的朱笔跋语。

卷三末　明应甲寅孟冬初三日如形加朱墨点毕(花押)

卷六末　明应甲寅孟冬初九手自加朱墨点毕(花押)

明应甲寅是1494年，这些跋语和前面的出自同一人，应当是三条西实隆的笔

迹。也就是说，该书的训点是实隆在三十五和四十岁时写入的。由此可知，此书是在 1489 年以前刊刻的。

接下来是无跋本。因为这是前述单跋本削去跋文后印刷的本子，开板时间应在 1489 年以前，但现在要考察的是，经过修版以后该本流行的时间。该本是东洋文库收藏的五册本（二—c・a—4），是近代向山黄邨、寺田望南的旧藏。浅棕色的古外封上附有朱红色的古题签，墨书"鲁论"。因为是单跋本的后印本，其版面自然无法如单跋本一般清晰。写在该本上的清原家后期的大儒清原枝贤（1520－1590）的训点，朱笔的有ヲコト点，墨笔的有返点、送假名、附训等，全部出自枝贤亲笔。卷一至卷九的各卷末写有"加朱墨点了"（钤枝贤印），卷十末写有以下文字：

> 右鲁论者人伦之大用也时习/可也玩索而觉气味深长者乎/于爰不干翁专佛教余志儒术/求累家秘点不及犹豫拭涩眼染秃笔加朱墨为他人勿令容易而/已/元亀第二岁舍辛未春二月初八/宫内卿清原朝臣（花押）（钤枝贤印）

也就是说，这是元亀二年（1571）五十二岁的枝贤所写。因此，本书的印刷时间可以确定是在 1571 年以前。

能够同时比较以上三种版本，对于古写本的研究来说非常有益。它们的纸张都是较厚的楮纸，为正平版《论语》所特有。双跋本用非常高级的白纸印刷，从双跋本到无跋本，时代越晚，纸张越黄。我们推测，双跋本是在南北朝末期至室町时代初期，即应永年间（1394－1427）左右开板；单跋本是在室町时代中期，即应仁（1467－1469）、文明（1469－1487）年间左右开板；无跋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即天文年间（1532－1554）左右大量印刷。这类文本的开板本来就是以满足乡绅的需要为目的，其意义在于他们可以在书中写入博士家的训点，因而开板和写入训点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解释。由此也很容易想像，贯穿整个室町时代，正平版《论语》在乡绅之间受到怎样的重视，以及正平版对古写本的形成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以应仁之乱（1467）为分界，学问传播到了地方，周防山口的大内氏得以

特殊的方式发展，持续进行了别名为“大内版”的开板事业。这在《五山版的研究》（《五山版の研究》川瀨一馬）的《室町初期的开板》（《室町初期に於ける開板》）一节中有详细说明。《论语》也是如此，明应八年（1499）大内氏的家臣杉武道覆刻出版了正平版《论语》（宫内厅书陵部藏），所以正平版的存在对于了解室町时代《论语》的接受，无疑具有关键的意义。

图 2 《论语义疏》

那么，正平版的文本到底具有怎样的源流？中国最早注意到正平版的学者据认为是清初的藏书家钱曾（1629－1701）。他在《读书敏求记》卷一“何晏论语集解十卷”中，举出了正平版的字体与六朝唐初的字体相似，以及句末多用“已”、“矣”等助字的情况与《史记》、《汉书》所引《论语》一致等理由，评价正平版为保留了古《论语》面貌的文本。这个评价现在在中国已成为常识。日本方面，则如武内义雄在《正平版论语源流考》（《正平版論語源流攷》，1933，大阪府立图书馆）中所论述的，从镰仓时代以前《论语》接受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清原、中原两家的文本进行比较后，得出了正平版更接近清原家本的结论。但是，关于清原家本的源流，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进一步的考证。

因为正平版《论语》具有这样的特点，要通过它来考察室町时代以后中原家的《论语》学，几乎等于没有材料。与清原家学成为主流相辅相成，正平版也与清原家的关系越来越深，而可以被讨论的二者具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也越来越多。不过，正平版的开板与清原家有关的明证尚未被发现，而在清原家

监修下开板的《论语》，则要到天文二年(1533)附清原宣贤(1475—1550)跋的所谓天文版《论语》刊行。据其跋语，泉南堺的阿佐井野氏，在应仁之乱后想要重兴已经消失的《论语》版本，据宣贤的文本重新刻版。川濑一马博士认为，所谓已经消失的版本才是正平版的覆刻双跋本，因而覆刻双跋本的传本也就很少。实际上，覆刻双跋本也仅在东洋文库、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安田文库旧藏)、静嘉堂文库(零本，松井本)尚有保存。

天文版与正平版同样在堺开板，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据说其板木由细川幽斋捐赠给堺的南宗寺，直到大正年间还在印刷，后在战争中烧毁。天文版是省略了注释仅保留正文的文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有仅有正文的宣贤亲笔写本《论语》，被认为是该版的祖本。

这样，镰仓时代以来，被称为秘传的，在家中传授文本和训点的习惯，变成了通过讲义和开板向大众推广的风潮，在此文化的变迁中，正平版被认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或许应该说，正是正平版的流行，促成了这样的风潮。更进一步说，室町时代的清原家似乎一面盯住正平版，一面想要形成自己的文本，与之相抗衡。

二、影响古钞本《论语集解》的《论语义疏》

下面要举出的第二个相关资料是，在中国早已失传的梁代皇侃撰《论语义疏》。本书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底本，增补了注释，因此也称《论语集解义疏》。皇侃(488—545)与集解本的著者何晏(190—249)相距二百年以上，所以他所用何晏的文本，与何晏原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是可以理解的。而更不用说，又经过了千年的时间，在日本中世的室町时代传抄的《论语义疏》，中间还混入了唐代邢昺的注释书《论语注疏解经》，与皇侃原本都有很大差别，如果将这些写本中包含的《论语集解》正文，与单行的《集解》正文进行比较，不能不说是十分危险的尝试。

但是，室町时代的读书人通过有权阶层的人，巧妙地将《集解》和《义疏》二书融合，却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这是何人、何时、为何而作的东西，全都不清楚。但是，这不是经过很多人，在不同的时机中渐渐吸收而形成的东

西；而是在某一时间融合以后，就以不变的形式延续下来。而且，与正平版《论语》的接受过程不同，其融合过程并非简单传抄，而是以复杂的方式进行。要把握日本室町时代，在特定的地域和时代中，《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特殊封闭的兄弟关系，实际上有必要全面考察《论语钞》之类当时学僧所进行的工作。不过，现在的研究课题是《论语集解》古钞本的整理，首要任务应当是从眼前的相关资料开始，慎重地展开推论，然后得出解答。

日本的《论语义疏》钞本，现在有不下三十种，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若从这些保存下来的钞本想象当时的情况，大概可以说这种书曾是非常流行的吧。

以斯道文库所藏的文明十九年(1487)钞本为例，其形态如下：

卷首有皇侃序文，题"论语义疏第一 梁国子助教吴郡皇侃撰"，以" 论语通曰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开头。

其后有魏何晏序，题"论语序何晏集解"，并言"叙曰汉中垒"，其下附小字双行的皇侃注"东西南北四人有将军耳北方之夷官也……"。

接下来是正文卷首，题"论语义疏卷第一　　何晏集解　皇侃疏"，卷二则题"论语义疏卷第二　　何晏集解　皇侃疏"，"第二"下用小字双行加篇名"八佾/里仁"，卷三以后的题名也和卷二相同，但有的卷没有"何晏集解"四字。另外，只有第九、十两卷，"皇侃疏"下附加了章数"凡几章"。

接下来另行写"学而第一 疏"，下面小字双行"论语是此书总名学而为第一第篇别目……故曰学而第一也"，是总述"学而"篇意义的文字。然后，同样用小字双行写"昺云自此至尧曰是鲁论语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言此篇于次当一也"，这是宋邢昺"正义"中总述篇名的文字。这一形式一直保持到"尧曰第二十"。这种在各篇篇首附加解说的形式，与邢昺的《正义》完全相同，大概是自古以来"疏"的传统形式吧。

以上内容结束后，进入本文。"子曰"下加入了小字双行的疏。"子者指于孔子也……"、"学而时习之"下用小字双行写"此以下孔子言也……"。何晏注低一格起，"马融曰子者男子通称也"下有小字双行疏"凡有德者皆得称子……"等。文中也有何晏注不提格的地方。

只要看一看"义疏"的现存本，就可以发现在反复传抄的过程中，这一形

态始终被保持着。由此考察古钞本《论语义疏》与古钞本《论语集解》在形态上的关系的话，由于《义疏》的写本中包含了《集解》，若把《义疏》的“疏”去掉，就会剩下《集解》，所以要省略烦杂的疏而成为简略的《集解》单行本并不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集解》本基础上，适当地附加插入《义疏》有用的疏，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说，融合的形式到底是以《义疏》为主，还是以《集解》为主的问题。

要判断本文和注的字句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影响，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以主要的形式来俯瞰其融合状态的话，如前所述，在被融合的文本中，《集解》单行本各篇中原样插入《义疏》中总述各篇意义的文字，是最引人注目的融合状态。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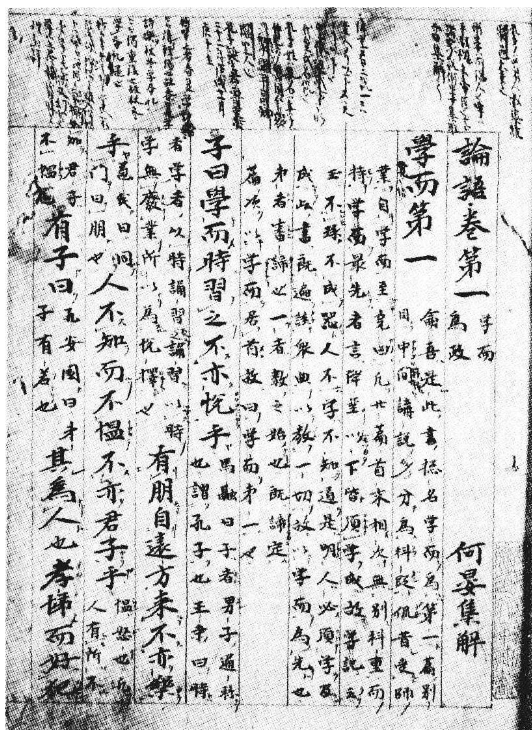

論語卷第一 學而 為政 何晏集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

图 3 《义疏》窜入《集解》卷首

图 3 虽然是《集解》的部分文本，但从形式来看“学而第一”题下的小字注释，却正是《义疏》的疏文。由此形式来看，融合是以《集解》为主体，并吸收了《义疏》的长处，这样的考虑确实是合理的。

更早的时候，在镰仓时代正和四年(1315)的清家写本《论语集解》(东洋文库藏本)中，有正庆二年(1333)写入的栏外补注，其中有作“疏曰”加入上文所述概括各篇意义的文字。这正说明了南北朝初期《义疏》的传本已经存在，而且是以《集解》为中心吸收了《义疏》，更表明将这些疏文抽出是《论语》讲说早期流行的方式。

但是，不管怎样，鉴于没有镰仓时代以前的《义疏》写本存世，而且与室町

时代形式完全相同的《义疏》只有这样的写本存世，应该很容易推测，《义疏》形式的注解在室町时代尤其具有必要性。关于这一点，阿部隆一在《室町以前国人撰述论语孟子注释书考》(《室町以前邦人撰述論語孟子注釈書考》，《斯道文庫論集》第二辑，1963)中有如下叙述："进入室町时代，在栏外等处写入义疏的集解本钞本增多，义疏急剧流行。这是因为论语的讲筵增加以后，相对于讲说的需要，集解显得过于简单，所以更加详细的注解受到广泛需求。(中略)皇侃义疏在六朝时代的特点，与所谓的假名钞相当。它与室町时代假名钞盛行期的趋向相合是理所当然的。"

《义疏》给予了学僧、乡绅的讲义便利，其无微不至的注释，与假名钞中所见室町时代日本人特有的注释具有共通性，因而被反复传抄。这样的见解确实一语中的。

不过，《义疏》最终因其注释太多，不可能制作大量的复本，而分量比较适中的《集解》本更加适应世人的需要，于是在《集解》本的基础上，仅保存了《义疏》中最为核心的总述各篇意义的文字，成为《义疏》讲读的余音。也就是说，我们推测《义疏》、《集解》二书在中世的融合是以《集解》为主体进行的。

实际上，从《义疏》现存本来看，除去一部分的影写本，其书写年代大多集中在室町时代的特定时期，之后就突然消失了。向上追溯的话，《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了"义疏十卷"，由此可以推测《义疏》在平安时代就已传到了日本，之后却突然消失；中世时期经过日本人的改编又再次出现，随时代风气而流行，最终受到宋学等新学问的排挤而再度消失。这大概就是《义疏》在日本的存在情况吧。

那么，《义疏》大量出现的"中世"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我认为，这与主导中世学问的关东的学校，也就是足利学校有很大的关系。

总之，《义疏》对室町时代《集解》古钞本的影响，与正平版《论语》简单传抄的方式不同，可以说是以时势变化为背景，通过稍微复杂而曲折的方式进行的。

然而，如要对正平版与《义疏》互相纠缠的《集解》本进行校订，其文本形成的经过已无法清楚地鉴别了。

从现存本来看，可以清楚地判定有《义疏》窜入的传本约占《集解》古钞本

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与正平版等有共同影响的本子约占四分之一。因此，从总体上看，约半数的本子都不是纯粹的《集解》文本，而是具有中世诸本混杂特点的本子。而且，这与维持传统的博士家的文本也泾渭分明，相对于博士家在以宫廷为中心进行讲筵的基础上形成的本子，这是在以寺院为中心培养学僧的基础上形成的本子，是非常有特点的现象。不难想象，有权威背景的博士家，一定会感到这种动向的威胁性。

三、现存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的梗概

真正发现室町时代古写本价值的，是江户时代后期的考证学者。从《论语》的情况来看，市野迷庵(1764－1826)和狩谷棭斋(1774－1835)等人的访书和校勘活动，可以说是一个开端。最终完成于涩江抽斋(1804－1858)、森立之(1806－1885)等人的《经籍访古志》，是书志学意义上最应依据的原点。当然，如果向上追溯的话，吉田篁墩(1745－1798)的《论语集解考异》，以及山井昆仑(1681－1728)的《七经孟子考文》中，古钞本也占了很大的位置，所以这个源流大概可以追溯到山井的老师荻生徂徕(1666－1728)。关于这些情况，请参考拙文《庆长印论语集解的研究》(《慶長刊論語集解の研究》，《斯道文庫論集》第三十辑，1996)。山井昆仑所用的古写本《论语集解》现藏于足利学校，吉田篁墩所用的大永四年(1524)、永禄六年(1563)的两个钞本，现藏于东洋文库，要进行源流的比较鉴定并不困难。

但是，一旦涉及《经籍访古志》，就出现了很多难以和现存本进行比较鉴定的古写本。这是因为此书包含了书志学研究的原点的缘故。那么，就先对《访古志》中所见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的著录进行实际的考察。下面以清末光绪十一年(1885)的徐氏刊本为基础逐一列举(初稿本是1935年日本书志学会影印的安田文库藏本，第二稿本是同样藏于安田文库的小嶋宝素等人的写本)：

1. 旧钞单经本　足利学藏

《访古志》初稿本、第二稿本皆未著录。足利学校现无收藏。

2. 旧钞单经本　京师锦小路家藏

《访古志》初稿本、第二稿本皆未著录。京师锦小路家不详为何处。

3. 天正四年(1576)钞单经本　容安书院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初稿本、第二稿本著录柳原书屋藏，清杨守敬旧藏，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4. 清氏点本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初稿本称其为“清家训点板本”，现收藏地不详。

5. 大永甲申(1524)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藤原贞干、狩谷棭斋、木村正辞旧藏，现藏东洋文库，为吉田篁墩考异所用本。

6. 旧钞本　容安书院藏

《访古志》初稿本、第二稿本皆未著录。八行十五字。文字与正平版相同。清杨守敬旧藏，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7. 天文二十一年(1552)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八行十八字。署名宥镜。现收藏地不详。

8.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三十郎盛政据清原枝贤本抄写。现藏斯道文库。

9.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十一行二十一字。署名宥俊。现收藏地不详。

10.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九行二十一字。署名俊仁。现收藏地不详。

11.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八行字数不定。署名蜜严院、有弁。现收藏地不详。

12.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六行十三字。有永享三年(1431)识语。原藏安田文库,现收藏地不详。

13.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九行二十字。有恕通墨印。现收藏地不详。

14.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八行十七字。署名源清房俊仁(初稿本"源"作"元")。现收藏地不详。

15. 旧钞本　求古楼藏

《访古志》初稿本以下皆著录。八行十五字。有一寸明珠的题识。现收藏地不详。

在著录的十五种钞本当中,仅有四种知道收藏地,由此也可以感觉到室町时代古钞本的深奥。

上述的研究后来没有继续进行,从而导致了明治时代典籍的散佚,不过大正年间,林泰辅著《论语年谱》(1916),对《论语》的文本进行了整理。该书附录的图版中收入了室町时代的三种古钞本,分别是:宽正本(男爵野村素介藏)、永禄本(同上)、大永本(木村正辞藏),现在都藏于东洋文库。之后的昭和初期也有研究进行。昭和六年(1931)5月,大阪府立图书馆举办了《论语》展览会。虽然我们不清楚当时到底有什么展品,但京都的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选择了七十种左右的展品,出版了图录《论语善本书影》。此书收录的室町时代的古钞本《论语》有二十一种。如此数量的古钞本会聚一堂,是《经籍访古志》以来才有的盛事,恐怕也是绝后的。下面不避繁琐,将其现在的收藏地予以确认。

(一)永享三年(1431)钞本　　安田善次郎藏(现收藏地不详)
(二)宽正元年(1460)钞本　　岩崎文库藏(现藏东洋文库)
(三)永正十二年(1515)钞本　　岩崎文库藏(现藏东洋文库)
(四)大永四年(1524)钞本　　岩崎文库藏(现藏东洋文库)

(五)享禄四年(1531)钞本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六)天文九年(1540)钞本	岩崎文库藏(现藏东洋文库)
(七)永禄三年(1560)钞本	高木利太藏(现藏斯道文库)
(八)永禄六年(1563)钞本	岩崎文库藏(现藏东洋文库)
(九)建长七年(1255)原跋钞本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十)室町初、中期钞本	宫内省图书寮(现藏宫内厅书陵部)
(十一)狩谷棭斋旧藏本	内野皎亭藏(现收藏地不详)
(十二)清见寺旧藏本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十三)根本通明旧藏本	秋田县立秋田图书馆藏(现藏该馆)
(十四)林崎文库旧藏本	神宫文库藏(现藏该文库)
(十五)古钞论语集解	高木利太藏(现藏斯道文库)
(十六)三十郎盛政钞本	安田善次郎藏(现藏斯道文库)
(十七)元龟二年(1571)释梵舜钞本	谷村一太郎藏(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一八)清莲院旧藏本	安田善次郎藏(现藏斯道文库)
(一九)古钞论语集解	龙谷大学图书馆(现藏该馆)
(二十)永正十七年(1520)宣贤原跋钞本	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藏(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二十一)释梅仙钞本	大阪府立图书馆藏(现藏该馆)

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写本都能知道现藏地,仅有永享三年钞本和和狩谷棭斋旧藏本两种不清楚。狩谷棭斋旧藏本也许就是《经籍访古志》的第十三种,有恕通墨印的本子。

顺便说一下,在此之前的大正二年(1913),汤岛圣堂内的孔子祭典会编制了《论语书目》,但收入的是日本人的注释书,而没有著录古钞本。接下来大概是昭和初期,举行了由财团法人大桥图书馆主办的《论语》展览会,并编制了目录。这次展览会也是前所未闻的大展览,而且书志学的水准很高。展览项目分为:"古版本"、"古钞集解本"、"古钞义疏本"、"古钞假名钞"、"假名论语"、"江户时代著述"、"其他"、"追加"。这个分类可以被评价为是确立了现在《论语》文本研究体系的分类。其中著录的室町时代古钞本有三十二种,

很多与大阪府立图书馆的展览目录相重合。因其现在是稀见的目录，故也在此不避繁琐地列出书目。

(一)永享三年钞本　安田善次郎藏(大阪目录之一)
(二)宽正元年钞本　岩崎文库藏(大阪目录之二)
(三)永正十二年钞本　岩崎文库藏(大阪目录之三)
(四)大永三年钞本　神宫文库藏(现藏该文库)
(五)大永四年钞本　岩崎文库藏(大阪目录之四)
(六)享禄四年钞本　德富苏峰藏(大阪目录之五)
(七)天文九年钞本　岩崎文库藏(大阪目录之六)
(八)天文十八年(1549)钞本　富冈益太郎藏(现藏斯道文库)
(九)永禄元年(1558)钞本　龟田次郎藏(现藏国会图书馆)
(十)永禄三年钞本　高木利太藏(大阪目录之七)
(十一)永禄六年钞本　岩崎文库藏(大阪目录之八)
(十二)元龟二年钞本　谷村一太郎藏(大阪目录之十七)
(十三)青莲院旧藏本　安田善次郎藏(大阪目录之十八)
(十四)三十郎盛政钞本　安田善次郎藏(大阪目录之十六)
(十五)建长七年原跋钞本　德富苏峰藏(大阪目录之九)
(十六)德治三年(1308)原跋钞本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十七)清原宣条、宣光持有本　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藏(大阪目录之二十)
(十八)赐芦文库旧藏本　宫内省图书寮藏(大阪目录之十)
(十九)林崎文库旧藏本　神宫文库藏(大阪目录之十四)
(二十)根本通明旧藏本　秋田县立秋田图书馆(大阪目录之十三)
(二十一)狩谷棭斋旧藏本　内野皎亭藏(大阪目录之十一)
(二十二)贺茂三手文库旧藏本　帝国图书馆藏(现藏国会图书馆)
(二十三)古钞本，二册　帝国图书馆藏(现藏国会图书馆)
(二十四)释梅仙写本　大阪府立图书馆藏(大阪目录之二十一)
(二十五)古钞本，五册　岩崎文库藏(现藏东洋文库)
(二十六)古钞本，二册　高木利太藏(大阪目录之十五)

(二十七)清见寺旧藏本	德富苏峰藏(大阪目录之十二)
(二十八)古钞本,四册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二十九)古钞本,一册(先进篇以下)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三十)古钞本,一册(先进篇以下)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三十一)古钞本,一册(卷五、六)	德富苏峰藏(现藏御茶之水图书馆)
(三十二)清家训点古钞本(先进篇以下)一册	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藏(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大阪展览目录中著录的本子,除了龙谷大学图书馆的藏本以外,与此完全重合。这个目录中可以称为新特征的,是增加了德富苏峰和帝国图书馆的藏书。

差不多同时,昭和三年(1928)斯文会的孔子祭典之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论语》展览会。据《财团法人斯文会八十年史》(1998)的记载,展品分为国译训点资料、古写古版和注释书。其中,仅有冈田正之据永禄六年写本影写的本子,而没有室町时代《论语集解》古钞本的原本。

以上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有原本存在的著录。这样的展览会在战后没有举办过,因而无法把握收藏的整体情况。进入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4),斯道文库的阿部隆一教授着手进行"汉籍古钞本的研究",致力于搜访原书、复制各机构藏书等实际的书志调查工作,斯道文库也由此一跃成为日本最大的《论语》古钞本的收藏机构。通过这些活动,保留了原高木文库收藏的原安田文库的藏书,基本都归入了斯道文库,再加上了冈田真的冈田文库、残花书屋的户川浜男、林泰辅旧藏书、南葵文库旧藏书等,凭借如此丰富的收藏,即便仅依靠斯道文库的藏书,也能大致判断室町时代古钞本的情况。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要归功于日本文部省的数项资助,以及斯道文库赞助委员会的协助。从研究项目开始,经过了半个世纪,现在终于到了提交完整成果报告的阶段。

下面,首先对收藏地明确、现在能夠进行调查的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按照收藏者分类,试做一概览。

现在结束调查的实物,日本有八十二种(其余台北有十种)。其中,斯道文库有二十一种,东洋文库、成篑堂文库(御茶之水图书馆)和日光山轮王寺

宝物殿各有六种，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各有五种，宫内厅书陵部、史跡足利学校、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神宫文库各有三种，六地藏寺、都立中央图书馆、庆应义塾图书馆各有二种，秋田县立秋田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大国魂神社、筑岛裕、某家、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大阪府立图书馆、阪本龙门文库、阳明文库、仁和寺、醍醐寺、大和文华馆、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各有一种。表格按照收藏、卷数、完缺、册数、书号、书写年代、较早的旧藏者（旧藏）、较晚的旧藏者（新藏）的项目列出。由此概况来看，虽然我们无法追溯到《经籍访古志》所著录的本子，但要赶上《论语善本书影》和《大桥图书馆展观目录》等的著录还是可能的。不过，永享三年的写本（安田文库旧藏）和狩谷棭斋旧藏的室町时代写本（内野皎亭旧藏），现藏于何处仍然不清楚。顺带说一句，昭和三十五年（1960）在京都本能寺新馆举办的京都古典会的拍卖目录中，有一种记为"享禄三年清受叟写　卷一、二"的古钞本现在也去向不明。

另外，室町时代存在的汉籍古刻古钞本，以及从中国输入的刻本总数到底有多少，虽然没有过具体的考证，但从现存汉籍的情况来看，古钞本仅有不到五百种，而其中古钞本《论语》占了最多数。极端一点来说，通过了解《论语》古钞本的情况，可以捕捉到室町时代汉学的动向。

进一步说，由现存古钞本《论语》的数量，可以想象已消失的古写本应当具有怎样的数量，由此也可以洞悉室町时代《论语》讲读的兴盛。从书写时代来看，以应永（1394－1428）为中心的室町时代前期到中期的本子相对较少，文龟（1501－1504）、永正（1504－1521）为中心的室町时代后期到近世初期的本子则压倒性地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后者的时代距今较近，更是宫廷和博士家禁秘的学问逐渐向学僧和武士等知识阶层推广的状况在《论语》讲习中的如实写照。不过，到室町时代后期为止，有大量写本在清原博士家流传，也是应当特别关注的事实。

收藏机构也能反映《论语》讲习的特征。例如，日光山的天海藏和足利学校等的藏书，如实反映了室町时代原样接受前代流传的《论语》的情况；仁和寺、醍醐寺、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德富苏峰收集的各寺院的旧藏书，是室町时代学僧动向的写照；六地藏寺和大国魂神社等收藏的本子，则是寺院系统的

学问向地方传播的见证，都非常有意思。另一方面，以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的清家文库为中心，分散于斯道文库、东洋文库、大阪府立图书馆、天理图书馆、大和文华馆、阳明文库等各收藏机构的清原博士家系统的写本，反映了具有强大势力的清原家的《论语》，是怎样实现其普及和渗透的。

不过，不应忘记的是，致力于防止古典籍的散佚和恢复其原状的民间藏书家们不惜投入重金而聚集的藏书，才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这条道路可以说是由明治时代以来汉学的开拓者根本通明（1822—1873）、林泰辅（1854—1922）和岛田篁邨（1838—1898），以及藏书家安田善次郎（1879—1936）、和田云邨（1856—1920）、德富苏峰（1863—1957）、冈田真、涩泽荣一（1840—1931）、大岛雅太郎（1868—1984）和谷村一太郎（1871—1936）等人所开辟的。特别是安田善次郎的安田文库（参考前述拙著《关于安田文库收集的古钞本〈论语集解〉》、和田云邨收集的岩崎文库（《岩崎文库贵重书解题Ⅰ》，东洋文库，1990）、德富苏峰的成篑堂文库（川濑一马编《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御茶之水图书馆，1992）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根本通明根据自藏的古钞本著有《论语讲义》（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6）（参考拙著《根本通明藏书纪略》，《斯道文库论集》第三十八辑，2004），林泰辅著有《论语年谱》（大仓书店，1916）。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虽然依据文本进行分类是理所当然的，但依据收藏者进行分类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高丽林惟正《百家衣集》续探

金程宇

《林祭酒百家衣诗集》(以下简称《百家衣集》),是高丽林惟正的集句诗集,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视为佚书,多据《东文选》所载作品进行研究①。实际上该书尚存于天壤间,1994年韩国学者许兴植发表了《诚庵博物馆藏〈百家衣集〉解题》,率先向学界公布了这一发现。不久许氏又发表《林惟正的〈百家衣集〉》,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考述。笔者亦曾撰文加以探讨②,当时因所利用版本漫漶不清,颇感遗憾。《百家衣集》的版本,此前许氏介绍了三个,即南权熙藏本、延世大学藏本、诚庵本(见图1),其中前两种均阙跋文,诚庵本刊印稍后,然最为完整,故予以影印,成为最通行的文本。然此三个版本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域外汉籍研究所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2006年度青年项目"域外所藏稀见唐宋文献之实证性研究"(编号:06JC—75011— 44010)。

①《东文选》收林惟正集句诗共36篇46首,约为《百家衣集》的六分之一弱。利用《东文选》对《百家衣集》进行研究的论文有,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汉城:汉城图书株式会社,1931,76、77页)、金相洪《韩国集句诗研究》(《汉文学论集》第5辑,檀国汉文学会1987年)、周裕锴《试论宋代文学对高丽文学之影响》(《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2004年第5期)。

②《〈十抄诗〉丛札》(《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论林惟正〈百家衣集〉的文献价值》(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第9号,2007年。又收入拙著《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此外,琴知雅发表了《林惟正〈林祭酒百家衣诗集〉研究》(《中国语文学论集》第49号,2008年,357—377页),亦可参考。

多漫漶不清，特别是小注中的诗人姓名，往往难以辨认，颇令学者困扰。实际上东国大学庆州校区尚藏有写本一部（见图 2），为此前学者所未及[①]。此写本以工楷抄录，十分清晰。这使《百家衣集》的文本辨认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十分珍贵。笔者读书过程中续有所得，颇感前文之不备，故再次撰文，加以进一步补充。


林祭酒百家衣詩集卷第一
宮中四景
春
上林花掩映　化國日舒長　風暖鳥聲碎　泥新燕影忙　輕輿臨太掖　步輦御披香　聖藻懸宸像　詩無入俗章
夏
冰盤消酷暑　輦路挾垂楊　林熱鳥開口　雲披月吐光　新衣裁白紵　薄汗染紅粧　何處添佳景　南風草樹香

图 1　韩国诚庵古书博物馆所藏
《百家衣集》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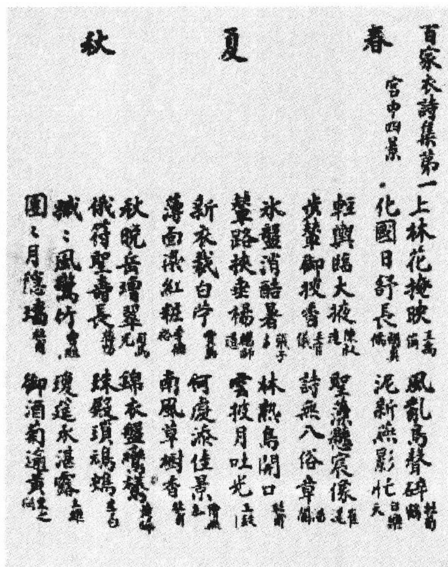

百家衣詩集第一
宮中四景
春
上林花掩映　風亂鳥聲碎
化國日舒長　泥新燕影忙
輕輿臨太掖　聖藻懸宸像
步輦御披香　詩無入俗章
夏
冰盤消酷暑　林熱鳥開口
輦路挾垂楊　雲披月吐光
新衣裁白紵　何處添佳景
薄面染紅粧　南風草樹香
秋
秋晚岳增翠　錦衣鹽鷹犬
俄符聖壽長　珠殿瑣鴻鵠
瑟瑟風驚竹　瑤庭承湛露
團團月隱墻　御酒菊逾黃

图 2　韩国东国大学所藏
《百家衣集》抄本书影

一、《百家衣集》的引诗来源

《百家衣集》共收诗 289 首，1968 句，涉及唐宋诗人二百余人。那么，这些诗句究竟来源于哪些书籍呢？兹就目前所知，略考如下：

有出于类书者。如《初学记》：

---

①此本 3 卷 1 册，书体大小为 24.0 cm× 21.0 cm，封面题“百家衣集”，正文题为“林祭酒百家衣诗集”，前有赵文拔序，末有南秀文跋，抄录时间为“丙午孟秋誊于城西书亭”，即 1899 年。序跋皆半叶 12 行，行 18 字，正文天头书卷次诗题，下书正文，半叶 12 行，行 10 字或 14 字。诗人姓名为小注，两字一行。此本偶有缺字，当因底本原缺所致。

第一首《宫中四景·春》第三、四句“轻舆临太掖陈叔达步辇御披香王官仪”，分别见《初学记》卷三陈叔达的《又早春桂林殿应诏》和上官仪的《奉和初春诗》，二诗在《初学记》中仅隔杨师道诗一首，当即林惟正诗作之所本。此外，第七句“圣藻悬宸像崔湜”，亦见于《初学记》卷十崔湜《长宁公主东庄侍宴诗》。又如，第二首《宫中四景·夏》第六句“薄汗染红妆李德裕”，见《初学记》卷三李德林的《夏日诗》。李德裕显然是李德林之误。

有出于总集者。如：

1.《文苑英华》

卷一《题元兴镇涤暑亭》“仍有酒如泥李商隐”，李商隐《昭州》中句，“可骇仍有酒如泥集作醉”，见《文苑英华》卷二九四。又，卷一《和廉学士留题道昌寺》“坐石自开襟杨速”，出自《送邹尊师归洞庭》，见《文苑英华》卷二二九。卷一《和锦城道弘寺留题》“迥碛星低雁李洞”，为《蕃寇侵逼南阳道中》中句，见于《英华》卷二九四。“迥”作“廻”。

2.《十抄诗》

笔者在《〈十抄诗〉丛札》曾举出十余例[①]，可证《十抄诗》为林惟正集句诗的用书之一，兹不赘述。

3.《西湖莲社集》

此书中土久佚，日本学者佐藤成顺先生最早撰文论述，并刊布了诗歌部分。笔者亦曾对该书进行过研究[②]，当时未能发现该书与《百家衣集》的关系，兹可加以补充。

《西湖莲社集》全称《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联社集》，林惟正引用部分诗句，仅见于其中所收《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如卷二《和文州道昌寺廉相国留题》七律的第五、六、七句“贝叶经中容问法沈日道，莲花社里愿归心和嵘。不向空门求解脱杜惟一”。第五句见于《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载阮思道诗：

①《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又拙作《域外汉籍丛考》14、15页。

②《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及其文献价值》(载《中国学论丛》第24辑，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8；又收入拙作《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关于该书早期在高丽的流传，参笔者《〈西湖莲社集〉流传高丽考》(未刊)。

导师怜我苦营营，为指空门出世情。
贝叶经中容问法，莲华社里许留名。
心游净域愁难入，目想灵山梦亦清。
圣代会酬明主惠，云林相与论无生。

按，阮思道，字元恭，建阳(今属福建)人。南唐进士。入宋后为史馆检讨，历知绍、衢、永三州(《建阳县志》卷七)。《全宋诗》卷一四载其诗二首。沈日道未详，当即阮思道之讹。

第六句见于和嵘诗：

华严净行许披寻，珍重吾师化导深。
红药阶边虽系迹，白莲社里愿归心。
情均慧远招多士，道胜庐山列二林。
灵鹫峰前遥稽首，幸因星使寄巴音。

按，和嵘(951—995)，字显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淳化三年(992)，知制诰。至道元年(995)，与王旦同判吏部诠。《宋史》卷四三九有传。《全宋诗》卷五五载其诗一首。

第七句见于杜惟一诗：

浮生扰扰利名间，觉性迷昏嗜欲缠。
不向空门求解脱，更于何处结因缘。
师容参预西湖社，吟惠清奇大雅篇。
企望升堂为弟子，坚持净行答高贤。

按，杜惟一，大中祥符间曾任库部郎中(《江西通志》卷四六)。《全宋诗》未见其人其诗。

又如卷二《和书状官晁嶷诗》第五、六句"细思西掖吟红药牛冕，何似东林种白莲王禹偁"。第五句见于牛冕诗：

脱落风尘愧昔贤，祖师消息未能诠。

尽思西掖吟红药，谁肯东林种白莲。

轩冕也知身外物，利名争禁世间缘。

会须一报君恩了，去结刘雷学坐禅。

按，牛冕(945？－1008？)，字君仪，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咸平元年(998)知益州，仍拜右谏议大夫。《宋史》卷二七七有传。《全宋诗》无牛冕其人其诗。

第六句见于王禹偁诗：

梦幻吾身是偶然，劳生四十又三年。

任夸西掖吟红药，何似东林种白莲。

入定雪龛灯焰直，讲经霜殿磬声圆。

谪官不得余杭郡，空寄高僧结社篇。

按，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宋史》卷二九三有传。《全宋诗》卷五九收其诗十三卷及部分残句，《全宋诗订补》补三首另残句一则。此诗载《全宋诗》卷六六(第757页)。

有出于别集者。据学者统计，《百家衣集》采纳白居易诗220次，杜甫104次，欧阳修82次，苏轼75次，王安石55次，王禹偁51次，李白42次，苏舜钦31次[①]，这些诗句当出自别集。

采纳唐人别集之例：

●卷一《暮春夜直都省》“小睡知年长白居易”，为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中句。见《白香山诗集》卷二十二。“小”作“少”。

●卷一《暮春夜直都省》“寂寂春将晚杜甫”，为杜甫《江亭》中句。见《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二。卷一《秋日途中》“洮云片片黄杜甫”，为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句，见《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卷一《和狼川县客舍留题》“墙燕语留题杜甫”，为杜甫《发潭

①前揭琴知雅《林惟正〈林祭酒百家衣诗集〉研究》，372页。

州》中句。见《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五。“墙”作“樯”。

●卷一《咏雪》“雨余山态活杜牧”，为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中句，未见总集、类书称引，当出自其本集。又如，《和彭学士祖逖题静边镇清远阁二首》其二“暮霭生深树杜牧”，为《题扬州禅智寺》句。

●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二“岩花落又开权德”，为权德舆《奉送韦起居老舅百日假满归嵩阳旧居》中句，见《权文公集》卷四。

●卷一《江头晚望》“花落鱼争唼韦庄”，为《李氏小池亭十二韵》中句，见韦庄《浣花集》卷五。“唼”作“唼”。

●卷一《秋日途中》“病容经夏在贯休”，为《上俞许二判官》中句，见贯休《禅月集》卷七。又，《渡朔宁县南江》“撑船碧江上”，为《上冯使君五首》其一中句，见《禅月集》卷四。

●卷一《见德城即事》“酒熟思才子钱起”，为《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中句，见钱起《钱仲文集》卷四。

采纳宋人别集之例：

●卷一《题元兴镇涤暑亭》“主人殊爱客司马光”，为司马光《又赠谓之》中句，见《传家集》卷六。又，《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一“冷冷林下风”，为《和景仁题崇福宫》中句，“林”作“松”，《传家集》卷九。卷一《江头晚望》“春雨亦多情司马光”，为《重景仁思归雨未克行以诗留之》中句，见《传家集》卷十。又，卷一《秋日途中》“云低秦野阔司马光”，为《重过华下》中句，见《传家集》卷九。

●卷一《宫中四景·冬》“严风生北户魏野”，出自《东观集》卷五《暮冬郊居怀李安》。又，《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二“池塘分御水魏野”，为《寄题石都尉林亭》中句，见《东观集》卷三。

●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二“危坐思悠哉寇准”，为寇准《秋夜独书勉诗友》中句，见《忠愍集》卷中。

●卷一《和铁川客舍留题》“奔走倦尘埃张耒”，为张耒《青阳驿会刘伯声夜话》中句，见《柯山集》卷十四。

●卷一《和洞仙驿留题》“伤春欲语谁王逢原”，为《庭草》中句，见《广陵集》卷十四。

●卷一《题元兴镇涤暑亭》“林迥鸟能啼洪龟文”，为洪朋《题大梵院小轩》中

句，见《洪龟父集》卷下。

●卷一《题元兴镇涤暑亭》"野色兼山远宋祁"，为宋祁《春郊晓野》中句，见《景文集》卷九。

●卷一《秋日途中》"山闭楚祠荒欧阳永叔"，为《送丁元珍峡州判官》中句，见《文忠集》卷十。

有出于诗话者。由于诗话引录常与总集、类书重合，其究竟引自何书，多不易究诘。其中可以确定者为《唐诗纪事》。如卷一《蜗舍偶题》"但将忠报主薛彦辅母林氏"，为《唐诗纪事》卷七八"薛彦辅母林氏"条所载林氏《送男左贬诗》中句。又如卷一《闵承制宅筵中赠妓》"歌声胜管弦郑还古"，见《唐诗纪事》卷四八"郑还古"条。

本节考察林惟正的引诗来源，确认了他征引了类书、总集、别集、诗话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利用《百家衣集》考察中国文学东传高丽的史实时，需区别对待，不能因《百家衣集》提及，即视为当时原集尚存。此外，如本文第二、第三节所示，《百家衣集》存有大量唐宋诗人佚句。除了采自本集外，尚可能采自一些唐宋诗总集或类书，可惜它们大多已经失传，无法覆按。

二、《百家衣集》所载唐人佚句续补

笔者此前曾据《百家衣集》辑出唐人佚句百余则，然尚有遗漏，今加以补录。

蒋防：俄符圣寿长。（卷一《宫中四景·秋》）

卢肇：幽涧迷松响。（卷一《咏雪》）

（幸）寅逊：松声寒似雨。（卷一《暮春夜直都省》）

法振：卧入武陵花。（卷一《湍江即事》）

　　清风起绿波。（卷一《题临津县客舍留题》）

方干：远水碧千重。（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二）

　　水气湿渔村。（卷一《题龙津镇临海山楼》）

朱存：茫茫古与今。（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二）

此意与谁同。(卷一《重阳日寄李同年》)

摘药香生子。(卷一《暮春早发高城县》)

望望连南北。(卷一《和李郎中海门秋兴》)

无本:驿卒半篇师。(卷一《和兴义驿留题》)

逸人居处似桃源。(卷二《夏初三日郊亭即事》、《题董文功书斋》)

醉乡无处不桃源。(卷二《和张学士题王轮寺清凉洞心源房洞虚轩》)

绿杨芳草为谁好。(卷二《和漳州客舍留题》)

翰墨成功未有缘。(卷二《书情》)

碧松阴下苍苔地。(卷三《复次韵八景清凉洞・浴泉》)

齐己:遥岑耸绿鬟。(卷一《和云林镇客舍留题二首》其二)

系马江头草。(卷一《和王城江客船吴使臣世文留题》)

到头传写新诗句。(卷二《和长州客舍王相国度留题》)

长安千里路岐赊。(卷二《和静边镇客舍留题四首》其三)

(杜)荀鹤:花藏一径寻。(卷一《和廉学士留题道昌寺》)

熊皎:待月露沾衣。(卷一《蜗舍偶题》)

千古悠悠竟不回。(卷三《和三陟县客舍八咏・水》)

(郑)云叟:眼前多胜景。(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二、《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一、《和王城江客船吴使臣世文留题》)

扫花香在帚。(卷一《和廉学士留题道昌寺》)

满眼是幽趣。(卷一《题白学士东江别墅》)

桃源在何处。(卷一《东溟即事》)

李洞:又许笙歌伴酒筵。(卷二《和春州韶阳江客船上先公提按时所题》)

(幸)寅逊:远峰高处子规啼。(卷二《题西村场》)

赵嘏:几纵高歌留野客。(卷二《题石先生郊居》)

无则:隔林寒笛三两声。(卷二《江天晚望》)

竹杖芒鞋称野情。(卷二《题汉南旅舍》)

草湿烟村暴雨晴。(卷三《早秋闻蝉有感》)

今人无奈太多情。(卷三《又赠歌妓》)

旅馆萧条忆故林。(卷三《和临津县客舍留题二首》其二)

高骈:逡巡好上高楼台。(卷二《和长平镇客舍楼崔相国留题》)

孙鲂:白云何事为关锁。(卷三《复次韵八景清凉洞·小径》)

春去秋来小苑中。(卷三《和锦城法轮寺八咏三感·松》)

来鹏:唯恐宾朋兴尽归。(卷三《复次韵八景清凉洞·小径》)

钱起:几人疑是画屏风。(卷三《和咸同年净因寺感怀八首》其三)

上述佚句中,不少诗人作品存世极少,如法振存诗十六首二句,熊皎存诗十首及断句五联,无则存诗三首,朱存存诗十七首,一些名家如方干、齐己、钱起也存有佚句,颇为珍贵。

三、《百家衣集》所载宋人佚句续补

《百家衣集》存有大量宋人佚句,兹以卷一为例,续加补录。

张子方:冰盘消酷暑。(卷一《宫中四景·春》、《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二)

平江细雨来。(卷一《和李学士知深奉题洪川资福寺二首》其一)

杨杰:岩泉入户鸣。(卷一《夏日与兄弟游花藏寺》)

赵企:款曲话诗情。(卷一《夏日与兄弟游花藏寺》)《全宋诗》存十九首。

鲍刚:迢迢夜未央。(卷一《暮春夜直都省》、《题洪川奉福寺》)

(姚)舜谐:无眠信夜长。(卷一《暮春夜直都省》)

水树烟云里。(卷一《山斋二首》其二)

孙何:古郡与江邻。(卷一《和长湍县客舍留题》)

小诗聊遣兴。(卷一《耀德城重九日寄尹侍郎》)

华发为愁生。(卷一《崔都统诜题长平镇东楼》)

億之:绵绵草织荫。(卷一《和长湍县客舍留题》)

迎春复送春。(卷一《和长湍县客舍留题》)

闲若洞中仙。(卷一《和洞仙驿留题》)

野阔连天远。(卷一《题临津县客舍留题》)

杨皤:欲问仙源事。(卷一《湍江即事》)

终是恨才轻。(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一)

暗草通溪远。(卷一《和洞仙驿留题》)

千流会一溪。(卷一《题元兴镇涤暑亭》)

游乐及新晴。(卷一《江头晚望》)

槛外青山叠[1]。(卷一《见德城即事》)

此中多逸兴[2]。(卷一《和骊江禅院留题》、《和诸元帅和州北楼留题》)

暗草通溪远。(卷一《和通驿留题》)

题诗愧不工。(卷一《和通驿留题》)

开轩妆草树。(卷一《和金壤县客舍留题赠邑倅》)

山深高阁寒。(卷一《题城北文殊寺独斋》)

欲赋难为情。(卷一《和隘戎镇银所客舍留题》)

风梗立蜻蜓。(卷一《东溟即事》)

刘旼:佳节值重阳。(卷一《耀德城重九日寄尹侍郎》)

且尽登临兴。(卷一《远眺》、《题临津县客舍留题》)

胡真儒:烟光割眼明。(卷一《崔都统诜题长平镇东楼》)

王孟(刘延世):公馆何萧索。(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一)

(朱)敦儒:恨无倾海力。(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一)

李郊:波远舟浮叶。(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二)

---

①此诗署名“杨公济”。齐已《白莲集》卷七《怀金陵知旧》有“城外青山叠”句,与此句相似。

②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有此句,见《李太白文集》卷十三、《文苑英华》卷二六九。

客舍独含情。(卷一《和积城县客舍留题》)
沙明浪浸星。(卷一《东溟即事》)

谢逸:帘疏月镂金。(卷一《和金学士题龙津县小楼二首》其二)

毕公叔(仲游):松柏千年色。(卷一《题龙津镇临海山楼》)

杨徽之:携琴上古台。(卷一《和彭学士祖逖题静边镇清远阁二首》其一)

林深鸟不惊。(卷一《江头晚望》)

石延年:物外断尘埃。(卷一《和彭学士祖逖题静边镇清远阁二首》其一)

王震:春江涨新绿。(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一)

毛友:地僻柴桑古。(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一)

夏倪:涧深花草香。(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一)
此地真奇绝。(卷一《和李学士知深奉题洪川资福寺二首》其二)

(王令)广陵集:流岁去堂堂。(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一)

郭震:更有堪怜处。(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二)
碑镌置寺中。(卷一《和骊江禅院留题》)
舍在白云里。(卷一《题东林寺》)
箧里诗千卷。(卷一《题临津资福寺》)
摩将白髭须。(卷一《和李郎中海门秋兴》)

萧悫:泉鸣知水意。(卷一《赴耀德镇次和宝龙驿留题二首》其一)

张潔:山昏雨欲来。(卷一《和铁川客舍留题》)

李朴:野花空胜锦。(卷一《和铁川客舍留题》)
落日长亭畔。(卷一《秋日途中》)
野艇萦风去。(卷一《和李学士知深奉题洪川资福寺二首》其二)

(范)景仁:春水绿于苔。(卷一《和铁川客舍留题》)

(苏)舜钦:长途万里余。(卷一《和铁川客舍留题》)

张会川：忘忧唯有酒。（卷一《和兴义驿留题》）

　　寒林闹暮鸦。（卷一《和临津县客舍留题》）

范文正：浓烟冷四陲。（卷一《和兴义驿留题》）

清晦：鸟道穿山色。（卷一《和洞仙驿留题》）

陆经：揽辔独依然。（卷一《和洞仙驿留题》）

石延年：一阁见千里。（卷一《题元兴镇涤暑亭》）

　　水澄天影闲。（卷一《和云林镇客舍留题二首》其一）

俞（喻）迪孺：数峰山远近。（卷一《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一）

吕本中：云横树荫浓。（卷一《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一）

柳开：难遣酒樽空。（卷一《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一）

　　幽禽往复还。（卷一《和云林镇客舍留题二首》其一）

　　登临眺望宽。（卷一《题城北文殊寺独斋》）

　　四海掌中看。（卷一《题城北文殊寺独斋》）

　　他乡似故乡。（卷一《复次耀德镇修制房分道时留题韵二首》其一）

　　客情终若何。（卷一《复次耀德镇修制房分道时留题韵二首》其二）

　　爱月从窗破。（卷一《春兴》）

　　上有明天子。（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清光下翠檐。（卷一《访礼安江弥陀寺》）

元惇：嘉气晚来浓。（卷一《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二）

刘安世：清吟竹影东。（卷一《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二）

蔡蕤：菡萏散香风。（卷一《应制避暑小阁二首》其二）

孙何：诗思入秋狂。（卷一《秋日途中》）

　　风定落花闲。（卷一《和云林镇客舍留题二首》其二）

　　波涛四面声。（卷一《秋晚重游复次前韵》）

李师中：山远烧如灯[1]。（卷一《见德城即事》）

---

①魏野《东观集》卷三《冬暮郊居》有“远山烧如灯”句。

邢敦夫：一瞬一回颠[1]。（卷一《和杨县客舍留题》）

清灯挂高壁。（卷一《秋夜入直都省偶题壁上二首》其二）

日落雨初霁。（卷一《和洪川县客舍留题》）

爱兹尘外境。（卷一《题临津县客舍留题》）

种放：惊禽鸣更巧。（卷一《和杨县客舍留题》）

寻溪得幽径。（卷一《和嘉平县客舍留题》）

孙仅：题名记岁华。（卷一《和杨县客舍留题》）

宋庠：可惜芳春晚。（卷一《渡朔宁县南江》）

范景仁（镇）：苍烟着迥林。（卷一《渡朔宁县南江》）

瀑溅安禅石[2]。（卷一《和骊江禅院留题》）

陈充：使君垂雪鬓。（卷一《和云林镇客舍留题二首》其一）

悲秋长病颜。（卷一《山寺感怀》）

客舍无人到。（卷一《题文州客舍》）

石曼卿：澄心掩竹扉。（卷一《蜗舍偶题》）

滕子京（宗谅）：誓不与心违。（卷一《蜗舍偶题》）

沈括：锱铢视万锺。（卷一《题山居》）

曾纡：水鸟避人没。（卷一《和嘉平县客舍留题》）

山花迎棹开。（卷一《和李学士知深奉题洪川资福寺二首》其二）

江阔风来远。（卷一《和连谷县客舍留题二首》其一）

僧简长：行行吟此景。（卷一《和嘉平县客舍留题》）

赏心持一杯。（卷一《和李学士知深奉题洪川资福寺二首》其二）

王承可（王铁）：奔云低带雨。（卷一《和嘉平县客舍留题》）

宋白：碧空犹未雁。（卷一《龙津镇通溟楼即事》）

曹纬：山木自生风。（卷一《和和通驿留题》）

磅礴解衣处。（卷一《夏日游甘露寺和诸公留题》）

---

①《唐诗纪事》卷七三载贺知章《放达》诗有"一醉一回颠"句。

②此句与《天台续集》卷下僧秀登《送小白上人归华顶》首句同。

王洙：一樽浮绿蚁。（卷一《山斋二首》其二）
黄晞：远屿迎潮没。（卷一《山斋二首》其二
王操：待月行苔径。（卷一《重阳日寄李同年》）
沈伸（绅）：愁思醉中宽。（卷一《题临津资福寺》）
吴千秩：昌朝戬谷秦。（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庚歌乐舞辰。（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二）
韩忠彦：千箱登黍稌。（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彭汝砺：恩随雨露新。（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王武仲：讵识发生仁。（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群生入大钧。（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二）
李颉：圣明乾坤像。（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二）
舒亶：庶汇荷陶钧。（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陈谔：皇恩何以报。（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二）
刘汇：万灵徒仰戴。（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一）
周邠：荐祉符高荚。（卷一《贺圣朝二首》其二）
鲜于侁：万寿祝君王。（卷一《题洪川奉福寺》）
孙授：岭隔秦云险。（卷一《和牛头山文殊寺留题》）
李元应（膺）：萧萧秋夜深。（卷一《和洪川县客舍留题》）
曾子宣（布）：踈树透山光。（卷一《和康先生日用福灵寺观音赞诗》）
许表民：湖水澄为镜。（卷一《暮春早发高城县》）

以上所补诗句，以杨蟠为最多，达十三句。按，杨蟠有《章安集》，今已佚，《全宋诗》仅录诗一卷。《百家衣集》存其佚句甚多，当采录自原集。其次为柳开，九句。按，《宋史·艺文志七》有文集十五卷，《全宋诗》仅录诗八首，柳开诗存世极少，此数则佚句，颇为珍贵，当出自于柳氏文集。有些诗人之名不见于《全宋诗》、《全宋文》，如鲍刚[①]、刘旼、萧懋、李颉、刘汇等，显得十分珍贵。

---

①《万姓统谱》卷八十四："鲍刚字弱翁，括苍人。少负大节，善属文，尤长于诗。始举进士，不第，即毅然曰：此非吾所学也。遂徜徉于东南山水间。俗事略不关意。"又，《浙江通志》卷一八二亦载，所据为嘉靖《浙江通志》，与《万姓统谱》基本相同。

四、《百家衣集》是东亚现存最早的集句诗集

以上主要围绕《百家衣集》的文献价值，特别是辑佚价值进行了考察。如果在整个汉字文化圈来看，这部书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弄清楚该书的成书时间。林惟正的生卒年，今不可确考。许兴植先生根据其交游，认为他大概出生于12世纪中叶，卒于12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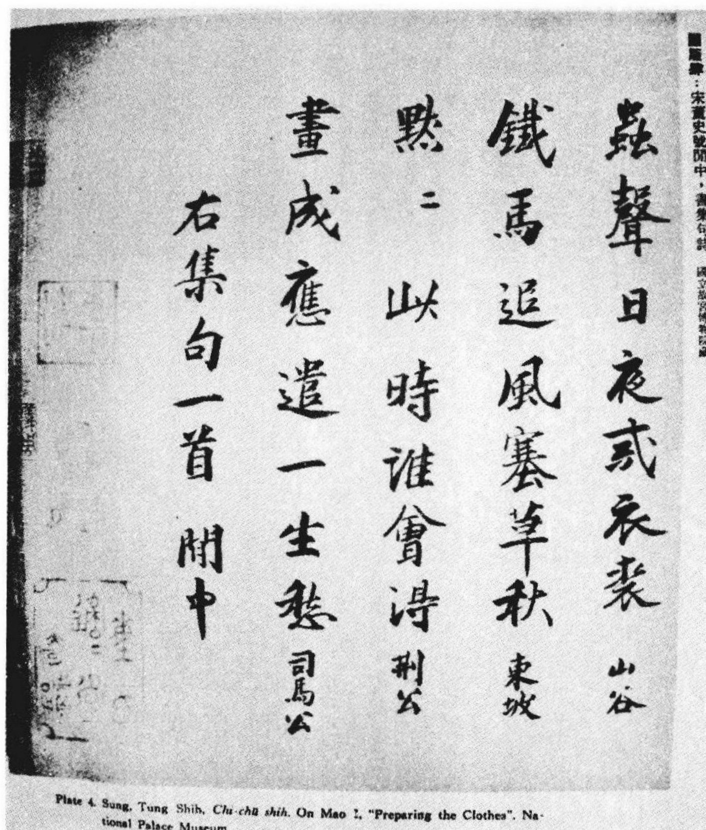


图3 宋董史书集句真迹（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①

①董史，字更良，号闲中老叟。理宗时编有《皇宋书录》。《全宋诗》卷3127（第59册）存《题米元章书迹拓本》诗一首，此集句诗见《故宫季刊》第九卷第一期（1974年），可补《全宋诗》之阙。

纪末叶[①]。为该书作序的赵文拔卒于1227年,则使该书的刊刻下限得以确定。

先来看中国。集句诗以晋人傅咸所作集经诗为最早,然至宋代始为流行,石延年、王安石等人均有集句之作。南宋集句诗存世较多,其中董史所书集句,是现存最早的集句诗真迹(图3)。然以专集流传者甚罕,今存者仅南宋数家而已。其中较早者,如李龏《梅花衲》一卷,今以《江湖小集》本为常见。该书刘宰序作于宝庆丁亥(1227),其诗作撰写时间当略早于此,显晚于林惟正之作。李龏另有《剪绡集》二卷,录诗一百十八首,亦为集句诗集,有《江湖小集》本,作时不详。此外,释绍嵩的《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七卷,存诗三百七十六首,为南宋集句诗作数量最多者。其成书时间,据其自序,知成于绍定已丑(1229)年间,亦晚于《百家衣集》。南宋最优秀的集句诗集,当为文天祥的集杜诗四卷,收五绝二百首,作于文氏晚年,时间远不逮《百家衣集》。

再来看韩国。林惟正虽不是最早的集句诗人,但他的《百家衣集》无疑为最早的集句诗集,其他高丽诗人仅存数句而已。此后至朝鲜时代,有金时习(1435－1493)的《山居集句》百首、金堉(1580－1685)的集杜诗二百十八首、全克恒(1591－1636)的集句诗五十首、文骏声(1858－1930)集句诗三十首。

再来看日本。和歌中的"本歌取",似乎曾受集句诗的影响[②],但平安后期、室町时期,未见有专门的集句诗集流传。江户时代日本汉文学创作中虽有集句诗、集句文[③]以及集句诗集的创作[④],但迄今尚未发现堪与《百家衣集》媲美的集句诗集。

---

①《季刊书志学报》第13辑。

②山岸德平,《本歌取と集句詩》,《诸桥博士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953。

③集句文罕见。近来笔者又发现宋人所作集句体小说,见拙作《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又收入拙著《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④山岸德平《论集句诗》(《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2号,1979。又收入《山岸德平著作集2·和歌文学研究》,有精堂昭和四十六年版)。《日中文化研究》(1,1991年)。此外,德田武的《野村篁園の集唐詩》(后以《野村篁園の集唐詩と清客の批評》为题收入《日中文化交流史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2004。)发现了野村篁园一百三十七首集唐诗。

由以上所举事实来看，《百家衣集》不仅是韩国集句诗集之祖，而且是东亚现存最早的集句诗集，在汉字文化圈中也同样值得重视。

2009年5月21日初稿于东京

【附记】

本文曾在日本第十三届宋代文学研究谈话会上报告，藉此机会向内山精也、浅见洋二等先生表示感谢。东国大学所藏抄本影印件由研究生朴旨彭代为复制，也向他表示感谢。

关于阮元的两条资料

——论阮元晚年的思想倾向

李　庆

这里有两条关于阮元(1764－1849)的资料,似还未被国内学界重视(如《阮元年谱》未收)。所以想略作介绍,并以此为焦点,对阮元和朝鲜等国的交往,他晚年的思想倾向,以及嘉庆、道光间中国学术的局限性,作一点探讨。

一、两条资料及有关的考证说明

其一,阮元给朝鲜学者权敦仁写的一幅字,有曰:

道光八年,粤中学海堂《经解》刻既成,夏观察寄《序》来滇请正。予稍增删之,其末句云"益见平实精详矣",则予所加也。平实精详,一部《经解》之要语也。平则不骛高远而切问近思,实则不落空虚而好古求实,非明辨则不能精,非博学则不能详。即如荀子者,学出孔门,受授诸经,尤传《诗》《礼》(见《经解》中汪容甫先生书内),而韩昌黎斥为择而不精,语而不详。盖昌黎但知文而不知经者也。《易》奇《诗》葩,不过择其词语为文之资而已,非余所谓精详也。(后有"阮元之印",朱文方章)

作者单位:日本金泽大学

此文原载日本《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富山房,1936),关于服部宇之吉的生平和主要情况,可参见拙著《日本汉学史》[①]。

为了省得大家查找,简单地把有关的人物和事件,按上文中出现顺序,作一点说明。

阮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关于其生平事迹,近年多有研究,不赘[②]。

学海堂,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学海堂课,道光四年(1824),始建堂粤秀山上[③]。《学海堂经解》一千四百余卷,又称《皇清经解》,名为阮元主编,实际主其事者为严杰。汇刻清初至道光以前人的解经著作,共约180余种,大体依作者先后为序。道光九年完工。关于《学海堂经解》所收作者人数和著述种数,道光本,咸丰、同治年间的两种补刊本,并不一样[④]。

夏观察乃是夏修恕。夏修恕,嘉庆七年(1802)进士,在翰林院供职。嘉道间诗人,"宣南诗社"成员,有诗作留存。夏修恕曾到肇庆任职。后曾修《思南府续志》。时为广东粮道,负责刻印《学海堂经解》。而阮元于道光六年调任云贵总督。此后道光九年始刊刻完毕。

"汪容甫先生书",《学海堂经解》收有三种:《述学》、《经义知新记》、《大戴礼记正误》。"荀子者,学出孔门,受授诸经,尤传《诗》、《礼》"(见《经解》中汪容甫先生书内),汪中之说,见《述学》"拾遗"中所收的《荀卿子通论》。有曰"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该论叙说了荀学的流变,还编有《荀卿子年表》。

韩愈论荀,见《韩昌黎全集》卷十一《读荀》,有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荀况)与扬(扬雄),大醇而小疵。"(《韩昌黎全集》卷十一《读荀》)又《原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

①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506页。

②见《清史稿》,又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

③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1934年第3期,20—21页,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218页。所论时间,略有出入。

④参见上海社科院虞万里的《正续皇清经解编纂考》注释83,载所著《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18页。

(《原道》,同上书)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

汪喜孙是汪中之子,编印《汪氏学行记》,顾千里参与其事①。

权敦仁(1783—1859),字景羲,号彝斋。他是朝鲜大学者宋尤庵的大弟子权尚夏的五世裔孙,官至领议政。权尚夏,是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家。权敦仁曾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道光十六年(1836)两次以使者的身份来北京,得以与汪喜孙结交,有书信往来。

权敦仁得此以后,非常珍视,曾给金阮堂看过。

朝鲜的学者金阮堂,权敦仁(号彝斋)等和阮元之子等有着交往。通过这个渠道,朝鲜得到了由阮元编纂的《皇清经解》等书籍。时在道光十二年(1832)前后②。

这样,关于此条资料的有关人物和背景就可以比较清楚了。

其二,和程恩泽的谈话。

> “岁出洋银,或云千万。”仪真(庆按:当作征,音近所致。)相公云:“过其辞也,不过五六百万。然洋钱亦自外而入,乘除之尚不至二三百万。然不可久,久则中国之储竭矣。”
>
> “英吉利陆战则弱,然以舟师疲中国守御,则为优之。此际有匪徒乘衅而起,则成大患,故不敢动云绝交也。”

这是程恩泽“丙申九月十七日,与仪真相公话,退而录之”的话,当为可靠③。“丙申”,当是道光十六年(1836)之事。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九年(1804)中举,十六年(1811)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1821)值南书房,累迁侍讲学士,为经筵讲官。曾任四川、广东主考官,贵州和湖南学政

---

①见李庆著《顾千里研究》200页以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近年杨晋龙编有《汪喜孙集》,可以参照。

②见日本藤塚邻《金阮堂和阮芸台父子》,载《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东京:富山房,1936,843—857页。

③《程侍郎杂著辑录》,载《中和月刊》第二卷,香港:存粹学社影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1978,361—377页。

等职。任满回京，选国子监祭酒，为工部侍郎，卒于任上[①]。这当是在北京任上的话。

二、这些资料反映的阮元的晚年思想倾向

从上述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学海堂经解》的一些情况：《序》，出于阮元手定，他对当时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看法。还有，这是写给朝鲜学者的，反映了当时清朝和朝鲜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这些，前面所引的藤塚邻之文，已经有所考述，不再赘引。当然也可再研究。然而在此，主要是想从研究阮元的晚年思想状况的角度，作一点探讨。

首先是对于传统的经学，阮元有着相当的自信心。有意识地向海外传播已经精熟的儒家解经之作。不要说对于朝鲜半岛的学者呈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诲气度——你要《经解》，那就拿一套去。就是对于韩愈这样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儒，被前人尊奉的贤者，也不在眼下。

其次，对于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但是，没有深入研究。

关于阮元晚年对当时横行世界的大英帝国的威胁，持怎样的认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有事前的准备；一种认为他反对林则徐禁烟。而上述资料，可以看到他对当时中外关系的一些基本看法。

早在嘉庆年间，阮元就预感到了外患的潜在危险，在《清史稿》本传中，说他"迭疏陈预防夷患"，且列有他的上疏大略："英吉利持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有关的《疏》文，在《揅经室集》中未载。）正如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叙》中说，他看到了"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

他不仅议论，而且有着未雨绸缪的实际努力，于嘉庆"丁丑"（1817）"乃择于大虎山筑建炮台"[②]。他在所撰《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中曰：

"丁丑冬，出海视察，方今海宇澄平无事，于此，此台之建，聊复尔耳，然安

①见《清史稿》本传。又，其文集有《程侍郎文集》，收入《粤雅堂丛书》，为何绍基等编次。

②见仰弥《阮文达事述》，香港：存粹学社影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1978，318页。

知数十年后，不有惧此台而阴弥其计者？数百年后不有过此台而遽取其败者？”[①]

二十二年后，林则徐败英军于此，阮元当有建台之功。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一些，不到百年，中国就遭到了外来干涉。他对于英国，对于当时正在激烈变动的世界，缺乏认识。

最后，对于当时和社会经济有关的国际贸易问题，有自己的估计。上述资料中说："岁出洋银，或云千万"，这可以说，是当时朝廷中流传的估计。阮元认为当务之急，是防止国内的民变，而不是和外国的纠葛。道光二十二年许乃济上书，主张"弛禁鸦片"之说，得到阮元的支持，和他这样的基本判断，有着一定关系[②]。对于这时的外贸，主要是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多有议论。1838 年，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上了颇为著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其中指出，鸦片输入导致巨大白银外流，危及国家。这成为后来"禁烟"的导火线之一[③]。

从上述资料看，在此之前，阮元等朝臣其实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问题是如何处理，阮元和当时黄爵滋奏折的判断不一样。如何看待禁止鸦片和阮元当时的处置，也有不同说法。梁章钜《浪迹丛谈》记载了他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广东的作为。近人萧一山《清代通史》、魏应祺《林文忠公年谱》则根据《鸦片始末》等书记载，认为阮元"疏禁鸦片"、"严驭洋商"，后又有秘密奏折，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酿成大错[④]。而《剑桥中国晚清史》则认为他在1820 年取缔了鸦片贸易[⑤]。如何评价，还可以再讨论。

三、从有关的资料看阮元思想的局限性

上述资料，一是 1832 年，一是 1836 年，这都是阮元六十岁以后的事。

---

①阮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揅经室二集》卷七，《四部丛刊》本，327 页。

②参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10 页。

③对此疏，据《江西日报》报道，在宜黄县黄爵滋后裔处，发现了定本手迹。又，近年有些学者对于黄氏的判断有不同的看法，可参见贺力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兼论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1 期。

④见仰弥，《阮文达事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318 页。

⑤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6 页。

对于阮元的学术和评价，龚自珍有《阮尚书年谱第一叙》（考文中有“今皇帝御极之三年”，当是道光三年，即1824年之事）。后来的评介，似乎都没有超越该《叙》的范围。当时读此，感觉奇怪，“第一叙”？那么有“第二叙”、“第三叙”吗？没有。龚自珍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呢？

今日看来，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阮元思想的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首先从研究的视野来看

众所周知，18世纪，西方涌现了狄德罗、魁奈、杜尔哥、伏尔泰、卢梭等一批影响了人类进程的启蒙思想家，揭开了人类思想史新的一页。这些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不仅关注自己所在的欧洲，而且有着世界的视野，关注亚洲，关注中国。比如，狄德罗对中国所谓的“女娲”、“伏羲”的传说进行了理性的批判，认为那是一种“荒诞无稽”之谈。对中国“停滞”的原因，进行了探讨[①]。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②]。但是，阮元则比较狭隘。他当时甚至还认为，英国大兵上了岸，连腿都弯不了，随便什么人，拿根棍子就能把他制服[③]。

2.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

对于世界新技术的认识。有的学者指出，阮元和他的门生程恩泽对于西方的技术有所关注。（参见上引《程侍郎杂著辑录》）但是毕竟只限于个别技术，从其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视。否则就用不到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开战后，还要浙江一带提供乃至寻找早就传入我国的有关西方大炮的制造技术和战法的书籍了[④]。他也编撰了《畴人传》，还收了四十一个外国人，然而其《赠周朴斋治平》诗曰：“中法原居西方先，何人能测九重天。”[⑤]反映出一种天朝大国的“自大”心态。没有从世界的角度详细研究的意向。翻阅《揅经室集》，很少涉及世界的新思潮、新科技和新文化。或许是仅有的一点吧，讲到了西方的自

①后藤末雄著、矢泽利彦校订，《中国思想的法兰西西渐》第2册，东京：平凡社，1994，129页，132页。

②参见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20页以降。

③上引《程侍郎杂著辑录》，香港：存粹学社影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1978，377页。

④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4页。

⑤阮元，《揅经室四集》，卷四，493页。

鸣钟，有曰："自铭钟来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还忘不了带上一句："此制乃古刻漏之遗，非西洋所能创也。"[①]

3. 从对于研究成果的应用来看

对于人的关注，虽然理论上探讨了，但是缺乏对策实践。有人说，在研究上，他继承了戴东原的思想，这固然可以再讨论[②]。他的《论语论仁论》，确实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那样，注重对具体的概念的考释[③]。他追究的是"仁"这一汉字和这一概念的历史展开过程。"夏商以前无'仁'字"，甲骨文中没有这个字，最早出现，当在西周。又对"仁"的内涵，尤其是孔子、孟子的解释，进行了论说(分别见(《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卷八；《孟子论仁论》，《揅经室集》卷九)。又在《性命古训》(《揅经室集》卷十)、《塔性说》(《揅经室续集》卷三)等文章中，对"性"、"情"、"欲"等进行了探讨。

可见，在18世纪，中国和正在走出中世纪阴影的西方，在关注和分析"人性"，肯定"情"、"欲"等的观念上，或许还没有过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在观念层次，也关注到人性问题。但阮元的研究，没有把戴东原对"人性"的解说与"情"和"欲"具有的合理性的思想[④]，朝着具体社会的方向，进一步探讨下去。而是到此止步，甚至有把戴震思想"形骸化"的倾向[⑤]。和西方相比，中国学者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理念层次，没有表现为一种改变社会状况的实践展开。

正如龚自珍曾指出的，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那是不行的[⑥]。

4. 从思想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

相对于西方思想的系统性而言，阮元等的思想，表现为个别的结论，在各

---

①阮元，《自鸣钟说》，《揅经室三集》，卷五，412页。

②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王国维遗书》影印本，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82页。对此，学界似有不同看法。

③阮元，《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卷八，95页。又《清儒学案》卷一二一，《仪征学案》条下。

④参见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等著，《气的思想》，李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61页。

⑤参见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的思想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2004，546－547页。

⑥清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殿试《对策》，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14页。

个点面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体系，仅仅是片段性的，缺乏可以实践的具体方法论。在走向体系性和实践性的层次，东西方学者有关人的观念的研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于是，有了龚自珍的呼号："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第125首)

《阮尚书年谱第一叙》中说，在十年后，再为阮元写叙("俟公七秩之年""当更叙之")，但是，十年后，他没有写。道光十八年(1838年)，阮元七十五岁(庆按：实际为七十四)，他"以老病致仕"，龚自珍还是没有写。第二年(己亥年)，他自己也出京回家。《己亥杂诗》的最后一首曰："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这时的龚自珍，似乎已经没有了再激愤的冲涌和再挥笔的热情，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①]。龚定庵的愤懑、激昂和悲哀都是有道理的。他还能怎么写呢？

四、一点感想

近年不少论著都认为，中华文明在重新崛起。那么，什么时候，中华文明在世界上落伍了，沉沦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多。在此不想进一步展开讨论。就我个人的看法，落后的源头或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而真正在世界上失去话语权，被世界认为是一个没落的帝国，沉沦为"东亚病夫"，转折点就在19世纪中叶，或者说就是阮元生活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像阮元那样在中国参与决策的知识人中，在当时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自觉。上述两份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心态。

当然，也有人是意识到国家和民族在沉沦的，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龚自珍。他给予阮元以极高的评价，肯定了阮元在传统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作的努力。他的经学和文史的研究，确实给古老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点光辉。但是这并没有能够解决在百年间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阮元和龚自珍都没有找到解决突破那百年劫难的冲天之力，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社会依然在旧

①龚自珍对徐松等的评价，或许反映了他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有诗曰"夹袋搜罗海内空"、"此席今时定属公"(《己亥杂诗》四十二首)。可见此时对徐松学术的推重，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风气的变迁。

的漩涡中沉沦。于是，在阮元七十多岁时，就出现了如下的场景：

况周颐《眉庐丛话》记载，阮元"对于庸庸视肉者流，或不免为青白眼，即如晚岁恒貌聋以避俗，惟龚定庵至（龚定庵自号"羽琌山民"）则深谈竟日夕，并不时周之"。扬人士为之语曰："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据《选巷丛谭》卷二补）[①]多少有点悲哀吧？

在19世纪的30年代，在面对着前所未遇的越来越激烈的外来冲击，面对着1841年鸦片战争的战火，阮元，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还能说什么？他之所以和龚自珍谈得来，应该说，在于有着某种共鸣。或许，他们都看到自己乘坐的大船正在被船上的"硕鼠"蛀虫侵蚀破坏，又将面临外来的狂风巨浪，感到了危险。无论阮元还是龚定庵，都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策。他们是无力的。阮元的装聋作哑，仅仅是避俗，还是有点无以聊赖，苟且残生？龚自珍的悲哀和阮元的悲哀，应该是相通的。这也是19世纪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哀。

在公元纪元的两千年历史中，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国家，至少有十六七个世纪，在这个地球上，比其他国家毫不逊色。我们完全无须妄自菲薄。但从17世纪的康熙时代，被称为和西方的法兰西帝国并列于世界的"两大帝国"的辉煌，到19世纪被人鄙视为"东亚病夫"，仅仅只有100多年的时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②]历史曾给过我们这个民族以相当的时间。在给予你的时间内，你不准备，满足于田园诗的潇洒，那么在面对着早有准备的强大对手时，你失败，你倒霉，你受欺负，那你活该，谁也救不了你。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蹂躏了中国100年。我们不应无视这样的屈辱。我们应当如何记取这样的教训呢？

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所作的《序》中，开篇就说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诚然。百年之后，我们看阮元

---

①《龚自珍研究资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1页。况周颐《选巷丛谭》也载此，文字有出入（见黄裳《龚自珍二三事》所引。《读书》2005年第2期）。考阮元道光十五到十八年在北京，龚自珍也在北京任职，所以有见面的可能。

②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90页。

的学术，或许不应该把当时学术的无力完全都归到他个人头上，根本原因当然是当时专制制度的问题，然而是否应该说，整个乾嘉时代的学术，或者说整个 18—19 世纪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这百年的沉沦，也都难脱自己的那份责任呢?

现在，历史又走到了新的转折关头，中国在重新崛起。在这样的时刻，两百多年前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是否应当引以为戒呢? 否则，研究学术史还有什么意义?

红楼其神　燕园其魂　兼收并蓄　洋粹为鉴

——试论北大图书馆有关中国西文珍本的收藏及研究

张红扬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珍本收藏中，有关中国的著述约有2万册。这个大多为20世纪初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书收藏既融合了京师大学堂、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燕京大学“西文东方学文库”中汉学收藏，又吸纳了中德学会、中法大学等机构的相关旧藏，其中尤以燕京大学的中国学藏书数量为最多，收藏为最完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辛勤搜求、反复研读和精心守护，它已成为嘉惠学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一、来源及发展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其109年的辉煌而又艰辛的历史过程中，百年搜寻，几代求索，形成了如今70万册西文图书的规模。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之一——京师同文馆是最早的西文图书收藏机构。同文馆建于1862年，是我国新式学校之始源。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在1862年的《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中，就有“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籍来京"之请，以备同文馆之需[1]。在 1887 年的《同文馆题名录》中已有记载，同文馆的"图书馆"——同文馆书阁时有"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2]。1902 年同文馆归并到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书阁藏书也归并于北大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同样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广为搜集西文书籍，曾通过请各国驻华公使馆购书、派人出洋购书、请大学堂洋教习购书及请国外书商购买等方法采购西学图书[3]。其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老北大图书馆更是注意收藏西学图书。据 1948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统计显示，当时书刊总量达到 724894 册(其中中文藏书达到 530104 册，西文藏书达到 128104 册)，名列中国高校藏书量之榜首[4]。

1952 年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归并于北京大学，燕大图书馆的 50 万册书刊也归并北大图书馆[5]。在燕大的西文收藏中，有个著名的特藏——"西文东方学文库"。1933 年编定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指出，这个收藏是"关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的西文书籍。至 1933 年，共有 4279 册。概况中还特别指出，"这个特藏中多为孤刻珍本，为燕大特藏之始源。1928 年春，哈佛一燕京学社成立，对于该类书籍，特加注意，数量与质量，都有一定增加。"[6]燕大的工作统计表也把"东方学书"单辟一栏，以示区别，并将其中善本存放于特别图书室，此特藏为燕大图书馆的一大骄傲。在编目中，还特别在索书号上标注"O"，意即 Oriental Studies。

燕大的这个特藏是以其完备性而著称的，而其中尤以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最丰富和完备。1938 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出版了《西籍文献中之中国精选联合目录》(*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

①《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1862，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1 页。

②《同文馆题名录》第四次，光绪十三年刊，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85 页。

③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 页。

④《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103 页。

⑤《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119 页。

⑥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1933，10 页。

in American Libraries, Second Edition)[①]。它从美国的75个学术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中遴选出329种核心图书和21种期刊,由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史专家查尔斯·噶德尼(Charles S. Gardner)编辑而成。这个研究会将此目录赠予燕大图书馆,燕大馆收到后即对本馆馆藏进行查重,发现仅缺4种。承担查重工作的图书馆员在每一条目后还特别用清晰工整的黑色墨水笔添加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索书号,以方便读者在本馆查找。

1952年新北大组成之后,继承和发展了燕大的这个特藏。它把老北大原有的12.8万册西文书中的东方学文献与老燕大东方学书籍合并,并不断添加新收藏,这个工作因"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时断时续。"文革"中,这个特藏被打散进入大库,取消了其特藏的地位。2005年,北大馆将其一一从大库中提出,恢复了这个传统特藏并提供便利的对外服务,受到了校内外读者的欢迎。这个特藏目前共有约2万册书,除融合了北大和燕大馆藏外,还融入了中法大学和中德学会等机构的相关藏书以及周慕西、方志彤、侯思孟等私人捐赠中的相关藏书。

二、有关西文珍本馆藏的相关人物及研究传统

饮水思源。北大图书馆有关中国的西文珍本收藏,凝聚着百余年来的赠书人及图书馆人的心血和智慧,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珍本图书本身。

贝公赠书是"西文东方学文库"的源头之一。1933年编定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指出,西文东方学图书中最早收藏中的一部分"为前贝主教所赠"[②]。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东方学的特藏中,还能找到165册有贝氏亲笔签名的书籍。

贝施福(James Whitford Bashford,1849—1919),是美国美以美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U.S.A.)1904年至1919年间派驻中国的驻

①Charles S. Gardner, *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 Seco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38.

②《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10页。

区会督(Resident Bishop)。昔日燕大及今天北大的校长办公楼——贝公楼(Bashford Hall)就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贝施福在他14年的中国生涯中积极倡导在华基督教各教派的联合办学,为燕京大学的诞生及中国近代基督教会大学的水平的提升作出了贡献。为此,为燕京大学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司徒雷登校长特别同意以贝施福的名字命名校园的标志性建筑——校长办公楼。1998年,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出版的一部介绍中国十三所著名基督教会大学的画册介绍文字中,也再次肯定了"贝施福促成了教派合并学校的谈判,而谈判的成功直接促成了燕京大学的诞生"①。

贝施福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传教士汉学家。他写过200多种手册或文章,6本著作,《中国述论》是他关于中国最重要的著述②。该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宗教、法律、历史、习俗、观念、信仰、迷信、自然、商业、教育、清末民初的政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等。与大多数传教士一样,贝施福有文化优越感,并认为治疗中国积弱的主要药方是基督教,但作为一个自由派传教士,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文明是极其强韧的③。他的关于中国民族性的分析曾为中外著名学者所引用④⑤。在《中国述论》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他著述的目的在于"向西方阐释中国,也希望中国作家向中国阐释西方,相信这样一种交流能为和平、贸易进步和民族文明做出贡献"⑥。贝施福在他的书中还提到,他来华之后,读过的有关中国的西文书就有五百种之多⑦。贝施福在美国逝世后,在华的个人藏书遗赠燕京大学图书馆。贝氏赠书不仅标志着北大西方汉学图书的源头,而且,他的关于"向西方阐释中国,向中国阐释西方"的观点也是体现了这一收藏的初衷。如今,这个收藏见证了欧风美雨洗礼之下汉学西渐的过程,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吸纳和存取的历史。

---

①Deke Erh & Tess Johnston, *Hollowed Halls: Protestant Colleges in Old China*. Hong Kong: Old China Hand Press, 1998, p. 19.

②James W. Bashford, *China-An Interpretation*. Nashville, TN: The Abingdon Press, 1916.

③*China-An Interpretation*, pp. 43-72.

④大谷孝太郎,《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35。

⑤沙莲香,《中国国民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⑥*China-An Interpretation*, Preface.

⑦*China-An Interpretation*, Preface.

言及“西文东方学文库”的管理和保存，梁思庄（1908－1981）女士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梁思庄女士是梁启超先生之女，1930年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曾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历任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燕大馆归并北大馆以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梁思庄在精通英语之外，还通晓法、德、俄等语言，擅长西文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无论是对燕大图书馆还是院系合并后的北大图书馆的西文图书编目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西文东方学文库”特藏，她亲自参与其编目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期间，梁思庄还因此受到冲击。她的女儿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回忆道：“为了使图书数据能很好地为读者服务，妈妈不怕压力，坚持她认为正确的东西。她一贯坚持和保留使用‘东方学目录’（Oriental Books，简称O字书）和‘标题目录’（Subject Catalog）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由于妈妈坚持保留使用‘东方学目录’和‘标题目录’，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北大图书馆里顽固的守旧派’、‘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有人骂她是‘帝国主义的看家狗’等等”[①]。如今，尘埃落定，玉宇澄清，览百年馆史，燕大和北大正因为有像梁思庄女士这样兢兢业业的图书馆员，百年来的珍藏才得以传承和发扬，成为滋养无数莘莘学子的丰厚人文积淀。

在西文汉学文献的收藏和管理之外，燕大馆人和北大馆人在西文汉学的研究领域也颇有心得及成就。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业先生、曾任北大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和向达先生，就是其中杰出者。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畏怜，William），字鹿岑。福建侯官人。1910－1915年在鹤龄英华书院读书。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1923年回国后任教

①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49－152页。

于燕京大学并担任管理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一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1946年春赴美讲学。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在美国去世。

洪业先生曾在燕京大学开设"远东史"，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研究。授课时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一直叙述到到晚清英国政局的变化等等，并用英文讲授。先生一生极为重视学术工具的利用。哈佛一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是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以研究"东方学"、"亚洲学"和"汉学"为宗旨的学术机构。1930年，哈佛一燕京学社设立了"引得编纂处"专门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而编印索引工具书，洪业任主任。此后的二十年间，引得编纂处共编出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成绩斐然。文献的考证也是洪先生所长。1935年，洪业多方考证了程百二《方舆胜略》(1610)所附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刊刻者及时间，撰成《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1]，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重视。留居美国之后，所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被推为世界汉学界诠释杜甫的权威之作[2]，为世界汉学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曾任职于北大馆，而又对西方汉学文献研究有较大贡献者，当属袁同礼和向达。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是我国图书馆界第一代具有现代图书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袁同礼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英文甲班，与傅斯年和沈雁冰同班，1916年毕业后进入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工作，1920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负笈美国，插班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后又在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图书馆学。袁同礼曾三度与北大图书馆结缘。一是1923－1926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二是1937－1946年抗战期间，他曾以北平图书馆馆长身份兼任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三是抗战结束后，他又以民国政府代表身份暂领馆长之职。袁同礼在中国现代图书馆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是在国立北

①洪煨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北京：《禹贡》学会，1935。

②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平图书馆主持工作的22年中奠定的，流传后世的主要著述则是1949年以后在美国完成的。而在北大担任目录学教授和图书馆主任的三年是他自美学成归国后重新踏上图书馆征途的起点，他的管理特色和学术兴趣，则在北大图书馆时期就显现了。

袁同礼首度结缘北大图书馆之时，正遭遇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政局动荡，经费紧张，甚至连个人薪俸也久欠不发。但他仍兢兢业业，勉力维持，不仅力图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而且清理了积压的大量西文书刊，编出了政府出版物目录一册，西文书目三册[①]。显示了他对目录学和西文文献的兴趣。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

综观其一生，袁同礼始终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献的保存及研究极为关注，并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他的工作。一是查录散佚海外的珍贵典籍和艺术瑰宝。早在1924年，他就曾利用去欧洲考察的机会，探访《永乐大典》散佚欧洲的情形，后撰写《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等[②]。他并托人多方查录英、法等国收藏的为斯坦因和伯希和掠去的敦煌资料。1935年，王重民在欧洲发现法国和普鲁士国藏有国内缺失的太平天国资料，袁同礼得知后即电请王重民拍摄，以利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二是关注西方汉学研究状况，编著西方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学术性书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中，由他个人编著并出版的主要书目有：《西方文献中之中国》（*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③]、《俄文文献中之中国》（*Russian Works on China*，1918－1960：*in American Libraries*）、[④]《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⑤]、《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

①《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58－59页。

②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29。

③Tong-li Yuan，*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Far Eastern Publications，Yale University，1958.

④Tong-li Yuan，*Russian Works on China*，1918－1960 *in American Libraries*. New Haven：Far Eastern Publications，Yale University，1961.

⑤Tong-li Yuan，*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Washington，D. C：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1961.

tinental Europe,1907－1962)①、《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②,等等,其中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最大的堪称《西文文献中之中国》。

袁同礼这一西文汉学书目的副题名为“续考狄书目”(*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曾于1878年出版《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③,1924年又出版补编本。考狄1869年来华,两年以后担任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图书馆名誉馆长(Honorary Librarian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考狄书目是西方汉学史上首部完整的有关中国的书目,它系统地汇编了16世纪以来直至1924年几乎所有的以西方文字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原书加补编共有4500栏,鸿篇巨制,前后共花费了24年心血。袁同礼所编《西方文献中之中国》中的文献收录,正是始于1921年,与考狄书目首尾相接。

《西方文献中之中国》历时5年方告完成。它收录了1921－1957年以英、法、德文出版的18,000种有关中国著述,以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受到西方汉学界的一致好评,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美国汉学家、后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首任主任的恒慕义(Arthur Mummel,1844－1975)在其前言中说道:“书目中所有条目都一一亲自考订其准确性,而非录自其他数据。为了防止缺失,美国和欧洲的重要亚洲图书馆他大都一一访问到了。因此他的续编无论在语种还是年代的覆盖面上,都比任何一家图书馆要全面。”④

如果说袁同礼的著述标志着20世纪初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西方汉学发展的兴盛,那么,解放后的北大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向达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则将中西文化交流和西方汉学发展一直追溯至它的源头。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笔名觉明居士、方回、佛陀耶舍。土

①Tong-li Yuan,“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vol.v,no.3,4 and vol.vi,1,1964.

②袁同礼,《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本下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813－828页。

③Henri Cordier.*Bibliothca Sinica*.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vol. 1. 1904,vol.2.1905－06,vol.3.1906－07,vol.4.1907－08,vol.5.1922－24

④*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oface.

家族。湖南溆浦人。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4年到北京大学任讲师。1935年起，先后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巴黎的图书馆中，对散佚国外的敦煌莫高窟史料和其他珍贵历史文献进行收集和研究。1938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西域史专任导师，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大历史系教授。1941年和1943年，曾两次去敦煌莫高窟考察。向达教授毕生治学严谨，著述甚丰。对中西交通史、少数民族史、特别是对敦煌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中西交通史》[①]、《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②]、《敦煌》[③]等。

1949年解放后，向达担任了8年的北大图书馆馆长，直到1957年。在任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北大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合并工作。在这一合并过程中，以向达为馆长的北大图书馆采用了原燕大图书馆的管理办法，在西文图书的编目方法上沿用了燕大的杜威分类法，而废止了北大原有的方法；在前燕大图书馆代理主任、合并后的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的通力合作下，不仅将原燕大的特藏“西文东方学文库”作为新北大图书馆的重要特藏，而且将老北大的同类图书合并归一，并加以发展，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文革”前夕。从而大大扩充了该特藏的品种和数量。

向达对“西文东方学文库”这一收藏的重视源于副馆长、老燕大人梁思庄的影响，同时也是基于向达本人对东方学和西方汉学文献重要性的认识。他对敦煌学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等始终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不仅对“东方中的西方”即中文文献中关于西方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及利用，而且对“西方中的东方”即西方文献中关于东方的记载以及散佚于西方的中文文献广为收集、爬梳及借鉴。他曾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④]，《鞑靼千年史》(*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⑤]，校注艾儒

---

①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百科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34。

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③向达等，《敦煌》，《伟大的祖国丛书》，北京：学习书店，1951。

④斯坦因(Aurel Stein)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41。

⑤巴克尔(E. H. Parker)著，向达、黄静渊译，《千年鞑靼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略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1]，译《甘地自传》（*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2]等等。向达著述甚丰，研究中中西（外）文献相互参见，力图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中诠释东方和中国，因而眼界较为开阔。老北大、老燕大图书馆西方汉学文献收集和研究的传统，通过向达馆长在新北大得到了延续和光大。

* * *

北大图书馆有关中国西文珍本收藏是优良的图书馆管理和完善的专题藏书建设的结合，它在形成中经过了人为的筛选、过滤、发掘和整理，体现了图书馆员的智慧。燕大、北大图书馆人对其研究促进了藏书建设的完备的发展，读者的反复使用和精心研读又使这个收藏的人文价值不断增值。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海外中国学尤其是西方中国学的发生发展，原因在于不少西方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中国学术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北大馆藏有关中国西文珍本图书也因此越来越为学术界所瞩目。故而，回顾和总结这些有关中国珍本的来源、发展及特色，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利用这个珍本收藏；而发掘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研究传统，将在人文的层面上展现凝聚其中的精神价值。

期待本书对北大馆藏有关中国西文珍本图书的发掘和揭示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①艾儒略（Jules Aleni）著，向达校，《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上海：上智编译馆，1947。

②安德鲁斯（C. F. Andrews）著，向达译，《甘地自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

国家图书馆藏普意雅先生(Bouillard Georges)著作考

彭福英

一、普意雅生平

普意雅(Bouillard Georges ,1862－1930),法国人,1862 年生于巴黎,1884 年进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工艺学校学习。毕业后,作为工程师在法国北部从事铁路建设工作[①]。1898 年来华,曾任平汉铁路北段总工程师,1906 年升任该铁路全路总工程师至 1927 年去职。普意雅退隐后,居住于北平,继续潜心钻研绘图技术,地形学和考古学。1930 年 9 月因病在北平(今北京)逝世,享年 68 岁[②]。普意雅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所能查到的材料也是片言只语,其中主要是伯希和发表于《通报》上的一篇介绍普意雅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伯希和提及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中,普意雅及其同事曾于 1898 年在长辛店遭到了义和团的攻击;而在 1901 年北京各大使馆被围期间,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

①É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France),. *Annuaire de l'Association amicale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é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 :promotions de* 1832 *à* 1929. Paris :é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 1930, p. 383.

②P. Pelliot, "Georges Bouillard", *T'oung Pao*(1930), pp. 454-457.

普意雅为法国驻华使馆的解围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①]。笔者希冀通过进一步探寻，发现新的材料，从而使普意雅先生的生平能够丰富起来。

二、普意雅专藏

普意雅去世后，其夫人朱德蓉女士为纪念普意雅特将其所藏遗书及地图悉数捐赠予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接受了此项赠品，特立专室庋藏，整体保存，以为永久纪念。经双方同意，订立了一份契约，代表人分别为朱德蓉女士和袁同礼副馆长[②]。普意雅藏书约有 1500 多种，2100 多册。其中，普意雅个人著作 25 种，收备齐全。笔者此文意在对普意雅的个人著作进行简单梳理和介绍，以资研究之便利。

三、普意雅著作

普意雅著作达 20 多种，本文按照主题，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研究

（1）Première série: *Le Yang Shan* [羊山 *Yang-chan*] *et ses temples* (avec 8 cartes et plans), dessins de J. Ruedolf, Pékin, A. Nachbaur[③], 1921.

系列一：《羊山及其庙宇》，北京：那士宝，1921。8 幅插图。

（2）Deuxième série: *Un temple bouddhiste: Kie T'ai Sze* [戒台寺 *Kiai-t'ai-sseu*]. in-8, 34 pages non chiffrées, 2 pl. en couleurs et 4 p1. en noir.

---

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英文译作 Legion of Honour，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Chivalric order），1802 年由拿破仑设立，主要颁发给为战争和艺术作出贡献的人士。不少中国公民也曾荣获过此勋章，如蒋介石、巴金等等。

②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2—3 页。

③那世宝（又名那士宝。Nachbaur，Albert 1880—1933，法国人），曾在北京主办过多种杂志，如《北京漫谈》（*Pekinades*.—1921）、《北京漫谈续编》（*Encore des Pekinades*.—1924）、《中国民间画》（*Les images populaires Chionises*.—1931），刊载了不少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文章。普意雅的许多著作都由其出版。

Pékin, A. Nachbaur, 1922.

系列二:《戒台寺》,北京:那士宝,1922。2 幅彩色插图,4 幅黑白插图。

(3) Troisième série: *Les Tombeaux Impériaux des Dynasties Ming et Ts'ing* (avec cartes et plans), Pékin, A. Nachbaur, 1922. Imprimés à la chinoise d'un seul côté et pliés à la chinoise, et 408 pages nch., avec 14 pl. en couleur.

系列三:《明清皇陵》,北京:那士宝,1922。408 页,14 幅彩色插图。

(4) Quatrième série: *Le Temple du Ciel*, Pékin, A. Nachbaur, 1923. Imprimés et pliés à chinoise, et 41 pages nch., avec 11 pl. nch. en noir.

系列四:《天坛》,北京:那士宝,1923。11 幅插图。

5. Cinquième série: *Le Temple de la Terre*, *Les Temples da Soleil et de la Lune*, *Le Temple de l'Agriculture*, Pékin, A. Nachbaur, 1923. La plupart imprimés et pliés à la chinoise, avec 10 pl.

系列五:《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北京:那士宝,1923。

6. Sixième série: *Le Temple de Pi Yün Sze* [碧云寺 *Pi-yun-sseu*], *Pékin, A. Nachbaur*, 1923. in-8, 24 pages nch., avec 7 pl. en noir et un grand plan en couleurs.

系列六:《碧云寺》,北京:那士宝,1923。7 幅黑白插图,一幅彩色插图。

7. Septième série: *Hsiang Shan* [香山 *Hiang-chan*] *ou Parc de Chasse*, Pékin, A. Nachbaur, 1923. in-8, 46 pages nch., avec 10 pl. en noir et en rouge et un grand plan en couleurs.

系列七:《香山》,北京:那士宝,1923。

8. Huitième série: *Les Temples autour du Hsiang Shan*: *Tien t'ai sze* [天太寺 *T'ien-t'ai-sseu*], *Wo fo sze* [卧佛寺 *Wo-fo-sseu*], *St yu sze* [西峪寺 *Si-yu-sseu*], *etc.*, Pékin, A. Nachbaur, 1923.

系列八:《香山的寺庙》,北京:那士宝,1923。

9. Neuvième série: *Le Temple lamaste de Yung Ho Kung ou Temple des Lamas*, Pékin, A. Nachbaur, 1924. Avec 6 planches et 2 plans.

系列九:《雍和宫》,北京:那士宝,1923。

10. Dixième série: *Tsing Ming Yuan* (静明园) (*La Fontaine de Jade*),

Pékin, A. Nachbaur, 1925. in-8, 76 pages nch., avec 9 planches et 3 plans.

系列十:《静明园》,北京:那士宝,1925。

11. Quatorzième série: *Environs Sud-Ouest*: *She King Shan* [石经山 *Che-king-chan*], *Yün Kiü Sze* [云居寺 *Yun-kiu-sseu*], *Tung Yü Sze* [东峪寺 *Tong-yu-sseu*], *Si Yü Sze* [西峪寺 *Si-yu-sseu*], Pékin, A. Nachbaur, 1924. Avec 12 planches en noir et 5 cartes et plans en couleurs.

系列十四:《西南郊区:石经山、云居寺、东峪寺、西峪寺》,北京:那士宝,1924。

12. Quinzième série: *Environs Sud-Ouest*: *T'ien K'ai Shan* [天开山], *Ku Shen* [孤山], *Shan Fang Shan* [上房山], *Tow Shuai Sze* [都率寺] *et les grottes de Yun Shui tung* [云水洞], Pékin, A. Nachbaur, 1924。

系列十五:《西南郊区:天开山、孤山、上房山、都率寺、云水洞》,北京:那士宝,1924。

北京周边地区寺庙研究共分15个系列,其中系列11、12和13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版。这个系列对北京及其郊区的庙宇做了一个系统的介绍。普意雅介绍非常详细,并且都附有其绘制的地图,图文并茂,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各庙宇的地理位置、建筑结构和特色。除此之外,他亦非常重视各个庙宇的大环境介绍,如讲到静明园的时候,开篇就讲述其地质结构,"诸多岩窟和洞穴显示这是奥陶纪的溶洞地貌"[①]。同时,这一系列也体现了普意雅对于中国历史了解比较详细。如在第五系列描述先农坛的时候,开篇言简意赅:"先农坛的祭祀主要是为了求雨,但其重要性远远不及天坛。"[②]开始追溯皇帝亲耕的历史渊源,转而论述从1420年先农坛建立开始,一直到清末先农坛的祭祀情况。其第四章对于祭祀礼仪的刻画,让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皇帝面朝南,三公九卿站于其右……皇帝左手执鞭,右手扶犁,六大臣位于其后。音乐奏响,其顺序为金、鼓、版、笙、箫,……皇帝耕后,三公九卿续,后佑平乐奏响

①Bouillard Georges, *Tsing Ming Yuan* (静明园) (La Fontaine de Jade), Pékin, A. Nachbaur, 1925, p. 940.

②Bouillard Georges, *Le Temple de la Terre*, *Les Temples du Soleil et de la Lune*, *Le Temple de l'Agriculture*. Pékin, A. Nachbaur, 1923, p. 1.

……从雍正以后，皇帝亲耕，不再是三犁沟，而是四分之一犁沟，以后的皇帝都遵循此规定"[①]。普意雅对当时祭祀礼仪上，皇帝和各大臣的位置，礼仪的程序描绘，都如数家珍。此上仅仅一例而已，这一系列诸多文章，都无不显现出普意雅对于中国历史、礼仪、风俗等等各个方面的了解。而这在《北京沿革和城墙历史小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追溯了北京城的历史，从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2700年黄帝追击蚩尤，统一北方，将都城北移至涿州开始，这个时候北京城被称为京兆地区。这一地区原有两个诸侯国——燕国、蓟国，燕侯打败蓟侯，迁都于蓟。蓟城就是今日北京的前身。而到大禹治水的时候，北京地区被成为幽州，是北部冀州省的一部分，当时中国有九个州。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全国以后，将全国分为36个郡，北京地区当时隶属于上谷郡[②]。普意雅按照年代顺序，由远及近，一直讲述到清朝，北京划归顺天府。普意雅还绘制了4张彩色地图，分别为蓟和幽州图、燕京和中都图、大都图以及北京图。这四张图也是按照年代顺序，将北京城的历史和变革描绘了出来。此种功夫，唯有深谙中国历史，而又擅长地图绘制之人士能为之。

13. Bouillard, Georges, *Note succincte sur l'historique du territoire de Pékin et sur les diverses enceintes de cette ville*. Stockholm :[s. n.], 1929.

普意雅:《北京沿革和城墙小记》，斯德哥尔摩:[不详]，1929。

14. Bouillard, Georges, *Coordonnées géographiques (longitude et latitude) de Pékin*. [S.l. :s.n.], 1929.

普意雅:《北京地理坐标》，1929。

15. *Les Grottes de Yün Shui T'ung [Yun-chouei-tong] du Shang Fang Shan*. [Réimprimé de Bull. of the Geol. Soc. of China, Ⅲ, 2(1924), 147－152, avec 4 planches.]

普意雅:《上房山的云水洞》，北京:中国地质协会，1924。

1923年10月，那士宝创办了《中国》(*La Chine*)一杂志，主要刊载关于中

---

①Bouillard Georges, *Le Temple de la Terre, Les Temples da Soleil et de la Lune, Le Temple de l'Agriculture*, p. 1833.

②Bouillard, Georges, *Note succincte sur l'historique du territoire de Pékin et sur les diverses enceintes de cette ville*, Stockholm :[s. n.], 1929, p. 39.

国的文章。云水洞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溶洞,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研究。普意雅此文为介绍性文章,主要介绍云水洞各个景点,有点类似游记,或者旅游指南之类的文章。

16. Bouillard, Georges,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commandant Vaudesacal)"Les sépultures impériales des Ming(Che-san ling)", *T'oung Pao*,1922,pp.57-66.

普意雅:《明十三陵》,通报,1922,pp.57—66.

(二)语言

17. Bouillard, Georges, *Essai sur une romanisation unique des sons de la langue chinoise*.[S.l.:s.n.]。

普意雅:《华音统一拼法说明书》。此小册为普意雅于 1926 年 4 月 1 日于北京写就,前半部分为法语版,后半部分为中文版。是书以最通用之英文拼法为根据,并斟酌英音以外最常用之德法各种拼音。其实,早在 1915 年,普意雅就有感于各国切华音之差异极大,妨碍各国交流,曾编订过华音统一拼法概略一书。《华音统一拼法说明书》即是在此书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修正。如法文中的 ou 作 u,fou 改为 fu 等等,使之更加臻于完备。普意雅之前所绘制之地图,其他著述中,都采用了此种拼法,并且获得了多数人的赞许。

(三)铁路

18. Bouillard, Georges, *Les Chemins de fer en Chine* (Rev. gun. des Chemins de fer, Pékin,[sn],1900,avec 1 carte).

普意雅:《中国的铁路》,北京:1900。

普意雅对中国的铁路状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笔者据之将当时中国在建的一些铁路列表如下(表 1):

表 1　20 世纪初中国在建铁路表

起点	终点	通用名字	长度(km)	工程开始年代	建筑者	备注
满洲里	绥芬河	华东铁路	1558	1901	华东铁路	包括 28km 到齐齐哈尔的支线。
哈尔滨	长春	华东铁路	214	1903	华东铁路	

续表

起点	终点	通用名字	长度(km)	工程开始年代	建筑者	备注
长春	吉林	长春铁路	128	1912	中国政府	
长春	旅顺	南满铁路	830	1902	南满铁路	
安通	奉天	南满铁路	305	1912	南满铁路	
北京	汉口	京汉铁路	1348	1905	中国政府	
天津	浦口	津浦铁路	1189	1912	中国政府	
北京	奉天	京奉铁路	1180	1903	中国政府	
青岛	济南	山东铁路	453	1904	日本	战前是由德国人承办的。

19. Bouillard Georges, *Note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 carte au* 1/100,000*e des régions traversées par les chemins de fer de l'état chinois* / dressée sous les auspices du Ministère des communications et de la direction du King-han(chemin de fer de l'Etat).

普意雅:《中国铁路地图(比例尺 1/100,000)》。

20. Bouillard Georges,"L'état actuel des chemins de fer Chinois",Paris,*Journal de Génie Civil*,1919.

普意雅:《中国铁路现状》,巴黎,《土木工程杂志》,1919。

(四)其他

21. Bouillard Georges, *Les grands vins de France: Bordelais, Bourgogne, Champagne*, Pékin, A. Nachbaur, 1924。

普意雅:《法国名酒:波尔多、勃艮第、香槟》,北京:那士宝,1924。

普意雅将波尔多,勃艮第和香槟三种法国名酒按照产地和等级,详细地做了介绍。文章并附有普意雅自己绘制的三张地图,将三种酒的产地描绘得清楚明了,为中国人了解法国名酒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22. Bouillard Georges, *Notes diverses sur les cultes en Chine: Les ornements rituels des temples lamaques et buddhiques*, Pékin, A. Nachbaur, 1924.

普意雅:《中国宗教仪式》,北京:那士宝,1924。

23. Bouillard Georges, *Notes diverses sur les cultes en Chine: Les ornements rituels des temples lamaïques et buddhiques*, Pékin, A. Nachbaur, 1924. in-8, 10 pages nch. 180 Notes diverses sur les cultes en Chine: Les attitudes des Buddhas,

Pékin, A Nachbaur, 1924, in-8, 28 pages nch. avec 5 planches.[①]

普意雅:《中国宗教仪式》,北京:那士宝,1924。

24. Bouillard Georges, *Usages, Coutumes, Cérémonies Superstitions à Pékin*, Calendrier Chinois.

普意雅:《北京人的习惯,风俗和宗教仪式》。

普意雅依照中国农历,按月介绍了北京人的各种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各月分别成册,共12册。普意雅还注意收集有关中国传统节日的文章。如在第一册中粘贴了1909年1月22日《郡法界权务报》关于中国春节的一篇文章(les fêtes du Nouvel An en Chine)和《北京政务报》(Curiosités et Caractéristiques Chinoises, *La Politique de Pékin*)关于中国春节的一篇文章。在第二册中,也粘贴了二月初二纪念孟子的一篇文章。此外,普意雅还自绘了彩图,如五月端午节中,普意雅绘制了张天师治鬼的两幅彩图。画中的张天师手持宝剑,身边围满了牛鬼蛇神、青蛙、蝎子、蟑螂等等。在第十二册中,普意雅绘制了秦叔宝门神图和尉迟敬德门神。画中人物栩栩如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理解。

25. Bouillard Georges, *Note sur les grands travaux à exécuter*,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17.

普意雅:《北京市政公所待办大项工程意见书》,北京,遣使会印刷厂,1917。

《北京市政公所待办大项工程意见书》是普意雅于1916年11月1日给民国政府上呈的意见书。普意雅认为:"京师为全国首善之区,交通便利。但亦有不足之处,如空中线道,任意安置,与电报电话各线,纵横交错,此最痛惜之事也。自来水汲取京北之河水,业已设立多年。水质纵不可云最佳,然较之北京之井水,固已高出其上。惟于百万居民之需要,仅有最低额之水量,是诚绝对不敷分配也。且该河无充足之水量,虽欲从事改良,不可得也。以上诸端,会与试行整顿,然卒无敢勇进行者。大抵以未有通盘筹划之详图故也。故欲北京成为方今合时之都城,尚失之远。"[②]而市政工程需通盘筹划,否则重复建设,造成浪费:"盖此种改良手续,若非事前筹划周密,有拆毁已成工程之

①Les 10 premières pages reproduisent le no 22.

②Bouillard Georges, *Note sur les grands travaux à exécuter*,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17. pp. 2-6.

困难。且所耗之费，尤必至巨。此其弊失其预备之不周。又常以承办工程，各自治机关，不并属同一管辖之下。彼此分歧，则工程不能统一。不特虚掷巨万金钱于无用。北京今日此项政务，虽在幼稚时代，然以划各区域数处。不听命于同一之管理矣。”①

在诸多考察之后，普意雅认为，当时市政最重要之工程主要有：

- 确定自来水分量之支配，以应居民需要及洗涤街道房屋工厂等处之用。
- 建造沟渠以排泄积水污水及一切污浊之物。
- 以电车交通城中各地点。
- 完全改造现有之电灯厂。改置空中之电灯电报电话各线为地线。
- 改造市政公所及市政需要之房屋场所。
- 设立林囿公园博物馆陈列所等等。
- 订立因工程需要收买民产之规定。
- 测绘全城市政工程之详细大图。
- 规定街道之宽度及基线。

而在诸多工程之中，普意雅对于自来水工程尤为重视，并绘制了一张北京自来水分配图。此图在今日，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他认为北京夏间暑期酷热，故自来水问题最为紧要。通过比较世界各大城市，如柏林、伦敦、罗马等人均自来水量，普意雅指出，北京为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如果以每人最低 300 升计算，整个北京城日均需 30 万立方米。普意雅认为，玉泉山水之流通于北京者，仅能供府中三海之挹注。至清河之水，现时供应自来水之分配者，每日不过 6000 至 8000 立方米，而永定河取水最佳。普意雅考察了永定河全年的流水量，笔者据之列作下表（表 2）：

表 2　永定河各月水流量表

月份	流水量（立方米/秒）
三个月（全冻）	0
开冻后第 1 个月	50

①Bouillard Georges, *Note sur les grands travaux à exécuter*,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17. pp. 2-6.

续表

月份	流水量(立方米/秒)
开冻后第2—3个月	10
雨水稀少(3个月)	5
雨季第一个月	100
雨季第二个月	50
雨季第三个月	10

这样，永定河每年六分之一的水流量就能满足北京全市的需要。但是永定河变迁不定，一年有六个月时间不能满足北京市民之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普意雅建议修建蓄水池和堰坝，并能用之发电。最后，普意雅还对各项工程做了一个预算，总计4400大洋(约合12000法郎)。

伯希和在《普意雅》一文中曾这么认为:"普意雅从来没有深入学习如何书写汉语，他可以读懂汉语，并翻译成法语，但是这些都是直接关乎各考古地点和遗迹的。"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伯希和在1930年《通报》上介绍普意雅的文章，对普意雅的著作也进行了梳理，共整理出20种。作为国家图书馆西文提善小组的成员，笔者在整理普意雅专藏的时候，也仔细地对普意雅的著作进行过统计，而搜集到此文的25种。其中《北京市政公所待办大项工程意见书》和《华音统一拼法说明书》均为双语版(法文和中文)，前半部分为法语，后半部分为中文。从中文措辞足见普意雅先生之中文功底。其句法通顺，文笔流畅，重重论述，很有说服力。而《华音统一拼法说明书》本身就是对汉语拼法的说明，这需要建立在对汉语和其他语言熟练掌握的基础之上，何况普意雅的切音法当时得到了大众的首肯。此外，普意雅在华三十年，其夫人也是华人，从外部条件来说，也是有益于普意雅深入学习汉语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收集更多的材料，来佐证这种观点。关于普意雅的研究很少，也没有人誉之为"汉学家"，但普意雅先生对于中国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研究，颇有学术价值。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有幸接触到这些材料，遂将其著作整理如上，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有更多的同仁来关注和研究普意雅及其藏书。

---

①P. Pelliot, "Georges Bouillard", *T'oung Pao* (1930), p. 454.

汉学人物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孟森(1868—1938)

纪念孟森先生

编者按

潘建国

2010年4月9日，在风景优美的北京大学临湖轩中，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1868—1938)遗著手稿捐赠仪式隆重举行，孟森先生裔孙孟庆瑞兄妹七人以及十余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的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批珍贵文献入藏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汉学图书馆”。为了表达对孟森先生道德文章的敬仰和缅怀之情，同时也向孟庆瑞兄妹的慷慨捐赠以及淡薄名利的可贵精神，致以感谢和表彰，本刊特辟此专栏。

中国是一个注重文献传承的国度，藏书之家代不乏人。与专重版本的收藏家相比，学者藏书的趣味、宗旨及特色，皆不尽相同，他们的藏书虽然没有宋刊元椠，也无“黄批顾校”，却多具有鲜明的专题特色，尤其是学者自己的著述手稿及批注题跋本，更因兼具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素为世人珍视。而对于学术机构以及大学图书馆来说，接受学者藏书，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累积专题文献，促进相关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学术氛围，弘扬学术传统。每当后辈学人阅读着前贤曾经读过的书籍，摩挲着他们题写于扉页或书眉的手迹之时，学术薪火便在潜移默化间完成了历史传递，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书者的学术生命也因之获得了新的延续。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图书馆长期以来颇为关注古籍善本的捐赠，却对版本普通的学者藏书缺乏足够重视。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

地"汉学图书馆",谨向海内外学者发出郑重倡议:如蒙您慨允捐赠藏书,我们将为您设立一个以您姓名或斋名命名的独立文库,编制完整的捐赠书目,辟出专门场所予以集中庋藏;您所捐赠的全部书籍资料,还将经过统一编目,列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检索系统,务求其能化身千万,嘉惠学术。窃念书籍购藏,其聚之也难,散之也易,而一旦散失,便将辜负数十年搜罗之苦心,也必然会影响书籍学术文献价值的发扬光大。因此,我们真诚地期待您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汉学图书馆",为心爱的藏书寻找一个理想归宿;这既是我们的荣幸,亦为书籍之幸事,学术之幸事!

孟心史(森)先生遗稿发现记

孙家红

一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生于清朝同治七年(1868),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江苏常州人,字莼孙,笔名心史,号阳湖孑遗。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廪生,后入江苏南菁书院、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并任师范馆教员,兼在译学馆翻译军事、经济、政治等外国要籍。1905 年 3 月,前赴广西,入郑孝胥幕,参与戎机。同年 10 月,返回上海,随即偕孟昭常兄弟二人赴日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归国后,积极投身于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后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员、书记长。与此同时,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政治、法律类文章和著作,并主编《东方杂志》,提倡立宪民主,在当时政界、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孟森先生沟通于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为民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民国成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推举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的起草工作,并参与中华民国商法的起草工作。面对现实政治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孟森先生自 1913 年冬淡出政坛,"退闲玩物",殚心著述,"心史"之名蜚声文坛,时人誉为"泰山北斗"。20 世纪 20 年代,孟森先生追随张謇等人,在江苏创兴实业,从事实业救国运动;同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创办《兴业杂志》，身担主笔，批评时政，建言献策，号召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吁国家早日走向和平统一、民主法治的正轨。

30年代初，孟森先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明清历史，育才无数。在后来的史学家中，著名者如吴相湘、商鸿逵、单士元、陶元珍、吴丰培、张鸿翔等皆出其门下。计自孟森先生此次北上，至抗战爆发前，不过五六年时间，发表著作和论文有数百万字。其中最著名者，如《明元清系通纪》，被史学家顾颉刚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表彰的三种著作之一；《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更被翻印重版数十次，成为明清史学研究的不朽经典。顾颉刚先生曾谓，孟森先生与余嘉锡先生"实为近日史学之双峰"，而自认"滥窃浮名，为可惭也"(《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75年9月2日)。足见其评价之高。

抗战爆发后，孟森先生因为年迈，作为北京大学留平教授，未即南下，参与保护校产、维持残局等工作。拒绝与日伪合作，坚定地维护民族尊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虽身染重疾，仍笔耕不辍，坚持著述。1938年1月14日，终告不治，与世长辞。

孟森先生作为著名的史学大家，其史学成就享誉国际，中外同钦，被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清史研究之开山大师"、"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其生前所发表之著述，除《清朝前纪》、《心史丛刊》、《明元清系通纪》等，部分史学论文曾于20世纪50年代由商鸿逵先生汇辑成《明清史论著辑刊》(正、续编)两册，刊布行世。"文革"结束后，商先生又将《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等三部讲义，在旧有基础上重新编排出版，并将孟森先生《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一篇遗文整理发表。而关于《明元清系通纪》的续补工作，自孟森先生逝世后，亦由商鸿逵先生赓续之。但由于时局多变，辗转流徙，原稿竟至湮没，学界同人引为一大憾事。

以上所述，基本限于孟森先生史学领域之成就，虽已荦荦大观，但究非全璧。笔者乃于2005—2008年应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之邀，将孟森先生早年发表之政论文、政法类著作大事搜集，点校整理，初步编成《孟森政论文集刊》、《孟森政法著译辑刊》两种，共六册，约18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试图弥补以往对于孟森先生政法领域成就认识之不足，为全面了解、认识和研究

孟森先生提供材料。随后，又在对孟森先生史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领域，以及文学、科技等方面文章，作进一步的收集整理，欲将孟森先生生前发表的文字进行更为广泛的搜罗汇集，为世人提供一个完整的孟森先生的“全息图像”。

二

前面所做的整理研究工作，仍仅限于孟森先生已经发表的文字。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孟森先生去世后，此前保存于商鸿逵、单士元等人手中的部分遗稿除个别篇章经过整理发表后，皆已散失殆尽，学界对其他遗稿的去向一无所知。但在笔者心中，却似乎总有那么一种感觉：相信冥冥之中，孟森先生的遗稿（包括日记）在世上一定还有所存留，终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2009年冬天，一个偶然机会，孟森先生文孙孟庆瑞先生在整理父亲孟鞠如（孟森先生次子）的遗物时，赫然发现家中藏有一箱祖父遗留下来的手稿、日记，以及相当数量的清代和民国旧籍。这真是一个大发现！在这之后，孟庆瑞先生带着极大的好奇心，便在因特网上开始了“追寻祖父孟森”之旅。随后，通过博客留言，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在得到孟森先生家属手中还存有这么多宝贝后，我激动不已，尽快和孟庆瑞先生取得联系，并约好时间，登门拜访。

2009年12月15日下午，在皂君庙东里的一个六楼上，两个不太起眼的纸箱，就摆在笔者面前。在和主人简单寒暄之后，忍不住想上前打开纸箱，一饱眼福。主人似乎已经看出了笔者的“不良居心”，却很爽快地答应了。纸箱打开后，里面的书塞得满满的，虽然有些凌乱，但瞬间就被吸引住了。一本本泛黄的线装册子，工整中颇显老辣的毛笔字，有的字迹清楚但密密麻麻，有的似乎已写好书名或篇名，却又戛然停笔，留下半册空白；毛边本，晒蓝本，有日记，有手札，有文稿，有读书笔记，有长篇大论，也有只言片纸。每发现一册或一叶未曾著录的遗稿，无疑都是一个惊喜。但是，惊喜一个接着一个，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面对这如“宝山”一样的孟森先生的遗稿，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如何妥善安置和利用这批宝贵的文化财富？据孟庆瑞先生言，这批孟森先生的遗著文

稿自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家门后，真可谓历尽劫难，但最终又都化险为夷，如有神护。屈指算来，自孟森先生辞世，1949年前就经历了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两次兵燹；1949年后，运动更是不断，尤其能逃过“文化大革命”一大劫难，真是幸运中的万幸。长期放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不仅保存的条件有限，之前还险些当作废纸卖掉。因此，必须寻求一个长久解决之策。经过初步商议，孟庆瑞先生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即将之进行整理出版，化身千百，广为学界研究利用，让这些遗稿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

回到北大后，我将发现孟森先生遗稿的事情，向几位熟悉和关心我个人关于孟心史研究的师长进行了汇报。这其中，主要有北大历史系张传玺教授、尚小明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先生。大家都觉得这是明清史学界一个重要发现，是一笔应该郑重对待、亟待开发的学术财富。尤其张传玺教授在得知我关于遗稿保存的疑虑后，从有效保存和利用这批珍贵学术资料的原则出发，帮我分析各种利弊关系，并主动和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进行联系。很快，基地方面有了积极反应。基地主任袁行霈教授对这批遗稿相当重视，先后经由刘玉才教授、潘建国教授和笔者进行了沟通。农历新年刚过，潘建国教授代表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在笔者的陪同下，拜访了孟庆瑞先生。双方坦诚相见，经过友好平等的协商讨论，初步达成捐赠意向。随后，又在双方的不断沟通协调下，最终达成了捐赠协议。孟森先生家属同意将手中所藏全部孟森先生遗稿、旧籍无偿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作为永久收藏，供学界研究利用，并由后者负责孟森先生遗稿、旧籍的编目、整理、展览、出版和研究等工作，以便使这些珍贵的资料发挥其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2010年4月9日下午4点，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隆重举行，有九位孟森先生的家属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等媒体，共同见证了孟森先生著述遗稿回归燕园的历史时刻。

目前，已经对这批遗稿做了初步清理和编目，详见《阳湖孟心史著述遗稿捐赠目录》。关于这批遗稿的影印出版和点校整理工作也已着手进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批遗稿就会和读者见面，让世人得瞻一代学术大家的智慧风采。

追寻祖父——孟森

孟庆瑞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当这个命题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时，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但是细细想来，在2006年退休之前，我对祖父的印象只是来自小时候父亲只言片语的讲述，原本就是很好笑的。如今到了“奔六”的年纪，才忽然感到对被史学界誉为“中国近代明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和“明清史学的泰山北斗”的祖父，作为他的后人，着实不该对他老人家仅仅是“只言片语”的了解。如此想来，“追”是要追赶着别人的研究、考证成果，紧快地了解和走近祖父（所谓“紧”是要抓紧时间，所谓“快”是要快速简捷）；“寻”则是要利用各种方式找寻并确定祖父一生中被遗落和尚不确定、尚不清晰的足迹。

孟森先生，字莼荪，号心史，晚号阳湖孑遗。江苏武进人。生于1868年4月29日，卒于1938年1月14日。

不知为什么父亲很少对他的子女们谈及祖父，或是性格使然，疏懒于炫耀先人的光环；抑或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自己已经因为“语不惊人死不休”被划过“右派”，哪里还能再去自找“封建社会遗老遗少孝子贤孙”的帽子戴呢。

对祖父的了解，大哥庆夔是这样回忆的：“1953年上中学初二时，历史老师问我：‘你的祖父是孟森吗？’我回答说：‘不是，我的祖父叫孟心史。’历史老师笑了，说孟森、孟心史是一个人。我因为是回国不久，闹了个大笑话。从那时我才知道祖父是个名人。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只是笑笑说孟家不缺名人。”

记得上小学时，我在父亲的书堆里发现一位俄罗斯作家有关草原游记的小说，书中对草原的广袤、苍莽，旅途中的自然景色，草原民族的习俗和草原狼群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我。父亲看到后就对我讲起他小时候随祖父坐驴车、马车、牛车或骑骆驼，走丰台，过集宁，前往呼和浩特和包头公干的经历。对父亲讲述的内容，我只记住了香喷喷的牛羊肉、无垠的原野和黄风裹着沙粒刮到脸上的疼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讲述祖父的事情。

后来读到一篇名为《孟森的史学》的文章，其中述到：“除了读书，若不能行万里路，亦不足成就孟森。行路，一是地理意义，一是心理意义。略考孟森

足履所经，东至日本，北至哈尔滨，南至粤疆，西边大概来不及去，但西边的事情也是他素所究心，看他为屠寄撰《蒙兀儿史记》所作的序，看他的《香妃考实》、《赵豁四传》，便能见出一二。”说是祖父生前考察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大约只有“西边”没有涉足。不知这里所谓的“西边”是否包括绥远和包头，结果使我对父亲随祖父去呼和浩特和包头一说产生了些许疑虑。

近来在整理父亲写的一份自传遗稿片段时，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的哥哥心如、嫂嫂钱蕴言已经在德国留学。心如进的是柏林大学，学的是工业化学，在这一阶段特别注意油脂和印染。所以在北京的时候，父亲曾三次带我到绥远（今天叫呼和浩特）和包头，考察胡麻油的产销情况，想让心如净化生产方法极其原始的、大西北产量极大、价格极其便宜的胡麻油。我们在丰台、平地泉客店里吃的大碗牛羊肉，虽然引得我食欲大动，可是胡麻油老叫我这个南方少年蹙额攒眉，无法下咽。父亲说，用现代工艺净化的胡麻油，不用比西方的橄榄油，起码可以胜出我们的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吃起来没有怪味，哪怕用来改良大量出口的杭州精美的遮阳伞，也可以为国家换回外汇。心如哥寄回来的样品，证实了这个想法的正确，从而决定了父亲带我三次到包头实地调查。”父亲的这段叙述，表明祖父确曾亲赴“西边”进行过对胡麻的考察，虽然这个“西边”与新、陇之“西”绝对逊色，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绥远、包头起码要算作“西边”的边缘地区了。啊，在这个问题上，我释然了。

20 个世纪 60 年代初，当日本的太阳旗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飘起来时，父亲又一次对我讲到祖父。他说日本鬼子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多次遣人到北平游说祖父出任伪满的“教育次长”，均被祖父拒绝。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祖父目睹日寇占领北平，在华夏大地烧杀抢掠的暴行，愤懑至极，一病不起，终于 1938 年 1 月 14 日离开人世。这件事像一方烙印深深地烙进了我的思想之中，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在我的骨子里、血液里和意识里，永远都是“爱国主义者”，永远都不会宽恕那些野蛮的法西斯“倭人”。

这是父亲生前仅有的两次对我谈及祖父。我曾经问父亲孟氏家族的祖上大都源于山东，为什么我们家是江苏武进人。父亲只含糊地告诉我，我们的祖上在老年间到江南任什么职务，从那以后就根植于常州，这个说法也不

知是否属实。后来看了风靡大陆的金庸写的众多明清武侠小说，发现在小说的注释中经常提到"孟森"，才得知祖父居然有如此高深的学问。很让我汗颜的是，我上学时历史课的考试得分几乎都是2分和3分(当然是5分制)，极感丢人。

2005年我和宝日格斯台的"插友"们相约去万安公墓祭拜去世三年的"插友"童宛因。我忽然想起幼年时的一个清明节，曾随父亲来此为祖父扫墓的往事。我开玩笑地对大家说：那时的万安公墓很破败、荒凉，我跟着父亲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在泥泞的小路上和杂乱的坟茔间艰难寻找祖父的墓地，却始终没有找到，结果准备上坟用的点心被我和父亲"咪希"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我匆匆赶回厂子上班后，老冯却很上心地找到公墓管理处询问如何能找到祖父的墓地。之后，他告诉我可以到公墓管理处查询我祖父的墓地所在区域，他们那里有详细的记载。

2006年我退休了。是年仲夏，我前往万安公墓寻找祖父的墓地，在公墓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终于在万安公墓"火区"的"忠组"找到了祖父的坟茔。呈现在眼前的水磨石墓碑已经被拦腰折断，想来是"文革"年间"砸烂一切"时，铁锤重击的结果吧。好在那些关键的、能够证明墓主人和立碑人身份的主要文字还清晰可见，可以认定这就是祖父和祖母的墓地，不至于做出哭了半天还不知道是别人家坟头的荒唐之事。

我为祖父重修墓碑和撰写墓志铭时才发现我对他老人家的生卒年份竟是一无所知。我去问哥哥姐姐们，哪知他(她)们对祖父的了解并不比我多，甚至都不知道祖父的墓地在万安公墓。撰写墓志铭必须要有祖父的生卒年，只好临阵磨枪，到网上一通狂搜，结果在众多涉及到祖父的文章中看到有关他诞辰的三个版本：即1867年、1868年和1869年。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相约在2007年1月13日，祖父的忌日前夕，各携家人到重修的墓碑前祭拜祖父。因此，必须在2006年年底前修好墓碑和墓志铭。幸亏在我家的一本老相册里有一幅祖父生前与北京大学师生合影的照片，上面有胡适的题记："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学庆祝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纪念合影　胡适敬记"。想一想，当年"文革"期间外交学院"造反派"还算是有些文化素养，"破四旧"和抄家时只"没收"了父亲从法国带回来的手

摇缝纫机、萨克斯管、曼多林、照相机和一件皮大氅，对相册和大量的书籍只进行了封存而没有实施毁坏。以照片上题记的时间计算，祖父的出生年份应该是1867年。同时万安公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经过查阅档案，根据档案中“填名书”记载，祖父出生于“1867年阴历四月初七”，我和大哥商量后最终确定墓志铭上祖父的出生年月为“1867年5月10日(阳历)”。

这是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地追寻祖父的足迹。此后，查阅了诸多刊物和文章，在祖父的著作和学术方面，我无力(学识太凹)也无意(没有心气)做什么“研究”、“考证”和论述，他生前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如今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而我只想在如“出生年份”、“字”、“号”、“笔名”和其他一些力所能及的方面寻找些自己的见解。

祖父去世后的几十年间，他的子孙后人关于他学术、生平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可以说是空白的。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曾打算2010年年初在我的博客上写一篇记述我所知道的关于孟森先生的文章，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表达后人对先人的崇敬和缅怀。由于父亲生前极少对我们谈及祖父，从而使我们对祖父知之甚少。我曾在网上搜寻，但没有找到多少适用的资料。

2009年11月，朱偰先生的后人(清史大家朱希祖先生的孙女)到我家作客，听她讲述了朱家几个子女搜集、整理和出版朱偰先生著作的事，很有些启发。忽然想到曾经在父亲的书堆中看到过很多蓝皮和黄皮的线装书籍，不知其中是否有祖父留下的东西。父亲在1996年去世时，我只收存了他的相册、部分日记和一些手稿，对大量的中外文书籍，包括那些线装书籍，我则自卑地认为与己无缘，没有加以过问，而任由哥哥姐姐们处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想要“追寻”祖父了，紧急联系大哥和大姐、二姐问询，毫无所得。我想大概是没有可能再找到祖父的遗作了，遂极为失望。

2009年12月初，为了在2010年下半年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我的博客上写一些关于父亲生平的文章，我前往外交学院的二姐家，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能再找到一些父亲生前的日记、文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装满祖父遗作手稿的木箱，真是如获至宝。据哥哥姐姐们说，1951年，父亲率领全家从法国回归新中国，那时一家九口人的家当除了一些必需的衣物和父亲的几箱子书外，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婆

婆”(祖父的续弦,父亲一辈人称她为“老师母”,我们这一辈人则按母亲的嘱咐称她为“婆婆”,大概是要与“奶奶”有所区别吧)闻讯后即时送来了桌椅厨柜和一些生活用品,这个装满祖父遗作手稿的箱子就是那时被送到我家的。

单士元的女儿单嘉筠在《先父单士元与恩师孟森的交往》一文中写道:“家兄嘉量,年长我10余岁,已届古稀之年。大哥告我,先父曾亲口对他讲过,孟森先生把多年来史学研究日记送给父亲。大哥忆说是蓝色硬纸封面,线装,形似大教材书之开本。里面纸页用红线条隔开竖行格,是孟森先生用毛笔亲写,极其遒劲工整。一本一本地摞起来,有近二尺厚。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大哥还得见于先父的书案上。‘文革’伊始,因先父所谓走资派等罪名被打倒,孟森日记毁于红卫兵抄家,或烧或扔或抄走,已不知下落。惜哉!”

相比祖父多年的“史学研究日记”在单家的遭遇,我家这些祖父的遗作手稿,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次战火,经过“反右斗争”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竟仍能够得以留存,实属万幸。我们家经过七次搬迁,“文革”中父母还被发往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三年,而这个木箱里的文稿依然得以完好保存,可以看出父亲对这些文稿是十分珍视的。1962年大哥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学教历史,父亲曾嘱托他整理祖父的遗稿。后来他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法语,整理祖父遗稿的工作就此中断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父母相继辞世,二姐全家从宁夏退休回到北京后,住到了父母的旧居。清理父母遗物时,二姐夫欲将这箱东西卖给收废品的人,我的外甥杨孟涛认为这是先祖的遗物不应随便卖掉,有惊无险地阻止了这个行动,使之再度躲开一劫。如果当时这箱遗作手稿真的就这样被卖掉,估计得到的也就是一罐八宝粥,而损失的则是永世的遗憾。

如今这箱祖父的遗作手稿被我发现,得以重现于世,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

这部分遗作手稿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既有清末祖父在广西时的日记《粤行随笔》,也有二三十年代的“住院日记”;既有一些零散的书函、诗词底稿,也有大量的读书札记;既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的讲稿原件,也有《元明清系通纪》的晒蓝本底稿。其中有一些遗作还没有发表过。很多书册的页

眉行间，都有祖父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书写的札记和校注。可以想见他老人家在研究、考证历史事件时，是多么的严谨、认真和勤奋。

简单整理、分类、建档后，虽然不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价值（不是“价格”），却刻骨地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看着祖父的手稿，简直就像在看天书，“认字不清”、“含义不懂”，自己的学识“凹”得真不是一星半点。由于我个人的学识和能力有限，无法真正了解这些文稿的学术价值，要想弄清弄懂这些蝇头小楷书写的随笔、札记和日记，使之体现出应有的历史的和学术的价值，没有行家里手的参与，单凭我那初中二年级肄业的“学问”是绝无可能的。同时深感要想妥善、长久保存好这些遗作手稿，还是要为其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为此，去年年底通过网络，我与孙家红博士取得联系，请他对这批文稿进行了初步的鉴定。之后小友孙家红邀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再次进行鉴定。尔后，家红小友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谈及此事，在张传玺先生的指荐下，遂联系到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并由孙家红和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潘建国老师第三次对这批文稿进行了鉴定，认为这批遗著手稿很有学术价值。

这批遗著手稿的学术价值得到肯定后，我们在京的五个兄弟姐妹经过认真商讨，一致同意把这批文稿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家住天津的三姐和远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二哥通过电话和发邮件也表达了他们积极支持此举的意愿，表示完全同意为祖父这些遗作手稿找一个理想的归宿，使其最好的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

如今，在时隔七十多年后能够让祖父的这部分遗作手稿公诸于世，并捐赠给他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大学，让他老人家的这些文稿体现出更大的学术价值，我们因此了却了一桩心愿，也算是对祖父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交代。

如果祖父在天有灵，得知我们今天的做法，他老人家一定会感到万分欣慰的。

2010 年 7 月



孟庆瑞先生与袁行霈主任共同签署捐赠协议



孟森先生家属接受北京大学颁发的捐赠证书



孟森先生部分著作手稿

阳湖孟心史著述遗稿捐赠目录

潘建国　孙家红整理

一、学术论著

1. 著作

(1)《禾摭龙摭》,手稿,1904年,4册,未刊

(2)《纪事诗话》,手稿,1913年,2叶,未刊

(3)《轮回集证》,手稿,1917年,1册,未刊

(4)《读诸子杂记》,手稿,1923年,2册,未刊

(5)《广韵校记》,手稿,1923—1924年,3册,未刊

(6)《读夷坚志记》,手稿,1927年,1册,未刊

(7)《两朝从信录辽事钞》,手稿,1930年代,2册,未刊

(8)《永乐大典戴赵三本水经注合校》,手稿,1930年代,2册,未刊

(9)《杂录明清间事》,手稿,民国,1册,未刊

(10)《读书札记》,手稿,民国,1册,未刊

(11)《清史人名索引》,手稿,民国,1册,未刊

(12)《先秦史书人名索引》(附逃人一则),手稿,民国,1册,未刊

(13)《朝鲜检查日历》,手稿,民国,2册,未刊

(14)《外族侵略中国史》(附李贺歌诗集校记),手稿,民国,1册,未刊

(15)《易义便览(附清史零拾)》,手稿,民国,1册,未刊

(16)《校正淮南集证》,手稿,民国,1册,未刊

(17)《易林分类附联话及易林集联》(附性理论、和约不签字后中国外交挽救策),手抄,民国,1册,未刊

(18)《文馆词林校记》,手稿,1933年,1册,已刊(《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1、6期)

(19)《心史丛刊》,铅印,大东书局,1936年,初集、三集各2册

(20)《明元清系通纪》,民国铅印本,存22册(前编1册,正编一2册,正编二1册,四1册,五1册,六2册,八1册,九1册,十2册,十二3册,十三2册,十四3册,十五2册)

2. 讲义

(1)《明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0 年代铅印本,2 册

又一部,上册残存第 125—180 页,下册全;另残存第 181—192、195—196 页

(2)《第二次明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0 年代铅印本,2 册

(3)《清史讲义》(甲上、甲下),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0 年代铅印本,2 册

(4)《满洲开国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0 年代铅印,校样散叶,残存第 6、16—17、30—33 叶,有孟森校语

又一部,残存第五讲"肇祖原皇帝补记",第 1—110 页

(5)《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校样稿),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0 年代铅印,5 册;存正编一 2 册,正编二至三 2 册,另残存正编一第 203—338 页

(6)《明元清系通纪》底稿,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0 年代,毛装 4 册,存正编卷七至卷十

3. 论文

(1)《太宗圣训跋》,手稿,1934 年,1 叶,未刊

(2)《李光地陈梦雷绝交公案》,手稿,3 叶,未刊

(3)《后汉书张温补传稿》,手稿,1930 年代,3 叶,未刊

(4)《堂溪赵典》,手稿,1930 年代,1 叶半,未刊

(5)《徐致祥参张之洞事原委》,手稿,1930 年代,2 叶,未刊

(6)《陆文端》(札记残叶),手稿,1930 年代,1 叶,未刊

(7)《清赋税能矫明弊旁证》,手稿,1 册(仅 1 页,余皆空白),未刊

(8)《读周官识字》(附三藩史料),手稿,1 册,未刊

(9)《铁岭李氏》,手稿,1 册,未刊

(10)《南都识小》,手稿,1 册,未刊

(11)《清皇室之文字狱》(附:杨道声事辑),手稿,1 册,未刊

(12)《清史稿地理志东北区域所叙明以来之沿革》(前附抄《大学》一篇),手稿,1 册,未刊

(13)《朱陆异同之大节目在论无极太极》(附汉译法兰西建国法、横波夫人史料杂抄)》,手稿,1册,未刊

(14)《刘毓楠咸丰庚申秋狩日记》、《抚远大将军奏疏考证》,手稿,1册,部分已刊(《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一篇》,《史学集刊》2期,1936年10月)

(15)《清太后下嫁摄政王辨正》、《清世宗夺嫡案论证》,手稿,1册,部分已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1934年)

(16)《徐氏支谱序》,铅印,1932年,3叶,已刊

(17)《蒙兀儿史记序》,铅印,1934年,存第2、第3页各一叠,已刊

(18)《传抄本黄景昉〈国史唯疑〉跋》,手稿,2叶,已刊(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35期,1936年2月13日)

(19)《书虬髯客传后》,手稿,已刊(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7年6月10日)

(20)《后明韩主》,《治史杂志》1卷1号,1937年,已刊

(21)《水经注原公水篇诸家之校正》,铅印散叶,已刊(《禹贡》7卷1—31期,1937年4月)

(22)《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中之熊耳山问题》,铅印散叶,已刊(《禹贡》7卷6—7期,1937年6月)

(23)《国史所无之吴三桂叛时汉蒙文敕谕跋》,铅印散叶,已刊(《禹贡》6卷12期,1937年12月)

(24)《戴本水经注所举脱文衍文》,《国学季刊》6卷2号,抽印本,1937年6月,2册

(25)《宋椠大字本孟子校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4—5号,抽印本,1935年7—10月,1册

(26)《相台本周易校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0卷3号,抽印本,1936年5月,1册

二、日记诗文

(1)《粤行随笔》,手稿,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十至九月十七日,2册,未刊

(2)《日记残稿》,手稿,1920年3月7日至3月24日,5叶,未刊

(3)《日记残稿》,手稿,1929 年 10 月 13 日,1 叶,未刊

(4)《大连星浦看花等诗》,手稿,1931 年,5 叶半,未刊

(5)《放庵老人七秩华诞贺诗》,手稿,1932 年,1 叶

(6)《诗稿残叶》,手稿,1937 年,1 叶,未刊

三、批注、批校、题跋之书

(1)《清谥法考》,铅印,1924 年,有少量孟森批校,卷上封面有孟森题诗

(2)《洪经略奏对笔记》,铅印,1930 年,1 册,涉园重印,卷首有孟森批注

(3)《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铅印,1931 年,1 册,故宫博物院赠,封面、天头有孟森批注

(4)《清初史料四种》,1933 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2 册,天头有孟森批校

(5)《武阳会馆碑记》,1935 年拓本,1 册,首有孟森题记

(6)《东华录》(残),清刻本,存卷 4—6、15—32,6 册,有孟森批注

(7)《钦差萨审办雍沙一案》,清抄本,1 册,封面有孟森批注

(8)《名教罪人》,铅印,故宫博物院翻印,文献丛书第二种,1 册,天头有孟森题注

(9)《山中闻见录》,木刻本,民国罗雪堂刊本,4 册,封面有孟森题跋,天头有孟森批注

(10)《山中闻见录》,孟森手抄(至万历四十三年),1 册,天头有孟森批注

(11)《朝鲜实录抄》,研究院文史部稿纸抄本,存第 1—12 册,每册封面有孟森亲笔题记,天头有孟森批注;第 18—25 册,晒蓝本

(12)《朝鲜实录抄(重修宣祖朝)》,研究院文史部稿纸抄本,1 册,封面有孟森亲笔题记,天头有孟森批注



四、史料杂抄

(1)《记事珠》,孟森手抄,清末,1 册

(2)《明末清初冯铨史料摘抄》,孟森手抄,民国,5 叶半

(3)《吴堦家传》,孟森手抄,民国,1 叶

(4)《兀良哈史料摘抄》,孟森手抄,民国,2 册

(5)《松鹤山房集》,抄本,民国,5 册;第五册有孟森补抄陈梦雷史料

(6)《清初修历奏疏摘抄》,孟森手抄,民国,2 叶

(7)《明史稿内史例议》,孟森手抄,民国,1 册

(8)《明末清初史料杂抄》,孟森手抄,民国,1 册

(9)《诸史杂校》,孟森手抄,民国,11 册

(10)《钱名世、万季野史料两则》,孟森手抄,民国,2 叶

(11)《金磅先令合算、朱批上谕目录等杂抄》,孟森手抄,民国,1 册

(12)《女真》,孟森手抄,民国,6 册

(13)《清代禁书汇录·叶向高女直考》,孟森手抄,民国,1 册

(14)《汤修业恽日初先生传附子格》,孟森手抄,1 叶

(15)《明代足证建州文字》,孟森手抄(部分),民国,1 册

(16)《满洲天命朝史料摘抄》,孟森手抄,民国,3 叶

(17)《明代满洲史料杂抄残叶》,孟森手抄(部分),民国,2 叶

(18)《满清史料杂抄》,孟森手抄,汉文阁稿纸,晒蓝本,民国,14 册

(19)《书籍目录一》,孟森手抄,民国,1 册

五、其他

(1)《孟森逝世口报》,油印,1938 年,3 张,附原函

(2)《物件寄存单》,1937 年 5 月,有孟森手记,1 叶

(3)《杨曾威致孟心史信札》(附杨道声等人史料),1935 年 3 月,8 叶

(4)《孟家账本》,2 册,民国,另 2 页

(5)《日人残田氏致孟淑琴手札一通》,民国,1 叶

(6)《清儒学案序》,油印,民国,3 叶,尹文赠孟森

(7)《关于清会同馆史料摘抄》,研究院文史部稿纸,抄件,民国,存 10 叶

(8)《与李厚庵绝交书》,红格抄本,民国,存 12 叶半

(9)《徐致祥、张之洞咸丰会试卷》,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稿纸,抄件,4 叶

(10)《史书杂抄》,抄本,民国,4 册

(11)《字书选抄》,抄本,民国,1 册

(12)《杨光先事》,抄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8 叶

(13)《何氏宗范》,石印本,1927年,1册

(14)《光绪朝外交史料预约样本》,铅印本,1930年代,1册

(15)《书籍目录二》,红格复写本,民国,1册

(16)《随园诗话》,道光刻本,存7册,缺卷一、二;补遗2册

(17)《明书》,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存2—6、8—11册

(18)《吴梅村诗集》,中华图书馆,石印本,民国,存6册,缺5、8册

(19)《纲鉴易知录》,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光绪三十年,存14册

(20)《明督抚年表》,民国铅印本,存2、3、4、5册

(21)《叠石名家张南垣父子事辑》(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5卷6号,1931年,1册

(22)《歌谣》,1936年,2卷14—18、21、2—28期;另19期存2叶,20期存2叶,22期存3叶,

(23)《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录》,铅印本,1936年,1册

(24)《张星烺次女婚礼请柬》,1933年,1张

(25)《吴燕绍七十自述》,铅印,1937年,2叶

(26)《中国银行贷借对照表及损益表》,铅印,1937年,1册,附原函

(27)《沙鸥明信片》,1937年6月,1张

(28)《授居家菩萨戒仪折衷》,铅印,缦衣辩证,民国,1册

(29)《金刚经》,铅印本,北平中央刻经院,民国,1册

(30)《授三皈五戒仪范》,铅印,拈花寺道场校印,民国,1册

(31)《空白户口统计日报表》,红印,民国,3叶

(32)空白稿纸,民国,7册半

2010年6月30日



我所认识的杜德桥

赵　超

杜德桥(Glen Dudbridge),是一个在国际汉学界中十分响亮的名字。他以深厚的汉学功底与卓越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欧美学术界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尊重,他不仅在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长期担任中文教授和中国研究所所长,而且还担任着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等诸多重要学术职务。没有见过面的人,或许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威严睿智、不苟言笑、高不可攀的大师级学者。可是在我们十多年的交往中,他给我的感觉始终是一个慈祥和蔼、亲切热情的好老师、好朋友,或者更亲近地说,是一个好老头。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他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德贯中西,一身兼备了英国社会传统的绅士风度和中国儒家传统的谦谦君子之风。真像他这个美好的中文名字一样,是一座道德的桥梁。

我是在1996年获得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的访问学者资助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与杜德桥教授做合作研究时首次见到他的。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就合作研究的工作有过多次信件往还。介绍我们进行这一合作的则是我的另一个英国朋友——当时刚出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杰西卡·罗森博士。她觉得杜德桥教授正想进行的一项中国古籍辑佚与研究工作与我的研究侧重有共同基础,可以互相交流,就向杜德桥教授提出来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过申请王宽诚基金让我到牛津去一起做这项工作。杜德桥教授很快就把他的研究设想来信告诉我，并且和我约好分工先期各自搜集一部分资料，等到牛津时再一起整理研究。尽管还没有见面，但在这些来信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感到他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与平易近人的善良品格，不禁使我非常想能尽快见到他。

在一个英国常见的阴沉寒冷的冬日，天上飘着雨星，我从伦敦乘坐长途巴士来到了久已倾慕的著名学府牛津。在此之前，杜教授已经周到地安排好我的旅程，告诉我到牛津车站后打电话告诉他。那时，置身于首次来到的异域，不禁心中惴惴，既担心将要在这里度过半年人地两生的日子，又不断地猜想着将要见面的这位著名学者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相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位于一条偏僻的小街——沃顿街上，是一座很显陈旧的三层小楼。我有些踟蹰地迈进大门，通报了自己的名字。"您已经到了。杜教授正在给您收拾办公室呢。"身材矮小的所长女秘书一边说，一边跑去找杜德桥教授。杜教授给我收拾办公室，有点离谱了吧。以后我得到确证，真是这样，杜教授亲自去给我搬的办公桌。在他们看来很平常，历来就是这样事事自己动手。而在我这儿，却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心里也顿时感到热乎乎的，似乎阴暗寒冷的天气也不令人生畏了。

随着一声亲热的问候，一位满面笑容的清瘠老人快步来到我的面前，伸出了他的手，由此开始了我在牛津的半年合作研究，也开始了我们至今十多年的友谊。我不想多讲杜德桥教授在生活上对我的细致照顾，使我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日常工作起居。重要的是我们在共同研究工作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理解和沟通，使我们的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说实话，原来我对这项研究的选题并不太感兴趣，觉得辑佚这种工作也只是简单地查找一下各种古籍，做做考证确认而已。加上《三国典略》这种书能够找到的佚文并不太多，我想这个研究的结果也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佚文汇集罢了。在见面后不久，我们把所有的材料统计了一下，一共有 410 条，其中还有 16 条是三国时鱼豢的《典略》一书佚文。我们查找的古代类书、史书有近 30 种，搜罗得已经比较完全。所以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把研究深入，将这项辑佚工作做成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新成果，以期与清代学者搜集佚书的

做法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杜德桥教授等欧洲学者的研究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首先去考虑了利用《三国典略》中史料的问题。杜教授提出了他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例如梁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北齐武成帝时期撰写《修文殿御览》等有关记载。这些记载都是其他史书中较少提及的。而杜教授注意的是这些记载中反映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他多次提到梁元帝焚书、折断珍贵的古代文物吴越宝剑这一场面，认为它表现出一个独裁者覆灭前的疯狂灵魂，并批评荷兰学者认为梁元帝焚书一事是虚构的看法，进一步通过这一记录去分析古代史官撰写史书时的立场与选材方法，并去考察古代书籍散佚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他又曾结合洪业对敦煌卷子中被误认为是《修文殿御览》残卷的论证文章，讨论古代类书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这种思路对于习惯于按照中国传统古籍校勘方法去思考问题的我们来讲，应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后来我们讨论到辑佚得来的材料如何编排成书的问题，按理说，清代和民国时期兴起的古籍辑佚做法，一般就是把摘录来的材料汇集成篇。我们要做到这样并不困难。可是我们总想能有所创新，做深入一些。反复思考后，杜教授提出《资治通鉴考异》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于是我们想到了先去考证《三国典略》一书的原本体例，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史书的编写类型与各类史书的特点，确定了《三国典略》一书应该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从而可以将辑佚的材料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起来，更好地反映出这本佚书的原来面貌。这样初步编排后，我们欣喜地看到，所搜集的佚文能够显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结构，甚至可以通过排列的文字了解《三国典略》一书的写作体例与文体风格等具体特点。杜教授和我一致感到这条路子走对了，以后的工作就做得更加愉快，不仅把《三国典略》的整理工作按时完成，杜教授还用这项研究成果做过专门的学术报告，去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史书的编写过程与古代类书的形成方式。

这项工作完成后，杜教授曾经如释重负地告诉我，由于他从来没有在学术研究上与别人合作过，更不要说和中国学者合作了，开始时他很担心，怕不好交流或者做不出成果来，没有想到我们合作得这么愉快，并且双方都有很大收获，真令他高兴。以后，杜教授还多次和别的学者们谈起我们的合作与

友谊，说明这次合作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英国大学的教授比起我们大学的教授来不知要忙多少。杜德桥教授身兼多职，更是忙得一天到晚团团转，除去教授众多课程与指导研究生外，还有研究所的管理，中文系的管理，学校教授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其他学术活动等等。但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是尽量抽时间和我讨论研究工作，带我去图书馆，去拜访其他汉学研究的教授，甚至专门开车带我去剑桥大学参观，领我看他在剑桥读书时住的宿舍，一路给我讲他与剑桥、牛津和中国文化的渊源，那种热情与坦诚，那种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让我感到一种心灵默契的感应，一种深深的情谊，好像和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在一起。中国有句古话叫"白首如新，倾盖如故"，我们大概都有这种相同的感觉。

英国人都有喝午茶的习惯，每天下午5点多钟，研究所里的教师、学生往往都要休息下来喝杯茶或咖啡。紧张忙碌一天的杜教授在这时才能放松一下，如果这时我也在研究所中工作，他就叫我一起在他的办公室中喝茶，同时天南地北地聊聊天，因为这以后他一般没有课了，可以不担心时间。至今闭上眼睛，还可以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四周满壁书架，一杯普通的红茶，几块饼干，窗外逐渐昏暗下来的暮色，伴着杜教授富有韵律的话语，造成一种温暖舒适的文人环境，令紧张工作一天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与休息。通过这些轻松愉快的闲谈，我对杜教授的学术生涯和学术造诣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杜德桥教授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中，幼年过的应该是不怎么富裕的普通平民生活，他出生在布里斯托，而在英格兰西南海滨的一个小镇克雷文顿度过了少年时代。在中学时期，他就表现出对语言、文学的爱好与突出的语言天赋，学习了法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并对英国文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在1956年获得奖学金，同时被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录取。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入学前要先服两年兵役。所以，杜德桥在入伍时选择了在军队中接受俄语训练，拿他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体格不适合拿枪。我想，这也正表现了他善良和平的学者心性吧。

当了两年不拿枪的兵后，杜德桥又到德国佛莱堡大学短期学习了德国文学。1959年10月正式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中文，主要研究小说和戏剧。1962年毕业后，师从张心沧教授读博士学位。他选择了《西游记》作为自己的博士

论文研究内容，为此，还到香港新亚研究所（今香港大学新亚学院）留学访问。这第一次来到东方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可以说奠定了他的一生，不仅通过与众多中国学者的交往坚定了他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决心，而且还找到了他终生的伴侣——当时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罗凤阳女士。

1964 年，杜德桥回到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继续撰写博士论文，同时申请到牛津大学讲师的工作。1966 年，杜德桥开始在牛津大学任教，1967 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4 年，杜德桥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又被聘为剑桥大学中文教授。自 1985 年起在剑桥大学工作 4 年。1989 年以后，杜德桥回到牛津大学做中文教授（邵逸夫讲座教授）和中国研究所所长。他的主要研究方面始终围绕着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古代宗教思想等内容。他的主要著作有：

西游记：16 世纪中国小说来源的研究（*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妙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shan*. first published by Ithaca Press in 1978; the revised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e in 2004）

李娃传：9 世纪一个中国故事的研究与校订（*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London: Ithaca Press, or the 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唐代中国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戴孚《广异记》研读（*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80 年的台湾南部原住居民（*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papers by the South Cape lightkeeper George Taylor.* edited and with introdution by G. D.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and the Shungye Museum. Taipei. 1999）

中世纪中国的佚书（*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The Panizzi Lectures 1999,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0）

以及十多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

《西游记》一书是杜德桥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起点，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西游记：1592 年的一百回本及其源流版本的研究》。在这篇论文以及其他有关《西游记》版本的研究中，他利用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校勘学以及传记研究等方法对《西游记》的各个早期版本加以分析比较，试图去搞清楚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追溯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的原型，考察这一传说从口头文学到戏剧、小说的演变经过，由此深入到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在这些早期的研究中，杜德桥教授已经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熟练掌握程度与对中国文化的钟爱。在这以后，他又通过对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译与研究，将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同时，他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古代历史研究与古代宗教思想研究的重要价值，把自己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中国古代历史与民间宗教等方面。对《妙善传说》以及有关民间宝卷的研究，对《广异记》的研究等都是在这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关于妙善传说的研究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中观音信仰的流行，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课题。杜教授从一件碑刻——北宋翰林蒋之奇所作《香山大悲菩萨传》入手，讨论了有关的各种古代文献、民间宝卷、宗教经籍乃至戏曲、传说等资料，“依据新发现的证据来叙述妙善故事的背景和它从 11 世纪到 14 世纪之间的演变过程；讨论以后产生的没有被详细研究过的重要版本；指出其中的关系和一些重要的模式；探索故事的原始资料，故事的发展模式，故事所涉及的社会和文学环境”。这部著作不仅在古代民间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也成为一部民间宗教信仰与民俗研究的经典之作。

国内有学者曾总结出杜德桥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主要特色有：灵活运用各种不同材料，将各个学科的理论都加以融合，为己所用。善于采用新角度来对待传统材料，不仅局限于经卷或是民俗学的口头传说，更多地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传奇、志怪等文学作品来开展研究，发掘了文学作品在历史以及宗教上的新内涵等。从杜德桥的研究成果来看，他很善于发掘传统文学史中较边缘的作品，他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是些不怎么著名的在文学史上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作品。故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大多能够填补有关方面的空白，同时

显示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厚的功力。而他自己却很谦虚地对我说过，中国文化毕竟不是他们的母文化，他们欧洲的汉学研究者由于语言和了解中国文化方面的限制，不能像中国学者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课题做全面的论证，只能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我觉得这正反映出杜教授实事求是的学风与谦逊朴实的学者本色。我也见过有些海外学者，总想对中国学者指手画脚，表现出自己的研究方法高人一头。杜教授的为人正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他那种由小见大，由微观到宏观的专题研究是很高超的，所得成果与表现出来的研究方法比很多空洞浮泛的所谓大课题有用得多。

海外学者对于研究资料的重视程度极高，这一点在我与各国学者的交往中感受颇深。他们可以用多年时间到处去搜集与自己研究有关的资料，念念在兹，一旦有所收获，往往欣喜若狂。自然，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研究条件比我们要好很多，有条件去各地寻找资料，但是，这种对于学术钻研十分专注的精神，也是很值得学习的。杜德桥想要去寻找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就让他一直念念不忘。在牛津时，他曾经详详细细地把他去河南宝丰寻碑的经过讲给我听。也难为他，在还没有全面开放的 80 年代初就一个人跑到偏远的宝丰县城去。当地的官员没有让他去看香山寺，只答应提供他一份拓本（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但是当地介绍名胜时一直说这件碑的拓本去牛津大学展览过）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了。在我们聊天时，杜教授对宝丰的香山寺充满了向往，也为没有能亲眼见到那座石碑而遗憾。为了弥补他的遗憾，我回到国内后，曾和河南文物研究所的朋友们专门去了一次香山寺，拍了一些寺院和宝塔的照片送给他看。他非常高兴，并且把香山寺的照片用到了再版的《妙善传说》一书中。近年宝丰县当地的领导找我们，介绍了他们重修香山寺和建设香山文化园的规划，并表示将邀请杜教授来参观，看来杜教授的心愿很快就会实现了。

英国人大多从小就受到很好的音乐教育，都会演奏乐器。杜教授就弹得一手好钢琴，可以演奏不少名曲。有时他和中文系的其他老师来个钢琴、小提琴合奏，能够让大家都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可惜工作太忙，这样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到他对生活，对生命，对美好事物深深的热爱，也就更能体会到他善良美好的内心世界。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为了要赶班机，早上 7 点就得去乘巴士，所以前一天

就向杜教授告别了。但是没有想到，在我踏上巴士的时候，竟看到杜教授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赶到了车站。他还是坚持从老远的家里提早赶来给我送行。我的行囊顿时变得无比沉重，那里增添了杜教授太多太多的深厚情谊。巴士驶出时，我从车窗望去，杜教授还在那里微笑着挥手，寒风卷起了他稀疏的白发。这一感人的情境，至今还清晰地映在我的眼前。

以后，杜教授几次来北京访问、讲学，都要找我见面，聊聊各自的工作与生活。2005年，他从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职位上退休，当时来信告诉我，他新买了一架很好的钢琴，每天弹弹琴，做点研究，在家里过着幸福愉快的晚年。我2009年应邀到牛津大学作客座教授时，杜教授又接我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们老两口在整洁的客厅内愉快地弹琴，听他告诉我儿孙们来时的热闹景象，说起近来的研究课题，真有说不完的话。十多年了，我眼前的杜德桥仍然是那个专注于学术，充满活力，热爱生活，善良可爱的好老头。我的耳边不禁又响起他发自内心的感慨："我们的一生最幸福，因为我们一直从事着自己喜爱的事业。"

被人遗忘的日本人八户弘光

——19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往来的一例

陈　捷

本文考察19世纪60年代活跃于横滨、上海和香港等地的日本人八户弘光在中国的活动。八户弘光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与当时普通的日本人相比，却有一番相当特异的经历。他曾担任美国商人Eugene Miller Van Reed的翻译，到过欧洲、美国，1866年开始在香港、上海的美国Heard Augastine & Co.公司（中国名为琼记商会）工作。他不仅懂英语，而且对西方的生活、风俗习惯及社会制度等有丰富的知识。另外，他受过汉诗文方面的基本训练，能够与中国文人唱和，用汉文笔谈，并擅长书法，通过诗文唱和等与上海、广州及香港的中国文人建立了友善的关系，在上海、广东和香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时在上海还很少有日本人长期居住，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为考察或进行贸易等来到当地的日本人，也曾经照顾过在香港的日本漂流民。他还是当时住在香港的王韬的朋友，是这一时期王韬的日本知识的重要来源。此外，他在香港中文报纸上发表的投稿文章曾经在清朝和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引起混乱，几乎发展为重大的外交问题。作为一位连本国政府都不承认其身份的民间人士，借助刚刚诞生不久的报纸这一媒体的力

作者单位：日本国文学资料馆研究部

量，在因西方势力的进入而呈现紧张状态的东亚国际关系中引起了一场风波。

清、日、朝三国在处理因八户弘光的文章引起的混乱时已称其人身份不详。1879年王韬访问日本时曾向日本人询问八户弘光的情况，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日本近代东亚关系史专家田保桥洁在其专著《近代日朝关系研究》中曾介绍因八户的投稿而引起的清、日、朝三国间的外交交涉，并将此事概括为“八户顺叔事件”。关于八户其人的情况，田保桥洁根据“旧幕府遗老所云”，说他是“官吏八户厚十郎的三男，后改姓大阳寺。明治维新时受雇于上野国高崎藩，曾参与藩政改革，以后担任东京府及地方属官。幕府末期曾数次前往欧洲。上述的投稿大约便是途经上海、香港等地短期逗留时的所为”[①]。关于投稿的内容，田保桥洁认为：“有关朝鲜的部分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为什么他要传布这样的流言，实在令人费解。”此后，在讨论近代清、日、朝三国关系的论著中有不少提到“八户顺叔事件”，但是研究者们对八户顺叔本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②]。除了提到“八户顺叔事件”的著作之外，关于八户弘光的论文有福永郁雄《顺叔八户先生的消息》[③]、歌野博《谷户喜三郎——海国异人的肖像与足迹》等[④]，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几乎都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史料。此外，冲田一的专著《日本与上海》和论文《The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关于幕末日本的相关报导》中注意到八户在上海的活动，可惜其结论只是“八户的身份背景不明，但确为这一时期出没于上海有关资料中的人物”[⑤]。在王韬研究中，经常有人引用《瓮牖余谈》中“日本宏光”等项作为分析其日本认识的资料，不过对八户的叙述大多不超过王韬提供的情况[⑥]。

---

①田保桥洁，《近代日鮮関系の研究》第二章，东京：文化资料调查会，1964年据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版复制版。下同。

②如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在提及这一事件时关于八户其人只有“八户某（经历不详）”几个字。此外，佐佐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观と西洋观》（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中也言及这一事件。

③福永郁雄，《顺叔八户先生の消息》，《明治村通信》第216、217号，1988。

④歌野博，《谷户喜三郎——海国异人の肖像と足迹》，《あうろーら》第20号，2000年7月。

⑤冲田一，《日本と上海》，上海：大陆新报社，1943。引文见《ノースチャイナヘラルドの幕末時の日本关系记事》，《龙谷大学论文集》第417号，1980年10月。

⑥近年言及王韬《瓮牖余谈》中“日本宏光”一条的论著有唐权《日中文化交流秘史——海を越えた艶こと》，东京：新曜社，2005。另外，清末中国人记录中“八户弘光”的“弘”字写作“宏”是避清帝之讳。

本文希望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散见于日中两国人士记录中的八户弘光的踪迹进行整理，对这位在明治时期就已经被遗忘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活动加以考察。

一、征韩说的风波

在考察有关八户弘光的记录之前，让我们先简略叙述一下引起清、日、朝三国之间政府外交交涉的所谓“八户顺叔事件”的经过。

同治六年（日本庆应三年，1867）二月十五日，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朝鲜对外关系的密折在报告了欧美各国动向和日本政府准备征讨朝鲜的传言之后，作为消息来源的说明，附录了五份有关的报纸消息，其中两条来自一位叫“八户顺叔”的日本人的投稿。总税务司赫德（R. Hart）寄来的报纸内容是：

> 闻日本名儒八户顺叔先生言：迩来其国政治风俗革故更新，蒸蒸乎日臻上理。六艺之内，舍弓箭而专习剑舞，骑乘则教之以坐作进退，火器则训以施放纵击，水师则导以驾驶轮船，俾其洞悉水火二力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术。今其国中已有火轮兵船八十多艘，可谓盛矣。前日江户政府选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国伦敦学校肄习文字，皆系英俊之士。其齿由十二岁至二十二岁，衣冠之欧罗巴，翦发持棍，效其装束，长官左右袖则以金线五匝，以别等差。皆能通英国之语言文字，所异惟腰系二刀而已。又有江户政府督理船务将军中滨万次郎，于月前特至上海制造火轮船。其智慧灵敏，能深悉机括关键之精微，近日已启行回国矣。国中共有二百六十名诸侯，前由大君诏至江户京师，会同议政，务要整武备，大震国威，以征不庭。现有兴师往讨朝鲜之志，因朝鲜五年一朝贡，至今负固不服，此例久废故也。[①]

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51—53页，文书三十八。《同文汇考》原编续卷洋船情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同治六年二月乙亥项也加以引用，但文字略有不同。

在这篇文章中，八户介绍了日本在政治、风俗及军事方面的改革和军力的增强，在幕府派遣十四名留学生到英国学习、中滨万次郎到上海考察火轮船等事实之外，声称因朝鲜王废除每五年一次向日本朝贡的旧例，故日本大君诏命二百六十名诸侯会集江户，将要征讨朝鲜。八户的另一篇投稿是由三口通商大臣寄来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收录的摘要比较简略，根据《同文汇考》，文章中提到了新罗王对日本的归化和三韩从属等问题。文章开头有"有日本国客人名八户顺叔送来新闻原稿"等说明，可知文章出自八户弘光之手[①]。

在朝鲜国内刚刚发生了法国传教士被杀等与朝鲜对外关系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关于日本准备征伐朝鲜的报导在清政府内部造成紧张，特别是令清政府加强了对日本政府的戒心。总理衙门在同一天的附片中云：

> 臣等反复思维，此事如果属实，朝鲜虽属弹丸，若英法各国与之构兵，其志不过在于传教通商，两国互相牵制，未必遽攘其土地为己有。至日本无所牵制，难保不贪其土地。设朝鲜为日本所据，则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中略）是朝鲜被日本之兵，其患较被法国之兵为尤甚。[②]

这段文字明显地表现出大臣们对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威胁有一种危机感。

在此之后，清朝政府立刻通过礼部密咨朝鲜国王，以确认报纸报导的真伪。朝鲜方面也感到震惊，先是在给清朝礼部的回信中表示朝鲜国王向日本朝贡等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同时通过对马藩向日本政府发出了追问的文书。这份公文中在引用了上述报纸报道之后云：

> 八户顺叔者，不识为何状人，属籍之的在贵国既不可详，流寓之现因何事又未必诘。而窃怪其捏造誓诬，恣意诪幻，公肆流播，无所顾畏。揆

①《同文汇考》原编洋船情形，韩国史料丛书二十四。《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52页，文书三十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同治六年二月乙亥。

②《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54页，文书三十九。《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同治六年二月乙亥。

诸事理，实是穷究不得者矣。[1]

在抗议八户无中生有的捏造的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明确的答复。对此，幕府在慎重协议之后，派当时在倭馆逗留的讲信大差使送去以对马藩主的名义发出的回函，正式承认八户的言论是“荒诞虚妄、毫无形迹”的“流言”[2]。

八户顺叔的投稿引起的这番纠纷终于以日本方面正式否认的方式被平息下去。但是，这一事件对此后的日朝关系仍然产生了影响。正如田保桥洁在《近代日朝关系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清政府向朝鲜确认朝鲜向日本朝贡、国王到江户朝拜大君等传闻的真假一事本身被朝鲜方面视为耻辱，幕府对征伐朝鲜的否认和派遣使节的行动反而让朝鲜猜疑日本是否别有居心，因而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中日朝邦交在精神上的障碍”[3]。

那么，这位给清、日、朝三国外交造成麻烦的“八户顺叔”是怎样一位人物？这个时期为何会在香港，是出于什么目的写这样的文章呢？如果像田保桥洁推测的那样，这是他在前往欧洲途中暂时逗留上海、香港时的行为，那么他通过什么途径与当地的中文报纸取得联系？为什么要特意在前往欧洲的中转地留下这样具有挑衅性的文章呢？为了回答以上疑问，需要对八户顺叔其人有更多的认识。

二、前往中国的日本人记录中的八户弘光

八户顺叔名喜三郎，又名弘光，日本安政六年(1859)即为当时美国驻日本神奈川总领事馆书记生、美籍荷兰人 Engene Miller Van Reed(1835—1873)担任翻译。庆应元年(1865)，Van Reed 因病回国疗养，八户随之同行，访问了 Van Reed 的故乡宾夕法尼亚州及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城市，并受到约翰逊总统的接见。1866 年初，二人在檀香山逗留一个月之后前往香港，中途遭到海难，幸而获救，于同年六月回到横滨。但是八户因为违反了禁止私人

①《日省录》，李太王丁卯年七月三日，首尔：首尔大学校奎章阁，1994。

②《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91 页，文书七十五。

③田保桥洁，《近代日鲜関係の研究》第二章。

擅自前往海外的规定而被拒绝入国，只好再次返回香港。此后，八户在与Van Reed关系较深的美国商社琼记商会工作，并因工作关系经常往来于上海、广州和香港之间。从这一经历可知，八户给中文报纸投稿时并不是在前往欧洲的途中，而是在他为琼记商会工作期间。

因为当时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八户的存在非常特别。他自己听说有日本人来上海的消息也主动前往见面，并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这一时期到过上海或香港的日本人的记录往往会出现他的名字。譬如，庆应二年(1866)和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中村敬宇一起率领幕府派遣的十四名留学生前往英国的川路太郎，在其《英航日录》中对在上海时偶然相遇的日本人八户有以下叙述：

> 其身份本为将军家臣次子，因先年游横滨，遇美国人，遂至此地。颇能书，通诗文，且善英语。性格资质极佳，甚为政府着想。既从怀中取出上海报纸，出示其中称赏日本政府政体之处。(中略)此人在上海颇有名。香港报纸上亦以日本人"恪"而著名。①

记录中未留下这位日本人的名字，不过，从"恪"与"顺叔"之"顺"字意义相通，此人兼通诗文书法和英语，而且在上海、香港都出名，还特意带来赞赏日本政府的报纸向人夸示等情况看，这个人应当就是八户弘光。

不过，另外一位同样是在庆应二年来到上海的土佐藩藩士谷干城，在日记中则对八户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 (八户)洋夷味道十足，言语不堪入耳。且自负甚高，在香港报纸用自己的名字登广告，其轻薄可知。②

这位初次来到上海这个商业化城市的年轻气盛的土佐藩士，似乎对八户弘光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如此鄙薄八户的谷干城大概不知道，这年十一月到

①据川路柳虹《黑船记——开国史话》转引，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53。原文日语，笔者译。
②据冲田一《日本と上海》198页转引。原文日语，笔者译。

达香港、翌年一月回国的日本八丈岛漂流民在香港得到八户的照顾，正是通过八户的翻译和谈判，漂流民才得到英国总督的保护，并由英国船送回日本①。

此外，庆应三年一月由滨松、佐仓等藩的九位藩士组成的贸易考察团来到上海，在沪期间，从联系住宿到参观购物，都得到八户的帮助照顾。一行从上海去南京的旅行也由八户同行。贸易考察团的成员之一、后来成为明治时代著名画家的高桥由一的《上海日记》中频繁出现八户弘光的名字，他在上海画的速写中还为八户弘光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像②。

在当时曾到上海的日本人留下的记录中，有关八户弘光的记载最多的是八户的好友岸田吟香在上海期间所记《吴淞日记》③。

庆应二年九月，为了帮助美国人平文校对印刷第一部日英词典《和英语林集成》，岸田吟香随平文来到上海，并住到翌年四月末。他和八户在横滨时就认识，在日本人极少的上海，更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吴淞日记》庆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有以下记载：

> 我先来到上海，不久弘光也来了。我们俩还在这里磨磨蹭蹭，后来又来了木村，接着是川路、中村、佐藤、箕作、伊东、福泽等。④

回国以后的日记中谈到八户，也说他是“在中国时最好的朋友”(见后)。《吴淞日记》频繁出现有关八户的记录，是考察这一时期八户弘光在上海活动的宝贵资料。

在这些记录中，我们先看一下与报纸投稿事件有关的资料。

根据《吴淞日记》，庆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一周之后的二十二日，岸田

---

①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藏，《在香港英国镇台八丈岛漂民救助一件》，《续通信全览》收录。

②高桥由一，《上海日记》，原本藏于东京艺术大学博物馆。文字内容可参阅青木茂编，《明治西洋画史料 记录篇》，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86。

③《吴淞日记》原本一部分由其子孙保存，近年被捐赠给岸田吟香故乡冈山县的岸田吟香纪念馆。这些资料曾由圆地与四松整理，于 1931 年到 1932 年陆续刊载于《社会及国家》第 185、188、190、192～194、197～200 各号，东京：一匡社。

④《社会及国家》194 号，97 页。原文日语，笔者译，以下同。

吟香曾两次访问琼记商会，询问八户弘光回上海的日期[①]。庆应三年一月十日日记写道："弘光来打招呼说从香港回来了。好久不见，聊了很多。他说今天太忙，改日再来，就回去了。"[②]从这段记载不仅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之密切，而且可以知道，庆应二年十二月八户是在香港度过的。一月十一日也就是八户从香港回来第二天的日记云："晚上弘光来。还鞋，送我糖果。借给我六张香港报纸。"我们当然很想知道这里出现的六张香港报纸的内容是什么，可惜这天的日记没有其他的相关记载。但是，根据前一天的日记，八户弘光告辞之后，岸田吟香与平文曾谈论前一年法国传教士在朝鲜被杀以及美国船被烧等事件，并议论说："不知朝鲜为何做出如此暴虐的事，真是没有人情的国家。大概就因为是这样的国家，所以丰臣先生才会去征伐吧。"[③]根据这段记载推测，有可能八户来见岸田时曾谈起在分别期间发生的朝鲜事件。两个月后的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有以下一段记载：

> 白天到琼记看了看。弘光明天要去香港，正在打点行李。（弘光说）有个叫曾我弥一的人来了，昨天见到。听说曾去过不少地方，说是在香港看到日本女人在弹三弦。（中略）中文报纸上登了批评日本的内容，真让人生气，得找机会报复一下。我笑他说：先前弘光托报馆的先生登了夸赞日本的文章，大概是中国人看了生气才写的吧。[④]

这里提到的"弘光托报馆的先生登了夸赞日本的文章"，应当就是指上文所述的"日本名儒八户顺叔"的投稿。

从《吴淞日记》的记载看，八户收集中国书画，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教养[⑤]。同时，他长期为美国人工作和去美国旅行的经历也使得他对西方的语

①《社会及国家》185号、188号。
②《社会及国家》192号，103页。
③《社会及国家》192号，104页。
④《社会及国家》199号，107页。
⑤《社会及国家》192号，106页；197号，92页。

言、风俗、生活习惯有较为丰富的知识[①]。此外，从“今晚弘光来商量美国与日本之间邮船事”[②]、“晚上弘光来，商量报纸之事”[③]等内容看，他当时似乎在考虑计划在日美之间开设邮轮航线等事业。

根据《吴淞日记》和高桥由一《上海日记》可知，八户弘光于庆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再次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关于他此后的行踪，两种日记都没有记载。高桥一行四月一日从上海起航返回日本，岸田也于四月末回国。大约是因为临行前事务繁忙，《吴淞日记》只记到四月四日。回到横滨的岸田吟香在庆应四年九月十五日重新开始写日记，新日记第一天便出现了八户弘光的名字：

> 前些日子八户顺叔也从中国回来，住了一阵子，又去中国了。他回来的时候石川权五郎也来了，一起轻松地逛了逛。都是在中国时最好的朋友。[④]

由此可知，八户终于被准许回国，在横滨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返回中国。

三、王韬眼中的八户弘光

以上，我们对日本人记录中的八户弘光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下面通过王韬的著作，看一下王韬对八户弘光的印象以及八户对王韬的影响。

王韬《瓮牖余谈》卷二有《日本宏光》一节，对八户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关于与八户相识的情形，据王韬“顺叔来访予于旅舍，与之敷衽论心，叹相见晚”的叙述可知，是八户到王韬住处访问，二人互敞心扉，相见恨晚。对

---

①例如，岸田吟香看到途经上海去法国的日本人在饭店吃西餐后，在日记中写道：“西洋饮食之礼还是事先学习一下为好。弘光久居美国，故详于此事也。”《社会及国家》193号，110页。据岸田说，八户因为与西洋人交往总要握手，所以平时尽量避免用力拧毛巾，以保持手的柔软。《社会及国家》192号，106页。

②《社会及国家》193号，113页。

③《社会及国家》194号，88页。

④《はまつと》、《社会及国家》218号，92页。另外，关于岸田吟香这一时期的日记《はまつと》，可参看圆地与四松《岸田吟香の〈はまつと〉について》，《社会及国家》217号，1934年4月。

于因各自的原因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居住的两位异乡人来说，这次会面可称具有特别意义。王韬在文章中对八户有如下描述：

> 日本人宏光，字顺叔，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户，为将军贵胄，世袭华职，年仅二十六岁。瑰奇英伟，超卓不群，固其国中之俊杰也。同治丙寅(1866)五月来游香港。曾往英京伦敦，览其山川风物，详观各机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会通其旨。于英国之语言文字皆能洞晓，英人无不羡其聪颖而啧啧叹美，敬礼有加焉。又尝游金山，所至辄询以有用之学，于奇技淫巧，视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来羊城，文人才士皆乐与之交通。顺叔亦皆一一延接，务极宾主欢。于是投赠诗章盈于行箧，求书者户外屦常满。顺叔于书各体无不工，而尤善钟鼎篆隶，因此书名大噪于粤东。比将返，辞于诸故人，祖道东门，自梅观察以及士大夫悉赠诗以壮其行色。即下至闺媛，亦以诗歌赠答，顺叔之震耀于时如此。吾观日本近来人材迭出，务在留心经世实学。欧洲文士所译天文历算医术格致各书，无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语便览》、《历代纪年》，于西国情事洞若观火。而国中亦有轮船炮局，力讲富强。呜呼，志岂在迩哉！今顺叔亦如是耳①。

关于八户的出身和门第，王韬用了“将军贵胄，世袭华职”八字，与上文引用川路太郎的“其身份本为将军家臣次子”的说法不同，大约是根据八户自己的介绍。这里关于八户年龄的记录不见于其他资料。关于八户曾去过伦敦的记述与田保桥洁的说法相符，但是也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尝游金山的记述应当是指与 Van Reed 一起赴美之事。不见于日本人记录的是，据王韬说，八户在香港、广州与当地文人广泛往来，除了诗文的唱和赠答以外，还擅长书法，很多人前往求书，以致其住处门庭若市。但是王韬最为关注的是，日本不仅有很多像八户顺叔这样注意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深入钻研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明了熟悉西方形势的人材，而且在国内增设造船厂和兵工

①王韬，《日本宏光》，《瓮牖余谈》卷二，光绪元年(1875)上海申报馆铅印本。

厂，每天都在努力探求富国强兵的策略。

庆应三年(1867)，八户陪同高桥由一、名仓予何人等考察团成员前往南京。王韬事前得知此事，于是为他写了一篇题为《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的壮行文章。文章中对八户做了以下评价：

> 日本八户宏光，余海外文字交也。宏光姓八户，字顺叔，为日本国都江户人。祖若父皆有位于朝，固东瀛贵胄也。顺叔少读儒者书，顾不乐仕进，喜留心当世经济，慨然思为汗漫之游。曾遍历欧洲诸国，习其国文字语言，揽其土风俗尚，辨其舆图形胜，皆一一罗列胸中，非所谓当今有志之士哉。①

他以八户为"海外文字交"，将其描写为一位出身于贵族，既有传统的学问、教养，又对现实社会问题具有深切关心的日本青年，赞赏他少读儒书，胸怀大志，周游欧洲列国，懂得其语言文字，熟悉其风俗地理，是一位有志之士。

除了游历西洋的经历和对当时世界形势的独自观察以外，八户对当时日本国内局势的看法以及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介绍对王韬来说也十分重要。《瓮牖余谈》中共有五条与日本有关的内容，除上面引用的《日本宏光》之外，卷三《日本风灾》是关于当时日本发生的风灾的报导，卷四《日本略记》转述理雅各(James Legge)访问日本时的见闻，其他两条都与八户弘光有关。

卷四《通商日本说》在回顾清朝顺治朝以后中日贸易的历史之后，引述八户关于中日通商的见解，从欧洲各国先例与中国商人的利益两方面分析了中日两国缔结邦交和通商条约的必要性：

> 八户顺叔遍游内地，与名公卿大夫交，笔谈往复，每以两国通商贸易立约和好为主。谓中国与日本文字可通，书籍不异，名人胜流皆喜涉历东瀛，览其山水，观其人物。况日本所产之漆器、细绸为中国所罕有，而

①王韬，《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长洲王氏上海重排本。

如人参、香蕈、鲍鱼、海带等物，亦系中国食馔所需，视为珍品。若是，则以有易无，以贱征贵，亦可各得其所，均沾厥益。迩来欧罗巴洲各国公使皆奉其国王之书函前来日本，讲好修睦，开埠建行。日本王亦各遣公使往诣各邦，以敦邻谊。即如荷兰一国，于二百年前与中国同在长崎岛通商者，近亦遣公使至日本，携其国书，请于横滨、箱馆往来贸易，日本王已许之矣。以此观之，欧洲绝不通商之国，今皆通书使立条约，舶舰鳞萃，商贾羽集。而中国素所交往者，反绝迹焉。此窃所未解也。且两国既已通商，设立领事，驻扎公使，一援欧洲各国之例，于中国土商亦甚便焉，何为计不出此耶？顺叔所论如此，亦自有见。

也就是说，日本的漆器、细绸和海产品为中国之所需，开展贸易对彼此都有利益。近年欧洲各国均与日本缔约进行贸易，连二百年前与中国同在长崎通商的荷兰也派公使至日本请求到横滨和箱馆进行贸易，并得到日本王的许可。但是与日本来往既久的中国却反而没有缔约，令人难以理解。应遵从欧洲各国之例，在两国间缔结通商条约，设置领事、派遣公使，这对中国商人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事，为什么不采取这一办法呢？

卷五《日本文字》中又引用八户之言介绍有关日本文字基础知识云：

日本国书多以汉字倭字相间缀文，读之殊不易解，而汉字亦读以倭音。据顺叔云：倭字亦有今体古体之分，而古体较为难读。日本古代之语，不学国书，古时和歌，非善诗家不能解也。其制字之源，由于日本僧宏法大师（笔者按：指日本入唐僧弘法大师空海）入唐土后归国所作，共有四十八字母，俗云比良假名。比良者，译即安之意。假名者，借之一法也。其后又有片假名，制之者未知何人，不见于书史。其谓片假者，即存汉字半边之意。如毛字作モ，吕字作ロ之类，笔划均取其减少。

从以上例证看，这一时期王韬的日本知识很多来自八户弘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瓮牖余谈》卷二《日本宏光》的后半段，王韬用“顺叔谓予曰”五字引出八户关于日本近年改革的一番议论云：

顺叔谓予曰：迩来国中政事风俗大有更革，蒸蒸丕变，日臻上理。六艺之内，既舍弓箭而专习剑舞，骑乘则教之以坐作进退。火器则训之以施放纵击，水师则导以驾驶轮船，俾供洞悉运用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术。今国中已有火轮军舰八十余艘（王韬注：按此乃夸词，日本所有轮船只二十余艘耳），可谓盛矣。前日江户政府选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国伦敦学校肄习文字，皆系英秀颖异之士。年齿由十二岁至二十二岁不等，衣冠之制多仿欧洲，剪发持棍，效其装束，长官左右袖则以金线五匝，以别等差。皆能通英国之语言文字，所异乎西人者，惟腰系二刀而已。江户政府督理船务将军中滨万次郎月前亲抵上海制造轮船局，知其机括关键，深悉其微，近已启行回国矣。国中共有二百六十诸侯，由大君颁诏谕召至江户京师，咸集议事，务欲整顿武备，奋扬国威，以征不庭。现有兴师往讨朝鲜意。粤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国王闻日本有圣王，始遣使朝贡。此当中国汉成帝和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亲统六师渡海征新罗，新罗王稽首称臣，愿备藩服，贡珍宝，高丽、百济亦皆恪顺内附，三韩悉服，女帝之功烈远矣哉。此当中国汉献帝建安六年也。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上将军平秀吉遣兵伐朝鲜，取之，大败明之援师，明遣使乞和。此当中国明万历二十年也。凡此皆载在史册，武功震耀，不遑枚举。西北诸藩历来臣服，朝贡弗懈。即如琉球丛尔邦，向为日本西国诸侯之属，隶于萨峒摩一岛，久奉正朔。慑我王灵，凡遇国君践位，必诣江户拜谒大君。至于朝鲜，五年一朝贡，至期亲至京师。此各国贡献之古例也。今朝鲜王负固不服，久废此例。是以将厉兵造舰，声罪致讨云。①

这段议论从内容到文章的字句与本文最初引用的总理衙门奏折所附的八户的报纸投稿基本相符，其中还言及《同文汇考》引用的关于新罗王归化日本和三韩从属等内容。文章最后说：

①王韬，《日本宏光》，《瓮牖余谈》卷二。

此皆顺叔所述者。稽古称今，言皆有物。铺张国家之宏功，扬厉君相之伟业，赫赫乎令人想见其国之方兴未艾也。真可谓华国之儒，学古之彦矣。[①]

可见，与清朝政府和朝鲜官员观点不同，王韬通过八户的介绍，感到日本通过改革正走向不断振兴之路，对极力彰显国家功业和日本君臣努力的八户的做法表示赞赏。从"顺叔谓予曰"的说法看，这里与报纸内容相同的部分或许并非自报纸转引，而有可能是直接从八户处听来的。当时王韬担任《孖剌报》(*Hong Kong Daily Press*)中文副刊《近事编录》的编辑，与《华字日报》也有很深的关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推测刊载八户顺叔文章一事本身也许就与王韬有关。

王韬自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1862)在香港英华书院帮助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当时因乘船前往欧洲而途经香港的日本人经常到英华书院参观，王韬有时也担任向导，有机会与日本人进行笔谈[②]。王韬从欧洲回到香港之后，名声越来越大，认识的日本人也逐渐增多。特别是1879年应邀访问日本之后，他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日本通"之一。但是只要查阅他六十年代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这时对日本的知识还十分有限，八户顺叔的名字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频繁出现，说明作为日本知识的信息来源，八户的存在对当时的王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879年到日本访问时，王韬首先向重野成斋、藤野海南、冈鹿门等日本文人询问八户的近况。王韬《扶桑游记》对此事有如下记录：

偶询及八户宏光近况，则诸文士无知之者。盖其人多居横滨，不与诸文士交接，迩来碌碌不得志。或有知其姓名者，则以余书中曾述之也。转咎余言为失实。噫嘻，一部十七史，大抵作如是观。[③]

---

①王韬，《日本宏光》，《瓮牖余谈》卷二。

②关于日本人在香港访问王韬的情况，可参看周佳荣《在香港与王韬会面——中日两国名士的访港记录》，《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

③王韬，《扶桑游记》卷上，光绪五年闰三月三十日。王韬到达东京是在二十五日。

也就是说，在中国被当成“东瀛贵胄”的八户顺叔在日本几乎被人遗忘，日本文人们反而是通过王韬的著作才知道此人的名字。

关于此事，日本汉学家增田岳阳（名贡）编辑的他与当时到日本的中国文人的书简笔谈资料集《清使笔语》中的一段记录恰好可以与《扶桑游记》相印证[1]。增田与王韬初次见面时首先对王韬说：

> 江东硕望紫诠王君足下：贡阅贵著，其《瓮牖余谈》载八户宏光事。宏光伤足下之抑塞，说涉纵横，而足下拒之。彼复自言江户将军之族子。将军姓德川，何其诪张也。

他并且表示，自己来拜访王韬目的是“欲证缟纻之盟，非复仿宏光纵横之辩也”。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八户弘光不过是一个冒充贵族、狂妄嚣张的小人。

四、八户弘光与广东文人的交流

从《扶桑游记》中除上述内容之外没有再提到八户的情况看，王韬以后大概放弃了进一步寻找八户弘光的努力。不过笔者在调查整理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访问东京的中国外交官、文人们往来密切并热心保存收集中国人笔谈书信资料的日本高崎藩最后一位藩主大河内辉声留下的文书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有关八户弘光的新资料。这些资料属于大河内辉声后代大河内辉信保存的其祖父留下的文书资料中的一种，原来题为《八户顺叔关系资料》，20世纪70年代作为《大河内文书》的参考资料拍摄成胶卷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和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后来原件也捐赠给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重新装裱成册之后改题为《李长荣笔谈资料》，现在收藏于早稻田大学中

[1] 关于增田岳阳及其《清使笔语》，请参见拙稿《增田岳陽と来日した中国知識人との交流—岳陽と中国人の筆談録〈清使筆語〉を通し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四二册，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3月）及《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所蔵〈清使筆語〉翻刻》（《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四三册，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3月）。

央图书馆特别资料室。本文开头提到，田保桥洁曾经说，根据从旧幕臣处听到的传闻，明治维新之际八户曾经受雇于上野国高崎藩参与藩政改革。从这一线索看，这些资料保存在大河内辉声收藏的文书资料中或许与此有关。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么大河内辉声对八户弘光以后的动向应当不会毫不知情。王韬在东京期间也曾与大河内辉声见面并受到他的款待，却没从大河内辉声那里听到八户弘光的消息，这对王韬来说可谓是一件憾事。

《李长荣笔谈资料》是八户弘光与他在丙寅年即 1866 年因琼记商会的工作暂住广东时结识的中国文人李长荣、何桂林、邓大林、包三鑢等人的诗文唱和书简往来的记录，均为李长荣等人给八户的书札、诗稿，实际上并没有笔谈的资料。从资料看，这些广东文人的中心人物是李长荣。李长荣字子黼，又字子虎，号柳堂。他汇集师友们的诗作编辑出版《柳堂师友诗录初编》，又有集录为纪念苏东坡生日而召开的雅集上创作的作品而成的《寿苏集初编》及收录自己与日本人唱和诗的《海东倡酬集》等著作[①]。八户弘光保存的这些资料内容包括请八户前往参加纪念东坡生日雅集的邀请函，向八户赠送礼物、寄诗请八户唱和或请八户题字时的书札，让我们联想到上文引述的王韬《日本宏光》中所说的“投赠诗章盈于行箧，求书者户外屦常满”的情景。根据李长荣的书札还可以窥知，八户弘光钦佩李长荣的诗才，曾经请求拜其为师。

另一方面，李长荣也特别在《柳堂师友诗录初编》最后安排了“海外”之部，收入八户弘光的汉诗《顺叔吟草》十首(见附录二)。从《顺叔吟草》第一首诗题“初到粤东”下注“同治壬戌”来看，八户初到广东是在 1862 年。

此外，上文提到的《海东倡酬集》是李长荣将与自己有书信来往的日本人关义臣及关义臣的友人铃木鲁等人的唱和诗编辑而成的中日文人唱和诗集[②]，诗句自注中曾多次言及“顺叔”。例如李长荣为铃木鲁所作的叠韵诗第五首中，就曾这样回忆当年与八户顺叔的交往：

---

①关于李长荣和他编集的《海东倡酬集》，请参看拙著《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清国公使館の文化活動》，东京：汲古书院，2003，23—30 页。

②关义臣 1867 年秋天到过广东，并结识了卓少琼、吴贯之二人。当时他虽然听说李长荣的诗名，但是因时间关系未能谋面。后来吴贯之到日本横滨，关义臣曾通过吴贯之与李长荣有过书信往来，关义臣的朋友铃木鲁也通过他的介绍将自己的诗作寄给李长荣。李长荣收到铃木鲁的诗后次韵十首寄到日本，这成为他们交往的契机。

琼记楼倚画阑东，顺叔前寓琼记楼上。对岸盈盈一水通。琼记柳堂仅隔一水。

烟雨半帆寻李虎，云山双屐访倪鸿。

因君寄句来今雨，谓鲁翁。与我论交有古风。

回首六鳌洲上客，琼记在河南鳌鱼洲。兴酣日洒万笺红。顺叔善书，求者不绝。

从注语可知，李长荣家与八户顺叔寓居的琼记分店只是一水之隔。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关系，结识了在琼记办事的八户弘光。注中“顺叔善书，求者不绝”一语与附录一中向八户顺叔求书的书札所显示的情况相同，可以与王韬的记述相互印证。此外，叠韵诗第六首注中有“曾与顺叔登粤台赏红棉”，第八首注中有“顺叔前来，荫泉招集杏庄”等叙述，都可以窥见八户顺叔与广东当地文人之间交流的情形。

五、结 语

以上，我们对日本幕末时期在横滨、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活动的日本人八户弘光的有关记录进行了考察。八户弘光懂英语，对西方的情况有着丰富的知识，同时又具备中日两国共通的传统文化的素养，能够吟诗题字，因而被中国文人社会所接受。他在横滨、上海、广东及香港也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日两国的现实情况掌握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当时，一个以香港、上海、广东及日本横滨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网络正在逐渐形成。

与王韬长期不能获准回国一样，八户弘光也有相当一段时间被拒绝返回日本。与王韬的怀才不遇相似，八户弘光在明治维新以后几乎完全被人们忘记，从历史舞台上失去了踪影。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在横滨、上海以及香港这样的国际都市中，共同讨论世界形势，互相交流有关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等方面的知识和见解，对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应当如何寻求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当时两国之间没有国交，民间交流的途径也极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成为两国民间沟通信息的一

种渠道。对八户弘光这样的人物以往研究甚少，今后，在回顾19世纪中期以后日中关系的变化时，对当时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的这些民间人物的存在与活动，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附录一 李长荣笔谈资料

1. 何桂林致八户弘光

分袂忽逾两月，每念先生高情绮笔，梦寐以之。而聚首之期，良未可必。天涯相遇，若是之难乎？弟入春以来与家伯瑜兄同游端溪，访碑七星岩，濯鼎湖之云瀑，流连光景，蜡屐所经，颇添诗什。殆清明时节始行返棹，会晤诸友，讯及起居，始知去腊扬帆香港，今春返辕江户。弟未申一荐，殊为抱歉，缕缕满怀，何时得与知己晤言，时度江天之梦耶？安得去秋与先生把笔停杯，文字唱酬之际，再为举觞者乎？荫泉、紫黼两公每谈及此，均切停云之忆。又闻阁下畅聚乡园，皆辄相酾酒遥贺也。兹承荫翁书画扇子，并上清丸等件及紫翁诗画一并寄上，望祈俯纳一切。伏愿鸿使时闻，玉音希勿远吝，切切。即请文安，维照不宣。

顺叔书家先生大人阁下

弟 何桂林顿首

少溪、金城、昆玉暨云松诸公附笔请安。

2. 今早与[八户]（户八）先生笔谈，见其风雅可爱，因得诗一首，书扇赠之，不过始与外国人士结一段翰墨缘耳。望代转交，并致声问好。此询金泉、金城两甥安好。

舅舅麟士白 十三日

3. 李长荣致八户弘光（残）

顺叔先生吟侣阁下：十二月廿八日何一山兄携至手书，备悉一切。复奉瑶篇，词旨温雅，格调清圆。惟书中巨擘二字、诗中立雪二字，均不敢当。东坡云："万人如海一身藏。"少陵云："转益多师是我师。"士君子主立身处世，不可有我，不可无我。有我则志矜，无我则志懈也。阁下少年进道，颇以斯言为当否？十二月十九日为苏文忠公生日，本朝翁覃溪学士年年举是会，故吾师

张南山先生赠学士诗云:"四海知公双鬓皤,年年置酒寿东坡。"仆于柳堂亦岁效仿斯例,每会约三四十词人,而一山、云臞、荫泉必在座。或诗或画,或琴或棋或笛,各奏所能。今年会中群望君至,如翘首天外之五色瑞云。停杯倚楼,各为怅怅然。自古贤豪无有不合,他日槎星再至,高会柳堂,安知东坡在天之灵不复令万里词人团圞一席。文章有神交有道,杜公之言不吾欺也。入春归帆,定检何日能至。〔下阙〕

4.(印刷)

4—①

("与年俱进"、"养真/履善"、"天生我辈/书为命/身在人间/骨欲仙"朱文长方印)

丙寅除夕书怀

如此光阴如此身,漫从现在问前因。少年同学多台阁,慈母关心望鼎茵。群念毡寒争赐暖,谓当道诸知己。自夸书富敢驱贫。名山谁负千秋业,大布衣中正有人。谓樊昆吾丈、李云巢·颜紫墟两君。

残年尚喜一心清,与水仙花又订盟。夜色五更催晓色,秋声万户转春声。立春前八日,督抚大阅乡屯,鼓角满城。胜游画舫看花约,诸友预约游春。好友寒灯守岁情。谓唐梯丹、卓斗枢两门生。为恋知音琴不典,贫家长物莫相轻。

敬呈

海政并请

和教

南海李长荣初稿("子虎"朱方印)

4—②

诸公叠赐和章奉报一律

好风吹送好诗来,不盥蔷薇不敢开。次第都如花有信,尖叉争羡客多才。遥情近绪应丛感,我唱君酬傥百回。明日即编丁卯集,斜川游兴又相催。

诗先后到者,樊昆吾封翁封、吕善卿比部元勋、华少京太守定祁、黄铭石广文德华、谢静山廉访有仁、徐伯安太守虑善、卢柬侯比部福普、胡闲笙大令廷镛、何云厓茂才文清、刘益之大使世勋、梁笛樵光禄杰庸、王眉生锟·沈芷邻泽

蘅两布衣、何一山少尹桂林、黄小鉴茂才蓉镜、胡云阁上舍锦观。丁卯花朝后十日，子虎并记。

（“美人赠我/青琅玕”白文印，“青眼/高歌/望吾子”朱文长方印）

5. 邓大林致八户弘光书札

顺叔先生大人阁下：素承雅款，奉睽经年，结想奚似。比维履祉如意为颂。客岁冬初奉接手书并绢纸，复承惠顾，贶以金编玉茗。相爱何深，弟惟有佩德不忘而已。时弟乡居，未获一接。千里停云，益深感慕。何日文驾再赋来游，藉抒积悃，何幸如之。月前挥就拙画，已托琼记洋行代为邮寄，想邀青及。兹又寄呈李淑贞女师花鸟图乙轴，并附卫生丸二匣八丸、宁神丸四匣八丸、上清丸二罐八两，画箑二持，非云报琼，聊以志好。统希察存，不胜欣豫。春风多厉，伏维顺时珍养为祷。肃此布达，即请吟安，余照不备。

小弟邓大林顿首

禊月初七日渤

（信封）

安函外暨扇绢壹卷药丸乙封烦

琼记大宝行代寄呈

日本

顺叔先生　玉披

粤省佐寿堂邓缄

6.（信封）

少爷收启

来书知悉，并致子登师一函、物件一箱，均已收得，当即代交至高星仪先生处。但物件累重，非有便人入都，恐难托寄。俟伊复信如何，再行通知便是。日本八户先生书法极佳，闻其善隶，未审可以代求否？兹送来挂屏笺四幅，希代求隶法，如何？此复，即询

刻好

叔沂撰拜手

7.(印刷)

日本国顺叔宏光远访柳堂携诗作贽赋赠二律首章末句

见风骚之道同源忠孝亦古诗人相勖之义也

海东人竟问诗来，蓬户重缘岛客开。十年前越南邓廷诚到求诗。万里云烟晃监序，一船书画越王台。笔谈各谱无声乐，主客默对以笔代谈。筹运应推有用才。君留心经济之学。早识孝经敦本意，《古文孝经》在日本。词林根柢定深栽。

通儒岂独重风骚，余事从容彩笔操。秋水夕阳词却妙，君留别句云：他日倘寻江户宅，白莲秋水夕阳边。酒龙诗虎气真豪。君集柳堂联句有云：酒龙诗虎成高会。书兼隶草精神劲，妻借梅花品格高。君自称终身不娶。今日鳌鱼洲上别，题襟还惜未题糕。君先赴香港，未践粤秀山登高之约。

敬呈

教政

丙寅九秋南海李长荣初稿

8. 李长荣致何桂林、八户弘光

8—①

请同顺叔先生明早到弟馆拜坡公生日并小饮。若伊要坐轿，我费轿金。带笔墨来，要请题画，便服。

同席 少京太守 到
孟卿各画客 到

一山仁兄 阁下

顺八户先生

弟李长荣顿首 十八日

甚多画看，请到凤和书室

8—②(名片)

李长荣

9. 李长荣致八户弘光书札

9—①欲得贵国名人字或四幅，或八幅。挂柳堂诗壁。但要好字，不论爵位。字各体俱可，款赐呼子黼。阁下代备纸，大条幅更好看。

9—②万里外诗人，难得爱我如此之深，念我如此之笃也。阁下诗有云：

"立雪门墙知善诱",隐然欲以柳堂为可师。仆初则不敢承,继而思之,如此乃成知己。古人视朋友如骨肉,况师生乎?所来《六家诗》,俱豪杰之士。作诗至自成面目,原非易事,必传无疑。初山主人诗追黄山谷,书法董香光,画追沈石田。万(下接15—②)

10. *卢熙佑致〔伍少溪〕*

10—①少溪三兄大人阁下:昨盛扰,谢谢。兹检出旧宣纸联壹副,欲求八户宏光先生大笔,即祈转交。如挥就,并烦饬纪掷还为感。专此奉达,并请文安不一,叠请
慈侍曼安

愚弟卢熙佑顿首草

六月廿二日

10—②(*信封*)

函外宣纸一卷并呈
二宅
伍三少爷　陛

卢缄

11.

再函送
顺叔诗友吟鉴

子虎手致

12.(*印刷*)

丙寅除夕书怀

如此光阴如此身,漫从现在问前因。少年同学多台阁,慈母关心望鼎茵。群念毡寒争赐暖,谓当道诸知己。自夸书富敢驱贫。名山谁负千秋业,大布衣中正有人。谓樊昆吾丈、李云巢·颜紫墟两君。

残年尚喜一心清,与水仙花又订盟。夜色五更催晓色,秋声万户转春声。立春前八日,督抚大阅乡屯,鼓角满城。胜游画舫看花约,诸友预约游春。好友寒灯守岁情。谓唐梯丹、卓斗枢两门生。为恋知音琴不典,贫家长物莫相轻。

敬呈

诲政并请

和教

南海李长荣初稿

13. 李长荣致八户弘光书札

陈蕙芳所作祈存览。江天万里,洄溯为劳,念念。即请

顺叔先生邮安

弟南海李长荣

八月廿五日

14. 李长荣致八户弘光

恭候

早光

乏价走催

15. 李长荣致八户弘光书札(9 — 15—②— 15—④— 15—③— 15—⑤)

15—①阁下一片真诚,殊无矫饰,若竟拒之,是辜来者之意也。自此以后,仆惟以贤友呼君,倘诗文稿至,仆必直摅已见,弗敢稍存客气。

15—②(上接 9)里外,恨不识其人。和诗二篇统呈吟订,并与初公商之。此段墨缘,两家不浅。吾三人俱前生香火中人也。米庵先生早采柳堂山水,神交最(下接 15—④)

15—③(上接 15—④)望寄来备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柳堂选诗,亦多多益善也。专此奉复。兹附上各件,另详一纸,并颂

吟安

顺叔贤友阁下

长荣顿首 四月十二日

15—④(接 15—②)先。仆欲辑其诗入《师友录》,伊有遗集,乞钞一本来。现《六家诗》已多采入《柳堂诗话》,闻贵处《政和三十二家诗》及《宜园百家诗》,是否如便,(下接 15—③)

15—⑤寄仆信照写

付至广东省城永清门外麦栏街中约南向解元第询交

李长荣先生收展

仍托琼记便可，因莫焕南与阁下熟也。要托琼记，信到即交。

16.（印刷）

春游怀张松庐师并柬同集及远别诸公

几家游舫几游骢，或醉晴中或雨中。话旧有情双燕语，散寒无力百花风。年年依例觞高士，倪云癯少尹每岁正月十七约同人拜云林先生生日。各各寻春忆钓翁。松庐师号珠海老渔。绿笠青蓑图宛在，柳堂悬老渔像。玉箫谁按满江红。

珠江风景似前无，挈鹭提鹕兴不孤。诗社最难得耆旧，酒多人半在江湖。停云各抱天涯感，新得恩树轩尚书自江苏来书，送华少京太守归闽。闻文树臣观察、周云圃太守将旋省。立雪谁传海外图。日本藤顺叔呈诗云："立雪门墙知善诱"，并自绘《柳堂立雪图》携归彼国。我笑阮修情未达，独酣偏限百钱沽。

敬呈

诲政

丁卯仲春李长荣初稿

上元日柳堂邀集者：樊昆吾封对翁封、袁秉初孝廉永彝、倪云癯少尹鸿、郑纪常司马绩、黄铭石广文德华、陈孟卿上舍埙、陈梅坪布衣邦士、家伯容少尹光表。十七日在山泉馆同集者，刘松堂观察印星、朱眉生大令世忠、何淡如孝廉又雄、郑月樵少尉人、于清田心·何省兰世文·沈芷邻泽蘅三布衣，主局者倪云癯。二十早根心斋同集者：华少京太守定祁、许春樵茂才荣，主局者家翠严布衣荣清。二十晚枕濠阁留集者：梁笛樵光禄杰庸。二月初八日半帆亭同集者：林午峰岳光·樊昆吾·谭玉生莹三封翁，刘荔坛承缘。胡同笙廷镛两大令，宝树上人成果，主局者卢柬侯比部福普。初十日半舫堂同集者：陈古樵刺史璞、陈少伯茂才景伊、观中上人，主局者惟心上人。十二日狮子禅林茶话者：梁宝生方伯佐中、邓荫泉中翰大林、卢柬侯，主局者林午峰。十七日大石山房同集者：刘松堂、周鼎卿太史冠、刘少坡都戎海珍、温辉山孝廉瓒、韦子研少尉庆清、倪云癯，主局者朱眉生。柳堂居士并记。

17.（信封）

17—①

外扇一持送

伍少老爷　陛

17—②

呈

顺叔三兄大人陛

佐寿堂缄

18.

今所以系天下之安危者在西人，盖一秦国之势也。然秦足以灭六国，而西人虽强，必不能统地球而一之，何也？势已先分也。英与法世雠也，外虽相助，而内挟剥肤切齿之恨。米与俄立国不同，而其人亦未必无怨于英法，则是犬牙相错，而实相制也。相错必相防，相制必相遏。此维也纳之盟，正见各国有自危之心。而其他之战争，相助实所以相夺，惟恐一国得专其利而已。然则可置西人于度外也而不可也。善为国者，当其人人争利，我独不争，而利自归之。盖各国之形势既见，而独居安而不忘危，岂徒弭乱于其国哉？其所以奠安天下者，事在数十年之后，吾可取必于今矣。昔人有言曰："先天下之忧而忧。"此言务所急者以为忧焉。方今之至急而可忧者，其教术足以诱人，其药物足以毒人。苟能不受其诱与毒，是亦足以自守矣。而务先忧者，则在有备无患，是必变易其国制，而后国可大定。此天下所引领而望之也。而何意于日本得之。日本之制，其国人出海有厉禁，盖有鉴于安边靖乱之策，使莠民不相奸而相保。故惟与中国通商，历数百年而无交侵之患，法至良也。自中国出和番之策，而米利坚人复思与通商，设不善处其间而议与构怨，当其国势，夫人而知其不可矣。老子云："受国之垢，是为天下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为人主者，孰不当守其戒哉！盖必近年江户之和议成，而后疆事可得而安也。然则犹是和议也，而何以日本独善？则谓坚守禁约，不使毒药异教流行国中。根本不摇，而后枝叶可为也。故又变通旧章，时使其大臣子弟浏览西国，而习其语言文字器械，则此数十年之后，西人之技艺尽皆变而之东。西人既失其所长，而其各国相错制防遏之情仍故结而不可解，则天下之

胜美安必不转而属之东人？东邦之形势政令自一，非如英法俄米之分其权也。苟欲有为，岂奠定其国而已哉？且天下苟无有心斯世者，不独毒药之害人为可虑，吾道不将为异端所绝灭耶？顺叔先生，东国贤大夫之子也。博学工书，自西土周游，近欲返国，而乞余赠言。余以为事之细者不足以相渎，因就余平日所愤惋者发为此论，以送其行。顺叔幸怜其郁抑而勿笑其愚，庶几绕朝赠策之心焉。

右序一篇计五纸敬请

顺叔仁兄先生大人教正

愚弟包三鑣莕洲氏未定草

19.（印刷）

新正十四日李紫黼广文以诗函致贺叠索和章依韵奉酬二首

新岁今朝喜雨初，恰承芳讯到庭除。五千道德渊源学，八万牙签邺架书。翰墨往来诗代简，杖滕安适步如车。紫黼春游有诗纪兴。堂前尽是金闺彦，羯末封胡愧不如。

好把诗篇纪岁年，集成长庆韵三千。瓣香不落初唐后，下笔能追两汉前。老我闲身聊复尔，爱君词句妙如仙。书斋幸与吟坛近，咫尺城南好便旋。

和紫黼广文除夕书怀元韵二首

百年依旧一吟身，年去年来未了因。晴日风光花绚采，阳春烟景草如茵。图书满壁家原富，金紫垂腰士不贫。紫黼来诗云：自夸书富敢驱贫。知否梅花诗屋里，岁除还有未眠人。除夕颇费屏当，至晓未睡。

柳堂深处水云清，紫黼有深柳读书堂。要与寒松守旧盟。饯岁灯花催曙色，迎年爆竹振春声。遨头宴属诗人咏，婪尾杯添酒客情。我欲寻春问舟子，野桃溪畔挂帆轻。石围塘以下一路皆种桃花，开时灿熳如锦。

丁卯上元日谢有仁未定草

20.

承命作山水一幅，即着紧挥就呈缴，乞察收。至求女史作画绢二块，已经发去，大约十日间方能写回，到期交何一山寄来便是。兹并送去上清丸四盅、甘露茶四匣、吾粤人往贵国作商者多有带此茶也。糖果四罐，统为莞存。端此，

并候

晚安

不具名另肃　廿四晚

21.（信封）

（背面）李长荣

（正面）恭候

早光

22. 李长荣和八户弘光诗

诗情送暖比吴绵，七字相思万里笺。高士性甘三径澹，美人妆谢六宫妍。手能经国才谁用，身早抛家累免牵。君自言不娶妻室。新辑寿苏成一集，十二月十九约君及何一山诸名流拜东坡先生生日，君以事未至。余三十年来岁举是会，拟辑前后祝坡公诗为《柳堂寿苏集》。柳堂还借巨篇传。寿苏之局君不可不补诗。

奉和顺叔先生见赠元韵即请教正

弟李长荣初稿

23. 李长荣致八户弘光

23—①过柳堂则正月初七同游花埭，是辰为五羊士女开春第一盛游，不可不观。若嫌热闹，别爱清凉，则正月十七来，同拜倪高士生日。君请择于斯二者。柳堂年年除夕俱有新诗，附上四纸呈教，并分送贵国诗人。大作即和，迟数日寄上。专此即颂

吟安　并贺

春祺

如弟李长荣顿首　廿八日

另韩太守一诗付上

又方督转《岭南新乐府》四本，书后有弟跋也。绢纸俱日间付上。云癯属候

23—②（信封）外诗四纸，书四本，内信并诗二首，烦

代寄日本国

顺叔先生　吟启

弟李长荣拜托

24. 陈蕙芳、李良玉和李长荣诗韵各二首

24—①绣帏回忆坐春风，余问业于夫子五年。千里神交二客同。谓潘卧云、崔慧卿两同门。爆竹声高传盛事，梅花诗好夺天功。拜颂夫子大作瑞梅诗。晓筹未许鸡声报，短札犹劳雁翅通。却喜侍儿烧烛到，快斟柏酒贺年丰。

24—②鼓角声声彻锦城，围炉独对篆烟轻。桃花已报初春信，湖海难忘此夜情。未必怜才人似我，屡叨注意姊犹兄。谓杏村女史。来朝正好新禧象，且听清歌乐太平。

乙丑除夕书怀敬和柳堂夫子大人元韵肃请教正

女弟子陈蕙芳谨呈

24—③除夕书怀敬步家大人元韵

几家除夕醉春风，爆竹声喧盛事同。骨肉有怀期后会，诗歌无律费前功。良玉久不作诗，以此为怅。柳堂师录投诸国，家大人《师友录》已传至琉球、日本、高丽。兰石舟回泊大通。春日携侄往兰石，舟回，泊大通寺。到处太平新景象，共斟柏酒和年丰。

24—④春光如许满江城，且喜门庭气象清。一片新词投朔雁，几翻风信寄闲情。好倾竹叶论书画，偶作诗筒忆弟兄。景色年年怀未了，明朝剪彩庆升平。

敬呈

大人教正

小女良玉呈稿

25. 日本诗人八户先生衔名藤顺叔因子黼学博先生索余《梦花草堂诗集》赋此奉答即请郢政

扶桑日出号天池，六十六州标国基。词客欣来东粤地，公已再至。晁卿艳渡大唐时。晁卿至唐两次，本国人尚有拟送晁卿渡大唐诗。岐阳有庙皆尊圣，庙祀孔子，崇圣祠祀五代，庑祀七十二贤。竺院无僧不解诗。日本《宜园百家诗集》有诗僧卅余人。未获跨鳌亲往送，难将和曲效王维。

东园初稿

26.（印刷）

丙寅三月襄校冈州试竣，拟游厓山访宋慈元殿，归谒陶三广公

祠，重登白沙璧玉楼，留别聂亦峰观察暨幕中诸君及冈州戚好

东风依旧画帆开，碧玉楼高客又来。僧院过时曾话竹，冈城有话竹寺。渔矶何菱塘司马桥西渔屋。醉处尚留苔。琴尊跌宕先相约，花草精神敢自栽。五覆诗题花草精神。怪得巢痕重认燕，此邦无限好亭台。文字缘兼湖海缘，胜游两度亦关天。趨来潮打山围地，感到龙争虎战年。永福陵荒啼杜宇，慈元殿冷黯秋烟。征诗借得厓山盌，新得厓山盌，绘图征诗。残宋金瓯总可怜。

使君谓亦翁。同抱表忠心，旷代何关感慨深。要为乾坤扶正气，况教风雅振词林。两厓俎豆尊犹昔，三广陶鲁称三广公。勋名望起今。理学渊源文武略，景贤非独到题襟。

归装只有白沙碑，清畏人知却自知。海上谁怀生月夜，冯子良太守书来江西，徐子远治中书来粤西。客中我怅落花时。瞻韩两度传佳话，去春韩东园太守招校冈州试卷，今重晤署中。荐祢群公况厚期。谓文树臣观察、梅小岩太守。盼到家驹心正切，接家书知舍侄来同邑，试前列。奈西湖柳恋枝枝。冈城外有小西湖。

敬呈

教政

南海李长荣初稿

27.

拜坡公生日

十九日小酌候叙。至迟十点钟到，以早为妙，愈早愈妙。预备客到点心，恕不走催。

李长荣拜订

酒柬照信即送

顺叔
一山 两先生

请回实音

长荣肃缄

附录二　《柳堂师友诗录·顺叔吟草》　　南海李长荣子黼辑

李长荣《吟草题词》

日本国藤顺叔宏光远访柳堂，携诗作贽赋赠二律，首章末句见风骚之道同源，忠孝亦古诗人相勖之义也。

海东人竟问诗来，蓬户重缘岛客开。十年前越南邓廷诚到求诗。万里云烟晁监序，一船书画越王台。笔谈各谱无声乐，主客默对，以笔代谈。筹运应推有用才。君留心经济之学。早识孝经敦本意，《古文孝经》在日本。词林根柢定深栽。

通儒岂独重风骚，余事从客彩笔操。秋水夕阳词却妙，君留别句云：他日倘寻江湖宅，白莲秋水夕阳边。酒龙诗虎气真豪。君集柳堂联句有云：酒龙诗虎成高会。书兼隶草精神劲，妻借梅花品格高。君自称终身不娶。今日鳌鱼洲上别，题襟还惜未题糕。君先赴香港，未赴越秀山登高之约。

南海李长荣

藤宏光字□□(原空二格)，号顺叔，日本国江户人。余少年好作山水，日本米庵尝刻《小山林堂书画录》，特采柳堂旧作便面。君为米庵弟子，见画慕余。去岁君航海来粤，在何一山案上见余诗文，又因诗慕余。一日，一山携君过柳堂，彼此把臂，恍如夙契。相对笔谈，品诗论画外无他及。时倪云癯、冯柳桥同在坐，即席联句，语默兴豪。越日袖诗执贽曰："再来难定，倘稿中零篇断句得附名《柳堂师友诗录》中，则弟子数万里慕道而来，不虚所愿。"诗少古歌行，近体颇清。摘句图所取，语多隽妙。别后君来书有云："仆远游异方，眼界虽未甚广阔，要之人情风境，仆当以东粤为巨擘焉。仆到贵境，得亲雅士，不少叨光，而首为仆之尊崇仰望者，又以先生为巨擘焉。"此门弟子私见，然其意殊足感也。有《顺叔吟草》。

初到粤东同治壬戌

此身岂合占琼楼，寓河南琼记楼上。偶借仙槎海外游。蜑雨暗迷青雀舫，客

星明近古鳌洲。河南枕鳌鱼洲。才闻鲸海风波息，且任鸿泥雪爪留。多少衣冠人物在，谁如金鉴照千秋。谓曲江张文献。

到粤未经旬此邦士夫以联扇求书者日不暇给自嘲一律

百年何苦墨磨人，自笑劳劳客里身。早悟烟云原过眼，须知香火亦前因。铁门限恐重重破，玉服笺开幅幅新。却怪板桥轻卖竹，纸高十丈索酬银。见郑板桥写竹笔单。

介何一山同到柳堂谒李子黼。先生座上因晤倪云癯冯柳桥。即席联句

自有此堂无此客，子黼。论交中外结奇缘。柳桥。酒龙诗虎成高会，顺叔。岂有风骚隔一天。云癯。

子黼先生出示柳堂禊卷内张南山先生癸丑修禊诗有句云曰酒龙诗虎成嘉会不意余七字与之暗合此亦万里寓公一重墨缘感赋

袁蒋赵编曾旧读，张黄谭集喜新开。声名远岛千秋慕，先后中原一代才。幸识松庐诗弟子，谓子黼先生。快登烟浒好楼台。柳堂在太平烟浒。如何七字偏相合，转惜身迟十载来。闻南翁归道山十载。

翌日执贽柳堂奉呈子黼夫子

一篇奇作火轮船，先生《火轮船赋》早传本国。卅载才名海外传。白傅价原高日本，孝威望早重朝鲜。定知他夕停云想，何幸今生立雪缘。归去东溟瞻北斗，诗星光岂隔遥天。

将归本国留呈子黼师并赠倪云癯何一山

柳堂诗录桐荫话，《柳堂师友诗录》，吾师著，《桐荫清话》，雪癯翁著。海外新添两本书。更有梅花何水部，天涯知己意何如。

一山约异日同李师倪君航海到访书二十八字以为左券

分襟斗忆题襟句，岂有风骚隔一天。云癯翁句。他日倘寻江户宅，白莲秋水夕阳边。

留题柳堂

杨柳夹梧桐，深深路不通。帆迟万里外，诗满百花中。四壁皆诗。朴处洗金碧，凉时兼雨风。绿蓑青笠像，长奉唱霞翁。堂中长供南翁《珠海唱霞图》。

留题野水闲鸥馆云癯所居

客里闲难得，闲寻野水鸥。诗人原跌宕，仙吏自风流。此即坐吟舫，谁同开选楼。君与子翻师同操选政。我来真不负，两地兼谓柳堂。托千秋。

金陵道上寄怀柳堂夫子并奉赠日本名僧禅统所作山水及国中诗词人诗集

名僧画与名流集，珍重缄封寄柳堂。为报金陵今夜客，一船秋色月如霜。珠江回首最相思，再侍论文未可知。落叶打门秋梦醒，料应雁到送书时。

顺叔吟草摘句图

五言

江声添雨壮，山势得云奇。
楼深容月隐，帆健挟风飞。
钟流隔江寺，树抱枕山城。
秋声凉雁地，雨气黑龙天。
帆破江云补，桥倾碉树扶。
戍鸦屯堠树，潮蟹拜滩灯。
寺荒苔上殿，村小竹为城。
诗盛初游地，心欢夙契人。
防身辞宝剑，入梦得奇书。
江天风雪月，海市蟹鱼虾。
秋声万马急，客梦一鸥闲。
一肩驮晓色，百感炼秋心。
游记时摹画，乡书每夹诗。
月明双只堠，秋远短长亭。

日月双丸荡，乾坤一气浑。
山深云有养，天阔月无依。
万花蝴蝶国，两水鹭鸥村。
秋风豪士气，明月美人心。

七言

风月天开诗境界，江山人结画因缘。
水村有柳桥宜曲，山径无松寺不深。
赤壁苦争三国垒，青山闲送六朝人。
悟空证月经休注，写意看云画欲删。
最难着意求奇句，未肯忘情负胜缘。
攀来杨柳撩芳绪，采到芙蓉惜古香。
黄鸡白酒田家味，红树青山钓渚图。
泰山竟挟言真大，云梦轻吞气过豪。
买酒人归秋月渡，寻诗僧上夕阳楼。
偶呼明月须携酒，岂买青山始著书。
全神锻炼诗中字，极力扶持雨后花。
塔穿山色千重翠，帆剪江光两片秋。
烟波半亩红菱角，风露全湖白藕花。
书味醉人千日酒，道心觉我五更钟。
自爱清凉闲水石，谁夸金碧俗楼台。
接天远水一痕白，抱郭近山三面青。
论史借观今代局，争名先避古人才。
万事最欢惟喜雨，几人相忆共停云。
雷惊嫩笋黄抽土，风引新瓜绿上棚。
无仇不买千金剑，有益争收万卷书。
诗归陈起江湖集，像拜东坡笠屐图。

呈李柳堂先生

【附记】

本文根据2000年10月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的日本中国学会第52届大会上所做研究报告修改而成，日文版发表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国哲学研究》第24号（佐藤慎一先生退官纪念号，2009年11月）。中文稿曾于2009年11月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东亚使节文化书写"国际会议上报告，会议主持者廖肇亨教授及讲评人刘序枫教授均给予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研究综览

内藤湖南研究综述(日、中、美)

钱婉约

内藤湖南(Naitō Konan ,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湖南为其号。他年轻时曾担任东京《万朝报》、大阪《朝日新闻》等重要报纸的中国问题评论员,时值晚清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期间,他纵论中国局势和中日关系,是舆论界著名的“中国通记者”;辛亥前转任京都大学,直至退休,长期主持京大东洋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是京都学派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内藤史学由今溯古,从晚清史、清史到中古史、上古史,一以贯通;研究范围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满蒙史地,以及版本目录、珍籍清玩、书法绘画等等领域。他一生的著述,身前身后陆续编辑出版,1969 年至 1976 年间,由筑摩书房出齐《内藤湖南全集》14 卷。

日本学术界对内藤湖南的评价和定位,不仅仅是一位“支那学家”、“东洋史学者”、“中国学研究者”,同时也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是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交会冲突下,深究东西方文化真谛、探求日本民族文化出路的思想家[1]。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内藤湖南的著作,被列入德间书店的《近代日本的名著》、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名著》以及朝日新闻社的《日本的思想家》、筑摩书房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等丛书中。

追溯学术界对于内藤湖南的研究、评述，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第一时期：追忆和反省（1934—1950年代）

内藤去世的1934年当年和次年，各相关杂志发表了一批悼念文章、生平略历及著书目录等。有代表性的是《支那学》杂志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内藤湖南先生略历”及“内藤湖南先生著作目录”[①]，《书艺》、《东洋美术》、《支那学论丛》、《史学论丛》等杂志也发了相关内容的“悼念号”或“著作年表”。中国方面最早的内藤研究，也是出现在内藤去世当年，即周一良所著《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上的贡献》一文[②]。

战后，日本思想文化界普遍出现对于战争的反思，内藤中国学中有关殖民心态和理论的言论，特别是《支那论》、《新支那论》中关于中国辛亥以后时政论述的部分，受到学界反省与批判，被指斥为“用学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助言”。批判文章以1946年野原四郎的《内藤湖南〈支那论〉批判》为代表[③]。于此前后，内藤的弟子、后人们则开始编辑整理内藤身前遗作、讲演稿，内藤重要著作的单行本《东洋文化史研究》（1936）、《清朝史通论》（1944）、《支那上古史》（1944）、《中国近世史》（1947）、《支那史学史》（1949）相继面世。

二、第二时期：学术研究的起步（1960—1970年代）

从1969年到1976年间，筑摩书房陆续出齐《内藤湖南全集》14卷。随着全集编辑整理工作的展开，自60年代起，学界有了对于内藤其人其学比较总体性的定位和较为全面的学术性研究。全集每卷之前有“月报”，分别由两三位专家、学人——大多为内藤的同事、学生、后人撰写，以随笔、小品的形式，介绍亲身接触到的内藤生平事迹、治学作风，评论其史学“本质”与“真相”，或

①载《支那学》七卷三号，1934年7月。

②周一良文载《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号，1934年9月。

③野原四郎文，载《中国评论》第一卷第四号，1946年11月。

就内藤在"满洲学"、"金石学"等专科领域的研究发表见解。这时期,除了出现一批内藤湖南研究的论文外,还有了几部传记著作问世,即青江舜二郎《龙的星座——内藤湖南的亚洲生涯》(《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朝日新闻社 1966 年,1980 年、1994 年又由中央公论社重版、再版),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 1972 年),小川环树《内藤湖南的学问及其生涯》(《内藤湖南の学問とその生涯》,见于《日本の名著》第 41 卷——《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 1971 年)。在这些论述中,内藤湖南已不仅仅是"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东洋学巨擘",同时,也被认为是对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对近代中日关系具有较大影响意义的思想家。

此外,如青木富太郎著《东洋学的成立及发展》(《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蛍雪书院 1940 年出版)、石滨纯太郎著《东洋学史话》(《東洋学の話》,创元社 1943 年)、宫崎市定《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朝日新闻社 1971 年)、朝日新闻社编《日本の思想家》(1975 年)、五井直弘著《近代日本与东洋史学》(《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青木书店 1976 年)、吉川幸次郎编《东洋学的创始者们》(《東洋学の創始者たち》,讲谈社 1976 年)、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系谱》(《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 1992 年)等著作中,关于内藤湖南的论述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的名字见于五六十年代"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论中国历史"的批判资料集中,他与他的学生们的只言片语,成为当时所谓学术批判的靶子[①],而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并未出现。

三、第三时期:新时期的新视角(1980 年以来)

80 年代以来,即近三十年间,随着日本及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的生成,对于内藤湖南及其学术,也有了扩大视野、深入挖掘的再认识。本文主要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

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一)80 年代

80 年代日本的内藤研究，呈现出一种将内藤湖南作为特定社会时代中一分子、一具体个案进行学术性、思想性分析、解剖的倾向，代表性论著有谭汝谦《内藤湖南的魅力及情、理、意、识——寄语八十年代的日本》(《内藤湖南の魅力及び情、理、意、識——八十年代の日本に寄せて》，载《亚细亚研究所纪要》1983 年 6 月)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解读内藤学术的当代意义；增渊龙夫《历史学家对同时代的历史性考察》(《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 年出版)，对内藤湖南中国论述中仰视文化中国而鄙视现实中国这一内在矛盾及其思想由来，作了合乎情理的解析，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还有千叶三郎的专著《内藤湖南与他的时代》(《内藤湖南とその時代》，国书刊行会 1986 年出版)、加贺荣治的专著《内藤湖南笔记》(《内藤湖南ノート》，东方书店 1987 年出版)问世。

80 年代初，日本成立了两个地方上、民间性的怀念内藤湖南的协会，都叫"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一是在内藤湖南的家乡——秋田县鹿角市，家乡人常年积极致力于保留内藤遗物、搜集内藤研究资料，奖励内藤研究等等活动，1980 年成立"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把内藤有关文物作为"鹿角市先人显彰馆常设展厅"的主要内容，并定期发行通讯刊物《湖南》，直至目前刊物和活动仍在持续。另一个是在内藤湖南退休后的住处，即晚年隐居地"恭仁山庄"所在地——京都府相乐郡加茂町。这些地方性民间纪念活动的长期存在，是否可以说，显示了内藤湖南所具有的超越其"学者身份和意义"的国民性价值。

在美国方面，出现了东亚史研究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的专著《内藤湖南——他的政治学说与中国学》(*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一书[1]，此书首次超越日本的视野，结合中日双边政治关系、中日学术背景，论述了内藤一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立场、思想主张与中国学方面的成就与局限，以日、中以外的第三方视角，初步塑造了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内藤形象"。傅佛果教授目前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继续从事亚洲政治与思

[1]傅佛果 70 年代后期在京都大学专攻内藤研究，1980 年以本书初稿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84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9 年日本出版了由井上裕正翻译的日文本。

想文化的研究，近年，他与内藤湖南有关的研究论文有二："汉学京都学派：当时与现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岛田虔次、小野和子、谷川道雄"，及"关于内藤湖南全集中的未收资料"①。

中国方面有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1981年)②，谭汝谦"内藤湖南的中日关系论"(1987年)③，代表了新时期中国学术恢复阶段的内藤研究动向。

(二)90年代

90年代最值得一说的是，由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谷川道雄教授倡议，1996年10月，成立了隶属于研究所的"内藤湖南研究会"。研究会成员由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河合塾、山口大学、德岛大学等教授组成，会员们持续有年地进行围绕内藤湖南的读书、研究、讨论，以一月一次的频率定期举行讨论会，至2008年1月，迎来第100次讨论会。这是一个"内藤湖南著作的读书会，关于内藤思想和学术的自由的讨论会，也是以内藤为话题的酒会"④。研究会成员历年的研究成果，反映在进入21世纪的几个论文集中，见下一节介绍。

在八九十年代，尚有野村浩一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⑤)，及子安宣邦著《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分子》(《近代知のアルケオロジー：国家と戦争と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出版⑥)等书中，有专门论及内藤湖南的章节，在当时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中国，严绍璗教授出版《日本中国学史》(1991年)一书，其中第八章第

---

①傅佛果文分别载于《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内藤湖南的新视野——文化交涉学的视点》，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第3号，大阪：2008。

②夏应元文，《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2期。

③谭汝谦文，载《日本的中国移民》，北京：三联书店，1987。

④《内藤湖南研究——学问·思想·人生》书载山田伸吾"前言"，奈良：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8，5页。

⑤本书由张学锋译，以《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程》为中译本书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⑥本书由赵京华译，以《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国知识的成立》为中译本书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一节专论“内藤湖南与内藤史学”，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学者对于日本中国学发展史及其特质的总体性把握，以及在此学术史背景下对于内藤湖南的理解和评判。另外，钱婉约连续发表《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1998年)、《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1999)、《“层累地造成说”和“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之古史辨伪理论》(1999)等关于内藤史学的论文，表示中国国内新一代内藤研究者正在成长。

这期间，内藤的部分著作有了中译本出版，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文化史研究》(199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燕山楚水》(1999)。

(三)最近十年

这十年是内藤湖南研究的丰收期，主要成果有以下几项。

其一，河合研究所的内藤湖南研究会不断结出成果，2001年该会编辑出版了《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①]，收集研究会成员的论文十二篇，从“内藤湖南的历史、文化、政治论”、“内藤与同时代——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内藤湖南的史学”、“战后社会与内藤湖南”等几个方面，展开对内藤的再研究。2008年，同研究会再次推出《内藤湖南研究——学問・思想・人生》一书，收集论文15篇，研究角度更为具体深入，如涉及到内藤学术著作的写作编撰特色、财政史研究方法、新发现的内藤湖南往来通信、内藤湖南引录中国古诗文及自制汉诗的研究解读等。

其二，中国学者内藤湖南研究专著的出版，以及内藤学术在中国学术界关注升温。钱婉约所著《内藤湖南研究》，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国内亦即中文世界里第一部关于内藤湖南的研究性专著。作者在内藤湖南生前工作的京都大学进修和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吸取日、美学术界前期研究基础上，从中国人的视角立场出发，充分注意揭示内藤中国学所具有的兼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性，注意揭示内藤学术的中国思想学术史背景及与同时代中国政界学界的关系等。这是继傅佛果以后，又一部标志性的外国人解读内藤

①本书由马彪、胡宝华、张学峰、李济沧译，以《内藤湖南的世界》为中译本书名，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湖南学术体系的研究成果。随着中国国内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不断升温,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内藤湖南,其著作和学术思想也越来越受到读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他的著作继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夏应元、钱婉约等译《中国史通论》上下册,包含他的《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五部单行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燕山楚水》作为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之一种,2007年再次出版。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栾殿武译《中国绘画史》,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另外,印晓峰点校《内藤湖南汉诗文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其三,在内藤湖南生前大部分藏书"内藤文库"的收藏地关西大学,在关西大学的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2008年6月,召开了"内藤湖南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交涉学的视点"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中心主任暨会议发起者陶德民教授,2007年出版了《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重野安绎、西村天囚、内藤湖南的外交策论》(《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一书,收入《内藤湖南〈支那论〉的成书与民国初期熊希龄内阁的关系》和《内藤湖南1905年奉天调查中的学术与政治》等考证性论文,并挖掘内藤政论中所用"监护人"等关键词的历史含义,以分析战前日本对华观的特征。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以河合研究所"内藤湖南研究会"成员谷川道雄、葭森健介、高木智见等为主体,另有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狭间直树、京都大学高田时雄、神奈川大学大里浩秋等教授,日本之外则有傅佛果、钱婉约两位参加。会议期间,关西大学图书馆还举办了"近代日本知识界的巨匠——内藤湖南墨宝手迹及收藏文物展",此次会议称得上是体现内藤湖南研究最新成果的专题国际会议。会后,出版了会议同名论文集《内藤湖南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交涉学的视点》(《内藤湖南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文化交涉学の視点から》)。

其四,陶德民教授编辑整理出版《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一书[①]。编著者将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部分清人书画收拢一册,分类编辑,影印出版。其中包括 (1)内藤收藏的清代名人字画,如顺治帝御笔"达摩画",戴震、章学诚、

①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馆内藤文庫所蔵品集》,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

林则徐、杨守敬、罗振玉等名家条幅、横额等，(2) 近人书赠内藤湖南本人的书法绘画作品，如皇室及其周边人物肃亲王、升允、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学者王闿运、叶德辉、梁鼎芬、傅增湘、赵尔巽等人的字画作品；(3) 一般清人的作品。如庄存与、顾广圻、宋翔凤、程瑶田、龚自珍、文廷式、王懿荣、吴昌硕、盛昱等人的字画。这些深藏在"内藤文库"中不为一般读者所见的珍品，不仅具有文物和艺术观赏价值，而且亦可从中窥见内藤与中国政界要员、文人学者交往的线索，对于研究内藤湖南的中国活动及所涉及的晚清人物的生平思想，亦具有辅佐和增进意义。

此外，近年来在包括东京大学和关西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中，均有中外硕、博士研究生，把关于内藤湖南的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预示着今后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仍将会有新人新著的出现。

要之，近三十年来的内藤湖南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将内藤湖南及其学术思想，放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时代氛围下，进行重新审视，凸现其学术体系中所蕴含的"文化范式"和"民族自觉"等精神内涵，并探讨其对于在当今全球化潮流和文化冲突并存的世界局势下，东亚社会如何谋求健康发展所隐含的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内藤学术体系中"政治学"、"来华访书"、"艺术鉴赏和研究"、"与同时代的关系"等等具体方面，也得到深入挖掘和研究，这不仅是加深了对于内藤本人的研究，也有助于旁及增益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

2009 年 8 月 22 日初稿

2009 年 12 月修订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①]

方诚峰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 CBDB)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哈佛—燕京学社、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联合建设,其界面与内容都有中英双语。CBDB 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一部传记辞典,而是要建设一个可用于进一步数据分析的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不是用描述性的语句,而是用互相关联的表格来组织人物信息。

因为这一目标,CBDB 的建设过程、结构、功能都与传统的全文资料库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拟简单地梳理一下 CBDB 的历史、建设方式、功能等,并对与之相关的一些计算机技术略加说明。

一、CBDB 的历史

CBDB 项目始于已故的美国历史学家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教授(1932—1996),本是其"中国历史软件公司"(China Historical Software, Inc.)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①CBDB 的官方名称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资料库"是台湾对 database 一词的译法。笔者以为,"数据库"不但符合大陆的语言习惯,也比"资料库"更贴切地表达了与计算机技术间的联系。特此说明。

的一部分。郝若贝教授先后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最终退隐于怀俄明州（Wyoming）。他一生的学术兴趣都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与经济变迁，特别是中国中古时期（中唐—元）。

CBDB源于郝若贝教授个人的研究。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他所关注的课题有数个："亲缘、社会关系与中古中国的社会变迁"（Kinship, Informal Associations and Societal Change in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的政府与经济"（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的朋党与政治决策"（Coalition Behavior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中的思想维度"（Intellectual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Medieval China）①。这些课题，都需要大量的材料支持——不止是一个家族、一个机构、一个小地区、一小个时段的，而是需要长时段、全国性的、涉及整个官僚体制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建立适于本人研究的数据库。

在妻子Marianne Carlson Hartwell的协助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郝若贝的数个课题虽然没有发表，但其数据库囊括的信息已经相当可观，他也试图将这个平台提供给学界使用。他的数据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体传记资料；二是地理资料，包括人口、经济信息②。这两部分内容分别构成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前身。郝若贝筹建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由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Peter K. Bol）任主席，并将程序与数据分发给委员会的成员；最终这些数据与程序成了"中国历史软件公司"的基础③；郝若贝教授去世后，它们被捐献给了哈佛一燕京学社④。其中，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经过了哈佛大学和复旦

---

①Robert M. Hartwell, "A Computer-Bas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edieval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Victor H. Mair and Yongquan Liu (editors), *Characters and Computers*, Amsterdam, Oxford, Washington, Tokyo: IOS Press, 1991, p. 89.

②Robert M. Hartwell, "A Computer-Bas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edieval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aracters and Computers*, p. 90.

③据包弼德教授介绍，郝若贝教授设立"中国历史软件公司"主要是出于纳税方面的考虑，希望通过它得到院校的资助，以便继续自己的研究。

④Peter K. Bol, "The Late Robert M. Hartwell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Ltd.' Software Project", http://www.pnclink.org/annual/annual1999/1999pdf/bol.pdf, 2010年4月4日。亦参见："History of CBDB",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 keyword = k16229&pageid = icb.page76664, 2010年4月4日。

大学的改进与建设后，早已向学界公布；而 CBDB 的工作则相对滞后。

郝若贝教授所建立的人物传记数据库，有 25000 余人的传记资料、谱系资料，5000 余条书目资料，还包括大量的地理信息。但它基于当时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技术环境——数据库用 dBase 建立，而在 90 年代以后，随着微软 Windows 系统的普及，dBase 就逐渐被 FoxPro 和 Microsoft Access 等新产品所替代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傅君劢教授（Michael A. Fuller）首先用 FoxPro 开发了郝若贝数据库在 Windows 环境下的第一个版本——CBDwin，使得浏览和查询数据变得容易了。之后，傅君劢又开发了该数据库的 Access 版本，使得使用者可以修改、输入数据。不过，在 Access 中，基本只能进行单机的操作，多台计算机协同操作的功能极为有限。这两个版本的数据库，目前都可以在 CBDB 的主页上下载。

从 2005 年秋开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与了对郝若贝数据库的修订工作，主要以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电子版为基础，在 Access 版中整理数据。2006 年，得益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资金支持，CBDB 项目开始开发一个在线的数据录入系统，并于 2007 年春天发布，使得多人协同操作变得更为方便。在线的查询系统也于 2008 年秋开始使用。而且，从 2008 年春开始，史语所"宋人履历计划"的资金、资料合并到了 CBDB 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工作中。为了加快建设的速度，从 2008 年秋开始，在哈佛大学一些计算机专家的帮助下，CBDB 项目开始尝试使用一些文本挖掘（Text Mining）技术，从《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电子版中自动提取资料，填入 CBDB 中。

二、CBDB 的结构与用途

人物履历，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最为丰富的记录之一。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他落籍或侨居于某一自然或行政区划，在官僚体制中拥有特定的级别和职位，属于某一家族、社会网络等等。基于这样的理解，数据库建设的过程，首先就是将人物的传记资料分割为不同性质的项目。CBDB 试图从传记资料中提取如下信息：

1. 基本资料——人名、生卒等基本信息；

2. 地址——与人物有关的所有类型的地址，如籍贯、迁住地、到访地等；

3. 别名——字、号等；

4. 著述；

5. 官名——人物一生所任的官职；

6. 入仕——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官僚体系；

7. 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事件；

8. 社会区分——人物的身份，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身份；

9. 亲属——血缘关系；

10. 社会关系——血缘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

11. 财产

每一类信息，都有相应的一个或多个表格，其中的每一条数据都有唯一的编号(ID)，比如人名表(表1)：

表 1

c_personid	c_name	c_name_chn
3257	Zhu Xi	朱熹
3258	Zhu Yi	朱翌
……	……	……
7055	Lv Zuqian	吕祖谦

再如地名表(表2)：

表 2

c_addr_id	c_name	c_name_chn	c_firstyear	c_lastyear	c_belongs1	c_belongs2	c_belongs3
12899	Nankang Jun	南康军	982	1279	江南东路	宋朝	
12900	Xingzi	星子	982	1279	南康军	江南东路	宋朝
12901	Jianchang	建昌	982	1279	南康军	江南东路	宋朝
12902	Duchang	都昌	982	1279	南康军	江南东路	宋朝

又如官名表（表 3）：

表 3

c_office_id	c_office_pinyin	c_office_chn
124	zhi mou jun shi	知某军事
127	zhi zhi cha yan fu shi	制置茶盐副使
129	zhong shu shi lang	中书侍郎

要让这些表格组合成为一个数据库，就必须让各种信息相互关联。比如朱熹曾知南康军，曾与吕祖谦论学，《近思录》是其著作之一。这条传记资料，在数据库中就涉及人名、地名、官名、社会关系、著述这些表格间的关联，下面是它们的关联示意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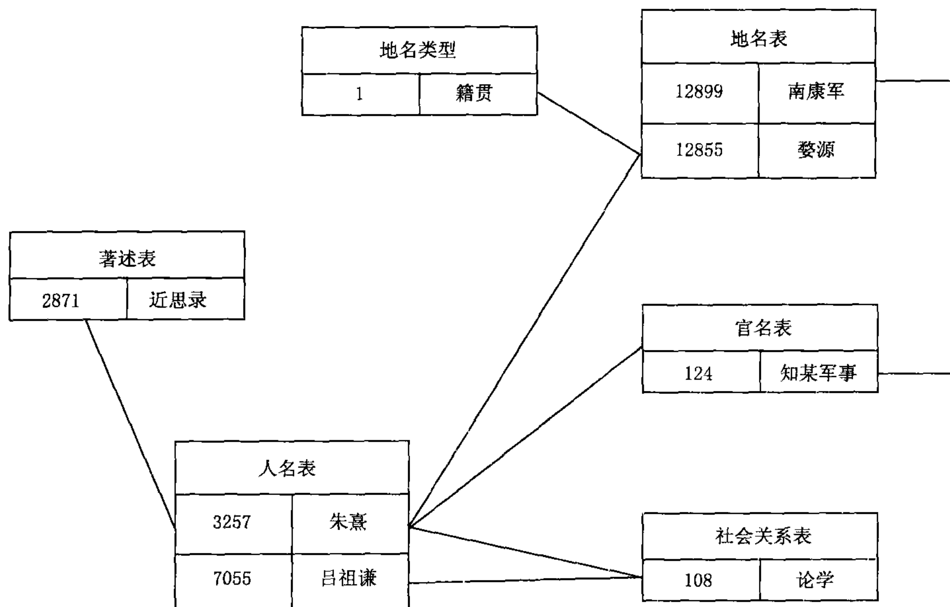


图 1

表格间的关联，都是通过编号，而非文字实现的。如朱熹与《近思录》间的联系，其实是在人名表的 3257 号与著述表的 2871 号间建立了关联，而一旦编号间的关联建立了，无论编号对应的内容如何变动，都不影响到其相互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各表中每一条数据的编号必须是唯一的，不能重复。随着信息的增多、表格的增加，表格之间的关联会变得极为复杂。

数据库的这种建设方式，就凸现了其与传记辞典的本质差别。在传记辞典中，人物是通过描述性的语句来呈现的，主要关联就是人名与其解释词条间的对应关系，故主要通过人名检索辞典。但是，在 CBDB 这样的关系型数据库中，任何一类信息都可以作为索引项，使用者的视角可以由人名变为地址、官职、社会关系、时间等不同的项目，还可以多重组合。比如，可以通过 CBDB 了解某一个地方在科举方面的表现如何；也可以了解某一种官员的地理分布特点或时代变动轨迹。如此等等，数据库呈现的答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CBDB 和传记辞典另一重要的区别，是其所能处理的数据量。在传记辞典中，一次查询只能得到一个人的传记资料，但 CBDB 则有能力同时处理多人的大量信息。如上面提到的，某一地区的科举人数极多，担任过某类职务的官员也非常多。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呈现、分析大量的数据？

方法之一，是结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分析 CBDB 中的数据。在 CBDB 中，有完整的地址表格，每个地址都有相应的坐标，因此可以直观地将查询结果呈现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如可以呈现特定人群的地理分布：该人群可以是某种身份的人物，也可以是担任某一官职的人物，或者是特定人物的社会关系网。比如图 2 呈现了 CBDB 中检索到的朱熹和吕祖谦的社会关系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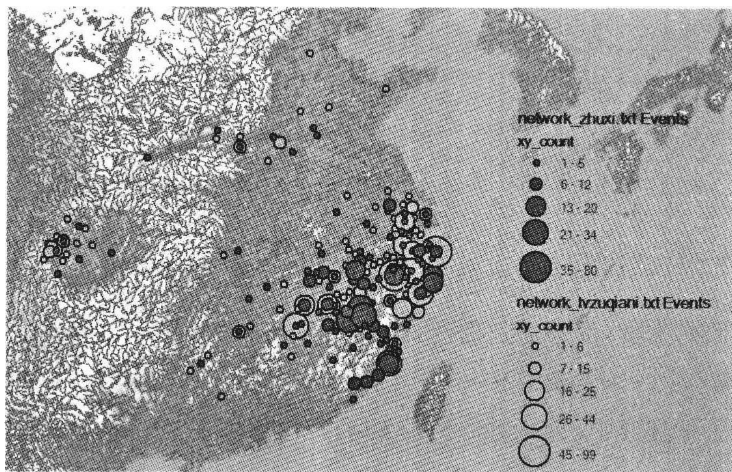


图 2　朱熹和吕祖谦的社会关系分布

当然，也可以将人物地理信息与其他地理信息进行对比。如图3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部分东南地区的商税、CBDB所收北宋进士地理分布、交通要道之间的对比[①]，从中可以看到当地的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与科举表现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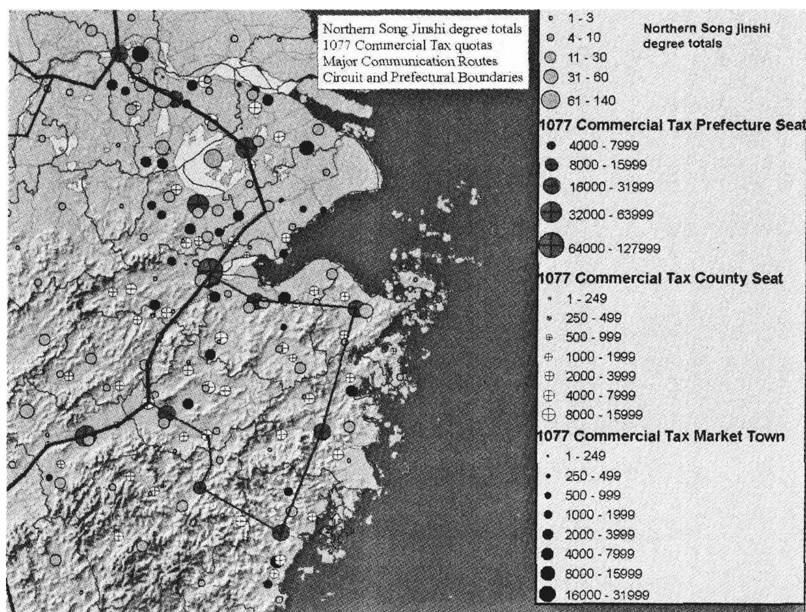


图3　北宋熙宁十年(1077)部分东南地区的商税、
CBDB所收北宋进士地理分布、交通要道之间的对比

另一种方法，则是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的对象，是人群的结构，而非单个人物。这种分析的基础，要有大量关于社会关系的数据。恰恰CBDB在建设的开始，就非常注重搜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如CBDB所输出的亲属或其他社会关系数据，可通过GUESS或Pajek软件可视化地呈现出来[②]。例如，CBDB中可以查询12世纪前半期吉

①"Mapping and Analyzing CBDB Data", http://isites.harvard.edu/fs/docs/icb.topic228201.files/Images/8_NS_jinshi_and_tax_quotas.jpg, 2010年4月4日。

②这两种软件都是免费的。GUESS见：http://graphexploration.cond.org/；Pajek见：http://vlado.fmf.uni-lj.si/pub/networks/pajek/

州庐陵人士的社会关系，会得到数千条结果（有些结果也许是不准确的）。把这些数据用 GUESS 呈现出来，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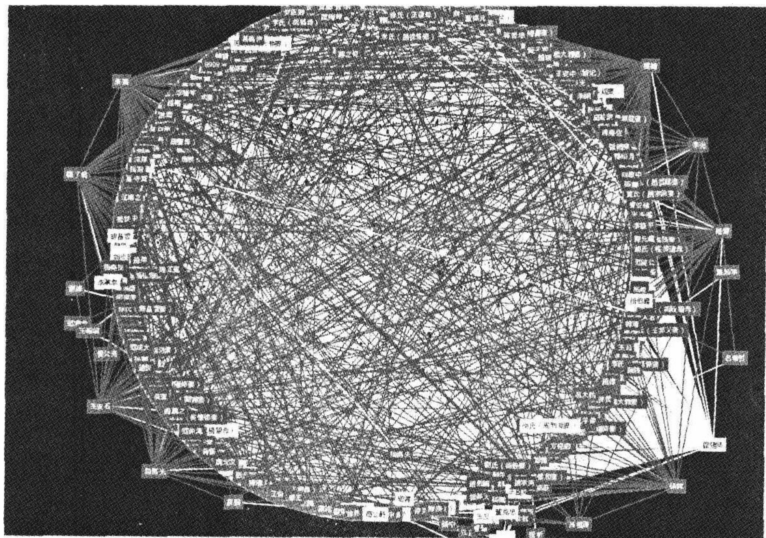


图 4　用 GUESS 呈现的 12 世纪前半期吉州庐陵人士的社会关系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几乎难以辨认各人间的关系，不过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这种可视化呈现，仍依稀可见这个社会关系网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分别是欧阳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司马光（1019—1086）、李光（1078—1159）、张栻（1133—1180）、朱熹（1130—1200）、吕祖谦（1137—1181）、楼钥（1137—1213）、陆游（1125—1209）、魏了翁（1178—1237）等[①]。此外，据笔者所知，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博士生陈松，也在利用 CBDB 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探讨宋代四川地区官员与当地士人网络的变迁[②]。

可以看到，CBDB 的长处在于同时处理大量人物，而非个别人物的信息。

---

①有多个人物的主要活跃年代不是 12 世纪前半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亲属关系、师生关系的影响外，也因为 CBDB 所收录的社会关系大量包括了"为他人作序跋"之类，因此一组社会关系中的两个人可能相隔年代很远。

②Chen Song, "Bureaucratic Hierarchy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in Song Dynasty Sichuan", *Prosopography of Middle Period China: Using the Database*, Department of History, Warwick University, December 14—15/2007.

http://www.humanities.uci.edu/eastasian/SungYuan/Downloads/Warwick/ChenSong.pdf, 2010 年 4 月 4 日。

郝若贝教授将自己所搜集的传记信息称为“Prosopographical or collective biographies”，或可称为“群体传记”。群体传记学（Prosophgraphy）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它是指“通过对一群人物生平的集体性研究，来探讨他们共同的背景特征”，其采用的方法是：

> 先建立一个研究范围，然后询问一组系统的问题：关于出生与死亡、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与其所继承的经济地位、居住地、教育、个人财富的数量与来源、职业、宗教、仕历等等。之后将这一范围内所有个人的各种信息对比、组合，并探析其重要的变量。研究者会分析这些信息的内在相关性，及它们与其他类型的行为与活动的相关性。①

这种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关注政治行为，试图揭示隐藏于政治辞令之下的深层次利益关系、政治精英的社会与经济面向、政治机器的运作机制；二是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无论如何，群体传记学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物生平，而在于群体性的特征或内在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群体传记学得到了新的关注和推进。如牛津大学历史系的“群体传记学研究计划”，还有关于拜占庭世界（Prosop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World，PBW）、6－11世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The Prosopography of Anglo-Saxon England ，PASE）的计划。郝若贝教授的数据库，以及现在的CBDB计划，都预此学术潮流。

郝若贝教授本人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750至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转型》（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宋初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所谓的开国功臣（Founding Elite）；到10世纪末，统治人群便被一群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ic Elite）所替代；而到了11世纪晚期，这群人又被所谓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所取代②。这一结论，便是基于他对宋代财政官员、执

①Lawrence Stone，“Prosopography”，*Daedalus* 100.1(1971)，p. 46.

②Robert M.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December 1982)，pp.405－416.

政群体的亲属、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来的，是他应用数据库的成果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又对宋代党争的模式有一个假设。他认为，党争源自权力过渡，而权力过渡是老一代的掌权者因死亡或危机而被迫将权力转给新的统治人群的结果，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政治斗争，破坏了以旧统治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新的统治集团取而代之①。虽然郝若贝教授计划中的几部著作都没有发表，但他的数篇文章，已经展现了其对大量统计数据的重视和应用，而基本不处理个案。

因此，CBDB 主要不是一个传记辞典，而是一个数据分析的平台、工具。研究者可以通过它，并结合其他的分析工具（如地理信息系统与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大量资料中——长时段、大区域、大量人群——某些隐藏的结构、规律。如何使用数据库，取决于研究者试图回答什么问题。

三、CBDB 的限制与未来

CBDB 源自郝若贝教授个人的研究，数据搜集的方向、数据库的结构，都与他本人的研究取径相关，这对现在的使用者是一种限制。他自己也说，他的数据库主要不在为别的学者提供研究帮助——虽然这是一项副产品，而是提供一个程序与数据的平台，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创建自己的数据库②。在过去的几年中，CBDB 的设计在郝若贝数据库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改变，数据本身也有了不少修改和增加。但无论如何变化，研究者必须要接受的是：CBDB 提供的解决之道，是基于大量数据分析、统计的，较为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这是由群体传记学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故与传统的个案分析、史料辨析之间如何融通，是数据库带给使用者的挑战之一。史东（Lawrence Stone）教授早就指出了群体传记学存在的多种限制与危险，包括数据本身的缺陷、数据分类的错误，当然还有对数据解释的错误③。今天使用 CBDB 时，也要注

①Robert M. Hartwell,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Bureaucratic Factionalism in Sung China: A Hypothesis", *The 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18(1986), p. 40.

②Robert M. Hartwell, "A Computer-Bas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edieval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aracters and Computers*, p. 90.

③Lawrence Stone, "*Prosopography*", *Daedalus* 100.1(1971), pp. 58—62.

意同样的问题。

CBDB 的数据确实有一些缺点。它致力于涵盖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传记资料,但目前主要是宋代,还有少量其他时代人物(见图 5)。而在资料比较集中的宋代,信息的密度尚不高。郝若贝教授主要关注财政官员、北宋前期的宰执,除此之外的许多条目主要依据昌彼得、王德毅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小传、索引信息而来。因此不仅信息覆盖面小,而且编者的一些偏见、错误也带进了数据库中。不过,因为 CBDB 的主要功能是大量的数据分析、统计,故一定程度的错误率是可以容许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在参与 CBDB 后,很长时间内的工作是用《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校对 CBDB 中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增加了许多人物,但如何扩充信息量仍是 CBDB 项目遇到的一大挑战。

如何迅速地扩充数据? 一条途径是整合已有的传记数据库。比如加拿大麦基尔(McGill)大学和哈佛一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联合项目——方秀洁(Grace S. Fong)教授主持的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MQWW),有 5000 名左右的明清女性资料,已被整合进 CBDB 中。再如姚平教授根据唐人墓志所做的数据库,约有 6000 人。其余的如史语所"明清人名权威档",也是 CBDB 准备囊括的目标。但因为各已有的数据库有不同的结构,加之出于版权的考虑,整合起来并非一帆风顺。

另一条途径是利用新的计算机技术。在 CBDB 的建设过程中,主持者逐渐意识到:人工逐条录入数据不但效率低而且成本高,于是文本挖掘(Text Mining)技术开始被注意到。所谓文本挖掘,即从海量信息中迅速发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不同信息之间的关联。通俗地讲,就是让计算机代替人去"阅读"文本。应用到 CBDB 的建设中,就是让软件自动地提取传记中的人名、地址、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职官等信息,然后导入数据库中。这一技术目前已经应用到 CBDB 的建设中了。项目组采用一个文本工程的通用架构(General Architecture for Text Engineering,GATE),以此为基础,让哈佛大学的计算机专家设计一些规则,然后应用到对《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小传的分析、标识上去。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1)这些专家不懂中文;(2)这个通用平台处理古汉语的能力尚有欠缺;(3)处

理的对象仍是《传记资料索引》的小传，尚未真正进入到传记资料的处理。无论将来文本挖掘能到达什么程度，学者对原始传记资料的阅读、疏正、分析，仍将是 CBDB 最为宝贵的资料来源。事实上，CBDB 欢迎所有的学者提供与自己研究相关的资料，希望维基百科（Wikipedia）式的建设方式能应用到数据库的建设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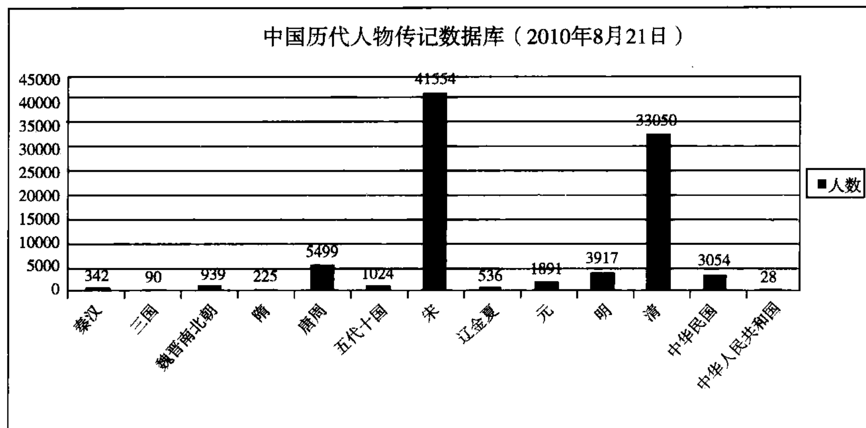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2010 年 8 月 21 日）

数据量的不足，即使能通过文本挖掘的方式解决，CBDB 仍将面临的问题是：在从描述性的文本向依赖编号而存在的数据这一转换过程中，传记材料中的一些信息可能丢失了。数据库建设首先需要打碎原来的传记资料，然后将能够采纳的信息进行编号，最后才囊括进数据库中。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信息是数据库所不能容纳、无法编号的，因此无法被收入数据库中，即使收入了，也无法被检索出来。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先生讳孝绰，字公裕，姓黄氏】。【上世为建之浦城人】，自【其考】【徙居于舒州之太湖】，【今为太湖人】。舒之望曰潜山，其下号丹霞府，盖养仙之所栖，幽人有道之所潜，先生游而乐焉，因【自号“潜山叟”】，而舒人尊之曰先生。先生者，道德之号也。先生于孝弟有至性，事父母竭力至诚，而时察其色辞以为忧喜，能如古人所谓养志者，侍疾居丧，皆有以过人。家贫口众，而制之必均。养嫁诸孤女，过己之子。周人之穷，不计

有无，往往衣不兼食不属，而先生处之自如。居乡与人子言必以孝，与人弟言必以顺，所居人用化之，至相诏语曰："毋或作非，使黄先生知也。"[1]

这是一篇墓志铭的节录，凡是在【 】中的，都是可以被录入到CBDB中的信息，而除此之外的文字，都无法成为数据库中的有效信息。CBDB和传记分别用不同的方式——代码表与叙述——来塑造同一人物，无法被编码的叙述，便无法被CBDB抓取。虽然CBDB试图将尽可能多的内容编码、录入，但距离完整吸收一篇传记的信息还有相当距离。而这些不能被吸收的部分，对认识传主及其时代、社会，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是从数据库本身着手——CBDB是一个有扩展性的、可以不断增加信息类别的数据库；另一方面，则是要找到一种方式，使CBDB这样的关系型数据库能与传统的全文检索系统结合起来。

在近20年中，中国史研究受到了计算机技术的深刻影响。首先是在电脑上写作，这对原来手抄卡片、数录其稿的写作方式是很大的冲击。接着全文资料库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人们搜集资料、研究问题的方式。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离开了全文数据库，如今的研究就难以进行。而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具开始影响到中国史研究。在CBDB的建设、使用中，涉及多项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数据库、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在提供新工具的同时，这一状况也对人文学者掌握计算机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郝若贝甚至说："我强烈建议，所有中国研究的学者，如果要用电脑作为研究工具的话，那就去学习编程。"[2]他认为，现成的软件或有其固有设想，或者其程序员对中文资料一无所知，所以可能会给研究带来偏差。要让学者都去学习编程，自然是不太可能的。但学者可以做到的，是努力去理解这些新工具的运行机制、使用方法，从而能达到相当程度的"中体西用"。

对中国史、特别是中国中古史来说，"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但它能否给学界带来真正的冲击，则取决于数据库建设实际

[1] 刘挚撰，陈晓平、裴汝诚点校，《忠肃集》卷一四《潜山黄先生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2，285页。

[2] Robert M. Hartwell, "A Computer-Bas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edieval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aracters and Computers*, p. 97.

能达到的程度——包括丰富的数据与良好的易用性，而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赖于长期的国际协作。希望将来的CBDB既能涵盖广泛的传记信息，有良好的通用性，又能成为不同类型的学者开展个性化研究的平台。而这一未来，不在于现在的工作小组，而在于整个学界对它的使用、批评与参与。

（本文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姜勇、刘江提供宝贵意见，特致谢忱。）

相关网站：

CBDB主页：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 keyword=k16229

CBDB录入系统：http://cbdb.fas.harvard.edu/cbdbc/cbdbedit

CBDB查询系统：http://59.124.34.70/cbdbc/ttsweb @0:0:1:cbdbkm@@0.10566209097417267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英文版：http://www.fas.harvard.edu/~chgis/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文版：http://yugong.fudan.edu.cn/Ichg/Chgis_index.asp

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MQWW）：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

Prosopographical Research at Oxford University：http://users.ox.ac.uk/~prosop/

Prosop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World(PBW)：http://www.pbw.kcl.ac.uk/

The Prosopography of Anglo-Saxon England(PASE)：http://www.pase.ac.uk/

【附识】

201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史研究与计算机技术”国际学术工作坊(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History)，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发起，邀请了海内外中国史与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主要面向中国大陆的青年学者与博士生，对其进行关系型数据库建设、使用技能的培训。

网络时代海外中国研究文献的检索

杨继东

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对全球文化进程的影响可以与历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传播相提并论。在当今这个电脑和网络的时代，各国的学术研究及学术资源纷纷转型。近年来，西方的许多学术图书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不少理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图书馆已经基本实现了向数字化和无纸化转变的过程。在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中心的图书馆里，电子资源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之中。与其他所有学科一样，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也日益倚重于数字化的资源和研究手段。本文将介绍一些利用互联网搜寻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的技巧和方法，涉及西、日、俄文文献的检索，但是侧重在西文。

一、西文检索的基本技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中国国内的文科学者们可能对西文文献检索的基本技巧比较陌生，这里有必要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在检索西文文献时，需要熟练掌握三个基本的布尔逻辑算符（Boolean Operators）即 AND、OR 和 NOT 的使用方法。AND 被用来指示系统满足两个或两个以上检索条件。比如在检索西人研究

作者单位：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Asia Library，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中国宋代妇女的著作时，可以输入 song AND women 这样一个指令。OR 表示只需满足多项检索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即可。比如输入 woman OR women OR gender 这个指令后，系统只要发现这三个词汇中的任何一个就会提交检索结果。NOT 算符则被用来排除某些选项。比方说当检索者只需要与宋朝有关的研究文献而不需要任何谈及清朝的论著，可以输入 song NOT qing 这样一个指令。上述三个逻辑算符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并配合以括号的使用（用来规定计算的优先顺序），从而构成相当复杂的检索指令，比如 song AND（women OR woman OR gender OR sex）NOT（ming OR qing）。近十几年来，绝大多数西文数据库的检索界面已经演变得相当人性化，使用者一般不再需要键入包含逻辑算符的检索指令，而只需要从检索界面的选项中选择所需的算符即可。但是，由于这三个算符构成了西文数据库最基本的计算方式，对它们的功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逻辑算符外，在使用西文数据库时还需要掌握其他几个常用技巧。如果检索者输入的检索条件是词组（phrase）而非单词（word），需要让系统知道对构成词组的单词不能作分开处理。由于目前绝大多数西文数据库在缺省设置下将词与词之间的空格当作 AND 算符来处理，因此如果在输入词组时没有标明它们是词组的话，系统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很可能与检索者所需要的大相径庭。而标明词组的最常见办法是使用引号。比如在西文数据库里检索有关唐代诗人李白的研究成果，应该输入“Li Bai”（有些西方学者使用“Li Po”或者“Li Bo”的拼法）这样一个词组。此外，截尾（truncation，亦译作“截断”）也是进行西文文献检索时常用的一个办法，其好处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输入。截尾符号一般用问号或者 * 号表示，比如用 chin * 这样一个检索词可以搜出 China、Chinese、Chine 以及 chinois 等英、法文中表示“中国”、“中文”、“中国人”和“中国的”等意的词汇。又比如用 legal * 这个检索词可以找到 legal、legalization、legalize、legalist 等一系列词汇。问号和 * 号在有些数据库里还可以被当作单词中间位置上的万能牌（wild card，亦译作“通配符”）来使用。所谓万能牌即是可以代表任何字母或数字的符号。比如输入 womn 这样一个检索词可以找到 woman 和 women。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上述功能在绝大多数西文数据库里都能实现，但是其实现方式和使

用的符号不尽相同。检索者在使用一个特定的数据库前，有必要先看一下其使用说明。

在检索西方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献时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即汉字的不同的拉丁化方式。大家知道，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大多使用威妥玛（Wade-Giles，又译作韦氏）拼音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和术语。汉语拼音是从1980年代开始才逐渐在世界上推广使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直到2000年10月才正式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文文献编目中使用的标准拼写法，而在那以前则一直采用威妥玛拼音。直至今天，英语世界还是有一些学者坚持使用威妥玛拼音。因此在检索有关中国的英文研究文献尤其是那些发表在20世纪的文献时，必须同时使用汉语拼音和威妥玛拼音进行检索，否则的话会遗漏许多重要的论著，甚至包括像《剑桥中国史》一类的主流作品。比如检索研究宋朝的文献，就需要分别输入 song 和 sung 进行检索（也可以使用 song OR sung 这样的指令）。与英语世界相似，法语世界的学者们在汉语拼音流行以前曾经长期使用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ais d'Extrême-Orient）制定的中文拼音方案。比如敦煌这个地名长期被拼写为 Touen-houang，与英语世界使用的威妥玛拼写法（Tun-huang）很不相同。这一点在检索法文文献时需要特别注意。还有，自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到达中国以后，中国的主要地名在西方文献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拼写法，与后来出现的威妥玛、法国远东学院以及汉语拼音里的拼写法均不相同。几乎所有的中国省级地名以及主要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历史拼写法，比如 Peking（北京）、Canton（广州或广东）、Chekiang（浙江）、Kiangsi（江西）、Shensi（陕西）以及 Sinkiang（新疆），等等。在美国，这套中文地名的历史拼写法直到1990年代末才被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废止，此后的中文地名均按照中国政府颁布的官方标准（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以及国内出版的各种英文中国地图）拼写。这个背景知识对于检索西方有关中国的研究著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检索西方人研究南京的著作时，必须分别使用 Nanjing 和 Nanking 这样拼写法。

二、一些主要的西文数据库

以下将要介绍的一些西文数据库的绝大多数已经被中国的主要大学及科研机构购买使用。读者们可以参看自己所属机构的图书馆的网页以确认这些数据库的使用权限和网址。

首先需要介绍的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编制的《亚洲研究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该目录是迄今为止搜罗最为全面的有关亚洲的西文研究文献目录,可惜的是直到本文写作的时候,中国国内似乎尚无机构购买该目录的网络版使用权。此目录的前身是从1941年开始编纂的《远东文献目录》(*Far Eastern Bibliography*),当时作为《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的附录出版。到50年代以后,其覆盖面逐渐扩展到亚洲大部(包括东南亚和南亚,但是不包括中东地区),并改用今名,作为《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附录,基本上每年出版一期。尽管由于受到资金和人手限制,该目录的编纂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未间断。1980年代早期,该目录开始采用电脑编制,并作为独立出版物出版,基本上也是每年一卷。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亚洲研究文献目录》自1971年以后的内容被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以收费方式向全世界各科研机构提供检索服务,与此同时其纸本停止出版。此目录包含世界各地以英、法、德、西等各种西欧文字出版的论著,而且其所罗的范围不仅包括以亚洲研究为中心的刊物,还包括许多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杂志。除了学术刊物以外,此目录还包括1992年以前出版的许多专著以及发表在各种文集中的文章。正因为有这些特点,《亚洲研究文献目录》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亚洲学家们检索研究文献的首选工具之一。

在检索西方有关中国的专著(monograph)时,研究者们可以有多种可选的方法。其中一个简单而且免费的办法即登录一些主要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等)图书馆以及国家级图书馆(比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的网上目录进行检索。在这些目录中按照书名进行检索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出现在书名最前面的冠词(英文的a、an、the,法文的un、la、le等)应该省略(但是出

现在书名中间位置的冠词不需省略)。此外在输入作者名字时,有时候需要采用"姓氏+逗号+空格+名"的格式,比如在输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名字时,就应该按照"Fairbank,John K."这样的格式。除了可以免费使用的图书馆目录外,美国的 OCLC 组织推出的 WorldCat(世界目录)也非常实用。WorldCat 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目录 CALIS 相似,是以美国为主的各种大小型图书馆的联合目录。在西文书籍方面,WorldCat 无疑是全球最为详尽的目录,从这里也可以迅速找到特定书籍的收藏单位信息。近年来随着法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国的国家图书馆逐渐加入,WorldCat 的世界性也日益增强。

JSTOR 是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比较常用的一个全文期刊数据库,于 1990 年代的中期初次开通使用。该数据库制作的宗旨是以数字形式保存西方最重要的一些学术刊物。对于每一种刊物,只收录其三年或五年以前出版的内容。JSTOR 在初期制作过程中得到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的资助,但是现在已经基本独立成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在纽约市及密歇根州的安阿伯(Ann Arbor)设有办公室。由于其搜罗的刊物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顶级水平,因此从 90 年代末以来,JSTOR 始终是西方的亚洲学家使用最为频繁的全文期刊数据库之一。不少重量级的西方各国研究亚洲的学术刊物均被收入其中,比如美国的《亚洲研究学报》、《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和《亚洲观察》(*Asian Survey*),英国的《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和《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荷兰的《通报》(*T'oung Pao*),瑞士的《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以及澳洲的《中国学报》(*The China Journal*),等等。除了这些归属在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类别下的刊物外,JSTOR 数据库中的许多其他主流学术刊物也有大量的与亚洲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比如《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等。

进入 21 世纪以后,JSTOR 组织将其数字化的工作范围扩展到了欧美地

区的一些主要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将这些机构搜藏的大量艺术品拍摄成数字照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ARTstor 图像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对于研究艺术史的学者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国艺术的图像。它们来自于一些著名的收藏和图像制作单位，比如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以及以英国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主导的国际敦煌项目等等，

跟 JSTOR 差不多同时推出的 Project MUSE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期刊全文数据库。该库搜集的期刊虽然不像 JSTOR 那样属于顶级的水准，但是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亚洲研究刊物，比如《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等。与 JSTOR 不同之处在于，Project MUSE 中有的刊物大多提供最新一期的全文内容，但是过往期刊的内容却不多。从 2009 年开始，《哈佛亚洲学报》的最新一期全文出现在 Project MUSE 里，为使用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总部位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 EBSCO 资讯公司从 90 年代以来推出的各种文献索引和杂志全文数据库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西方大学里最常用的电子信息产品之一。这些产品中与严肃的学术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一个叫做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其中搜罗的学术期刊总数达到三千五百种左右，文科和理科各占一半左右，而且将近一半的刊物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主要是欧洲)出版的。在该公司提供的 EBSCO Host 搜索界面里，人们可以按分类浏览各种刊物，也可以用标题、作者、国际标准刊号以及关键词等方式进行跨杂志的检索。虽然 EBSCO 杂志库里没有"亚洲研究"这样一个分类，但是其包含的很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杂志里有大量的中国研究论文，尤其是研究近现代及当代中国问题的论文。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成立于 90 年代末的 Ingenta 公司(2007 年与 Vista International 公司合并组成 Publishing Technology 集团)推出的 Ingenta Connect数据库也是西方学术界比较常用的。它包含了荷兰 E. J. Brill 出版社的几乎所有学术刊物的全文，其中有《通报》和《东方社会经济史学刊》(*Journal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Orient*)从创刊号到最新一期的全部内容。

对于需要寻找近二三十年来发表的法文文献的研究人员来说，Francis 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搜罗非常齐全的索引数据库。它是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下属的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nstitut de l'Information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编制的，其涵盖的年份从 1984 年开始至今。目前该数据库的已经成为美国 OCLC 组织提供的各种数据库之一，其界面和检索操作与同属 OCLC 的 WorldCat 数据库非常相似。

除了以上介绍的以外，其他含有大量中国研究文献的西文期刊数据库还有 Periodical Archives Online，Periodical Index Online，ISI Web of Knowledge，ABI/Inform Global 以及 Academic OneFile 等等。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作一一介绍。近年来，随着海外及中国一些数字信息公司开发的跨数据库检索平台(比如 SFX)的推广使用，这些不同的数据库之间的整合也日益加速，给使用者带来了许多便利。但是由于跨数据库检索的方式因校而异，读者最好与本单位的图书馆或资料室联系咨询最佳的检索西文数据库的方式。

除了期刊以外，近年来电子图书在西方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随着索尼公司和亚马逊网站推出的各种电子书阅读器逐渐流行，大量的通俗电子读物开始占领市场。在学术领域里，一些主要的出版公司比如 Springer、Taylor & Francis、Elsevier 和 Wiley 也开始推出大量面向高校师生的电子教科书产品。到目前为止这些学术电子书大多集中在理工和医学等领域，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几年里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文电子书数量也会逐渐增加。2008 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将其《剑桥史》系列(包括《剑桥中国史》)制作成电子书全文数据库并在全球发卖。

在检索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时，最常用的工具乃是总部位于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 ProQuest 公司制作的 ProQuest Dissertations 数据库。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博士论文除了在本校图书馆或档案室有留底外，还要向 ProQuest 公司寄送一份拷贝。因此该公司的这个数据库成了检索美国各科博士论文的最佳手段。但是此库只提供一个索引，如果读者需要某篇论文的全文，需通过本校图书馆提出购买请求。ProQuest 公司可以按客户要求提供各种格式(纸本、缩微或电子文本)的博士论文，而且每售出一份拷贝，都会向论文作者

支付一份微薄的稿酬。

三、开放获取资源

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近十几年在西方知识界出现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一些适应纸本时代的法律和概念,尤其是著作权法的一些内容,开始显得不太适合时宜。在当今时代,制作和传播信息已经成为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成本也日趋低廉。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觉得纸本时代的"知识有价"观念需要改变。开放获取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9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所谓开放获取,简单地说就是研究者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放到某个网站上,供公众自由免费地浏览和下载。目前北美和西欧大多数主流大学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网站,存放本校师生授权开放的研究成果。这一运动尚未对传统的学术出版体系造成决定性冲击,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多数开放获取的成果没有经过"同侪审阅"(peer review)的程序,有很多是不成熟的演讲稿甚至学生的学期报告,一般认为其价值不如通过传统学术出版渠道发表的成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在通过传统渠道出版自己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者文章的形式)的同时,向出版社声明保留在互联网上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权利,然后将成果交由某个公开获取网站发表全文。有些资助学术研究的政府机关和基金会,比如属于加拿大政府的卫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和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已经规定所有受其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成果必须免费公布,无论其是否通过学术刊物发表。不少北美大学的教授会也纷纷通过决议,鼓励或要求其成员开放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之下,有些新的学术刊物甚至从一开始就采取在互联网上开放的出版方式。当然,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开放获取运动并不支持盗版行为。学者自愿公开其研究成果与某些团体和个人以非法手段传播他人作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高尚且受人尊重,后者则属为世界各国法律所禁止的偷盗行为。实际上即使在西方,至今还是有许多学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果让公众免费获取。他们的著作权依然受到法律

保护。

在中国研究的领域，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可以公开获取的西文著作，其中包括一些90年代以后才出版的新近书籍。比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图书网站上（http://publishing. cdlib. org/ucpressebooks），人们可以发现该社出版的好些中国研究专著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公开，比如余宝琳（Pauline Yu）主编的《宋词之声》（*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以及韩明士（Robert P. Hymes）与他人合著《燮理天下：探讨宋代的国家与社会》（*Ordering the World :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等等。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不断更新的网页（http://onlinebooks. library. upenn. edu），专门搜罗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获取的图书，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不少中国研究著作。

除了专著以外，在网络上发行公开获取的刊物也日益成风。这些刊物有的既有印刷版也有网络版；还有的则完全没有印刷版，全部内容都发表在互联网上让公众免费获取。不过这些刊物大多采取"同侪审阅"的制度来决定稿件的采用以保证学术质量。近年来，一些西方的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从技术和资金上帮助这种新的学术出版模式。在中国研究方面，有若干种相当重要的西文刊物已经全部或部分采取开放获取方式，比如目前由位于台北的中研院编辑的《亚洲专刊》（*Asia Major*）杂志将三年前发表的旧内容全部刊登在网页上供免费阅览。日本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也于前不久将其编辑出版的核心英文刊物《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前身为 *Asian Folklore Studies*）从1942年的创刊号直至最新一期的全部内容在网上免费公开，但同时也保留纸本刊的销售和发行。这是两个由传统纸本期刊转变成公开获取杂志的例子。此外还有一些最新的、一开始就只有网络版的中国研究杂志，比如由澳州国立大学的亚太研究院编辑的《南方华裔研究杂志》（*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就是一个例子。寻找所有这些杂志的最简捷办法是查看一个叫"开放获取杂志指南"的网站（http://www. doaj. org）。

到目前为止，开放获取的书刊只占西方研究中国文献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发展势头相当迅猛，很有可能在今后某个时候成为西方学术出版主流，因此值得广大中国学者关注。

四、谷歌图书和 Hathi Trust

2004 年 12 月，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谷歌(Google)公司推出了一项震撼全球文化界的图书数字化计划，它宣布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合作，将这五个机构(后来陆续有其他一些图书馆加入)的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扫描，以制作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上数字图书馆。不久以后，谷歌图书检索(Google Book Search)网站(http://books.google.com)正式推出，在这个网站上，读者们对所有按照美国版权法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图书可以进行全文在线阅读和检索，对于尚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则可以进行检索，但是不能在线阅读(经作者特别授权的除外)。谷歌图书网站自从推出以后，其合法性备受争议，一直受到各种法律官司的缠身。但是它给广大研究人员带来的巨大便利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围绕该数字化项目的法律纠纷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这些纠纷进行分析也非本文的任务。但是至少在北美地区，一般的看法是这样一个已经持续多年而且受到公众欢迎的项目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下去。

参加谷歌图书项目的密歇根大学从谷歌公司那里获得了该校所有图书的电子版本。以此为基础，该校推出了自己的 Hathi Trust 网上图书馆(http://www.hathitrust.org)。目前北美地区的二十多所其他高校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也参加了这一网上图书馆的建设。该馆所藏的电子图书的使用方式与谷歌图书非常相似。凡是 1923 年以前发表的、已经没有版权保护的书籍均可在线全文阅览，而此后出版的书籍一般只提供全文检索，检索的结果以页码方式表现。即使是参加 Hathi Trust 项目的各校师生，也没有在线阅读受版权保护著作的权利。

谷歌图书和 Hathi Trust 对中国研究学者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两个网站都有大量的已经不受版权保护的早期西方亚洲学著作或原始材料，比如斯坦因(Aurel Stein)于 1907 年发表的《古代和阗》(*Ancient Khotan*)以及对于研究近代西方在华传教史很重要的《中国丛报》(*The Chi-*

nese Repository)等等。需要利用这些资料的中国学者已经无需再跑图书馆借阅，在网上就可以直接阅览并且全文检索。其次，那些尚受版权保护的西方研究中国著作，尽管还没有开放在线阅览，但是使用者可以在谷歌和 Hathi Trust 的网站上对其进行关键词检索并获得这些词汇所在页码的信息，而且关键词检索可以扩展到全库或者任意几本书的组合。这种检索当然比利用纸本专著后面所附的索引更有效。

五、日文中国研究文献的检索

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些检索用日文发表的中国研究论著的方法。与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比较起来，日本尽管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电子工业，但是其文献情报数字化工作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可能跟该国长期使用的 JIS 和 EUC 日文编码标准有关。与中国的国家标准 GB 以及国际上比较通用的 Unicode 编码不同，这两种日文编码自从形成以来几乎没有修订过，每个体系中包含的日文汉字不超过 7000 个。这么少的汉字数量对于该国的历史文献数字化工作来说自然是远远不敷使用的。其造成的结果便是日本绝大多数的数字化工程只能生产出图像(主要有 PDF 和 DjVu 两种格式)，而不能形成可以全文检索的产品。尽管不少日本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作出各式各样的尝试去创制大规模的字库比如“今昔文字镜”，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对日本政府产生足够的影响使其扩大 JIS 和 EUC 编码的汉字含量。不过，近些年来随着 Unicode 在日本逐渐被接受和推广，该国数字化进展缓慢的现象或许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观。

对于寻找在日本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献的人员来说，由论说资料保存会编辑的《中国関係論説資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该连续出版物从 1964 年开始出版，每年一次，搜罗在日本出版的各种学术刊物上的有关中国的论文资料，将其分门别类(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文学、语言学等等)后影印出版。四十多年来，它一直是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了解日本同行研究成果的最简捷的途径。从 2000 年开始，该资料汇编在出版印刷版的同时赠送带有全部内容的光盘(PDF 格式，不能全文检索)，而且将历年出版的

全部内容也做成了光盘发卖。除此之外，购买者每年还获赠一个索引光盘。这个索引光盘不仅涵盖当年新收的所有文章，还包括了所有的旧内容。因此这个光盘本身就是一个检索日本中国学成果的绝佳手段。不过在使用这个索引光盘以前，需要先将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的非 Unicode 语言属性改成日语（其缺省设定可能是中文或者英语）。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纂的《東洋学文献類目》也是检索日本研究中国论著的一个有效工具。所谓东洋学也就是中国学。这个目录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但是在战后才得以不间断地进行，每年出版一大卷。它的最大特色是包含了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的中国研究成果。其涵盖的语言包括中、日、韩、英、法、德、意、西、俄文，甚至还有一些较小的语种比如匈牙利文。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東洋学文献類目》始终是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该领域主要成果的首选工具书。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唯一一种能够综合反映全世界中国研究成果的文献目录。不过自从 90 年代以来，由于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的文献数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京都大学单凭自己的力量显然已经无法胜任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详尽搜索的任务。近些年出版的《東洋学文献類目》虽然依然保持了涵盖各种语言的传统特色，但是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使用这本目录去检索某些语言（比如中文和英文）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国内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本目录在检索日文研究中国的文献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作为日本学者编纂的中国研究文献目录，它自然在搜集日文成果方面做得非常仔细和全面。特别是近年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网页，让全世界的学者免费使用这个目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这个目录对学者们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两种侧重于中国研究文献整理的索引和目录外，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网页上也提供了不少对检索该国学术文献有用的工具。比如一个叫做“書誌拡張検索”的目录对于搜索日本出版的各种学术专著就很有用。这个目录做得非常细致，将许多论文集的目录都全文抄录，使用者因此可以搜索到这些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此外国会图书馆长期以来不断编制的“雑誌記事索引”详尽搜罗日本国内出版的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并编制成目录，其

中也包含大量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学术文献，是很有用的检索工具。

六、俄文中国研究文献的检索

最后非常简单地提一下检索俄文文献的最新手段。在俄文科学文献的数字化方面，目前做得最好的是总部位于美国明尼亚波利斯市并且在俄罗斯登记注册的East View（东观）信息公司。该公司早年从经销俄文书刊起家，后来逐渐涉足文献数字化，并推出俄文科学文献的大型全文数据库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е базы данных（大全数据库）。据笔者了解，此数字产品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多家用户，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该库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对于关心俄苏中国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最有用的是俄罗斯国家书目（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а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以及近百种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这里面包括不少从苏联时代起就具有权威地位的俄文学术杂志，比如《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和《文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等等。

综上所述，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检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各种语言的数据库（多数基于互联网，少数以光盘为媒介）已经成为获取相关文献的主要来源。相对于纸本时代的参考工具书，网络时代的数字化学术资源具有空前强大的检索功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帮助研究人员获得大量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源一般都对使用者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有比较特殊的要求。对于关心海外中国学的广大中国文史哲专业师生来说，有必要接受一定的训练以期获得必要的技巧。此外，由于网络时代文献检索手段的演变非常迅速，因此研究人员有必要对这些变化进行持续的跟踪，不断更新在使用这些资源时需要的知识和技巧。

中国文化史文明史书目(西文、日文、韩文)

陈才智　张剑　柳昌娇　编

西文部分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国文明》)	Herbert Giles(翟理斯,1845—193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简史》)	Richard Wilhelm(卫礼贤,或尉礼贤,或卫理贤,字希圣,1873—1930) translated by Joan Joshu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29	
Bas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 a topical survey in outline, with readings(《中国文明基础》)	Esson McDowell Gale(盖乐,号智山,1884—1964); Lee,Shao Cha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续表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国:其历史与文化》)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赖德烈,或拉妥瑞,或拉图莱 1884—1968)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34(2nd ed.);1946;1949(3rd ed.);1956(3rd ed.,rev.);1964	上下卷。包括许多西方有关中国资料的汇编。运用的是传统方法。书评:钱锺书(C. S. CH'IEN),载1946年9月《书林季刊》(Philobiblon)第2期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汉语译本,题为《中国的文化》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	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费子智,1902—1992)	London: Cresset Press	1935;1942;1961;1976;1978;1986,	The Cresset library,5
		New York: Frederich A. Praeger	1950;1961 (3rd ed)	
		Holt, Rinehart & Winston (3rd ed.)	1961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61	俞仁寰汉语译本,题为《中国文化简史》
		Ta Hsi Yang Book Co.	1971	
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概览》)	Herrlee Glessner Creel(顾立雅,1905—1996)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36;1937	
		Ungar	1954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史》)	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倭讷,1864—1954)	Shanghai: Shanghai Times	1940	
A syllabu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on and culture(《中华文明与文化史纲要》)	L. C. Goodrich & H. C. Fenn.	China Society of America	1941(3rd ed.);1958 (6th ed.)	

续表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Joseph Needham(李约瑟,1900—199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la 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ée(《中国文明》)	Marcel Granet(葛兰言,1884—1940)	Paris: Albin Michel	1968;1994	
		Meridian Books	1964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		Caves Book Co.	1976	英语译本。Translated by Kathleen E. Innes & Mabel R. Brailsfor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中国文明与官制:一个主题的变化》)	Étienne Balazs(白乐日 1905—1963)著,Hope M. Wright(赖特)编辑,Arthur F. Wright(芮沃寿)英译	Yale University Press(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4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eine Einfuhrung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史》)	Werner Eichhorn(艾士宏 1899—1991)	Stuttgart(斯图加特): W. Kohlhammer	1964	
		Utrecht: Antwerpen	1967	荷兰语译本
		New York: Praeger	1969	英语译本。Translated by Janet Seligman
The Legacy of China(《中国遗产》)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Raymond S. Dawson(雷蒙·道森)	Oxford: Clarendon Press(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	1964	
		Amsterdam: De Arbeiderspres	1973	荷兰语译本:De Chinese Traditi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要义》)	Dun J. Li(林顿)	Princeton: Van Nostr & Reinhold Co	1967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	汉语译本,题为《中国历史文明巡礼》

续表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何谓道家及其他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论文》)	Herrlee Glessner Creel(顾立雅)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0;1982	
The Ageless Chinese:A History(《永恒之中国》)	Dun J. Li(林顿)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1	本书讨论了从起源到1963年的中国文明,文化的各个方面均有涉及,观点新颖,具有现实感。作者还编有一部文选,虽未与此书成套出版,但可视为姊妹篇一起使用。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通变:中国历史与文化》)	David C. Buxbaum(巴克斯鲍姆)& 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	Hong Kong: Cathay Press(中国书店)	1972	

续表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史》)	Jacques Gernet (谢和耐,192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出自法国著名汉学家之手的欧洲风格的标准文化史教材。附参考文献及索引
	Jacques Gernet ; translated by J.R. Foster & Charles Hartman		1982;1985;1996(2nd ed.)	
	(法)谢和耐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汉语译本,题为《中国社会文化史》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A Research Guide(《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	Endymion Wilkinson(魏根深)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导论》)	edited by John T. Meskill(穆四基),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 Mason Gentz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xington: D. C. Heath & Co	1973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帝制时期之中国: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Charles O. Hucker(贺凯/郝克欧)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ivilizations(《中日文明史概要》)	Conrad Schirokau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The Chinese experience(《中国人的经验》)	Raymond Dawson(雷蒙·道森)	Scribners	1978	实为中国文明简史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David T. Roy(芮效卫)、Tsien Tsuen-hsuin(钱存训)编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8	

续表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文明论文集》)	Derk Bodde(卜德) Edited & Introduced by Charles Y. Le Blang(白光华)、Dorothy Borei(包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0;1981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中国历史与文化》)	William Scott Morton(莫顿)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中国文明与社会导读》)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	New York: Free Press(独立出版社)	1981	中国社会史方面的译文选集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ourcebook (《中华文明导读》) containing more standard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			1993(2nd ed., rev. & expanded)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8	
	何兆武、何冰中译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China: a cultural history(《中国文化史》)	Stephen G. Haw	London: Batsford	1990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文明简史》)	Conrad Schirokauer	Harcourt Brace Gap College, Publishers	1991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文化的力量:中国文化历史研究》)	edited by Willard J. Peterson(裴德生), Andrew Plaks(浦安迪), Ying-shih Yu(余英时)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续表

题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备注
Chines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t: "*Wen-hua Zhongguo*". [*Chinese self-im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Wen-hua Zhongguo*".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 1995 *of the Germ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DVCS*)]《文化中国:一九九五年德国中国研究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	Christiane Hammer(克利斯提安·海默), Bernhard Führer(弗赫尔)编	Dortmund(多特蒙德):Projekt	1996	
Dictionnaire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中华文明辞典》	Eulalie Steens	Paris: d. du Rocher-J.-P. Bertrand	1996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遗产的认知》	edited by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Edition Forum	2008	

(陈才智)

日文部分

支那文明史略	青山正夫著	大阪文海堂	明治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88—1889)出版
支那文明史略	青山正夫著,深井弘校	大阪松村九兵衛	明治二十五年(1892)修订2版
支那文明史論	中西牛郎著	東京博文館	1896年出版
支那文明史	白河鯉洋,国府犀東著	東京博文館	明治三十三年(1900)6月出版,《帝国百科全書》第52編

续表

支那文明記	宇野哲人著	東京大同館	明治四十五年(1912)2月出版 大正七年(1918)改订版
支那文化史講話	高桑駒吉著	東京共立社	大正十三年(1924)出版
支那文化史観	出石誠彦著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昭和十五年(1940)出版
中国文明史物語	大林重信著,山本一郎絵	東京富山房	昭和十七年(1942)出版
中国のめざめ	宮崎市定編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2000年12月出版
中国文化の成立	水野清一責任編集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2001年1月出版
中国文明の歴史	岡田英弘著	東京講談社	2004年12月出版

(张　剑)

韩文部分

중국문화사(中国文化史)	김동성 편역(金东成编译)	유문화사(乙酉文化社)	1961年
중국문화사(中国文化史)	김원중(金元中)	을유문화사(乙酉文化社)	2001年
중국문화사(中国文化史)	이국희(李国熙)	중명(中明)	2005年

(柳昌娇)

论著评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序言

张广达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珍本提要》的问世，是对当今学术界相关研究领域的莫大贡献。这一解题目录对北京大学百年来西学积淀做了颇有深度的揭示，其中包含的信息和资料对于西方汉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有诸多特点。例如，入藏年代早，一些特藏始自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和后来的老北大，入藏的年头已过百年。又如，融入北大的西文藏书源出多头，因而内涵丰富，兹举其荦荦大端：1928年之后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一燕京图书馆同步形成的燕京大学"西文东方学"特藏，1945年二战结束后到1950年代初，被相继接收的德国人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1888—1956）等私人精品，之后又纳入原德国公使馆、原中德学会、原中法大学、原美国新闻处等机构藏书。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北大的西文藏书之语种多、涵盖面广等诸般特色。

今天，就珍本善本收藏而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中自然不乏外文珍本善本。据顾犇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①]，该馆收藏西文善本1234

①顾犇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种、日文善本 299 种、俄文善本 420 种，其中包括了近年外国首脑的一些赠书。上海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因其地理位置而受西方文化浸润较早，一些西方人士和宗教机构长期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并在上海建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也相应收藏了相当数量的西文典籍。1992 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目录》收录了 1515 年至 19 世纪初出版的西文图书 1831 种①。但是，这两本目录旨在将各自所有的西文珍本收藏做总体性描述，而非研究性专题特藏的揭示。

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图书中，最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其中 20 世纪初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书多达两万册，而图书的收藏往往因其专题性质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如此珍贵的专题特藏由于缺少必要的介绍，即便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难窥其全貌。此次北大图书馆从两万余种图籍之中选录了大多出版于 1850 年以前的三百余种珍本善本，重揭其面影，并写出详细的提要，再现这座难得一见的宝藏的一角。其版本不乏珍贵的首版本；其语种涉及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蒙元以来早期中国游记、明末以来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记录、汉满蒙藏维等语言语法早期课本与研究、中国传统经典和名著的翻译、亲历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关于中国的总体和区域考察以及专题研究。翻阅一下目录，可以看到，从蒙元以来各种行纪，特别是 17 世纪中叶以后耶稣会士东来直到今天，反映早期从内陆和沿海来到中国的珍贵典籍各个阶段情况的代表性的西文典籍于焉大体具备。换言之，在国内，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既富于珍本善本，又切合今天的西方汉学及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之用途。

本目录所附题名页上的各种藏书章，形象地再现了这一特藏的收集流程，在其背后，则是袁同礼、严文郁、毛子水、洪业、陈鸿舜、向达、梁思庄等几代北大和燕大图书馆人为此付出的毕生智慧和心血，他们的作用与哈佛大学的哈佛一燕京图书馆的裘开明、吴文津相若。哈佛大学为了庆祝哈佛一燕京图书馆七十五周年大庆而举办的特藏展并在 2003 年出版的一部展览目录《燕

①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目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

京宝藏》[①],北大图书馆主持的这部解题目录与之相映生辉。

本目录的编纂体现了今天北大图书馆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负责此项工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张红扬女史及其同仁与北大各院系师生精诚合作,克服语种、版本等诸多困难,使本书得以完成,值得人们衷心赞美。在提要编写过程中,编者对所收录的图书在作者、版本方面进行了精心的核实和考证,厘清了一些原来编目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一种图书的不同版本和译本,以及原收藏者、印章、题签等重要信息都有较好的揭示,在提要编写方面也不乏独到之处。本目录的体例使人们想到约翰·拉斯特(John Lust)为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图书馆编写的《馆藏1850年前刊行的西方论述中国的注记书目》。拉斯特做了统计,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这批图书大约相当于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的《中国学书志》(*Bibliotheca Sinica*[②])著录的典籍的三分之一[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批珍贵的西文有关中国的特藏或许数量上赶不上世界顶尖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但质量上绝不逊色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研究性大学图书馆。这份文化遗产珍贵而沉重,它既见证光荣的过去,也昭示辉煌的未来。

如上所述,北大图书馆收藏20世纪初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籍约达两万册,本目录不可能面面俱到。例如,北大图书馆除西文珍本图书外,还藏有不少西文珍贵期刊和报纸,如全份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④])等,但此次并未入录。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的这一有益的尝试旨在创始,衷心希望这一解题目录成为我国这一领域的工作之嚆矢。

2009年2月2日

---

①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xhibition Catalog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ng Kong: Distribu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2003.

②Henri Cordier, *Bibliothca Sinica*. Paris :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vol. 1. 1904, vol. 2. 1905—1906, vol. 3. 1906—1907, vol. 4. 1907—1908, vol. 5. 1922—1924.

③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rduction, viii*.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1833—1851.

洪业及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代译后记

曾祥波

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业用英文写就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2)一书。在这部400余页、包括一册正文和一册注疏的煌煌著述中,洪业以唐帝国由盛及衰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引证、翻译和阐释杜甫的374首诗篇,详尽地讲述了这位诗圣不朽的一生。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流的教育家和学者,洪业的一生也同样不朽于世。其功业见于燕京大学与哈佛一燕京学社的创办,其德行遗泽于众多卓然成家的门生弟子,其著述如诸种《引得序》、《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破斧》等名篇佳什无不为学界所熟知。而《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乃是洪业平生中唯一的一部专书著述①,其意义尤为切要。

杜甫及其诗文何以成为洪业唯一一部专书著述的兴趣之所在?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的自叙中,他作了饱含感情的交代: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①按,洪业一直计划成书并已着手多年的《史通》笺释与翻译最终未能完成。参见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予年方十三，家父即授以杨伦《杜诗镜诠》，语予云，杜子美志意宏远，心性桀倔，且多谐趣；嘱予曰，其人也，天假其时，则显；运命未济，亦不衰。既长，因予所学，遂以《圣经》为绝世之书。而仅次于圣诗者，即为杜诗，每能慰予之大悲大喜。四十年来，吟蕴其间，其亲近感激之心，沛然而与日增焉。

壬午岁(1942)，予缧绁于日寇之囹圄，欲阅《圣经》而不可得，遂索杜诗一部——囊昔文文山(1236—1282)于元人狱中慨然引领而待死，集杜句成诗二百章。予臆可以效法焉——亦不获允。其时于晨昏祷思之中，已默定他日脱身后必所当为之事若干，潜研杜诗即其一也。

丁亥至戊子岁(1947—1948)，予再赴哈佛大学教席，授以杜诗行实。诸生喜焉，促予笔削以成编。戊子岁二月，又宣之于耶鲁大学伍德沃(Woodward)讲席。听者亦促予以英文撰为一书。今其书告成，吾之微愿，在增西人于诗圣之新知，藉此而具同情之了解于吾国吾民。①

其中所言情、事之深沉曲折，揆诸现代学术著述撰述之“缘起”，实可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相媲美。实际上，洪业对杜甫的研究应该还可以追溯到编纂《杜诗引得》时期。1940写就的《杜诗引得序》中，他已经表明了全面整理杜甫诗歌与生平的旨趣。在总结了杜诗流传刊刻的重要版本之后，洪业认为：

然杜集之编订，岂已臻至善，而学者固可辍笔哉？间尝论之，考订《杜诗》之事有三：一、蒐辑其诗也，宋人诸本已为之矣，后人无以复加焉；二、校勘异文也，黄伯思之校本既不传，而钱谦益之校本又不可据，此后人不可不更勉力焉者也；三、考本事、注典故，以解篇意，此清人已优为之，顾多辗转钞录，鲜覆核原书，此后人尚可改良者也。……然则三事中，尚有二事可为，故谓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昭来学，丝毫无遗憾矣。然而谈何容易！一则书不易得，上所举宋、元人编订之本八种，其半尚在秘藏，安得有人

①此处及以下所引之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杜甫》)文字皆出自笔者译本，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不再一一标明。

影印而传布之，此尚有待于将来者也。二则工具不足，校注《杜诗》必欲得杜甫所习用之字句、《杜诗》中所复见之名物，而前后参照焉，杂书引《杜》则简举篇名，或仅录一句，或仅摘二三字，学者必欲知其各在集中何处；然《杜诗》篇数，千四百余首，《杜集》各本之都宜检校者十有余种，而编次卷第又多不相同，校者将望而生畏焉。欲救此弊，故引得编纂处有《杜诗引得》之编制也。……他年如果有新本《杜集》，如业所议之《杜诗校注》者，则今《九家注》本，并《引得》，并《编次表》，并业此序，皆筌蹄可弃也已。①

很明显，《杜诗引得》的编纂，只是为了覆核、校勘异文的便利，为最终全面整理杜诗、编就集大成性质的《杜诗校注》作工具性的准备。尽管洪业构想中的《杜诗校注》最终未能形成，但是在撰写《杜甫》一书中，《杜诗引得》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洪业以回答学生提问的方式，展示了如何通过《引得》的检索功能来判断汉学家杜诗译本中的伪赝之作。而《杜甫》一书中应用《杜诗引得》进行排对、校核、辨伪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尽管洪业因撰写《礼记引得序》获得 1937 年巴黎的儒莲奖而享誉学界，但在哈佛一燕京学社编纂的诸种《引得》中，《杜诗引得》恐怕才是洪业最具个人关切的一种，因为它的编纂寄托了洪业自身的阅读情感与撰述规划，是其杜甫研究的真正学术起点。以这样的背景来观照《杜甫》一书的写作，才能见出此书在洪业生命中渊源深长的重要性。

然而，此书自 1952 年出版以来，竟从未被译为中文介绍回杜甫和洪业的祖国。这大概有两个原因：1952 年哈佛出版此书时，中国国家政权刚易手，港台地区惊魂未定，尚无暇顾及学术著述译介；等到 80 年代以后大陆开放，90 年代西方汉学著述翻译热兴起，而洪业先生早已于 1980 年遽归道山。《杜甫》一书出版时间既太早，题目又不够前卫热门，著者也已寂然于世，自然就无人问津了。2008 年下半年，我到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做访问学者，观览一干汉学著述，及至展读此书，只觉胜义纷然、生气满纸，惊讶于此前国内学界对

①洪业，《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347—349 页。

此书甚少关注，遂有译介之意。后来作了一番调查，才知道此书迄今为止仍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著述。其实，在2006年，当时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陆扬教授在《中日中国文学史研究情况对比的一点浅见》一文中就指出："对杜甫的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是洪业先生的两大卷杜甫传，但偏偏是这部著作，在中日都没有能产生影响。"这一状况的产生，自然跟缺乏中文译本大有关系。以我的阅读体会，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可与陈贻焮先生完成于1988年的三卷本《杜甫评传》并称东、西方杜甫研究的杰构。当然，堪称汉语著述中杜甫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杜甫评传》完成的时间晚于洪业《杜甫》，时光流逝，学术进步，将两书作"关公战秦琼"似的对等比较，对洪业先生来说有点不公平。而且《杜甫评传》字数百万，篇幅远远超出洪书，在细节上更趋于细腻深入，后出转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如此，《杜甫》一书仍时时闪烁着洪业探赜索隐、戛戛独造的智慧光芒，更流露出他缅怀故国的深情。

试举数例，以见一斑。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是哪一篇？诸家往往以杜甫漫游齐赵之际的《登兖州城楼》为现存杜集中最早之作。而洪业先生别有创见，认为《夜宴左氏庄》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作品，他说：

> 二十年前，我遵循前人注释，认为杜甫在712—735年的诗歌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观点，将此诗系年于735年。因为诗中提到了吴地方言（"吴咏"），这使我相信此诗作于东南游历时期。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写的。杜甫"检书"、"看剑"也许跟他即将返回、准备科举考试有关。

洪业进一步将此诗与杜甫晚年回忆吴越之行的《壮游》相互对应，加以发挥：

> 这次南方的游历可能花了好几年时间。杜甫甚至想沿着扬子江顺流南下。他还雇了一条船，希望能航行到东海的扶桑岛。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为什么？难道是家中来信催促他回去，以便准备州郡和全国的

贡试？在一切事务中，似乎只有这件事情有足够理由使得他在735年的晚些时候回到长安，参加736年春京兆为选拔参加全国贡试的乡贡进士而举行的考试。……

在诗歌竞赛中，蜡烛常常是为了标志时间底线。剑也许是传家之宝，可能还是诗歌吟咏的主题。在诗歌用事中，作为惯例，书剑常常指一个人做好准备要为他的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学与力量。公元前5世纪，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他放弃了对他非凡功业的一切报酬，驾着一叶扁舟离去，从此再没有回来。苏州、杭州和附近州郡的吴方言与首都以及其他北方地区的方言有很大不同。因为杜甫在南方已经游历了好些时候，也许有几年了，他可能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吴方言，能够理解吴咏——换句话说，能确切地了解并被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所打动。我们的诗人是否已经想到了科考之后进入仕途的机遇？他是否为了因科考而被迫推延到不可知的将来的这次原计划中的浮海之航而感到遗憾？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将此诗系年于南方游历结束的735年，它将变得极富意味。

对《夜宴左氏庄》的这一读解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学者就指出，洪业《杜甫》一书"创获之多，近古莫比。如以《夜宴左氏庄》诗定为游吴时作，心得之说，碻不可移"[①]。

又如，杜甫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在哪一年？诸家多将杜甫首次参加科举的时间定在孙逖知贡举的735年，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亦然。而洪业将其定在考功员外郎李昂知贡举的736年，这一年在科举史上很有名，因为发生了举子与主考的冲突，此后朝廷觉得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位卑而权重"，就改为由礼部侍郎主持了。洪业先生的编年理由是：

杜甫某句诗曾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已经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还进一步说，这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经"快意八九年"，

①引自洪业《我怎样写杜甫》，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年元旦特刊，香港：《人生》杂志二四卷八、九期转载。

之后才于745年再次返回长安。我们这里把此次考试的时间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杜甫没有通过科考。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诗人因为上述事件被惩诫了。

这解释颇令人信服。尤其是注意到了"忤"字与736年科举风潮的关系，并用以解释杜甫落第的部分原因，不能不让人叹服其别具只眼。洪业在此书《引论》中说："中西诗歌最显著的不同，是中国诗歌普遍的简短。中国诗人仅仅提笔写下迷狂和灵感的最高体验。戏剧能够繁复，故事可以细腻。而在诗人看来，这些细节应该尽可能留给读者去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候，洪业也通过对诗歌的翻译来传达其独到的理解，例如《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洪业指出，此诗"常常被误读和误译。汉语中的诗歌语言总是很简洁，人称代词一般都被省略。这里，不能够加上第二人称，否则看上去好像年长的诗人被当作一个顽劣孩子一样被斥责"。因此，其翻译是：

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 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 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 I sing, and I waste days in vain, Proud and unruly I am, hut on whose account"（"又到秋天，我们依旧像蓬草般飘荡在风中。我们未能如葛洪一样，找到长生的丹药。我痛饮，我狂歌，我白白浪费了每一天。我如此桀骜而不守规矩，这又是为了谁呢？"）

聊聊数语，举重若轻，自成一家之言，足以破宋人以来的纷纷聚讼。又如，杜甫初次授官，被任命为河西尉。河西的地点在杜甫研究史上曾经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洪业的解释最为妥帖。在撰写《杜甫》一书的引论中，洪业就指出："在重建杜甫生平的过程中，我严格使用当时的地名。在杜甫的时代，一个地名一般都经过三次更改。这些更改及其日期、加上地名的今称，都可以在索引中找到。"因此，河西的位置也就迎刃而解，"在唐代，不同时候有好几个地方叫做河西。杜甫被任命的这个地点很明显属于黄河西岸的同州辖区。760年，此地改名夏阳。位于今郃阳东十三英里处。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11b；《唐会要》卷70，18b；《旧唐书》卷38，15b；《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690页，'夏阳'条。从奉先往东北方向到河西有五十多英里。"

撰写有偏重于阐释杜甫思想的《杜甫评传》的莫砺锋先生在其《杜诗讲演录》中评论陈贻焮《杜甫评传》研究的细致深入时举了一个例子，即陈书解释了杜甫从凤翔回羌村途中的步行与骑马问题。而洪业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 9月18日，我们的诗人离开凤翔。向东北方向的三川进发的旅途大概路程是215英里。一名朝廷官员通常可以使用政府的驿马；但是《徒步归行》一诗表明杜甫不得不至少步行头73英里，抵达新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邠州，在那里，我们推测，李（嗣业）将军给了他一匹马。当杜甫写《玉华宫》的时候，他已经走完了回家路程的三分之二还多。

再如对杜甫一篇很少为人注意的短文《杂述》的理解：

> (745年)是什么导致杜甫西归呢？当然，他并不知道，等待在他面前的将是十年蹉跎岁月。在东部，杜甫的思绪关注于修炼来世的隐者、炼丹求长生的术士。为何他要返回京城这个政治阴谋和竞争的漩涡中心？难道他的旅费花光了？或者西归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实在没法知道。然而，在杜甫诗集中，有一篇名为《杂述》的短文。此文一定作于鲁郡附近的某个地方，时间可能就在745年秋天。
>
> ……(此处为《杂述》全文，略去不引)……
>
> 除了张叔卿，这里提到的其他人将在后面的章节出现。薛据在731年通过了科举考试，岑参则是在744年。他们在当时已经是文学名家，并且毫无疑问担任了官职。是否我们的诗人已经深切意识到，除非一个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则很难依靠地方权贵的关照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

杜甫何以于745年西归长安？历来无达诂。洪业此说乃是我所见到的最具“证据性”说服力的阐释。这需要熟知杜甫同时代人的具体情况，才能敏锐地意识到薛据、岑参等人的中举年份与745年之间的联系。真是目光如炬！这种对问题的敏感，其背后是饱览、熟谙，纵横捭阖的联系能力，以及天马行

空而操纵自若的想象力。洪业眼光的独到还表现在，他的研究视野极其开阔，总是能想到其他研究者从来未曾想到的问题，而不仅仅限制在文学研究的界限之内。例如，他谈到杜甫青年时代漫游的经济来源问题：

为了计算737年杜闲一家的经济状况在整个唐帝国当中的层级，我采用了25年后一次廷辩的某些论证(《新唐书》卷54,11b—12a)，其中认为每人年平均的谷物消耗量是7.2斛，这是其生活资料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他的东西包括衣物、社会及其他消费。据说，每亩地年产谷物约二分之一斛，而普通农业家庭的人口是7人。因此，一般农业家庭的年消耗量是151.2斛，需要土地302.4亩。据《新唐书》卷52(2a—b)记载，一个七口之家的所得土地是260亩，如果加上40亩继承来的土地，则是300亩。杜闲作为官员，其家庭还可以免除租赋劳役。官员俸禄是随官阶变化的。作为兖州司马，杜闲可以获得两份土地，一份700亩，任期内占有，一份800亩，终身拥有。他每年获得两种俸禄，一是320斛谷物，一是110,400枚铜钱。他还能享有25名仆人的免费服务。如果他用货币折算这些仆人的服务，那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49,000铜钱。如果把钱币都折算成谷物(普遍价格是每斛130钱，尽管那时在偃师是每斛30钱)，并假设土地租金是收益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在杜闲的320斛谷物俸禄之外他还能额外得到1,476斛。总数是1,796斛，这是一般家庭收入的11倍。这个计算当然是粗略的。但是它足以表明杜闲完全能够资助杜甫的生活开支。

这个计算还没包括当地政府提供给杜闲的房舍——或者马匹，办公费用，以及其他特权和服务。我们还没有算上杜闲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和财产，以及他自己的积蓄和投资；我们猜测他从这些资源中获得的收益足够负担生活在汴州(陈留)的继母卢氏，以及她的孩子，可能还有杜闲的两个寡居的弟妹。杜闲在兖州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许现在有五个孩子。让我们推测他有五个奴仆，依靠他的收入生活。因此，兖州家中应该有十二个人，但杜闲的收入足以负担这个数目的好几倍。当然，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大儿子杜甫的旅行费用。

从经济层面去理解诗人生活，这种眼光不但在杜甫研究中首屈一指，即使置诸迄今为止的古代作家研究领域，也带有垂范意义。更不用说其推断、论证的精细了。杜甫告身的问题则是体现出洪业从唐代文书体制的层面进行文献辨伪的老到眼光。

> 早在17世纪，据说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告身就被发现了。钱谦益给出了这份告身的形制和文字(卷2.4a)。告身的日期是757年6月7日("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这意味着杜甫的任命是在房琯被贬谪之后六天，而他抵达凤翔可能是在6月1日之后。且不论学者对这一告身的普遍接受，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件赝品。不必讨论唐代文书的细节问题(参见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之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pp.793ff)，我们可以拿这件告身与韦济的拾遗任命相比较，韦济告身见于《文苑英华》(1000卷，987，1567)卷383.5b；作伪者对唐代用法的无知立刻昭然若揭。此文并未提及杜甫从前的官职，而是一开始就说"襄阳杜甫"！而且，在现存杜甫集子中有一篇《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感谢皇帝宽恕自己免于审判，写作时间是757年6月21日，在署衔时杜甫在自己的官衔前用了一个"行"字，这在唐代的文书用法中表示他现在的官阶要高于左拾遗(参见《旧唐书》卷42.3b；《新唐书》卷203.3b)。而作伪者依照某些无知的编纂者的修订，将"行"改为"行在"，把杜甫任命为"行在左拾遗"！

此说证据确凿，可为定案。大概因为未曾翻译的缘故，洪业此说不为国内学界所知，即使是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也还沿用钱谦益根据伪赝的杜甫告身而得的结论[①]。类似的文献辨伪不乏其例，如指出河北第一博物馆(天津)在1934年出版的《河北第一博物馆画报》第57期刊载的出自巴郡南山的拓片"杜甫《严刺史武作重九日南山》"为伪作，并从《巴州志》(1833年)卷8中找出题为"万刺史诗:《重九日南山》"的同样文本，从而证明此诗是一位生活

①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57页。

在1195年之前的姓万的宋代刺史的作品。并且洪业还指出，在《巴州志》卷5、卷8、卷10中还收有这位万刺史的其他诗文。我查阅了《全宋诗》，其中没有收入洪业提及的万刺史的其他一些诗作，可见洪业先生的这条考证对于90年代才完成的《全宋诗》也不无裨益。

当然，《杜甫》一书体大思深，智者千虑，手不及心，偶尔出现小小笔误，或者也会有个别考虑未稳的地方。例如第三章说到"杨贵妃有三个从兄，一个娶了皇帝女儿，作了驸马；一个做了皇帝的侍御史，身居官阶二十二级的高位"，据两《唐书》载，杨玉环从兄杨铦任鸿胪卿，杨锜任侍御史，为太华公主驸马。这里的叙述把杨锜的官职误任给了杨铦。又如《杜甫》一书中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杜甫晚婚，婚期是752年。洪业认为：

> 杜甫在远房堂弟家度过除夕之夜这件事颇能反驳他在752年之前成婚的假说。而且，751年杜甫四十岁时，尽管出身于良好的缙绅之家，但却穷困潦倒，并无仕途前景和固定收入，倒是经常酩酊大醉，想要一个人浪迹天涯，去遥远而不可企及的地方。这些可能都妨碍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婚。到四十一岁，情况有了可观的变化。突然之间他声名大噪：三大礼赋打动了皇帝陛下！不错的任命、稳定的收入想来没有问题，如果再娶得佳妻，他一定不会再想浪迹四方，他甚至还可以节制饮酒。媒人们忙碌起来了。肯定有一些漂亮的良家女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了青春，尚待字闺中。

他举出一条最重要的证据：

> 杜甫后来的诗篇显示他是一个十分深挚的丈夫和父亲，当他和妻儿分离时，他的诗中也总是洋溢着思乡的情怀。杜甫从745年至752年的作品中对家庭完全保持缄默，只有一首短诗是例外——这首诗我系于755年。……

要让这条证据发挥作用，那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的系年及其解释成

为关键：

> 杜甫的这首爱情诗一般被系于757年春天。我发现有误，因为这一年的寒食夜里，天空中只有半月，但是诗中提到了满月。在杜甫一生中只有三次满月的寒食之夜：747年，755年和763年。763年杜甫和家人在一起。747年，他很可能尚未成婚。因此，我将此诗系年在755年4月1日。

在陈毓贤《洪业传》和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中，都提到过一本对他影响很大的《蚀经》(Th. Ritter V. Oppolzer, *Canon der Fiinsternisse* (*Denkschr. D. Wiener Akad. D. Wiss.*, math. Kl., Bd. 52, 1887))。洪业说："西人有著《蚀经》者，上自公历纪元前1208年，下及公历2161，举上下三千余年共八千日蚀而表列之，细计每蚀之起讫，图绘见蚀之地域；凡考史者取征焉。"[①]洪业对《一百五日夜对月》的系年，就是用的与《春秋经传引得序》中相同的天文历法考证。但是，符合该诗天文历法特征的日期有三个，排除了不符合其他因素的763年，那么还剩下747年和755年，而洪业选择755年、去掉747年的原因是"747年他很可能尚未成婚"。可是，一开始洪业为了说明"杜甫于752年结婚(疑问?)"，举出的证据是"杜甫从745年至752年的作品中对家庭完全保持缄默，只有一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是例外"，为了解决掉这个"例外"，才引入天文历法的考证，现在当这个"例外"仍然可以在天文历法的验证下保持其"治外法权"的时候(747年也符合"从745年至752年"的要求)，他却又用需要验证的问题的最初起点——"杜甫于752年结婚(肯定!)"来否定这个"例外"。且不论洪业对杜甫婚期的假说究竟成立与否，至少就这一阐释过程而言，难免有些循环论证的嫌疑。奇怪的是，对此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过质疑。大概是因为婚期的假设叙述于第五章《故山归兴尽》的开篇部分，而《一百五日夜对月》的证明则出现在这一章的结尾部分，很少有人会将两者联系到一起进行考察吧。

①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引自《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23页。

再如谈到杜甫《酬高使君相赠》的尾联"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时，洪业认为，"杜甫答诗的最后两句也就可以相应地理解为退休并不真正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他还是希望以文学才能为皇帝服务，就像扬雄在汉朝所做的那样。"我认为，此处的"扬雄"似乎应该改为"司马相如"才对。因为，"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一联应该理解为："我没有扬雄写《太玄》的能耐，但是在作赋方面或许能和司马相如一比高下。"这其中带有某种反讽意味。扬雄其人有"剧秦美新"之论，这种主动附逆之举是杜甫绝不会附和的。另外，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高于扬雄，扬雄的若干作品就是效法司马相如的。杜甫说过"赋料扬雄敌"，又说"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正好说明他心目中想要赶超的目标并非扬雄，而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曾为汉武帝作劝百讽一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和封禅遗表，这和杜甫作三大礼赋、《封西岳赋》无论在题材还是主旨上都极其相似，故杜甫有此语，恐怕其中既有自豪，也有自嘲，耐人寻味。洪业先生此处理解恐有误，而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中卷，640—642页）也没有指出杜甫的这层深意。

《杜甫》一书中还有一些提法，当时未觉不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今天看来就需要修正了。例如书中谈到李白时说"他被召到长安，授予了翰林院的职位，这是一种皇帝的私人秘书性质的工作"，80年代以来，对唐代翰林学士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①]，我们知道李白担任的是翰林供奉，与私人秘书性质的翰林学士是差异很大的两种职务。

又如，第十章《何地置老夫》中提到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意识到严武幕府中有些年轻同僚对他怀有嫉妒"，但洪业并未进一步加以发掘。对这一问题，后来万曼先生有精彩的发挥，其《读杜札记》指出，幕僚中"和老杜不能合作的，便是老杜的从孙杜济"。万曼根据颜鲁公为杜济所作的《神道碑》得出结论，"严武再入蜀，便是和杜济一路由长安同来，杜济是行军司马，杜甫是节度参谋。所以杜甫从一入武幕，便感到不甚如意。"[②]此说颇

①相关著述如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傅璇琮先生的系列考论《唐德宗朝翰林学士考论》（与施纯德合写，《燕京学报》新十期）、《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等，以及马自力《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国学研究》第九期）等。

②万曼，《万曼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652页（原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1期）。

能启人之思。如果我们还记得杜甫在长安时期所作的《示从孙济》中披露出来的杜济对他那不耐烦的待客之道，可以想见两人之间早就有矛盾了。我的推测，这是性格气质和处事做派的冲突。杜济显然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干才，颇瞧不上老杜的迂阔而不切事情，更何况杜甫很可能还对他摆出从祖的资格，自然使他越发不能容忍。有时候，激烈的冲突反而来自原本关系更近一些的人。生活中往往有这样合理的意外。

和全书的博大相比较，些许瑕疵不足以损其全璧。求全责备，唯对事不对人。百密一疏，易地而皆然。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曾说过："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辩证也易，何者？……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辩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①]日月流逝，学术渐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月旦铨评，可不慎欤？我译《杜甫》一书，觉得洪业先生以及他那一辈学者最不可企及者，在其笔端常带感情，而每能以史实为依托，发挥其想象力与价值判断。

第七章《万国兵前草木风》一开篇，洪业通过对 11 月 16 日诏书向四方传递速度的详细分析，论证了杜甫 757 年 12 月 8 日随驾返京的可能性。史学考证的能事已毕，他忽然笔锋一转，写道：

> 不，不能夺去杜甫的这段经历。就像写我们当代英雄乔纳森·温莱特将军（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令人崇敬的经历，而把他于1945 年 9 月 2 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见证日本投降的经历抹杀掉一样。爱国精神是杜甫性格中杰出的一部分。在经受了这么多颠沛坎坷之后，757 年 12 月 8 日这一天对杜甫来说一定终身难忘。我可以想象杜甫看到长安城前欢呼和哭泣的人群时是如何的喜不自禁、老泪纵横……我们完全可以说，长安光复之后的这几个月是我们诗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唉！就是太短暂了。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8 页。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象经历过侵华日军囹圄之灾的洪业的爱国激情！这种情感，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小引》、冯友兰《贞元六书》诸序中也可以看到。洪业先生的考据名篇《破斧》的结尾同样带有这种想象力和价值判断相结合的深长意味。在几乎"涸泽而渔"了汉人以降对《破斧》一诗长篇累牍的诂训义释之后，他同样笔锋一转，指出"('我人')其所指者为那些亲朋戚好为国捐躯长逝而不返者矣"。因此，归来者"虽都庆幸东征的成功，也许还觉得成功的代价已太重了。如果《破斧》一诗可让我们这样地来解释，那么，作此诗之人，比曹松早了1900年，已感觉得：'一将功成万骨枯。'"①这种"性灵"的解释使人在学理迷宫的曲折摸索之后，顿时有醍醐灌顶的畅快。正所谓彼可学而得，此不可学而得矣。

第十一章《夔子之国杜陵翁》中，洪业描述杜甫旅居之夔州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状况，"一条褐色、闪着波光的奔腾大江，被两座山峰截断，八阵图在瀼口附近的西边，滟滪堆在东边，夔州城在南边……城池的西南侧位于从江上突然崛起的一块大岩石上。岩石上还有一座木制的建筑物，能居高临下鸟瞰大江和江岸的大部分区域。这可能就是西阁，在其上层也有为官方客人准备的住处……从766年仲秋开始，杜甫的很多诗篇都作于西阁，或者涉及西阁，或者描述在西阁上所见到的情景。这些诗篇都带有孤独的意味，没有提到家人和他在一起。似乎杜甫不愿意让官方的招待惠及自己的家人。他将家人留在瀼东郊外山麓边的房舍中，只时不时回去小聚。"然后他发挥说：

> 从《西阁雨望》一诗可以推断，西阁上层有一个带朱红油漆栏杆的走廊，也许环绕这个建筑一周。可能就是在这个走廊上，我们的诗人饱览万象，倾听群籁，然后将它们写到这些诗篇之中，如《秋兴八首》。

我得承认，尽管非常熟悉《秋兴八首》，但是读到这里不禁击节，似乎对它们又有了新的阅读感受和理解。洪业先生一定深谙为文之道。试想，当诗人处于创作状态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能够凭栏高阁，寂然独处，胸中往事，

---

①洪业，《破斧》，《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375页。

眼底山河，内忧外患，相互激发，故国平居有所思，伟大作品在心中潜流暗涌而呼之欲出，这是何等境界！不过，文学创作和论著写作又不一样，后者更需要切磋砥砺，异论相搅，擘绩补苴，臻于完善。就这一点而言，据说洪业先生在哈佛论学的环境似乎稍觉落寞。还好，在寂寥之中，他有杜甫这样古道热肠的敦厚之人相陪伴，我们才有幸读到《杜甫》这本书。

1970 年，晚年的洪业写成《半部论语治天下辨》，其中一条注释，提到《论语》有一句“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苏东坡以为后半句有阙文，应当作“患不得之”。洪业先生走笔至此，忽然题外起兴，添了一句：“业案，苏东坡真聪明可爱。”这句对苏东坡的评价，心目中必然有林语堂《苏东坡传》在①。洪业读《苏东坡传》，觉得苏东坡“聪明可爱”。他写《杜甫》，这样描述诗人的性格：

> 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他为人一贯实诚可敬，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

对洪业而言，《杜甫》也是他的发愤(worry)之书(words)、忧患(worry)之作(words)，他以此书浇(wine)胸中之块垒。不妨说，通过对杜诗的研读和写作，洪业与杜甫相濡以沫，气息共通。因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洪业成为杜甫的忠臣；因为一千四百余首不朽诗篇，杜甫成为洪业的挚友。洪业写《杜甫》，认为杜甫“实诚可敬”；我译此书，对洪业先生的印象也同样如此。

---

①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一文提到：“据洪煨莲先生告诉我，这本书(《苏东坡传》)出版时(1947 年)不能畅销，关键在于书名的‘Gay’字引起了误会。”(《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466 页。)

《剑桥中国文学史》简介

——以下卷1375—2008为例[①]

孙康宜

有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宗旨

《剑桥中国文学史》(已于2010年4月出版)当初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向我约稿,考虑到卷头浩繁,我进而约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与我共同主编该书,同时邀请其他十多位欧美汉学家分别撰写书中各章,前后历时共五年之久。大致说来,宇文所安负责主编上卷,我则负责下卷,但在编撰过程中两人不断讨论并随时互相参照,其过程十分琐碎。不用说,对于两位编者和其他作者们,这是一件极其辛苦的大工程。大家之所以愿意任劳任怨地为这部新的文学史努力耕耘,主要因为在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几年算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刚出版

作者单位: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学系

①本文乃根据本人所负责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Volume 2)之序文增补改写而成。(参见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s 1 &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olume 2: 1375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Kang-I Sun Chang.)本文初稿的写作承耶鲁同事康正果先生大力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①。而且，最近荷兰的布瑞尔公司(Brill)也计划出版一部更庞大的多卷本。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撰写一部剑桥中国文学史呢?《剑桥中国文学史》到底有何特殊性?

首先，《剑桥中国文学史》乃属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相同，其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当然，研究文学的学者专家们也该会是本书的读者)。但不同的是，剑桥文学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却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巧合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下卷在年代上正好大致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欧洲卷相同，且十分具有可比性。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普通的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贯谐调，有利于读者从头至尾地通读。这不仅需要形式与目标的一贯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要不断地互相参照，尤其是相邻各章的作者们。这两卷的组织方式，是要使它们既方便于连续阅读，也方便于独立阅读。上卷 和下卷的引言也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设计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欧美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需要之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以使他们在读完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换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要利用这个凡事追求全球化的大好机会，来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

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还希望呈现以下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尽力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性地分割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历史方法:即一种文化史或者文学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r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这种叙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时期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时期则变得愈益

①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困难起来。为此，需要对文化史（有时候还包括政治史）的总体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易言之，唐朝那一章不被机械分割为"唐诗"、"唐散文"、"唐小说"，甚至"唐词"；相反，将有"玄宗统治时期的文学文化"，或者"9 世纪早期的文学文化"，以处理诗、散文、传奇（anecdote books）、故事等等。当然，文类问题是绝对需要正确对待的，但是，文类的出现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将首先澄清文类所扮演的角色，而这在一般以文类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史中是难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是也必然问题重重。《剑桥中国文学史》并非为反对标准的惯例而刻意求新。但最近许多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传统的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着根本的缺陷。但习惯仍常常会胜出，而学者们也继续按朝代来分期（就像欧洲学者按照世纪分期一样）。在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期，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踪不同时期思想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①。

一般来说，人们早已认识到，唐太宗的统治是 6 世纪传统的继续，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进程中，北方（北齐、北周、隋以及初唐）吸收了南方那种复杂精制的文学文化。按照这一思路，《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撰写时就特别认真地参考了几个世纪以来批评家们的意见——尽管现存的文学史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以隋朝或者唐朝建立之时作为断章之处。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不是将"五四"置于"现代性"的开端，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进程中。这是认真参考最近学术成果，并重新阐述"传统"中国文化在遭遇西方时的复杂转化过程的一种方法。在每一卷的引言中，对分期的理由都作了说明。

---

①比如说在第一册里，宇文所安写的是唐代文学文化史，但那章所涵盖的时期则是 650 年至 1020 年，与一般以朝代的分期法不同。此外，普林斯顿大学的 Martin Kern 所写的是古代一直到西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 David Knechtges 写的是东汉到西晋。哈佛大学的田晓菲写的是公元 317 年至 649 年。加州大学的 Ronald Egan 写的是 1020—1126 年的那段。另一位加州大学的 Michael Fuller 和密歇根大学的林顺夫合写第 12 至 13 世纪那章（包括那段时期的南北文学史），亚利桑那大学的 Stephen West 则写 1230 至 1375 的那段。在第二册里，我写的那一段就是明代的前中期，大约从 1375 年到 1572 年。我的耶鲁同事 Tina Lu 写的是从 1572 年到 1644 年。哈佛大学的 Wai-yee Li 写的是清初到 1723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写的是 1723 年到 1840 年。哈佛的王德威写的是从 1841 年到 1937 年。加州大学的奚密（Michelle Yeh）写的则是由 1937 年到 2008 年 的文学（其中还有 耶鲁的 Jing Tsu 和 英国伦敦大学的 Michel Hockx 个别撰写的篇章）。

另一个随着文学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现的特点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尽力考虑文学过去是如何被后世所过滤并重建的。(Chinese literature is a constant rereading of the past.)这当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间进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过去的文学遗产其实就是后来文学非常活跃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学史叙述才会拥有一种丰厚性和连贯性。当然,将"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仅要包括批评(常常是针对过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种文学研究成就、文学社团和选集编纂。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思索文学史的方法。正是从这一关注出发,我们决定什么东西可存留下来以及如何和为什么将其存留下来。同时,也要讨论为何许多文学作品(尤其在印刷文化之前的时期)都流失的原因。

总之,这个两卷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既要保持叙述的连贯性又要涵盖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向。

以下卷 1375—2008 年为例

如上所述,《剑桥中国文学史》共分两卷,仅就下卷所跨越的年代而言,即相当于该系列欧洲文学史中任何一卷的长度。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采用按朝代分期的方式,本书自然也未能免俗。若按照常规,本应以明朝的开国年 1368 年(明洪武元年)划分上下两卷,但本书选择了 1375 年。这是因为相比之下,1375 年更引人注目,更有历史意义。截至 1375 年,像杨维桢(1296—1370)、倪瓒(1301—1374)和刘基(1311—1375)等生在元朝的著名文人均已相继去世。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前一年朱元璋处决了大诗人高启(1336—1374),开启了文禁森严、残酷诛杀的洪武年代,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尽。

直到永乐年间,明成祖开始奖掖才俊,重振宏业,明朝文学才在一度禁锢后有了起色。这样看来,以 1375 年作为本书下卷的开端,不只显得分期明确,而且也确立了一个具有本书特色的分期原则,可作为沿用于其后的惯例。比如,在第六章王德威所编写的现代文学部分,"现代"的开始便定于 1841 年,而非通常所采用的 1919 年五四运动。我们写的是文学史,而非政治史,一个时

期的文学自有其盛衰通变的时间表,不必完全局限对应于朝代的更迭。

本卷的编写特别重视从明清直到今日的文学演变。在目前常见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中,往往表现出重唐宋而轻明清的倾向,而对于现当代文学,则经常另行处理,很少与古代文学衔接起来,汇为一编。中国的传统文评大都重继承和崇往古,因而晚近年代的作家多受到忽视。本卷的编写一反往常,在作家的选择及其作品的评析上,力图突出晚近未必就陷于因袭这一事实,让读者在晚近作家的优秀作品中看到他们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和突破。读完了本卷各章,你将会看出,从明清到现在,文学创作的种类更加丰富多彩,晚近的文学已远远超出了诗词歌赋等有限的传统文类。

与上卷的原则一样,本卷的着重点不以个别作家或人物为主,而是偏于讨论当时写作形式和风格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对文学多样性的追求。当然,我们仍然坚持叙述方式要按时代先后(即所谓 historical)来决定各章的先后顺序。唯一的例外是伊维德(Wilt Idema)所写的有关弹词宝卷那一章,其中所收多为通俗文学的材料,时间跨度较长,有些作品,很难判定属于哪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此类作品较晚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且多数均无明确的作者,即使极少数有作者署名的作品也难以断定创作和出版的时间和地点。基于这个理由,伊维德所写的那一章并不按时代先后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伊维德很照顾到其他各章的内容与其相互间的关联,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那章对其他章节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此外,凡在日本、韩国和越南出版的中文作品,一般均不予讨论。一因受限于本书的编写体例,二因已有其他书籍——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提及相关的信息,无需本编再作重复。但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的第一章(由我本人执笔)则有所例外。从明初到明中叶,某些作品在中国本土与东亚各国间流传甚为频繁。这与当时的文禁(censorship)及作者本人的有意回避(self-censorship)有一定的关系。也只是在此一特殊情况下,中国与邻近各国的相互影响才成为中国文学史应予关注的一个问题。例如瞿佑的《剪灯新话》曾被明朝政府查禁,但该书却在韩国、日本、越南广泛流行,并引起很深刻的跨国界文化影响。藉研究此一文学交流的现象,可看出作家的生花妙笔的确有跨越国界的感染力。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与东亚各国交往增

多，不少作家写起了异域游记之类的作品。直至清代中叶，如商伟在他所写“文人时代及其衰退：1723－1841”一章中所叙，中国及其邻国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上仍维持着密切的关系。

地缘文学（regionalization）的现象也饶有兴味，但本书所谓“地缘文学”的内容则大都只限于中国本土的范围之内。在本卷的每一章中，均讨论到重要的地域性文学团体或流派，特别是那些在全国范围内深具影响的团体或流派。例如在我所执笔的那一章所指出，原来在明代中叶，由李东阳和号称“复古派”的“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其文学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但到了16世纪初期，文学中心则渐渐转至江南一带。这一转变是随着江南地区早在15世纪末就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的情况而突现出来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北方的复古派文人都在朝廷位居高官的情况完全不同，江南——特别是苏州——的诗人和艺术家则多半是靠卖诗文和书画为生的。此后，苏州更以女诗人辈出和文人扶持才女的持久传统而著称于世。苏州文化的阴柔气质体现了风流唯美的特征，与北方文学的阳刚风格形成迥然不同的对比。

印刷文化也是本卷另一个特别关注的内容，诸如文本制作与流传的方式，乃至读者群的复杂成分，均在各章的讨论范围之内。特别是在Tina Lu所写的“晚明文学文化”一章中，对万历年间印刷业飞速的商业化发展作出了专门的描述。仅在此一时期，所印制的商业印刷品比前五十年就要多六倍。因此，文学作品的读者在当时不只人数剧增，而且成分多样。正如Tina Lu所解释，墨卷、曲本和内训等出版物前所未有地充斥书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青楼女子赋诗填词，与文人聚会酬唱。与此同时，像臧懋循（1550—1620）《元曲选》之类重新编排的元杂剧也大量出版，尽管在此前剧作家李开先（1502—1568）改编的很多元杂剧文本已出版问世。由这些晚明的事例即可看出先前的文学作品在后来被赋予新解和加以创新的情况。

虽然本书基本上不采取严格的朝代分期，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不同已往，在此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清初的文学深受世变的影响，而且具有浓厚的晚明遗风。在这一江山易主期间，涌现了很多悼念前朝的作品。因而尽管有关清朝起始之年的记载众说纷纭，本卷还是以1644年，即顺治元年作为第

二章和第三章的划分。按照李惠仪(Wai-yee Li)在第三章“清初到 1723 年”的说法,“晚明”这一标签基本上是个“清人话语”,如果说清初的作家“发明”了晚明,那正是因为他们一直要“确认他们所遭遇的历史时刻”。在这一重新确认身份的压力下,清初作家常常面对着以明遗民自居还是归顺新王朝的艰难抉择,尽管两个阵营之间的区划尚有诸多含混不清之处。因此,这一时期以政治和地区归属为取向的文学团体空前繁多,从而也导致了文学形式的新变。比如曾作为复社名流大本营的江南地区,后来就成为清代戏剧文化——特别是政治性的戏剧——的中心。

晚明的名媛传记——特别是其逸事多与朝代兴衰相关的名妓——同样盛传于清代。从余怀《板桥杂记》和冒襄《影梅庵忆语》等作品的流传不但可以看出晚明风流佳话入清后的流风余韵,而且通过艳传风尘女子的本事,文人也寄托了他们对先朝的怀念之情。与之相反,像李渔(1610—1680)这样的作家则致力于创新,不再以怀念晚明为主。可以说,在其标新立异的小说中,李渔大多以“明哲保身和世俗的实用自利”为主题,即李惠仪所谓的“compromises, pragmatism, and self interest.”

在清朝统治下的汉人特别面临着文禁森严的问题,从康熙年间(1662—1722)开始,严酷的文字狱一直威胁着舞文弄墨之士。在这一时期,忠于先朝的诗人只好以婉转幽深的比兴手法寄托自己的怀抱,以免招惹文祸。然而,即使如此曲笔隐晦,也未必能避过文祸,比如两位《明史》编修即因触犯禁条而在康熙初年被判处了死刑。在康熙末年,戴名世因《南山集》语涉违碍而遭到满门抄斩一案更为骇人听闻,成为清代文字狱最血腥的案例。

乾隆年间(1736—1796)的文字狱甚至更为惨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制造文字狱的皇帝同时又最热心于编纂图书,中国最大的图书集成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他在位期间完成的。漫长的乾隆盛世尽管文采斐然,却也不无矛盾冲突。在商伟所写的 1723 至 1840 年一章中,重点讨论了吴敬梓《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红楼梦》的成书及相关问题。与成书于明朝的《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和《金瓶梅》的商业营利取向截然不同,这两部在乾隆年间那种特殊环境中成书的文学名著则完全与出版赢利无关。当然,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商业性的出版在清朝不重要,而是表明像吴

敬梓和曹雪芹这样的边缘文人既远在官场之外，又与当时的书肆和地方戏曲文化无缘，因而他们在世时寂寞无闻，他们的作品埋没多年后才为世所知，只是19世纪以降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现代读者的推崇，这些成书于18世纪的文人小说才成为经典之作。这一有趣的接受史个案不只涉及接受美学的问题，也关系到文化和社会的变迁。

在18世纪后半叶，女作家人才辈出，在文坛上群星灿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引人瞩目的景观，被视为妇女文学史中的第二次高潮。与17世纪的第一次高潮相比，18世纪的女作家在写作种类上更加多样，除了传统的诗词创作，还有不少人从事叙事性弹词和剧本的创作。她们大都出身仕宦人家，与晚明时期青楼才女独领风骚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及至18世纪末，所谓的"名妓"在文坛上已声名大减。

但这并不意味着青楼才媛此后便永离文坛，再也与文人无缘。在王德威所写的"1841至1937年中国文学"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歌妓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依然是一个常见的人物原型，很多晚清作家的小说都大写特写这些花街柳巷里卖笑的尤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该书先是由张爱玲译为英文，后来又经Eva Hung修订，已于200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王德威所见，晚清时期有关妓女的叙事作品与前此的同类作品有着根本的区别：晚明文人写风尘香艳，多含有象征意味，而清朝的狭邪小说则实写嫖客与婊子的调笑狎昵之私，标志了现实主义文学新方向的滥觞。

诚如王德威所说，现实主义的实践和话语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主体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因为反映现实的需求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在那个国难当头，而文人群体也面临生存危机的年代，像《官场现形记》之类的谴责小说已预示了鲁迅、老舍和张天翼等作家在他们的新小说中写实传真的追求。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现实主义为这些现代作家提供了观察生活的新角度，而与此同时，随着女作家走上新文坛，更以她们女性的新声扩展了现实主义的领域。需要强调的是，除了现实主义的范式，现代中国作家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体裁和风格，诸如表现主义、自然主义和抒情主义，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涉猎，蔚为大观。即使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不同的作家也

风格各异，均以各自独特的声音而取胜。正是这一众声喧嚣的动力在晚清到五四后几十年间促使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文学有一个生生不息的特征，那就是现在与过去始终保持着响应和联系。即使在现代文学创作中，作家也没有切断他们与已往文学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性"就是从重新读解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和古文开始的。正如王德威所说，中国人今日所理解的"文学史"是直到晚清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1904年，随着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正因建立了文学史这一新的学科，在现代作家和读者的眼中，文学的源流才如一江春水滚滚而下，将往古的生命输送到了未来。

现代中国文学另有一必须一提的方面，那就是19世纪至今对西方文学及其话语的译介。之所以特别要提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诱人的课题一直为文学史编写者所忽略，我们有意要填补这个学术空白。随着各种翻译作品——从基督教经文到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不仅修正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规模的理解，也增进了我们对印刷文化的认识。正如Michel Hockx在其《印刷文化和文学社会》一文（见第6章第4节）中所说，最早的现代印刷出版是由传教士从西方带入中国的，而且首先是用于出版翻译作品的，其出版物的内容以宗教和文学为主。只是到后来，中国的商业性书局才采用了洋人带来的新技术，以迎合城市中新读者群日益增长的需求，正是此类文化交流的新方式丰富了世纪末的文化景观。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与大多数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不同，本书的编写更偏重文学文化的概览和综述，而不严格局限于文学体裁的既定分类。体裁的分类固然很重要，但应置于文学文化宏大的系统中予以通观。因此，奚密（Michelle Yeh）在其所写的一章（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章）中并未沿用"现当代小说"和"现当代诗歌"这类通行的分类，而是以"抗战（1937—1945）及内战"和"战后和新时期（1949—1977）"这样的标题统领全章的内容，将各种文学景观按不同的地域分别介绍和讨论。按地域分述的方式显然更为生动，有助于读者理解当时的文学景观，由于战争造成的分割——如国统区与解放区或沦陷区之分，以及大陆与港台之分，中国文学再也难以笼而统之地

讲解给读者了。战争造成的分裂使中国作家陷于日益离散的复杂境地，同时也催发了新的文学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危机致使不同区域的作家做出了各不相同的选择，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台湾的白色恐怖期间。

本书最后一部分综述了 1978 年至今的文学。就如奚密所述，这一时段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方向。这一时期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作家们在对区域和全球的变化做出反应时如何界定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创作。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作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著名小说家哈金——越来越多地移居国外，因而出现了作家国籍归属的问题（见石静远[Jing Tsu]为本卷所撰写的“后记”[Epilogue]部分）。此外，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后，更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分化现象，如有人被视为“外省人”，有人则以“本省人”自居，更有人高举反殖民旗号。香港的身份归属则更为复杂，在外国人眼中，香港乃中国人的天下，但在某些中国人的眼中，那里不啻为外国。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我们在论及新文学时不能不考虑到如何划界和归类的纷争。

最近十多年来更有网络文学的兴起。正如 Michel Hockx 在他所写的章节“印刷文化最近的变化和新媒介的来临”（见第 7 章第 4 节）中所述，由于互联网登陆中国大陆为时略晚，最早的中文网络文学是在大陆以外制作的，台湾的网络文学就比大陆领先十年之多。早在 90 年代中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已出现了各种中文的网络文学作品，由此也导致文学网站于 1997 年左右在大陆出现。但诚如 Michel Hockx 所云：“要控制网络文学，得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作家的自我审查，并假定那些发表文学作品的网站因怕招惹麻烦而履行严格的管理。”

时至今日，尚无任何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讨论网络文学，本书可谓早鸟先鸣，开启了此一最新的研究领域。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对中国文学史做出包罗万象的综述，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年代，为具有文化教养的普通读者提供对口的读物。

一部值得重视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新作*

张海惠

由张海惠主编、薛昭慧和蒋树勇任副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China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and Resource*)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广达先生在为这部书撰写的封底推荐语中写道:"近年,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对于美国长期积累的研究中国的资源,对于美国日益多面向开展的中国研究,亟需做全面而具体、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本书应时之急需,各个篇章邀约在美的各个专门领域的专家执笔,扼要的综述既有助于我们进行资讯检索,又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美国研究中国的各个领域的既往与现状。"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这部书的内容和作用。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一书是第一次由在美学者执笔、对北美中国学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之第一本结集。由于身处美国中国研究学术界,各篇综述的撰写者不仅对自己所在的学术领域有更多、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有着与身在美国之外学者不同的观察视角。这本综述结集,不仅使北美过去几十年间的中国学研究信息融于一册,也有助于读者在了解每个独立学科的同时,了解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

作者单位: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

* 这篇文字依据为《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一书所撰"缘起及说明"改写。

为这部书撰写文章的北美中国学学者有数十位，他们的综述文章涵盖了北美学术界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书中绝大部分综述都是学者特为此书撰写的。

由于每个学科有其自己的发展历史，或为传统学科，或为新兴学科，该书采取了在学科发展现状基础上，以学科领域、断代、专题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篇章撰写工作。在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金鹏程(Paul Goldin)、李峰、陈美丽(Cynthia L. Chennault)和裴士凯(Scott Pearce)、陆扬、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柏清韵(Bettine Birge)、何义壮(Martin Heijdra)、罗友枝(Evelyn Rawski)、叶文心、程洪等对自早期中国(early China)至现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分别撰写了综述文章。针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热门"及颇具争议的专题研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就中国科技史研究，苏成捷(Matthew Sommer)就清代法制史研究，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就清代经济史研究，卢苇菁就妇女史研究，汪利平就城市史研究撰写了专题研究综述。在文学史方面，柯马丁(Martin Kern)、田晓菲、艾朗诺(Ronald Egan)、伊维德(Wilt Idema)、王斑等学者分别撰写了中国不同时段文学研究综述，田民则概述了近几十年北美中国戏剧研究的进展情况。在传统语言学研究领域，该书包括了梅维恒(Victor H. Mair)和李亚非有关北美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历史轨迹和现状的文章。宗教研究方面，则有陈怀宇和赵昕毅(Chao Shin-yi)对北美佛教研究，以及道教和民间宗教研究概貌和成果的详细阐述。

过去的几十年，北美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得以蓬勃开展，并成为汉学研究向中国学研究转变和延伸的重要特征。尽管从整体上讲，书中社会科学研究综述文章所占比重仍然小于人文科学领域文章之比重，但几位学者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综述共同为北美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过去与现在做了全面揭示。边燕杰和周雪光分别从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以及中国组织现象两个领域对北美中国社会学研究作了十分全面的总结。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唐文方分别通过对 1949 年至 1999 年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钩沉，以及最新研究趋势简述的方式，对北美中国政治学研究作了展示。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以圈点中国经济研究演进

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列举吸引众多学者开展研究的课题，指出中国经济研究的拓新途径的方式，对北美中国经济研究予以扼要陈述。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就美国关于中国外交关系及安全政策/军事的专题研究作了详细梳理和分析。

此外，荣鸿曾(Bell Yung)的文章提供了中国音乐研究领域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学术信息。刘怡玮(Cary Y. Liu)就中国古代艺术史领域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演变作了具有特色的学术综述。高名潞则对美国当代中国艺术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状况作了既精要又重要的叙述。戎雪兰的中国教育研究综述、罗伟的中国法学研究综述都是构成北美中国学研究全图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至于撰写方式，由于各个领域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不同的发展现状，学者观察的角度也不同，每位学者都有其独特的撰写特点，例如，罗友枝是以专题叙述的形式，对北美清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和研究趋势作了概述；何义壮采取全面回顾和考察《明史研究》(*Ming Studies*)的形式，勾勒北美明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罗伟是通过对每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叙述来体现北美有关中国法学研究现貌的。不论采取哪种陈述方式，每篇文章传递的都是关于某一学术领域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学术信息。

为了展现北美在中国学研究博士生培养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以印证北美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事实，这部书还收录了徐鸿对最近5年美国大学有关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所作的定量分析，揭示这一领域博士生培养现状的文章。同时，为了表现北美汉语教学的发展轨迹，姚道中(Yao Tao-chung)和姚张光天(Yao Chang Kuang-tien)受邀特为该书撰写了北美汉语教学回顾及现状概说的文章。

翻开此书，读者可以从学者文章的字里行间领略到北美中国研究学术领域的一些特点，包括学术批评精神、学术研究兼容性和互动性。

所谓学术批评精神是通过不同方式体现的，例如，在北美、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领域，围绕彭慕兰(Kenneth Pemeranz)“大分流”之说已开展了近十年的学术争论，该书中的几篇文章对此都有所反映。同时，该书也收入了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撰写的反思清史和世界史之大分流论辩的文章。

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客观、如实地记录学术领域里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以及勤于思辨的方式体现了北美学术界所具备的学术批评精神。此外，这种精神还表现在学者们对目前北美中国学研究存在之不足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许倬云先生在其序文中指出，"'地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具备能出能入的反省功夫，既能从情境外做客观的观察，又能进入情境，领悟体会其不着言诠之处。如此回还映照，方能得到适当的分寸表达陈述。再进一步阐释解读，终于建构理论，以抽绎其普遍性的意义。"实际上是指出了北美中国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更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诚恳地就本研究领域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学术研究兼容性不仅体现在学者个人的研究中，也体现在他们对各自研究领域整体的反思上，体现在他们对学术健康发展的愿望上。李峰在指出早期中国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论"源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以及支撑各自传统的教育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中美两国学者应当运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同时吸取他人所长，将早期中国学研究视为全球性学问而共同努力和合作，才能将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唐文方则在其文章中强调，应当加强中国政治的比较研究，"中国纵然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教训，但若一味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则无法让世界分享中国的经验，也无法使中国政治研究融入作为人类最古老学科之一的政治学的主流中去"。

与此同时，不少文章所表现出的各学科研究成果之间的相互印证则体现了北美中国学研究各领域之间的学术互动性。例如，周雪光对涉及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在内的、不同社会科学学科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英文文献作了全面考察，在以一个全新视角对中国组织现象研究予以述评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和组织学之间互动和互惠的学术关系。又如，罗斯基不仅在其文章中对北美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还列举了非经济学家（如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家等）所取得的、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和成果。此外，几乎每位学者都对过去二十年来，中美两国学者之间日益增多的学术交流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这种良性互动视为北美中国学研究蓬勃开展、成果显著之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诚然，这些综述文章所论及的一些学术观点并非成熟，甚至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至今为止北美中国学研究现状的真实记录和表现。何况，这些文章除了展现北美中国学研究全貌外，也确确实实显示出了一些或许多少值得国内学术界重视和借鉴的东西，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术批评精神、学术兼容性和互动性外，还有关于研究题目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采用，学术研究社区的建立等等。此外，这些文章所表现出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清晰的学术脉络，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丰富的学术信息是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首先，学者们在通过学术研究综述的形式，总结过去几十年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对未来本研究领域的学术走向和发展前景作了预测。这些预测是学者们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队伍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做出的，可以被视为重要的学术信息。其次，除综述文章本身，文末注释是为读者提供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学术文献信息的一个重要方式。全书所提及的中国学研究学者千余，学术成果数千种。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近几十年来北美中国学研究的迅速发展，除学术研究队伍壮大，学术成果丰硕外，也表现在中国学研究文献服务工作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学术研究是离不开高水平的专业文献资讯服务和支持的。这本书的编辑团队第一次尝试学者与文献资讯人员合作展现北美中国学研究全貌的做法，收录了数篇由北美中国学研究文献资讯人员撰写、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电子资源和专题文献资源的评介文章。文章的作者都是北美东亚图书馆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北美近年来有关中国学研究专题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给予了梳理和阐述。不论是对某一具体数据库的介绍，还是对某一类专题文献的叙述，都为读者提供了海外中国学，特别是北美中国学研究文献资源的重要信息。

由于这部书包括了几代北美中国学学者、学术研究成果、学术及教学机构等有关北美中国学研究的大量信息，可以说这部书同时具备了北美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功能。

在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先生为这部书所撰写的跋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美国中国学是当前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学研究之一，甚至颇有些世界中

国学研究领头羊的作用。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崛起、中美影响在世界范围的提升,美国对于中国学的研究也将有更大发展;同样,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反研究,也会加强。”如朱先生所言,不论是了解过去几十年北美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还是中国学者对北美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反研究,这部书都将起到具有地标意义的重要作用。



基地纪事

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纪要

基地办公室

2010年3月12日下午，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五讲在北大静园二院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矶部彰先生，主题为“日本镰仓时代明惠上人与宋代佛教故事”。矶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小说史，他善于将版本目录学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西游记》研究方面成果尤为卓著。本次讲座，矶部先生以日本镰仓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人物——明惠上人为个案，梳理了他与日本高山寺所藏、记载新罗僧人义湘、元晓入唐故事的《华严缘起绘卷》之间的关系，指出了镰仓时代僧侣群体在宋朝、日本、高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此外，矶部先生对镰仓—室町时代中日在宗教交往、文学史影响以及图书交流等诸方面的特点都作了介绍，并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研修基地潘建国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刘玉才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文、史、哲院系的部分博士生出席了讲座。

2010年5月26日下午，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六讲在北大静园四院会议室举办，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杉山正明教授作了题为“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的讲座。

杉山先生以“文明”一词在日语中的出现为切入点开始了讲演。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关于世界文明总体格局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亚述帝国和中国的历史，杉山先生提出，亚述和夏、商时期的中国同属于一个文化圈，而其与

希腊、古伊朗等古代文明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属于同一个世界，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文明仅仅起源于希腊的观点与近年来中亚史的研究并不相符。杉山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下，包括佛教造像在内的各种东方文明都被视为希腊文明东传的结果，但近年来的中亚考古和古史研究纷纷证明，东方文明有着自己的发展传统，过分强调"希腊化"并不合适。

接着，杉山先生具体阐述了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他指出，中国文明的发展并不孤立，《周礼·考工记》与印度的《实利论》关于都城建制的构想惊人一致，而在乌克兰的墓葬中发现的汉代漆器以及考古发掘发现的中国造纸术的传播等，都揭示了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的影响力。但自明初以后，中国逐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同一时期，西方文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航海术的发达更使得西方文明迅速扩张到全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近代中国文明的落后，而世界史也就此被彻底改变。

最后，杉山先生指出，中国拥有十几亿的民众，而海外华人更是分布于世界各地，他相信日益复兴的中国文明将把整个世界引入到一个新的秩序中。

讲座由基地荣新江教授主持，历史系王铿老师任翻译，历史系牛大勇教授（系主任）、罗新教授、中文系刘玉才教授以及文、史、哲、考古等专业数百名学生到场倾听了讲座。

2010 年 5 月 28 日下午，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七讲在北大静园四院会议室举办，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杉山正明教授作了题为"马可·波罗的谜团与真相"的讲座。

杉山先生的讲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其事的研究。他指出，围绕马可·波罗存在许多谜团，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争议便是这个人是否存在、他是否到过中国。杉山先生为解决这些谜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今年 1 月份，他翻阅罗马教廷出版的拉丁文档案，发现其中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与世间的传闻有许多共同之处，颇足证明马可·波罗其人、其事的真实性。

讲座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研究。杉山先生指出，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超过 140 种，但其中主要的只有 5 种，尤以 Fr.

1116本为最重要，系由欧洲学者整理、研究。但由于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欧洲学者多不懂汉语，加之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亦了解不足，故而在研究中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目前，《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亟待中国学者的加入。他希望北大的师生利用自身的优势，邀请对波斯文等素有研究的学者，共同整理出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定本。

讲座由历史系李孝聪教授主持，王铿老师任翻译，基地荣新江教授、历史系张帆教授以及上百名学生出席了讲座。

2010年6月10日，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八讲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陈怀宇先生作了题为“北美中国佛教研究概述”的讲座。陈先生首先介绍了北美佛学在北美中国学领域里的微妙地位，指出北美中国佛学与藏传佛学、日本佛学以及南亚佛学相比还不算繁荣，这种现状的形成有欧美殖民时代学术取向的影响。他在讲座中将北美中国佛教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开创酝酿期（20世纪60—70年代）、学术积累期（20世纪80—90年代）和特色形成期（20世纪中期以来），并分别介绍了三个阶段主要的学者及其代表性著作。他也对北美中国佛教研究对中国佛学的贡献作了精辟评价，进而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应有的反思。讲座由基地荣新江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位教师与文、史、哲相关院系的研究生出席了讲座。

2010年6月18日，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九讲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台湾南华大学文学系郑阿财教授作了题为“文献、文学与图像：从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五道将军信仰”的讲座。郑教授首先陈述了选题缘由，在对传统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路数作了简单回顾之后，他指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偏重文献，过于褊狭，如果能使用图像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将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他在报告中详尽罗列了佛教经典、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中有关五道大神的文献记载，并结合相关图像材料进行精辟分析，对五道大神的职司范围、形象特征及五道大神信仰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反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讲座由基地荣新江教授主持，文、史、哲相关院系的研究生出席了讲座。

2010年6月21日下午，由基地组织的国际汉学报告会（No.1）在静园一

院会议室举行。韩国鲜文大学中韩文献翻译研究所朴在渊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住吉朋彦准教授作为报告嘉宾出席了会议,基地刘玉才教授主持了报告会,中文系钱志熙、王岚、许红霞教授,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和文、史、哲专业的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朴在渊教授报告的主题为《关于朝鲜后期的抄本汉语会话书》。关于朝鲜的汉语会话书,此前学术界比较了解的是《老乞大》和《朴通事》,而近年来,在日本、韩国的一些藏书机构陆续发现了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汉语会话书,经过学者的初步研究,确定为朝鲜后期手抄本。朴在渊教授长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调查与研究,本次报告的就是他近年来关于这些抄本汉语会话书的研究成果。朴教授首先介绍了《学清》与《你呢贵姓》、《中华正音》与《骑着一匹》之间的版本传抄关系,又通过比勘韩国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日本东京大学阿川文库、日本驹泽大学濯足文库所藏不同版本的《中华正音》,结合抄本中的朝鲜语注音、注释,对该书中此前难以理解的汉语口语词汇进行了疏解,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东北官话对近代朝鲜语的影响。讲座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为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住吉朋彦准教授报告的主题为《五山版与中世日本汉学》。五山版是日本镰仓—室町时代最为重要的刻本系统,它是以镰仓五山(即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和京都五山(即五山之上的南禅寺和相国寺、天龙寺、东福寺、建仁寺、万寿寺)为中心的版刻印本。由于其曾大量翻刻中土文献,因此在中日文献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住吉先生长期从事五山版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他首先介绍了五山版的产生过程,指出南宋时期佛教临济宗在日本的流传是五山刻书的最初动因,而在日本中世的早期,五山版刻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临济宗各派僧人的传教语录,起初是翻刻中土的宋僧语录,后来也有日本僧人仿照中国体例,自行编辑宋僧语录刻板,例如《禅仪外文集》。接着,住吉先生又介绍了五山版的发展演变,即中世后期,随着日本僧人对世俗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五山版所刻的书也逐渐由佛教语录转变为世俗典籍,包括《范德机诗集》、《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内的集部诗文集以及《春秋经传集解》、《庄子鬳斋口义》等经、

子典籍陆续出版。最后，住吉先生专门介绍了五山僧人对中国世俗文学的学习与传播，并阐述了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住吉先生在报告的过程中展示了大量五山版的版刻书影，图文并茂，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报告完毕之后，与会各位老师还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与两位教授进行了交流。



矶部彰教授演讲，矶部祐子教授现场翻译



朴在渊、住吉朋彦教授出席基地国际汉学报告会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大事记

基地办公室

2010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在静园二院会议室举办了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五讲。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著名汉学家，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矶部彰先生，主题为“日本镰仓时代明惠上人与宋代佛教故事”。研修基地潘建国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刘玉才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文、史、哲等院系的部分博士生出席了讲座。

2010年4月9日，“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遗著手稿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孟森先生的后人将一批珍藏多年的孟森遗著手稿无偿捐赠给



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华书局部分
专家学者与孟森先生家属出席捐赠仪式

研修基地永久珍藏，并提供给学术界研究使用。出席捐赠仪式的有孟庆夔、孟庆瑞等九位孟森先生的亲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何龄修，中华书局顾青、俞国林，北京大学张传玺、牛大勇、郭润涛、孙家红等专家学者，以及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袁行霈、主任助理程郁缀、图书资料委员会委员潘建国和《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主编刘玉才等。仪式由潘建国教授主持，孟庆瑞先生、何龄修教授、张传玺教授和郭润涛教授等来宾致辞，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助理程郁缀教授总结发言，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北大国学院院长袁行霈教授与孟庆瑞先生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并向孟庆夔先生等人颁发了捐赠证书。此次捐赠的遗著手稿包括孟森先生的日记、手稿、函件、读书笔记、史料摘录等内容，字数多达三四百万。这是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所获得的第一笔社会捐赠。基地将设立完备的藏书制度，以最妥善的方式收藏和使用这批珍贵文献，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它的巨大学术价值。

2010年4月13日至16日，由国家汉办组织的专家团远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参加了由中国孔子学院与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西班牙文明对话”论坛。专家团以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袁行霈教授任团长，成员有北大社科部部长、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助理、中文系程郁缀教授，著名西班牙语言文学专家、西班牙文《红楼梦》第一译者、外语学院赵振江教授，哲学系王锦民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刘建教授。在论坛上，袁行霈教授作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主旨发言，程郁缀教授作了《中华文明的伟大载体——汉字》的发言。

2010年5月26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在历史系会议室举办了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六讲。本次讲座主讲嘉宾为著名汉学家，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杉山正明先生，主题为“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研修基地荣新江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历史系王铿老师任翻译，历史系牛大勇教授（系主任）、罗新教授、中文系刘玉才教授以及文、史、哲、考古等专业数百名学生到场倾听了讲座。

2010年5月28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在历史系会议室举办了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七讲。本次讲座主讲嘉宾为杉山正明先生，主题为“马可·波罗的谜团与真相”。讲座由历史系李孝聪教授主持，王铿老师任翻

译，研修基地荣新江教授、历史系张帆教授以及上百名学生出席了讲座。

2010年6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国外中青年汉学家进修项目正式启动。在这一项目中，基地将接收各国的中青年汉学家进行为期一至三个月的短期研究。自6月2日起，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住吉朋彦准教授等学者陆续抵京。此后，在2010、2011两年中，还将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加拿大等国的多名中青年汉学家进驻基地。

2010年6月10日，研修基地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八讲。本次讲座主讲嘉宾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陈怀宇先生，主题为“北美中国佛教研究概述”。研修基地荣新江教授主持了讲座。

2010年6月18日，研修基地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第九讲。本次讲座主讲嘉宾为台湾南华大学文学系郑阿财教授，主题为“文献、文学与图像：从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五道将军信仰”。研修基地荣新江教授主持了讲座。

2010年6月21日，由基地组织的国际汉学报告会（第一期）在静园一院会议室举行。韩国鲜文大学中韩文献翻译研究所朴在渊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住吉朋彦准教授作为报告嘉宾出席了会议。朴在渊教授报告的主题为《关于朝鲜后期的抄本汉语会话书》，住吉朋彦准教授报告的主题为《五山版



杉山正明教授发表学术演讲

与中世日本汉学》。基地刘玉才教授主持了报告会,中文系钱志熙、王岚、许红霞教授,历史系辛德勇教授,以及文、史、哲等专业的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2010 年 7 月,美国耶鲁大学 Malcolm G. Chace'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孙康宜向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捐赠图书。孙教授将其私人藏书的 95%捐给研修基地,其中包括大量中外文书籍、光碟,以及施蛰存先生信札等珍贵文献。这批书籍是继孟森先生手稿之后,基地接受的第二笔重要馈赠。为保持捐赠书籍的完整性,研修基地将设立"孙康宜潜学斋文库"集中收藏,并编制"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捐赠书籍目录"。日后,这批书籍将编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综合目录,向读者开放。

征稿启事

一、《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是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综合信息类刊物，办刊宗旨为报道国际汉学界在中国传统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搭建中外学者沟通交流的学术平台。本刊分设汉学论坛、文献天地、汉学人物、论著评介、研究综览、基地纪事等栏目，欢迎海内外学人赐稿或提供信息。

二、本刊暂定为半年刊，每年5月、10月出版。

三、本刊为中、英双语。来稿篇幅以中文一万五千字以内为宜，特约稿件不在此限。除经本刊同意，不接受已刊发稿件。论著评介栏目原则上不接受外稿，但可以推荐。

四、来稿请以电脑打印纸本，同时提供电子文档。如有相关图片资料，亦请随文附寄。撰稿请依照通用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并附参考文献。因编辑人员有限，恕不退稿，请自留底稿。咨询稿件处理事宜，请尽量通过电子邮件。

五、来稿如涉及著作权、出版权方面事宜，请事先征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书面同意，本刊不负相关责任。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删改加工，但发表前会征求作者意见。如不愿删改，请事先注明。

六、来稿刊出之后，即致赠稿酬、样刊。本刊享有已刊文稿的著作权和数据加工、网络传播权，如仅同意以纸本形式发表，请在来稿中特别注明。

七、来稿请注明中英文姓名、工作单位、职称，并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项联络信息。

八、来稿请寄：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100871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编辑委员会

E-mail：sinology@pku.edu.cn

附：

文稿技术规范

一、来稿请以Word文档（正文五号字，1.5倍行距）打印纸本，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二、来稿正文请按"一、（一）、1.、（1）"的序号设置层次，其中"1."以下的章节段落的标题不单独占一行；文稿层次较少时可略去"（一）"这一层次；段内分项的可用①②③等表示。

如：一、XXXX

（一）XXXX

1.XXXX

（1）XXXX。①XXX；②XXX；③XXX。

三、来稿中的中文译名，除众所熟知的外国人名（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地名（如巴黎、纽约）、论著名（如《圣经》、《资本论》）按照通用译名外，其他人名、地名、论著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请括注外文原名，如沃尔特·福克斯（Walter Fuchs）。

四、来稿中的注释，请采用页下注，每页各自编号，注号置于句末的标点符号之前，如孔子已有"六艺"之说①，"……将边界查明来奏"②。但引文前有冒号者，句号在引号内，则注号置于引号之外，如《释名》云："经者，径也，常典也。"③

五、页下注释文字的具体格式如下：

1. 著作类：著作者名，《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加"年"字），X—X页。又：著作者名，《书名》卷X，X年X本。

2. 杂志类：著作者名，《论文名》，《期刊名》X年第X期，X—X页。又：著

作者名,《论文名》,《期刊名》X 卷 X 号,X—X 页。

3. 西文书名与杂志名均用斜体,文章名加引号。日文、韩文参考中文样式。

4. 重复出现的注释不用"上同"简略,但标注文献出处只列著作、论文名和页码即可。

例:①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75 页。

②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清光绪八年查氏木渐斋刊本。

③袁行霈,《〈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7 页。

④池田秀三著,金培懿译,《韦昭之经学——尤以礼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5 卷 3 期,141—155 页。

⑤Ad Dudink, "The Chinese Christian Books of the Former Beitang Library",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VI (2004), pp. 46-59.

六、图表按先后顺序编号,在文中应有相应文字说明,如见图 X,见表 X。

七、数字用法:

1.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如 18 世纪 50 年代。

2. 中国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其他国家民族的非公历纪年,用中文数字表示,且正文首次出现时需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 722),清咸丰十年(1860),日本庆应三年(1867)。

3. 中文古籍卷数均用中文数字表示,如作卷三四一,不作三百四十一。